

序

现代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人类社会文明进入了一个快速化、多元化、整合化的发展新时期。在如此时代背景下，教育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发展机遇。教育牵动着社会的神经，教育的水平和成效，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进步状态的重要标尺，也是展示社会文明进步成果的重要平台。因此，教育历来备受人们高度关注。

饱经沧桑的中国教育，虽然经历了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发展道路，但不抱成见的人都能体认到，中国教育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据《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十五”时期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稳步发展，国民受教育水平显著提升，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5年。到2005年，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和初中毛入学率均达到95%以上，进入全面普及的新阶段。高中阶段教育规模继续增加，在校生达4 031万人。职业教育在改革中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实现历史性跨越，毛入学率达21%，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增强，成为

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将世界教育现状及我国发展的综合前景考察,我国人均受教育水平仍然不高,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仍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3年以上,创新型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不足,杰出人才缺乏。

如今,人们站在新的时代高度,面对世界现代教育的巨大冲击,怀着焦虑与希冀之情,对中国教育进行新的审视。著名科学思想家钱学森先生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既是关系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急迫、艰深命题,也是关乎国家发展与民族命运的一个重大问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求解。

直面“钱学森之问”,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求解。有人认为,“钱学森之问”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追寻的悠久深沉历史问题。也有人认为,应从消除传统文化之不足来求解“钱学森之问”。还有人认为,应从建设一流大学来求解“钱学森之问”。另外,有人认为应从消除教育行政化管制、根除学术腐败、健全科研创新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教育评价体系、改革考试录取制度,以及构建科学透明的教育发展决策机制等方面来求解“钱学森之问”。

当然,学无止境、术无定势,因而直面“钱学森之问”除了以上“求解”之外,也许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求解,或者还可能出现许多新的求解。无论哪一种求解之道,都体现了人们十分关注“钱学森之问”这道既关系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又关乎国家发展与民族命运的急迫、艰深命题,在某一角度、某一侧面或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为求解“钱学森之问”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为了进一步求解“钱学森之问”,必须运用系统论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教育进行系统的深入分析研究,因为教育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是在单向性、一维性、静止性的孤立状态中实现的。因此,必须把教育发展作为一项涉及多种因素和关系的复杂系统来加以深入分析研究。与教育发展系统密切相关的有自然环境系统因素、社会环境系统因素,也可区分为物质系统因素、精神系统因素,还可区分为人的内在系统因素、外在系统因素,同时还可区分为历史演进系统因素、现实行进系统因素以及

未来构想系统因素等系统结构要素、系统运行过程和系统功能特征等重要因素关系。

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庞跃辉教授,集合诸位学者对我国教育体系中的多个层面的现状进行了综合性考察,运用系统论的理论和方法求解“钱学森之问”,从教育观念系统因素、教育管理系统因素、幼儿教育系统因素、小学教育系统因素、中学教育系统因素、大学教育系统因素、继续教育系统因素等角度和层面,对教育现状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系统深入分析研究,从中发现在教育观念、教育管理、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继续教育等领域所存在的重大误区,找出其深层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和科学方法。

本书主张面对教育现状和发展需要,必须确立适应现代教育的新型教育理念,为促进教育发展提供思想先导;必须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快构建现代教育管理新模式;必须消除幼儿教育拔苗助长的危害,让幼儿保持童心与童趣;必须改变小学生在不堪重负中喘息的情状,使小学生在愉快学习中成长;必须改变中学教育文理分科的模式,让中学生在知识海洋中畅游;必须改变大学教育单向度、程式化定势,使大学生能真正成为社会栋梁;必须改变继续教育专为技能补课的功能弱化状况,全方位构建终生学习新体系。总之,本书的基本核心思想在于强调教育需要真正步入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轨道,杰出人才的辈出才有可能,振兴教育才有希望!

风物长宜放眼量。人类已进入 21 世纪,知识经济浪潮扑面而来。我国也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教育的特殊重要功能和作用越加凸现。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在诸多方面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经济繁荣、社会进步,需要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民族复兴、国家强盛,需要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我们应当有强烈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我们深信,如果能够在系统深入分析教育现状、发现制约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深刻把握现代世界教育发展趋势,真正按照教育规

律办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针对性地提出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切实可行的新思路、新政策、新措施，重点突破、分步实施，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分类指导、全面推进，教育一定会开创新局面，取得令人欣喜的新成就。

感谢庞跃辉教授的厚爱，他嘱我将这样一些感受记下为文，并推举为序文，这是十分不敢当的。

严绍璦

2010年阳春记于北京大学

（严绍璦：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古籍整理规划出版领导小组成员、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人文研究重点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人文学部委员、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社会文化研究中心学术顾问、香港大学现代语言文化学院荣誉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所顾问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汉语世界推广研究所—国际汉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籍研究所客座教授）

目 录

序 /1

引 言 反思“钱学森之问” /1

第一章 教育观念有偏颇 /15

“传道、授业、解惑”是中国传统教育观的经典。然而，曲解或者固守传统教育观，势必形成僵化的教育理念，游离世界现代教育潮流。因此，必须冲破曲解或固守传统教育观念的误区，为促进教育发展提供思想先导。

第二章 教育管理过度行政化 /29

过度的教育行政化管制，致使教育管理缺乏活力，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步履维艰。因此，必须冲破过度的教育行政化管制的体制误区，加快构建现代教育管理新模式，使教育管理真正成为教育发展的推动力。

第三章 幼儿教育超前成风 /59

幼儿教育盲目超前的态势愈演愈烈，致使幼儿的灵性过早泯灭，好奇心丧失殆尽。因此，必须冲破幼儿教育盲目超前的误区，避免拔苗助长的危害，让幼儿保持天真烂漫的童心与童趣。

第四章 小学教育负担过重 /87

大剂量的课堂知识灌输和超负荷的课外作业，使得小学教育成了不停运转的知识灌输机器，小学生在不堪重负之中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因此，必须冲破小学教育进行繁重知识灌输的误区，小学生才能在愉快的学习中享受成长的快乐。

第五章 中学教育陷入文理分科的泥淖 /115

中学教育在一切为高考服务的迷雾之中苦苦挣扎，文理分科成为影响中学教育发展的桎梏，致使中学生步入知识狭窄的偏道。因此，必须冲破中学教育文理分科为高考的误区，让中学生在知识海洋中畅游。

第六章 大学教育步入单向度误区 /157

大学教育囿于专业知识教育的定势，单向度、程式化教育状态依然严重，致使大学生难以形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此，必须冲破大学教育囿于专业知识教育的误区，使大学生能够真正成为社会栋梁。

第七章 继续教育有名无实 /175

继续教育成了专为技能补课的工具，继续教育的功能大为弱化，致使继续教育陷入职业场所技能培训的泥潭。因此，必须冲破继续教育专为技能补课的误区，全方位构建有利于终身学习的新体系。

结束语 教育的真谛：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203

参考文献 /252

反思“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振聋发聩、令人深思的“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既是关系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急迫、艰深命题，也是关乎国家发展与民族命运的一个重大问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求解。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时，钱老发出这样的感慨：“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4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1位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2006年11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一个教育座谈会上对与会的教育专家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温总理拿这个问题请教国内最有名的六所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们的回答是：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起来之后，

应该是大提高；做大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如此回答，能否让钱老和总理满意呢？

其实，饱经沧桑的中国教育，虽然经历了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发展道路，不能不说取得了巨大成就。据《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十五”时期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稳步发展，国民受教育水平显著提升，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5年。到2005年，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和初中毛入学率均达到95%以上，进入全面普及的新阶段。高中阶段教育规模继续增加，在校生达4 031万人。职业教育在改革中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实现历史性跨越，毛入学率达21%，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增强，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我国人均受教育水平仍然不高，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仍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3年以上，创新型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不足，杰出人才缺乏。

如今，人们站在新的时代高度，面对世界现代教育的巨大冲击，怀着焦虑与希冀之情，对中国教育进行新的审视。著名科学家、思想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令人深思的问题。真正让“钱学森之问”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源于2009年11月11日的一封公开信。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①。发出公开信的沈正赋等11位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几天前，我们满怀悲痛送别了钱学森老人。作为一代科学大师，钱老对国家民族、对科学研究、对青年人才、对科学道德的挚爱，感动了全民族。他的崇高人格和科学精神就像一座灯塔，照亮后人前行的路。连日来，人们在缅怀和追思中，不时会被钱老提出的一个问题所震撼——‘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它是沉重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① 《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新安晚报》2009年11月11日。

这11位教授认为,“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为此,他们愿意通过《新安晚报》,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给教育部新任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同仁发出《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这封公开信。信件原文如下:

尊敬的袁贵仁部长并全国教育界同仁:

钱学森走了,又一颗巨星陨落了。我们深切缅怀钱老,缅怀他的科学精神和崇高人格,还有他的那句振聋发聩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只有直面这个疑问,才能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之种种问题寻求真正的解决之道。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我们认为,钱老的疑问,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

从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1905年废除科举至今,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已逾百年。从1977年重新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至今,中国当代教育的改革已经有30余年。应当说,积30余年来的发展和改革,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但是,不能回避的是,今天的中国教育同样存在着许许多多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深层次的。例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难以突破的瓶颈。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温总理的感叹,源于对中国教育深层次问题的忧虑。缺乏人才长远规划的短视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扭曲的考核评价和选拔机制,怎能催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怎能创新之花盛开、创新之树常绿?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

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时候直面“钱学森之问”了，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眼下，袁贵仁部长刚刚走马上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纲要》正在制订，这时候，我们需要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一起来深思、来解题。

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解开这道题，一定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中国的杰出人才也会由此不断涌现。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便是对钱老最好的缅怀。

此致

敬礼

沈正赋 芮必峰 胡荣华 卞利 康建中 谢云章 李正平 徐华
李桂华 杨四平 吴玲

2009年11月11日（排名不分先后）

如今，面对“钱学森之问”这道既关系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又关乎国家发展与民族命运的急迫、艰深命题，有人呼吁：应当让更多的专家、学者、教授乃至社会各界人士都参与讨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对这个问题来一场“思维风暴”吧！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人们正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求解：

求解之一：一个值得追寻的悠久深沉历史问题

关注中国教育与科技发展，是一个悠久深沉的历史问题。有人认为，自春秋战国结束，汉代推行独尊儒术后，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就一直在发出“钱学森之问”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出过的大思想家，屈指可数！产生于中国的重大科技成果，少得可怜！也有人认为，“钱学森之问”，在上世纪已由一

位英国人提出过，此人就是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李约瑟之谜”。他提出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求解之二：应从认清“文化之不足”入手

传统文化与教育发展密切相关。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循着梁启超的思路，从反思“器物不足”、“制度不足”到反思“文化之不足”：我们的文化是怎样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官场文化，讲究的是等级，扼杀的是平等和真理。这一点，只要从人们见面总是以“袁厅长”“侯处长”“牛股长”“马经理”来相称即可知道，只要看校长、企业家也有行政级别即可知道，只要看连有的小学生以“当贪官”为志向即可知道。在这种被柏杨称为“酱缸文化”的传统文化中，权力是私有的、是被滥用的。因此，相对应的，个体是奴性的，被塑造成依附型人格，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怎么会有创新能力？在这种文化下，人们“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唯独不畏真理；只有盲从心理，没有科学精神；崇拜权力、金钱，唯独不崇拜知识。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又怎能产生“杰出人才”？

求解之三：没有真正一流的大学

一流大学是教育发展的重要标志。有人认为，所谓一流大学就是要有大量的、有学问的学者。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一流大学比不上美国的一流大学，也比不上欧洲的一流大学。很多大学自称是世界第一流，甚至有个说法国内某大学全世界排第15，这学生不相信，教授们也不相信。个别领导也可能被误导，以为这是权威说法。可是实际上，你不要讲全世界第15，排名美国东部第15都不到。中国有些大学说自己是世界一流大学，是不合实际的，是违

背“实事求是”原则的。

求解之四：大学精神没有真正确立起来

大学精神是引领大学教育的航标。有人认为，曾子《大学》首章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陈寅恪为王国维所作墓志铭写道：“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那么，真正的大学精神是什么？在新一轮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大学的规模越来越大，建筑越来越漂亮，但是我们不得不问，我们的大学究竟是否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今天，我们对于什么叫大学，大学之大究竟指什么，这些概念和问题是越来越模糊。

求解之五：大学没有核心竞争力

好大学必须具有其强盛的核心竞争力，因为大学有没有核心竞争力，是大学办学水平高低的重要体现。有人认为，在中国面向未来的高等教育发展当中，欠缺的东西很多，大家感到最紧张的还是缺钱。如果认为有足够多的钱就可以打造出最好的教育，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应该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但我们知道最好的大学不在中东，在美洲。就连在战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代，条件极其简陋的西南联合大学也出了一批大师。归根结底，大师和大学制度是一所好大学的核心竞争力，这些东西是外在建筑无法取代的。

求解之六：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

“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是畸形的教育管理方式，是严重影响教育发展的一大障碍。有人认为，“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造成的危害，已经有目共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大学教育，从苏式的专才模式向比较现代的通才教育模式转型，从教材、教法、培养模式诸方面，面临改革的

巨大压力。一方面要接受新东西，另一方面要结合中国国情加以试验，摸索自己的道路。在多年封闭和“文革”破坏之后，局面应该说是相当困难。经过各方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学术转型和教学方式变革方面出现了一些好的苗头，有了初步与国际学界接轨的迹象。然而，恰在这个转型的关键时刻，教育行政部门高调介入大学事务，并空前强化行政控制，在数字化管理名目下，高校被迅速拖入了评审学术、数字学术和大学结构“衙门化”的泥潭。学生由于处在“衙门”结构的最底层，受影响最为深重。

求解之七：应当建立健全现代大学制度

能否建立健全现代大学制度，与高等教育发展关系甚密。有人认为，历史上看，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可以说是奠定了现代大学现代性的基础。而当下，大学和市场、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但大学是否具有独立精神是大学至为重要的特点。一所大学的人文精神、价值和理念，只有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办学制度才能生根和落实，现代大学制度也为大学精神的发源和滋养提供载体。没有这样一个制度保障，少数人的精神追求、非常先进的理念很难产生和保存下来。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可谓互为表里。那么，面对现代教育的发展需求，我们所需要的现代大学制度，应当包含什么内容呢？如果用非常简略的语言表达大学制度，它应该包含以下重要内容：第一，大学自治；第二，学术自由；第三，教授治学；第四，通才教育；第五，学生自治。

求解之八：科研创新制度存在严重缺陷

能否具有良好的科研创新制度，是否能推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的重要保障。有人认为，在美国，就算哈佛大学这样的名校，有些大教授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学术界就不见得这么依靠他了，因为他可能不再做研究了。那是纯粹以学术作为评判标准的。可是中国的制度特别尊老，特别记得某教授从前的工作，而不记得年轻人需要新的知识。中国的年轻人要走新的道路，往

往有些有权的老先生或者个别大学领导会制造出种种障碍。因为创新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创新便只能被扼杀在摇篮中。院士制度是做学问的大障碍。做学问的年轻人，只要做得好一点的，将来都想当选院士。但是，现实是，有些高校甚至可以控制院士的选举，所以年轻人只能跟在制度后面唯唯诺诺，创新远远没有顺应继成利益集团的心意重要。现在中国的大学对年轻的学者、年轻的研究生不够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说，年轻的学者只是跟着教授走的学徒。

求解之九：部分学生被培养成“奴才”或“愤青”

良好的教育应当引导学生形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人认为，人的大学生涯，本是求知欲特别旺盛、自主意识形成的过程，也是产生各种歧见、异见，形成不良习行的时期。加之一代代独生子女的登台，而他们所受的家庭教育和中小学教育多少有点变形，心理不健康学生的比例大有增加的趋势，这更加重了大学教育的负担，需要学校加倍努力，小心应付才是。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由于一些大学“衙门化”过程中，官场文化被大面积深度复制，在一些教师变成学官下属的同时，一些学生则成了下属的下属、奴才的奴才。有的学校的各种管理越来越严格细致，但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让学生听话。说得对要听，说得不对也要听，还不给学生任何解释；理解要服从，不理解也要服从，从来没有想过给学生哪怕一丁点自治的机会。在这种高压下，部分学生的心理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听话的变成了“奴才”，不听话的变成了“愤青”。

求解之十：教育问题与政府决策关系很大

教育出现问题，从某种原因上看，与政府的某些决策是有密切联系的。有人认为，近年来国人有“新三座大山”之说，教育即是其中之一。而在教育这座“大山”中，大学自然占了很大的分量。全国“两会”上，大学成为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激烈批评的对象。但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尽管

这类批评的事实都存在，将大学作为靶子却是找错了对象，或者是故意指桑骂槐。就拿最受人诟病的扩招、扩建（圈地）、贷款、乱收费来说，真正与大学有关，或者应该受到查处的，只是在这些过程中的腐败和犯罪行为，而这些事本身却都是政府的决策，或者是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例如扩招，主要是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决定的，学校能够自主增加的极少。没有主管部门的批准，不仅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不出，还会受到查处。扩招无论是功是过，根源都不在大学，大学充其量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又如扩建，其中固然不乏大学本身的需求和建议，但要是没有政府的批准和拨款，没有银行的贷款，没有政府批的土地，建得成吗？再如贷款，政府如能按扩招的规模拨足经费，如能兑现按GDP和财政预算增长的比例确定教育经费，绝大多数大学根本不需要贷款，更不会负债。何况多数贷款也是由银行主动和政府牵线，甚至明示校方不必顾虑还款能力。

求解之十一：轻视教学而导致教学效果差

高质量的教学，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有人认为，一些教师的身教靠不住，言教也大有问题。在教育行政部门数字化管理的目标体系面前，教师只能为完成数字而挣扎，或者取巧造假，教学认真的教师，得不到正面的激励，反而面临下岗、转岗的威胁。有的学校最为马虎和将就的部分，就是教学。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但由于考核指标重科研轻教学，到目前为止，没有多少人把教育部的话当真。事实上，教学越来越被教师视为可有可无的鸡肋，教师随便缺课、请研究生代课；即使上课，也信口侃山，随意对付。学校没有精力推动教师改善教学、变革教学方法、优化教材。教材的编写变成了部分教师评职称连带敛财的机会；教学方法的改革，仅仅蜗居在师范大学狭小的领域，其他学校基本上无人操心。文科的学生不知道如何查资料，不懂得怎样检索信息，更不知道如何分析信息、归纳整理。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教学，实习部分往往被减了又减，甚至变成纸上谈兵。都说大学生就业难，但目前大学生的培养，基本上没有脱离文凭教育的范畴，这样的学生，如何适应社会和市场需要？

求解之十二：高等院校“高耗低产”现象严重

高水平的教育应当是“投入”与“产出”成正比的优质教育。有人认为，在我国重点大学中，有近半数高校过去3年“投入多，产出少”。由中央教科所（教育部直属的国家级综合性教育科学研究机构）高教研究中心负责完成的《中国高等学校绩效评价报告》，首次对教育部直属的72所高校进行绩效评价。据悉，高校绩效评价是根据“投入产出理论”，从高校资源利用效益方面评价高校的绩效。投入的评价指标涉及科研经费、教育经费、固定资产等14项，产出的指标涉及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数、出版专著数、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特等奖数、发明专利授权数等16项。数据统计显示，有近半数高校过去3年“投入多，产出少”，显得“高耗低产”；另有29所高校“产出高于投入”；还有7所高校投入和产出的排名一致，“投入产出相当”。一位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专家称，国家每年给“985”、“211”类高校投了从上千万元到上亿元不等的经费，“不能再只管投钱不看效益了，要把钱花到刀刃上”。

求解之十三：必须深入改革高考与录取制度

优化的高考与录取，极其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人认为，我国高考制度存在严重弊端，必须深入改革高考制度。有教育研究专家向教育部提交了高考改革整体方案。此方案建议，改革传统高考，实行多轨道、分层次的统一考试。大学中的不同学科采用不同的考试科目。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科兴趣与能力选择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考试。其次是举行“全国学业能力水平测试”。学业能力水平测试主要是基于这个学生分析的能力、推理的能力、逻辑能力的考试，类似于美国的SAT考试，是对学生基本的能力水平测试。除了提出考试制度改革、录取制度改革外，方案还提出了八套配套措施，其中包括制定《考试法》，将考试招生纳入法制轨道等。对于高校“自主招生”是否会影响教育公平，导致更多腐败？这位教育研究专家认为，“这种危

险是客观存在的。而新方案提出,上述危险可以通过考试立法,以及树立高校自主招生公信力,来加以纠正。”也有人认为,自主招生改革,暂且不要再在扩大学校自主权和中学推荐权方面做文章,而应该基于扩大受教育者选择权,构思自主招生体系。教育部门和高校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以正确的方向推进自主招生改革,而不要在不正确的方向使力,除非配套管理制度改革,否则这将进一步影响大学的教育声誉。

我们认为,直面“钱学森之问”,除了以上“求解”之外,也许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求解,或者还可能出现许多新的求解。无论哪一种求解,都体现了人们十分关注“钱学森之问”这道既关系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又关乎国家发展与民族命运的急迫、艰深命题,都在某一角度、某一侧面或某种程度上为求解“钱学森之问”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我们认为,为了进一步求解“钱学森之问”,必须运用系统论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教育进行系统的深入分析研究,因为发展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是在单向性、一维性、静止性的孤立状态中实现的。因此,必须把发展教育作为一项涉及多种因素关系的复杂系统来加以深入分析研究。与发展教育系统密切相关的有自然环境系统因素、社会环境系统因素,也可区分为物质系统因素、精神系统因素,还可区分为人的内在系统因素、外在系统因素,同时还可区分为历史演进系统因素、现实行进系统因素以及未来构想系统因素等系统结构要素、系统运行过程和系统功能特征等重要因素关系。

我们认为,运用系统论的理论和方法求解“钱学森之问”,可以从教育观念系统因素、教育管理系统因素、幼儿教育系统因素、小学教育系统因素、中学教育系统因素、大学教育系统因素、继续教育系统因素等角度和层面,对教育现状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系统深入分析研究,从中发现教育观念、教育管理、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继续教育等存在的重大误区,找出深层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我们认为,面对教育现状和发展需要,必须冲破固守“传道、授业、解惑”传统教育观的误区,确立适应现代教育的新型教育观,为促进教育发展提供思想先导,必须冲破教育行政化管制的误区,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加快构建现代教育管理新模式；必须冲破幼儿教育盲目超前的误区，消除拔苗助长的危害，让幼儿保持童心与童趣；必须冲破小学教育繁重知识灌输的误区，改变小学生在不堪重负中喘息的情状，使小学生在愉快学习中成长；必须冲破文理分科为高考的误区，改变中学教育步入知识狭窄的偏道，让中学生在知识海洋中畅游；必须冲破囿于专业知识教育的误区，改变大学教育单向度、程式化定势，使大学生能真正成为社会栋梁；必须冲破继续教育专为技能补课的误区，改变继续教育功能弱化的状况，全方位构建终生学习新体系。总之，教育需要真正步入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轨道，杰出人才的辈出才有可能，振兴教育才有希望！

Chapter1

第一章

教育观念有偏颇

“传道、授业、解惑”是中国传统教育观的经典。然而，曲解或者固守传统教育观，势必形成僵化的教育理念，游离世界现代教育潮流。因此，必须冲破曲解或固守传统教育观念的误区，为促进教育发展提供思想先导。

韩愈的教育思想观

中国唐朝产生了一位著名的教育思想家,这位著名的教育思想家就是韩愈。在被许多中国人信奉为教育经典之作的《师说》中,韩愈如此精彩地写道: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

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谄。”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韩愈“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教育观，一直被许多中国人视为教育思想的极致。我们从韩愈的给“李氏子蟠”的鼓励文章中可以看出，韩愈的教育思想是十分明显的：

一是认为老师的作用十分重要。韩愈指出：古代求学的人必定有老师。老师是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啊。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的问题？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始终不能解答了。

二是认为老师可以不分辈分。韩愈指出：出生在我前头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做老师；出生在我后面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做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

三是认为轻视教育之风危害极大。韩愈指出：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要人没有疑惑就难了！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要跟从老师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原因大概都出在这里吧！人们爱他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

四是认为应当有正确的教法与学法。韩愈指出：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孩子们文字，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老师，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大道理，解答那些有关大道理的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理解书本上的字句，不能解决大道理的疑难问题，有的书本上的字句向老师学习，有的大道理的疑难不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却反而放弃学习，我未能看出哪种人是明白事理的！

五是认为人各有所长而应相互学习。韩愈指出：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他们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一类人，一听到有人称“老师”称“弟子”等，就许多人聚在一块儿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他们就说：“那个人同那个人（指老师和学生）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啊，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可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好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君子们认为不值一提，现在君子们的见识竟反而比不上他们，可真奇怪啊！

六是认为老师和学生应当相互学习。韩愈指出：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三个人同行，里面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永远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样样都比学生贤能，老师和学生的区别只是听到道理有的早有的迟，学问和技艺各有各的专长，只是如此罢了。

七是赞赏喜好博学的学生。韩愈指出：李家的孩子叫蟠的，年纪十七岁，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了，他不受当时士大夫那种耻于从师的时俗的限制，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正道，所以写这篇《师说》送给他，以激励其更好地学习。

对“传道、授业、解惑”的偏颇认识

我们从韩愈在《师说》中所表达的教育观点可以看出，韩愈的教育思想可以说具有其丰厚的内涵。然而，我们现在许多人却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韩愈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对“传道、授业、解惑”的认识更为偏颇。一些人对“传道、授业、解惑”的认识，局限于狭窄的认识误区之中，而这种认识误区

又形成了人们固守的落后的传统教育思想观念：

其一，把“传道”仅仅理解为“老师（或长辈）对学生（或晚辈）传授伦理等级之道”。在中国长期的古代社会中，十分强调伦理等级的思想观念。早在二千多年前的《礼记·祭统》中，就用“伦理”来划分社会关系中的等级差别次序，提出“伦，辈也”。伦理，即一定的辈分秩序。等级伦理观及其维护等级伦理的措施，与封建专制王权的关系极为密切。等级伦理与专制王权的关系及它们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在等级伦理观的巨大影响下，金字塔般的等级制度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依据伦理划分等级，这种等级又与专制王权互为依存，乃是中国封建主义社会的一大特点。正是在这种传统等级伦理思想观念的巨大影响下，形成了“传授伦理等级之道”的传统教育观。一些人认为，对学生进行“传道”，就是“传授伦理等级之道”。通过对学生“传授伦理等级之道”，让学生信服“伦理等级之道”，遵从“伦理等级之道”，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严格的“伦理等级之道”。因此，从一定意义上看，“传授伦理等级之道”是中国落后传统教育观的核心。一些人深受这一观念的影响，使其对“传道”的理解陷入了狭隘的认识误区。

其二，把“授业”仅仅理解为“老师（或长辈）向学生（或晚辈）传授劳作技能”。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因此，人们特别看重劳动生产技能的作用。在传统的教育观念中，不少人认为在对学生或晚辈的教育中，“授业”就是老师（或长辈）向学生（或晚辈）传授一定的劳作技能。当然，在对学生的（或晚辈）教育中向他们传授一定的劳作技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教育中的“授业”仅仅理解为“传授劳作技能”，就陷入了狭隘的教育思想观念之中：一是“授业”之“业”，就是专指某种劳动技能，或者就是专指某种工艺技巧，把“业”局限在一技之长的范围；二是向学生（或晚辈）“授业”之“授”，就是专指老师（或长辈）单方面向学生（或晚辈）之“授”，而忽视了学生（或晚辈）自学的可能性和主动性。因此，这种教育思想观念实质上既是对“授业”之“业”的认识具有片面性，也是对“授业”之“授”的认识具有片面性。这两种片面性的交织，形成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观念的一大弊端。一些人深受这一弊端的影响，使

其对“授业”的理解掉进了狭隘的认识误区。

其三，把“解惑”仅仅理解为“老师（或长辈）解除学生（或晚辈）不懂不知的问题”。由于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长期深受封建伦理等级观念的影响，因而在一些人的思想认识中，总是把老师（或长辈）作为令人推崇或崇拜的偶像，以为老师（或长辈）必定比学生（或晚辈）更有知识、更有学问、更有水平。当然，在一般情况下，老师（或长辈）是比学生（或晚辈）具有较高的知识学问水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老师（或长辈）在任何时候、任何场所都必定比学生（或晚辈）有着更高的知识学问水平，也并不意味着老师（或长辈）在对任何问题的认知都必定比学生（或晚辈）具有更高的知识学问水平。然而，许多人正是缺乏这种辩证思维，因而对“解惑”的理解陷入了狭隘的教育思想观念之中：一是把“解惑”之“惑”仅仅理解为学生（或晚辈）不懂不知的问题，而老师（或长辈）在学生（或晚辈）面前不存在任何不懂不知的问题；二是把“解惑”之“解”仅仅理解为老师（或长辈）帮助学生（或晚辈）解除不懂不知的问题，而学生（或晚辈）却不能帮助老师（或长辈）解除不懂不知的问题。一些人深受这一片面“解惑”教育观的影响，使其对“解惑”的理解陷入了狭隘的认识误区。

我们认为，由于一些人并未真正理解“传道、授业、解惑”教育思想的丰厚内涵，反而把其片面的曲解当作正确的理解，并且固守其曲解的教育思想认识，形成了落后的传统教育观念。这种落后的传统教育观念，长期影响着中国教育，诱发了教育中的诸多问题，对教育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缺乏对“传道”的正确认识，诱发和加深了教育及社会诸多方面的不平等程度。由于许多人把“传道”仅仅理解为“老师对学生传授伦理等级之道”，因而让学生信服“伦理等级之道”、遵从“伦理等级之道”，成为了固守落后传统教育观的一大表现。这种落后传统教育观不仅对教育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而且对社会群体组织以及人们在这些群体组织中相互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各种群体组织的最为明显的特点可被概括为辈分制或等级制：在这些群体中，各种不同性质的辈分与等级的区分非常明显，每一辈分与等级具有不同的地位与权威，每一个人都被分排到不同的

辈分与等级中去,从而影响着人们在各种教育活动与日常生产、生活中的行动逻辑和交往原则,造成了教育等级森严以及社会其他诸多方面等级森严的不良状态,极大影响了教育与社会的发展。因此,必须冲破“传道”就是“传授伦理等级之道”的传统教育观念误区,确立追求平等精神、自由精神的教育理念。

缺乏对“授业”的正确认识,不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由于许多人把“授业”仅仅理解为“老师向学生传授劳作技能”,因而只重视学生学习、掌握劳作的“一技之长”,成为了固守落后传统教育观的又一大表现。这种落后传统教育观把学生学习、掌握的内容局限在狭小、偏颇的技能、技巧范围,仅以专门学习、熟练掌握某种劳作技能、工艺技巧作为教育培养的目标,显然极其不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难怪一位具有教育学硕士学位的家长让儿子退学:“回去吧,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他认为,真正的好老师,不仅能够在授业中帮助孩子学习、掌握劳作技能、技巧,更会引导孩子形成良好的人格、品质和灵魂。他觉得现在的学校,这样的老师“十个里也难有一个,有一个,就比十个都强。”因此,必须冲破“授业”就是“老师向学生传授劳作技能”的传统教育观念误区,确立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

缺乏对“解惑”的正确认识,难以形成师生共同提高、共同创新的教学相长局面。由于许多人把“解惑”仅仅理解为“老师解除学生不懂不知的问题”,因而只看重老师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以为老师总是比学生具有更高的知识学问水平,成为了固守落后传统教育观的第三大表现。这种落后的传统教育观不仅不利于调动老师更新知识、求解新问题的积极性,而且不利于发挥学生学习新知识、提出新问题的主动性。因为如果认为老师在任何时候、任何场所对任何问题的理解和认识,都必定比学生具有更高的知识学问水平,那么,老师在学生面前就成了“圣人”、“神灵”。而老师一旦在学生面前成为了“圣人”、“神灵”,势必造成老师“神圣不可侵犯”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之中,极易形成老师自恃高傲而不求进取、学生自惭形秽而不求创新的不良状态。因此,必须冲破“解惑”就是“老师解除学生不懂不知问题”的传统教育观念误区,确立教学相长的师生共同提高、共同创新的教育理念。

确立适应现代教育发展的新理念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教授深刻指出，理念创造文化，文化创造制度，制度创造生产力。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说，冲破曲解或固守传统教育观念的误区，就是要面对新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构建适应现代教育发展的新理念。人们已经发现，21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在新的时代，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必将发生巨大变革，引起人们诸多观念的变化。那么，人们对教育理念、特别是教师对教育的理念将面临哪些重要挑战呢？有人发出了值得深思的如下感慨与疑问：

第一，“信息时代已经到来”、“知识经济初露端倪”已经成为我们的常用话语。但是，我们在运用这些话语时，除了感性地表达心理上的紧迫感和对未来的憧憬外，我们是否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延续过程中，从国外到国内的引进吸收过程中，领会了当代教育与传统教育到底有什么不同？

第二，我们早就摒弃了注入式教学法，而接受了启发式教学法，特别是近几年来，许多引进和自创的教学方法层出不穷，这对于促进教育教学改革和素质教育的实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面对这些眼花缭乱的程式化教学方法，到底哪一种更适合本校的实际？

第三，一定的理念影响着一定的行为，教育也不例外。方法是重要的，因为方法是理念和行为的中介。但是，仅有方法是不够的，只有深刻领会当代教育理念的内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现在有了大量的教学方法，现在所用的教学方法是以任何教育理念为基础的？

第四，所有教育教学方法的诞生都是与一定的文化背景和哲学思潮相联系的。西方教育教学方法的涌入，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资源。但是，我们在借鉴这些教育教学方法的时候，如何使之“本土化”？也就是如何解决这些教育教学方法切合我国的国情和实际的问题？

第五，传统的教育是“遗传”式的，即传承人类文化，是以传授知识为基础的。现在的教育功能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提高学生的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已成为教育的主题。教师们对教育教学改革也抱有极大的热情。

但是,实施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需要落到实处,仅有热情是不够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教师怎样教和学生怎样学,以及教师教什么和学生学什么感到困惑如何解决?

我们认为,回答以上疑问、解除以上困惑,既是冲破传统教育观念误区的需要,也是构建适应现代教育发展新理念的要求。现代教育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形成而出现的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教育形式,也是人类社会和教育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是迄今为止教育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人类教育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现代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是受教育系统内外多种复杂因素制约的,但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现代教育产生和发展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当然,关于现代教育的理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界定。有的人从外部条件入手,把现代教育界定为“适合现代生产体系、现代经济体系、现代文化体系、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教育概念、形态和特征”。有的人从内部因素看问题,将其界定为“教育者以大生产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内容,把受教育者社会化为能适应现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现代社会的人的活动。”综合起来看,可以将现代教育表述为:“从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到共产主义完全实现这一历史时期的、致力于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该定义力图揭示现代教育的共性。实际上,不同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不同的发展阶段的现代社会都会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来表现和实现这一共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现代教育与社会主义的现代教育,英国的现代教育与美国的现代教育既有着共同的趋势又有着不同的特色。现代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多样的、动态的综合与统一的概念。

那么,冲破传统教育观念误区,构建适应现代教育发展的新理念,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呢?我们认为,尤其需要从如下方面进行深入思考:

“教育的三大基础和四个支柱”理念

现代教育应当是有利于影响学生一生的新型教育,因此,教育应当具有“三大基础”作用:为学生立身、处世、发展,奠定学会做人的基础;为学生学习、立业、进取,奠定知识、技能和方法的基础;为学生成长、成功、成

才,奠定身心健康、善于合作、勇于创造的综合素质基础。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1996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一份名为《学习——内在的财富》(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提出“教育的四个支柱”的观点。该报告认为,在新的21世纪,“教育应围绕四种基本学习加以安排;可以说,这四种学习将是每个人一生中的知识支柱:学会求知,即获取理解的手段;学会做事,以便能够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产生影响;学会共处,以便与他人一道参加人的所有活动并在这些活动中进行合作;最后是学会做人,这是前三种学习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这四种获取知识的途径是一个整体。”这四个支柱与社会学习化、终身教育紧密联系。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把与生命有共同外延并已扩展到社会各个方面的这种连续性教育称之为终身教育”。教育包括从童年到生命终止的所有活动,而所有活动都是与四种基本学习结合的,都是为了每个人能生动地、深刻地了解世界、了解他人和了解自己。

“培养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理念

确立“培养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理念,是现代教育区别于以往教育的最基本特征。现代教育之所以称为现代教育,首要之点就在于它能提出培养现代人即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这一目的并将它付诸实施。以往一切教育都不能做到这一点。换言之,如果不能培养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就不能认为是现代教育。现代教育所强调的人自由全面发展,主要是指人们能够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提高与协调发展,包括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提高与协调发展,体力、智力、创造力以及人格的全面提高与协调发展,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程度的全面提高与协调发展。在国际21世纪教委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学习——内在的财富》中,也把“教育的四个支柱”的终极目的或主要成果,确定为使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该报告指出:“委员会从它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开始就坚决地重申了一个基本原则:教育应当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扩大了的教育新概念应该使每一个人都能发现、发挥和加强自己的创造潜力,也应有助于挖掘

出隐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财富。”

“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意义日益重要”理念

现代教育的这一基本特征与前一个特征即培养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一起，构成现代教育的两个根本性特征。因为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大机器生产，要求广大劳动者懂得科学技术，通晓生产原理，掌握现代生产知识、技能。这样的劳动者，文化素质是基础，生产技术素质是条件，仅仅靠脱离生产的教育或是没有教育的生产过程是很难培养成的，只有通过同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的学校教育和实践培训，才能培养大批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因此，现代社会客观上要求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现代生产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反映现代大生产的要求，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所深刻指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式，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①当前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已成为现代教育的发展趋势，引起了世界各国广泛的重视，成为与古代教育区别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统一”理念

现代教育的核心是科学教育。教育的内容是科学的，教育的方法也是科学的，没有科学教育就没有现代教育。与科学教育相对立的是宗教教育或建筑在信仰基础上的教育；它也本质上不同于经验性的教育或限于见闻和感性活动的常识教育；它还打破了在它之前的所谓文雅教育或古典文化教育的局限。现代教育要求学生系统地学习科学知识，包括基础学科和各有关的专业科学知识，学习和掌握综合（基本）技术和有关的专门技术，进行动手和实践能力的训练，培养追求真理、探索、创新、献身科学为人类造福的科学精神，教育方法遵循科学的认识论路线，理论联系实际，重视理论，重视观察、实验、操作和社会实践。^②然而，现代教育又不是仅仅局限于科学教育的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0页。

② 《现代教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180页。

育,而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统一”的“大教育”。现代教育强调在重视科学知识和技能教育的同时,加强学习人文知识与培育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就是通过广泛学习文、史、哲等人文知识,使受教育者提高人文修养,学会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处理各种关系、如何确认价值取向、如何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的过程,丰富文化底蕴、提高人文素质、培养人文情感,更好地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我,以人为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内心的和谐。

“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相结合”理念

现代教育强调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相结合,既是教育民主化向纵深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现代教育逐步普及、教育对象不断扩大的显著表现。现代社会的大机器生产中,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相互作用,迅猛发展。复杂的劳动使劳动者仅仅凭借自身的体力和传统的技能去操作已不可能,劳动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化和相当水平的科学知识、生产技术,而且随着科学技术转化为第一生产力,这种要求将越来越高。等级森严、优中选优的精英教育和父传子、师徒传的原始的和手工生产的家庭、行会教育已不能适应大生产的社会需要。要培养出现代化大机器生产所需要的劳动者和科学技术人才,需要经过学校教育的系统学习和专门培训。学校教育的职能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但要为国家和社会培养精英人才,也要培养和训练普通劳动者。教育需要普及,教育对象需要扩大,劳动者的素质和才能需要提高,因此,必须适当增加教育经费,适当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不断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多渠道开展成人继续教育,进行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以充分适应教育日趋大众化的社会需要。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协调互动”理念

在传统教育体制下,学校近乎于政府的附属机构,政府对学校的管理以行政命令为主,学校办学自主权十分有限。学校的内部管理基本上也是上令下行的行政管理方式,学术权力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状态严重阻碍了教育发展,特别是极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正如高等教育专家所指出,在

大学内部,对行政权力的过度强调势必影响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过分松散的学术权力则有损于大学效率的提高和整体目标的实现。针对大学行政化色彩浓厚的现实,大学唯有不断探索和建立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协调互动、共同发挥作用的制度模式,积极为教授治学创造条件,切实保障教授治学真正实施,协调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才能更好地推动有特色高水平大学的建设。由于行政权力以层次性和隶属性为基本特征,而大学是培养高级人才、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工作内容有很强的学术性,学校的许多决策都涉及各学科发展问题,因此,行政权力的科学运行必须建立在科学民主机制上,争取得到广大教师,尤其是学科带头人的支持。学校要在决策层次上整合各类校级组织,确立和发展综合性的议事机构。在执行层上推动行政系统和学术系统适度交叉,强化学术人员在重要领域,例如审议学科、专业设置和教学、科研计划方案,评议教学、科研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方面的作用。在学生管理和科研管理上,建立能主动适应学术组织变迁的灵活化、柔性化的系统,强化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从制度上保证两大系统的协调。

“面向终生学习的开放式教育”理念

开放式教育是相对于封闭教育而言的。开放式教育的本质是人人享有终身受教育的权利。它不仅意味着对教育对象的开放,更重要的是教育观念、教育资源和教育过程的开放。开放式教育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特征:以学生和学习为中心,而不是以教师、学校和管理为中心;采用各种教和学的方法和手段;取消和突破种种对学习的限制和障碍。比如开放式教育对入学者的年龄、职业、地区、学习资历等方面没有太多的限制,凡有志向学习者,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基础的,不需参加入学考试,均可以申请入学;学生对课程选择和媒体使用有一定的自主权,在学习方式、学习进度、时间和地点等方面也可以由学生根据需要决定;在教学上采用多种媒体教材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等。开放式教育可以在远程教学、也可以在面授教学的条件下进行,但相对于面授教育,远程教育更适宜于实现开放教育。现代远程教育和开放教育的结合,就是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国际上的开放大学都是进行远程教育的。在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以及成人教育等不同类型

教育中,都可以根据各自教育类型的特点,选择开放式教育的途径和方式,有效实施开放式教育。

“本土教育与国际教育有机结合”理念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现代教育并不否定和排斥具有国家民族特色的本土化教育,而是将本土教育与国际教育有机结合,在适应现代教育发展趋势中极大丰富和发展本土教育。正如马克思所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①本土教育与国际教育的有机结合,是现代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体现了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整体化特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及合作也变得越来越密切,并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商务洽谈到文化交流,无不流露出“国际化”的痕迹。与其他领域一样,教育同样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开始展露出“国际化”的面貌。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外双方希望在教育上有更多的交流,或者共享教育资源,合作的项目开始变得丰富,主动多元的阶段也在这个时候呈现出来。事实上,不少学校早在几年前已经向“国际化”发展迈出了第一步,尤其是大批民办学校和部分公办学校,其“国际化”特征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国际化教育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Chapter2

第二章

教育管理过度行政化

过度的教育行政化管制，致使教育管理缺乏活力，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步履维艰。因此，必须冲破过度的教育行政化管制的体制误区，加快构建现代教育管理新模式，使教育管理真正成为教育发展的推动力。

从宏观上看,教育管理是国家对教育系统进行组织协调控制的一系列活动。从微观上看,教育管理就是管理者通过组织协调教育队伍,充分发挥教育人力、财力、物力、信息等的作用,利用教育内部各种有利条件,高效率地实现教育管理目标的活动过程。教育管理分为教育行政管理和学校管理。中国的教育管理经过多年改革,不能不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教育管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深化教育管理体制变革仍然面临巨大挑战。

过度的行政化管制致使教育管理问题重重

大学成衙门,学术行政化。有人认为,“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造成的危害,已经有目共睹。由于学生处在“衙门”结构的最底层,因而受到的荼毒最烈:

首先,学生成了“摇钱树”,而且在一些学校是人人都可以去摇的“摇钱树”。按道理,既然学生交了高额的学费,学校里的一切服务就不应该再收费。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一些高校里凡是涉及学生的事

务,原本不收费的,现在都要收费了;原本收得少的,现在加倍了。如此状况,导致学校乱收费现象愈演愈烈。

其次,一些学生成了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力。学校的一些管理人员和老师,可以随意支使学生干这个干那个。一些带研究生的教授们,纷纷把自己的博士和硕士生当成劳工,为自己做课题,从老师变成了老板。一些学生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能干的学生和不能干的学生都毕不了业。不能干的,老板不喜欢,自然毕不了业;能干的,老板喜欢,轻易不能放走,也毕不了业。

其三,部分学生被培养成“奴才”或“愤青”。有学者认为,由于一些大学“衙门化”过程中,官场文化被大面积深度复制,在一些教师变成学官下属的同时,一些学生则成了下属的下属,奴才的奴才。一些学校的各种管理越来越严格细致,但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让学生听话。说得对要听,说得不对也要听,还不给学生任何解释,理解要服从,不理解也要服从,从来没有想过给学生哪怕一丁点自治的机会。在这种高压下,部分学生的心理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听话的变成了“奴才”,不听话的变成了“愤青”。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一些学校“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的高调推行,使得一些教师素质急剧恶化。在有些学校,只有一些听话的教师,才能得到正面的激励,而真正做学问的、坚守人格的教师,不是被迫离开,就是被边缘化。因此,一些教师的个人操守和职业道德,越来越劣质化。原本怀着崇敬心情进入大学殿堂的学子们突然发现,有着各种耀人头衔的一些老师,居然是这样的货色:渔利渔色,贪污腐败,侵占学生的成果,公开造假甚至剽窃。一些人心中原本尚存的一点具有正面价值的东西迅速崩解,人格遭扭曲,心灵被玷污,很快就会变得没有责任心,什么都无所谓。

一些教师的身教靠不住,言教也大有问题。在教育行政部门数字化管理的目标体系面前,教师只能为完成数字而挣扎,或者取巧造假;教学认真的教师,得不到正面的激励,反而面临下岗、转岗的威胁。一些学校最为马虎和将就的部分,就是教学。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但由于考核指标重科研轻教学,到目前为止,没有多少人把教育部的话当真。

事实上,教学越来越被教师视为可有可无的鸡肋,一些教师随便缺课、请研究生代课,即使上课,也信口侃山,随意对付。一些学校没有精力鼓励教师改善教学、变革教学方法、优化教材。教材的编写变成了部分教师评职称连带敛财的机会;教学方法的改革,仅仅蜗居在师范大学狭小的领域,其他一些学校基本上无人操这个心。如此忽略教学的状态,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警醒!

学术有腐败,学风不端正

有人认为,对于“学术腐败和学风不端”的当事人和相关人难辞其咎,不能诿过于客观条件。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这类现象会愈演愈烈?为什么涉及的人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并不复杂的弊案却得不到及时、公正的处理?

有学者认为,一些弊案一旦有权力介入,就变得复杂了,有时甚至会黑白颠倒。大学在学位授予、职称评聘、招收入学方面存在腐败现象,始作俑者往往也是一些高官和巨商,许多时候学校和教授想抵制也抵制不了。金钱的魔力同样不能小觑,校长、导师或许能抵挡对个人利益的诱惑,对涉及单位生死存亡的贷款、拨款、资助、项目就不能不权衡利弊,甚至作出违心选择。

在一些学校内部,权力的作用也大于学术评判,教授会、评委会、学术委员会往往形同虚设,专门聘请来的校外专家也只起点缀作用。一位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著名专家说,他不止一次在评审会上听到主管部门的表态:我们尊重专家的意见,但最后还得由领导来决定。这位著名专家与同人相视苦笑:既然如此,还要我们来评什么?但我还是得参加,要不,连这一点发言权也没有,如何向同仁交代?

这位著名专家指出,这样说不是推卸自己的责任。应该承认,一些高校和学术界的一些人已变得相当麻木和自私,出了事往往不希望家丑外扬,或者怀疑揭发者别有用心,是利益之争,莫名其妙地同情被揭发者,怕承担查处的责任,怕得罪权势人物,更怕事情闹大无法收场。就是举报者,往往也只敢匿名,不敢直接作证。在扪心自问的同时,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这样的局面是如何一步步演变过来的。总之,只有净化社会环境,避免权钱干预,

高校和学术界自尊自爱，高校的问题才会逐步得到解决。

科研官本位，教师无处逃

有人认为，必须对科技工作者热衷做官的现象深恶痛绝。因为要搞科研就不要当官，要当官就不要搞科研，当了官就要好好为科技工作者服务，既想当官又想搞科研肯定什么都做不好。

目前，科研系统“官本位”习气很严重。有人指出，作为科研人员，是什么职称就享受什么待遇，而不应该比照享受什么厅级、处级等待遇，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一些单位连所谓比照的待遇也是空的。“一线科技工作者实际待遇无法落实，往往是担任了行政职务后才能真正享受到相关待遇，造成了只要手中无权，科技工作者职称再高也兑现不了应有待遇的怪现象。”因此，“大量科技工作者千方百计要混个官当当”，一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也乐于给那些有成就的科技人员委任以大大小小的官衔，似乎只有封官才能体现对科技工作者成绩和学识的肯定。

在“官本位”习气影响下，一些科技工作者热衷于做官，被繁杂的行政事务分散了精力，忽视了本职科研工作，工作积极性受到影响。其实，搞科研工作和做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很难同时在一个人身上一体现。一些有领导能力的科技人员可以去做官，但做官的前提是必须为科技工作者好好服务，既然做官就不要搞科研，想搞科研就不要去做官。但目前有许多人既做官又搞科研，做官不为大家好好服务，而是利用职务之便，把好多科研经费留在自己手里，往往使真正搞科研的人没有科研经费，严重影响了科研事业发展。

利益加权利，从不思变革

有人认为，过去多年来，教育行政部门是十分繁忙的，大到全国各高校的办学质量，教育部要派专家一校一校亲历评估，此谓声势浩大的本科教学评估；中到大学生就业，教育部门要出台规定，规定就业率不达到某个指标就将专业停办、减招；小到学生怎么上课，比如跳集体舞、唱京剧、长跑，都要去指点。在这样的管理之下，有专家称，全国之内，就只有了一所学校，

也只有一个校长。大学千校一面，中学也是千校一面，学校办学没有特色，学生又何来个性与创见呢？

因此，必须解决“既得利益与权力紧密相联”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要实施这一步是非常困难的。比如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的校领导级别问题；高考改革打破集中录取制度问题；教育资源的配置模式调整问题等，都需要面对既得利益的压力，同时需要构建新格局的智慧。其中很关键的是，教育主管部门必须明确自身的责任，不是牢牢掌握权力，并制造权力、变现权力，而是机智地放权，把办学权交给学校，把评价权赋予社会与受教育者。有学者指出，在这样的管理架构下，教育部门不那么繁忙地发通知、文件，召开会议，制造奇闻，让高校和教师有多一点办学的自主空间、想象空间，教育也就“无为而治”了。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我们的学生才有可能真正以钱学森为榜样，见贤思齐。

形式滥成灾，教育花难开

有学者在《教育部门的行政管制造成了什么结果？》一文中指出，教育的政府垄断和行政管制很严重，也许是各个部门中最厉害的，而且管制的手段五花八门，主要由校长任免、行政审批和教学评估。

有人认为，教育行政部门直接掌握着各个学校校长和书记的任免，这不仅其安插本部门官员的重要途径，也是控制学校最好的办法。这些校长、书记是官员而不是教育家，他们没有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也不能有自己的教育思想，只能按着教育行政部门的调子跳舞，一切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安排办事，甚至教育部门的一个处长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训斥大学校长，而校长只好笑脸相迎。他们为了自己的乌纱帽，既不能容许教师的独立思考，也保护不了学生们应有的自由思想权利。他们是教育商业化和技术化的推动者，而不是学校人文传统的守护人。

办学的行政审批有无必要？利弊何在？行政审批是保证了办学秩序还是扭曲和破坏了办学秩序？有人认为，历史和国外的事实证明，办学的行政审批是不必要的，而实行备案制和加强监管则是必要的。用准入限制代替监管，一方面限制了民间在发展教育事业方面的努力和创造，保护了公办学校的垄

断地位，扭曲了所有学校的办学行为，制造和强化了教育的社会歧视；另一方面也是教育行政部门滥用权力、设租寻租和偷懒推诿的最好办法。而教育的腐败将中国的教育事业引向歧途，从年轻一代和少年儿童身上存在的问题就不难看出教育问题的严重。其关键在于，在教育行政部门的严格管制之下，不可能出现与现行应试教育不同的办学模式：不仅官办的学校不可能，民办的学校也不可能。因为不仅教材一模一样，而且对学校、教师的要求和考核也完全相同，于是，学校和教师的行为方式也没有什么两样，其结果只能在高分低能、有技术无思想、有知识无文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有人认为，教育行政部门不仅拥有巨大的权力，而且掌控着大量的资源，一步一步地将教育纳入官僚化的行政轨道。这里的主要手段是学科和教学评审，一是学科点、学位点设置的评审，二是科研项目的评审，三是本科教学的评审。一旦评审中标，学校的等级就会提升，经济上的好处也随即到手，的确是名利双收。表面上看，评审请来的都是各个高校的专家学者，走的是专家路线，公正公开，实际上是行政主导，公关开路，造假成风，彼此照顾。

有人认为，在教育行政部门的管制和主导之下，这种形式主义已经泛滥成灾。有人发出这样的呼吁：为什么不能打破教育行政部门的集中管制，让各个高校独立自主？为什么不能取消准入管制而改为备案制，让民间力量进入教育领域？为什么要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搞什么一本、二本、三本、四本，而不能取消歧视政策，让各学校平等竞争？没有真正的平等竞争环境，各学校的创造才能就不可能竞相迸发，创造性人才就难以脱颖而出。因此，如果不坚决改变教育管理形式主义泛滥成灾的状况，教育的发展将是一句空话。

制度危机伏，教育怎自度

有人认为，教育制度层面的危机，主要集中在教育与外部关系的领导体制和处理教育内部关系的管理制度方面。

我国教育领域目前通行的领导制度，是一种显著的行政管理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教育被作为行政机构进行管理。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

在一些决策者心里,并没有意识到教育是一种具有独特价值观念和文化目标、独特原则和活动规律的专门性事业,是需要遵循其专门的活动规律的。

有人认为,由于社会管理教育的行政机构习惯于将自己的自利需求强加于教育,严重地扭曲了教育的本质和宗旨,使教育失去了自己引以为荣的品格和精神,变得猥琐和庸俗。比如:一些教育行政机构在普通教育中推行的重点学校制度,对应试教育推波助澜,造成了教育机会和权利的不公平,使教育的畸形发展越来越严重。一些政府部门管着自己不该管的事情,又使中小学校、高等院校的职能窄化,无法全面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一些大学被定为副部级和厅局级的做法,让人感觉大学与官场差不多。这种行为凸显的行政特征,以及在各级教育机构中强化的主要对上负责的行政原则,造成普遍忽视教师声音的现象。教育领域中许多深层次矛盾形成的主要根源,可以说就是行政性的领导制度。虽然现在许多大学校长都声称在思考大学改革问题,但他们思考的改革,往往是在现行制度框架内或基础上的改革,他们所要加强或完善的大学制度,是“现在大学制度”,而不是人们期望追求的“现代大学制度”。

教育内部管理制度的简单化和行政化,造成教育领域中的种种乱象。有专家指出,教育管理制度层面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简单化的数字管理,二是显著的行政化倾向。简单化的数字性管理诱发了许多功利化现象。行政主导体制在剥夺了教师许多权利的同时,也解除了他们的不少教育责任,使不少人尤其是水平低的人感到大学确实“好混”,很多本来应该极其严格的事情,在现在的一些大学却无人过问。如:对大学活动有极其重要导向作用的教师职称评定,往往没有严肃、认真的专业性讨论,一些本行业的专家评定又由于“关系”等因素而流于形式,其真正起作用的标准却是一些机械的论文数、项目数、获奖数等数字。所以,有人说,现在的职称评定根本无需什么专家,只要找几个细心的本科生,将职称标准与申报人的材料仔细对照一下就可以了。这种简单化的标准,诱发了包括刊物版面费、期刊公关费、评委公关费等许多腐败现象。所以,虽然现在的一些大学中教授、博士数百上千,若过江之鲫,重大成果却屈指可数,风气也江河日下,越来越缺少大学的精神意味。

诱发过度的教育行政化管制的原因

任何问题和现象都是由一定的原因所引起的。诱发过度的教育行政化管制的原因多种多样。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官本位”思想作祟

“官本位”是“官”的本来涵义的异化。本来，官是一个较为好听的名称：处理国家公务曰官。官者，公也。《汉书·盖宽饶传》中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说苑至公》中说：“博士鲍白令之对秦始皇曰：‘天下官则让贤，天下家则世断，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可见，官的本义是“为公”。正因为以“公”相通，才有了尧舜禅让的佳话。韩非子在其名篇《五蠹》中说到“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但是在后来，人们的这种观念就发生了转变。也就是在韩非的那个时代，社会上就产生了重官的思想：“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积驾，故人重之。”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人们对官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官本位的思想观念。

有学者指出，“官本位”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而是通俗的说法，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这种说法起源于经济学上的一个专用名词——“金本位”。金本位指的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以黄金为单一的价值尺度去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由此看来，在最初提出这个名词时，官本位至少有这样一层意思：把是否为官当成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含义渐丰，不仅限于此。

有学者指出，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至少包括了以下四点内涵：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心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往往在多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它包含了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思维、官本位文化、官本位机制、官本位现象、官本位行为等多方面的意思”。

行政管理与党建理论研究专家季建林教授指出:“‘官本位’是封建官僚制度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以官为重的封建思想流传了几千年,‘官本位’至今尚有很深影响。加之,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还是不完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存在着产生官本位的土壤与条件。”^①季建林教授认为,现代版“官本位”有如下体现:

表现之一:公共权力运行中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公共制度与决策设计中将“官”的利益放在优先和第一位,甚至专门为照顾“官”的利益设计某些制度与政策。

表现之二:严格的上下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马首是瞻,只有无条件绝对服从。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权力,绝不允许下级“越级”反映情况,“官”大一级压死人。

表现之三:以是否当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评价人的价值和地位。于是,出现了“处级和尚”、“副处级播音员”、“局级运动员”、“科级教授”、“将军级演员”这种奇特的社会现象。

表现之四:形成以做官为荣、“升官发财”和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在“官本位”的基础上,形成了“官本位思考”、“官本位机制”、“官本位现象”、“官本位行为”等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

从根本上说,官本位意识是一种极端消极并产生严重恶劣影响的价值取向。政治哲学研究专家吴灿新指出:“官本位意识是与民本位意识根本对立的价值取向。”^②在当前,官本位意识主要表现为官价值至上、官“真理”至上、官利益至上、官僚主义泛滥和官商勾结严重。官本位意识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障碍,它会危害到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声誉及其执政行政的能力,会危害到党群和干群关系,会危害到民主和法制建设,会危害到经济

① 《“官本位制”严重危及党的宗旨》,《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24日。

② 《官本位意识是和谐社会的宿敌》,《嘉应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官本位意识在当代中国还有很大的市场，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社会现实根源的，因此，要破除官本位意识，必须完善制度安排，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政治伦理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政治管理体制不健全

众所周知，官场腐败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权与钱的联姻结合。虽然它有好几种表现形式，如权力寻租、以权谋私、权力资源市场化、资本权力化、权力资本化、买官鬻爵等，但千变万化离不开权和钱两样东西。权加钱这个混合的怪物，爆炸了是定时炸弹，不爆炸时对于很多人来说，永远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可爱尤物。它之所以可爱，是因为它又有权又有钱，既可以肆无忌惮地张扬权欲，又可以为所欲为地享受生活。孕育这个怪物的子宫就是不受高度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权力”！这种权力是鸦片，它可以让一些人心甘情愿地在忘乎所以、飘飘欲仙中走向毁灭；实际上，它是比鸦片还要毒的毒品，因为它损害的不仅仅是个人，还毒化腐蚀了整个社会！

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搞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搞反腐败斗争，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官”与“民”畸形关系这个顽疾。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的经验中提出了人民公仆的概念，列宁、毛泽东也曾经在执政实践中用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说确实有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过多依赖当权的革命者自身的修养、人品即所谓人治，以及历史、社会、时代、经济、文化等诸主客观因素而基本流产。有人把流产的原因归于社会主义，这是不公正的，因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是全体公民平等地拥有共同构建、整合、管理社会的权力，所谓“官”不过是公民自由选举产生的、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管理社会的、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而已。

有学者指出，公仆这个名称已经不是一种比喻、形容，而是规定了社会主义“官员”的内在性质，即为公民大众服务的国家和社会的公共性工作人员，而且这种服务必须体现在为职权范围内一切（即每一个）公民具体的服务上。社会主义的“官”，本质上不再是统治社会的工具，不是控制人民的强制性机器，由于“官”的产生和做官的合理合法性是建立在代表人

民利益、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之上，因此对上级负责与对人民负责必须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当两者有矛盾时应该毫无疑问地服从对人民负责！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解决“官”与“民”畸形关系问题上的流产，根子不在社会主义，而恰恰在于我们在实践中部分或者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关于“官”的原则定义。

组织人事深陷官本位

有人以为，现行的人事组织制度与官本位制风马牛不相及，怎么会是官本位作怪呢？不错，我国确实从来没有宣布要实行官本位制度（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正式宣布自己是实行官本位制的，而且几乎总是宣布自己代表天意或者人民执政）。所谓官本位制度是指在国家和社会的人事组织工作的具体实质性内容上以官的本位立场为出发和归宿，以官为核心和重心，使各种精神和物质的利益向官严重倾斜的一种潜在意识性的吏治制度。那么，在我国现行的人事组织体系中究竟有没有官本位制的东西呢？答案是毋庸置疑的！正因为我们的权力结构体系中事实上存在着官本位制的东西，所以官僚主义作风还十分严重。尽管组织人事结构中官吏这个名称消失，代之以社会公仆、领导同志、干部、人民勤务员等一些非常具有民主气息的称谓。但是名义的改变不等于事物本质也会自动改变，一些官员所表现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就是明证。

我们对行政管理的组织人事体系结构进行了一定的改革。然而目前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在反对平均主义或极端民主化的同时，往往会不恰当地扩大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特权、经济优惠和宽松的环境条件；有时候，非常时期的高度集权制和对干部的特殊保护和优待措施由于没有及时清理，政策的惰性惯性使这些措施在平常反而逐步扩大，形成越来越不可动摇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人民权力的空泛、抽象、无形、分散现象和现实操作的困难性，使代表人民的领导干部在具体执政时具有相对无限大的个人权力，以人民和社会革命名义的合理合法性是这种个人权力的权威基础，因为它同时具有国家和社会的双重权力，即既代表国家的上权又代表人民的下权。这在事实上为“官本位”创造了有利优越的条件。

有学者指出,在市场化进程中,实际上我们实行了一种自上而下的越放越大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无形中使政府权力更加扩大,事实上形成了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一些政府机关愈见庞大。我们一方面叫“精兵简政、放权让利”,另一方面官员的影响作用又几乎无所不能,无处不在!一个小小的经济项目,什么参观访问、出国考察、招商引资、政策优惠、贷款担保、洽谈签字、落成投产、扶持助销……无不见官员的身影。公权对私人致富起着“四两拨千斤”的神奇效应,巨大的公共政治经济资源使某些官员的地位获得前所未有的提高。同时,掌握这些资源的多寡又加大了某些官员之间的利益差距和心理不平衡,产生攀比效应。所有这些,对“官本位”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下面,我们通过对中国与日本在“公务员考试”的“热”与“冷”的比较分析,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官本位”的影响和作用。

在《公务员考试热是好事还是坏事?》一文中,有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公务员报考为何这般热?据相关部门统计:2009年仅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报考审查通过人数就突破百万,远远超过2008年的80万大关,有些职位近五千人争一职,可想而知公务员职位竞争的激烈程度。大家应该想想,特别是相关政策的制定部门和掌握着中国人事大权的有关部门应该想想:公务员考试为什么这么热?

相关人士认为:深层次原因在于报考的大部分人有一种理念:除了公务员,我根本不想其他工作,甚至瞧不起其他工作,至于其他的什么凡进必考,待遇只是一定原因,但都不是主要原因。

公务员是国家行政执法的主要群体,即便是非领导职务的某些公务员手中也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什么审批权、监督权、执法权等一系列的权力,实际上就变相地引诱着某些人为之拼杀,争过独木桥了。再加之近两年有些公务员滥用权力谋取私利,有这些“坏典型”在前面以身作则,才有“不当公务员誓不工作”的典范。对于广大的刚踏入社会的学子们来说,与其说他们了解公务员职业,不如说他们是羡慕公务员这个职业,实际上他们是对公务员权力和荣誉的一种向往。中国五千年封建礼教传统文化熏陶下的某些人,知道什么叫官,现在官都改名了,叫公务员。你看哪个企业的老总,拥有身

价千万还不是对一个对他指指点点的主管局的副科长点头哈腰,这一社会现象在有些人脑海中形成一个共识:没钱的怕有钱的,有钱的怕有权的,谁有权?自然是国家公务员最有权了,因此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在群众中最高,谁不想争呢?

令人担忧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热。一年一度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信息一经公布,这也就意味着新一轮的公务员职位竞赛已经拉开了序幕。这些年来,公务员一直是炙手可热的职业。越来越多报考者造成的极度悬殊的录取比例使得公务员考试成为“中国第一考”、“现代的科举考试”、“中国竞争最激烈的考试”。公务员考试的“热浪”不断升温,参加“公考”的热情也在不断高涨。公务员作为一个职业,本该和其他任何一种职业一样,具有一种平和的进出环境,但是而今的这种公务员“考试热”仿佛已经进入一种类似“高烧”的不良状态。这种情况不得不令人担忧!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竞相报考公务员的根本原因是看准了公务员这个“铁饭碗”稳定、安逸以及相对较高的社会福利和待遇。《公务员法》解释说:“本法所称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在我国,公务员的另一个大众化的称呼就是“人民公仆”。可以看出,公务员的主要工作是服务性的。然而这个服务性的职业,因其稳定性及各种保障制度的完善性,使它一直戴着“铁饭碗”的光环,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不是以道义责任和为人民服务的崇高职业去吸引人们,而是以较为“特殊”的待遇福利吸引大众,更可悲的是不少人考公务员的动机并不是想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而只是为了端上这只“铁饭碗”,去享受稳定、有保障的待遇,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否需要引起反思呢?

“中国第一考”该不该“降温”?据报道,2009年10月13日,公务员招考信息发布的第一天,由于访问人数太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就被挤瘫。由此可见,被称之为“国考”的公务员考试对于很多大学毕业生来说,又是人生的一场恶仗,其激烈程度决不亚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甚至激烈到了“千军万马走钢丝”的程度。面对如此惨烈的竞争,面对公务员“高烧”不退的现状,我们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公务员考试为什么

有这么大的吸引力？缘何越来越多的人想吃“皇粮”？公务员考试“酷热”的背后又说明了什么呢？

有人认为，公务员考试之所以如此白热化，究其根源和目前的时代背景有着莫大的关系。其一，如今，大学生已经明显“贬值”了不少，供大于求甚至已经成为了社会“就业难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加上一些大学生眼高手低，正如抱着高考的心态一样，很多人高考“跃龙门”只是为了更好地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或者人生起点，而目前的公务员考试已经变成一些读书人为实现目标需要逾越的第二道“龙门”。其二，众所周知，我国公务员公开的工资不如一些外资企业高，但其他的待遇较为优厚；公务员享有国家完善的社会保障，养老、医疗、住房等都不是外资企业员工所能期望的；而且公务员是一进终生，除非违法违纪，很少有可能失去工作等，这些都让越来越多的人“挤破”脑袋也要考公务员。其三，尽管公务员淘汰制不是没有法律依据，但在治理公务员的问题上，我国一些地方，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不少地方，即使公务员犯了错误，引起了群众反对，也只是从一个工作岗位调到另一个工作岗位，而且很多时候还是平调，更有甚者，有的人还把这种平调当作对公务员的处罚。另外，随着一些地方公务员辞职可以获得补偿与奖励等政策的出台，更加刺激了公务员考试的升温。试想，在公务员较之某些职业具有如此诸多优势与实惠的背景之下，谁还愿意一走出大学之门就去创业？公务员的权力大、“油水”多，而且可以光宗耀祖，怎能不让人羡慕与眼红！

很显然，从中央到地方依然会每年大量招考公务员——不但招考制度不会改变，连招人的数量恐怕也不会轻易缩减：2006年，中央、国家机关97个部门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公务员10 282人，有近百万人报名角逐，平均录取率为48.6:1，最热门的职业录取率高达2 014:1。2007年公务员招考涉及89个部门12 724个职位，共有1 113 966人次通过网络提交了报名申请，有742 386人通过资格审查，最终确认人数535 574人。2008年中央国家机关总共计划招录公务员1.4万余人，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有64万之多。从2003年中国公务员考试的报考人数23.6万，2007年就达到了130万，4年增长5倍的数据来看，考公务员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诚然,热衷报考公务员固然是一个好现象,报考的人多了更有利于国家在官员选拔上好中选优,为国家储备一大批的精英人才。但是公务员太热真的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吗?在报考公务员的“大军”中,到底有多少人是准备甘当人民公仆的?想来更多的人追求的是公务员们的“阳光工资”、“福利待遇”和“锦绣前程”。另外,报考公务员的人多了,那些选择自主创业和基层就业的大学生是否就少了呢?高素质人才都集中于政府部门,是否会使原本应在专业性更强的岗位上发挥热量的人才大大浪费呢?实际上,很多人看重公务员就是因为工资高、福利好而且稳定。但这种观念的背后是否会必然导致“惰性”升级,不思进取,工作上难有创新等的危机和隐患存在呢?

无论从事哪种职业,“能者上,庸者下”的自然规律都应该贯彻到底。公务员、打工者、外企职员虽然在工作内容上有区别,但职业基本特性都是平等的。如果公务员没有忧患意识,没有压力,怎么能重视“人民公仆”这一荣誉?因此,面对公务员考试“酷热”的现象,各地政府应尽量创造更多的其他的“饭碗”,特别是在“企业过冬、岗位缩水”的今天,进一步降低创业的门槛;同时也必须引入公务员淘汰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只进不出的局面,为畸形的公务员考试降温。同时要改善企业、科研机构待遇和保障措施,培养工作成就感,解决青年就业的后顾之忧。

公务员考试的“高烧”不退,让人不无忧虑,势必进一步强化中国社会结构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崇拜”。什么时候公务员考试褪去“中国第一考”的光环,成为一种普通的职业考试时,公务员群体也就回归了其社会本位,社会对公务员职位的竞争就回归到了正常水平,我国的改革也就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与中国“公务员考试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公务员考试却出现了较冷的状态。^①目前的日本,在经济低迷、就业不乐观之下,本以为报考公务员会更热,结果呢,2009年报考I类公务员考试的人数只有2.2万人,远不及经济危机前2005年的3.1万人。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出现“公考冷”?最大原因在于,日本一直致力于

①《日本为何出现“公考冷”》,《报刊文摘》2009年12月9日。

把“公务员”向“事务公务员”转型，避免官僚权力化。新政府上台后，宣称要打破明治时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官僚政治”，实行由“政治家主导”的政治，日本的“官僚”指的是政府公务员，特别是那些对政策制定能够发挥重大影响的高级公务员，而“政治家”主要指直接由国民选出的议员。此举最直接的结果是，让公务员的吸引力大大减弱，成为正常职业的一种，因此不少人主动退出这一考试，同时，真正有志于政治事务的人士面临的录取比例自然明显提升。由此，使“官”向社会各界真正有志于政治事务的人士打开了“方便之门”。

日本“公考冷”的另一个原因是，真正做到公务员的待遇没有“超国民化”，其待遇与民营企业职工差不多。2008年日本闹出“公务员坐出租车丑闻”，导致“部长”日本官房长官町村信孝数度公开致歉，而“丑闻”只不过是出台了公务员加夜班误了地铁可“公费打的”的政策、引来出租司机争客源而送小礼一事。可见，公务员连收点“友情型”小礼都视为“丑闻”时，“公务员热”降温就是必然的了。

功利主义抬头，学术气氛浮躁

据《新京报》2007年9月9日报道，在北京语言大学45周年校庆期间举行的“社会文化建设与当代大学的责任”论坛上，教育部一位副部长批评说，现在一些大学功利主义抬头，功利主义太重，就会急功近利，急功近利就会学术浮躁，大学文化积淀薄化。他还认为，“大学的官本位倾向也在影响着学术的发展，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也就会逐步失去色彩。”^①

本来，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场所，这个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它既不能是官场，也不能是商场，而应该是“知识创造的中心、思想激荡的圣地、自由精神的堡垒”。而今，官本位进入一些大学校园，做官的逻辑压倒了办学的逻辑，其结果必然是，官本位成为大学功利主义的典型代表，使大学的功利主义倾向不断强化。

教育研究专家潘洪其在《解决大学官本位关键在“教育家办学”》中指

① 《大学官本位影响发展 急功近利将导致学术浮躁》，《新京报》2007年9月9日。

出，大学官本位直接表现为“人员官僚化”。大学有副部级、正厅级，大学校长一般由政府司局级干部“空降”出任或升任，而罕有从本校教师中选任校长的先例，更没有形成从不具有行政级别或官员身份的名教授、名教育家中选任校长的机制。自校长以下，一批局级、处级、科级干部职位也引得一些大学教师“竞折腰”，这些人一旦为官，则既有当教授的荣誉，又有当官员的风光，充分享受到官本位带来的实惠，而学术追求则被抛之脑后。

俗话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学术研究是一种积累，尤其需要耐得住寂寞，数十年如一日地刻苦钻研。但是，“官本位”的文化氛围已经严重破坏了学者们的成长环境，住房、工资、科研经费等资源要么与行政级别挂钩，要么完全掌握在行政领导手中。急功近利的氛围必将抑制许多重大的理论创新和科技发明。

一些大学的官本位倾向也使得我国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大量的学术垃圾。虽然一些大学领导也追求学术进步和科技创新，但只是把这些看作是追求政绩的手段。由于目标的错位，在大学里就形成了一种重数量轻质量的激励机制。这种考核制度迫使教授专家不断地申请课题项目，完成各种形式上的科研任务，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学术成果”的井喷。正如一位全国政协常委所指出，每年国家统计的数万项科研“成果”中，90%以上无实际价值，形成了大量的“科技泡沫”。

大学是从事心智活动的场所，是学术的殿堂。科学与民主应是大学文化永恒的主题。我们应该尽快采取措施让“学本位”回归校园。毕竟，大学者，非有大“官”之谓也，而是有大“学”、大“师”之谓也。

有人认为，大学官本位是趋利制度的怪胎。大学里一个系的支部副书记（副处级）其地位和收入比一般的教授要高得多。这就造成了本来想搞学术的教授也不想搞了，还是谋个行政职务好。一位大学教授说，高校“官本位”现象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盛行。应该说，是大学里官本位冲垮了“板凳要做十年冷”的良好学风。

能当官就当官，当不了官就另辟蹊径评职称。没有文凭就造假，写不出学术论文就抄袭。近年来，比较典型的造假有上海一重点大学的某教授以一块磨光的别人研造的芯片去骗取国家上亿元经费、北京一重点大学的医

学院某院长助理的学术造假等。如果收集高等院校学者评职称的“计谋”，可编一本《捞职称之宝典》。

有学者指出，近年来，我们损失了多位大师级人物，比如社会学家费孝通、物理学家黄昆、书画家启功、文学家巴金。有人说大师已断档，是大师们没有薪尽火传。事实上，不是大师不提携后人，而是体制上的问题。一个崇尚“官本位”和树立“行政权威”的大学，不可能出现良好的师风和学风。这种环境下也不大可能出现大师级学者，即使出现也会被淹没。所以不要抱怨诺贝尔奖评委不评中国人不公平，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自己。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丹青从清华大学辞职一事，曾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到1977年下乡务农，自习绘画。1978年到1980年上中央美院油画系研究生班，以油画《西藏组画》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西藏组画》被公认为“文革”后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经典油画作品。曾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年末辞职。著有文集《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荒废集》等。陈丹青为什么要从大学辞职？有人曾问陈丹青：“你因为不满某些制度而离开了清华大学，中国的教育制度深为人所诟病，你认为中国教育改革要从哪里开始？”陈丹青回答：“真要改革，先要革除大学里无所不在的权力结构，不然教育没希望。但最不可能改变的正是权力结构，所以我逃走了。”^①

安徽大学名教授何家庆称学校行政化严重申请提前退休一事，也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何家庆1949年出生于安徽安庆，现任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专业方向为资源植物学，他还兼任中国园艺学会魔芋协会副会长，从事魔芋开发研究。何家庆曾十余次自费深入大别山进行科技扶贫。时间最长的一次，行程3.16万公里，其中徒步8000公里，向芋农和魔芋企业传授技术，被誉为“魔芋大王”。还是在2000年4月1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在安徽视察工作时提出，要“见见何家庆老师”。何家庆至今记得，4月23日早上7点半，他刚到铁山宾馆门口，温家宝拉着他对身边的摄影师说

① 《陈丹青：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11月27日。

“我们俩照张相”。

当时《北京青年报》报道，温家宝还对何家庆说，“你的事迹登在《人民日报》第一版，我很高兴。我在贵州看到老百姓的生活状况，睡不着觉，我们的心是相通的……”让何家庆上了《人民日报》第一版的是他“魔芋大王”的扶贫举动。他经过在大山里考察，发现魔芋（俗称黑芋头）除了食用，还可广泛用于化工原料、药品以及美容面膜。1998年他远赴大西南，教当地村民如何栽种有较高经济价值的魔芋。当年5月1日，何家庆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年末，他又从一名“编外”教员，破格被评为正教授，照片也登上了安徽大学的招生简章。如今，何家庆作为学校里的“名人”，已经被写入学校简介。何家庆说，自己只想好好进行魔芋研究，可是工作上的一些建议和要求总是“碰钉子”。2007年4月25日，他向学院申请提前退休。在何家庆看来，“现在学校行政化越来越严重，而且官僚迹象明显，我已忍无可忍，到该改的时候了。”^①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在高校录取学生中的行政化管制现象，也是令人深思的问题。曹林在《从落榜状元悲喜遭遇看教育泛行政化之弊》一文中记述了高校录取学生中的行政化管制现象问题：

海南高考状元李洋因“移民”身份而梦断清华的事，曾一度成为媒体报道、评论的热点，15日，李洋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遭包括清华在内的内地高校抛弃的他，被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录取了，并获城大颁发合计44万港元的“状元奖学金”……

不知因梦断清华遭遇过很大打击的李洋和他的父母，此时此刻心中是何种滋味；也不知道看到这条新闻后，规定李洋限报的海南省教育部门会怎么想；未曾破格录取李洋的清华会怎么想；这种教育体制的制定者和部门又会怎么想？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想到的是：这是对内地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一种无声的鞭策。

不拘一格降人才，录取了按内地规则不能上名校的人，并不折不扣地施之

^① 《安徽大学名教授称学校行政化严重申请提前退休》，《新京报》2007年5月16日。

以状元的待遇——正是在这样一种鲜明的对比中，不同规则的优劣得以展现。

香港城大以录取李洋表达了他们对招生的价值判断：录不录取一个人，完全是按照自主的教育规则加以考虑。对于李洋，城大的评价简单得很，只会以教育的眼光看他的成绩和素质，不会考虑诸如“高考移民”之类的其他身份。无疑，这种招生体制是符合教育规律的科学体制的。教育范畴内的评价标准就只能以教育的眼光，而不能掺和其他因素，政治的、经济的或行政的。

我们来看，为何李洋作为高考状元却被限报名校，为何清华想录取他却又没有走出这一步，甚至为何会出现“高考移民”这种中国独有的名词。这都与教育问题的复杂化有关：本身纯粹的教育问题，却被附上许多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为了这个政治目的把公平扭一下，为了那个经济目的再扭一下，结果教育问题就很难在纯粹的教育逻辑中理解了，教育公平也很难以纯粹教育的眼光审视了，价值评判标准很容易陷入了混乱。

这直接导致了教育的行政化：即教育不再是单纯的教育，而是受到来自各方面、各层次行政权力的影响。比如，考虑到本地区的利益，某地就可以随便出台政策左右招生录取，海南省的限报政策就是典型。清华虽然想录取这位高考状元，但考虑到与地方的合作关系，不得不遵守一种潜规则，给海南方面以“面子”——不仅清华，其他名校也没有谁会为了一个李洋而得罪一个地方政府。如此，在内地的教育体制中，按纯粹教育标准能上名校的李洋，其前途就这样被种种非教育考虑“谋杀”了。

可能很多人会谈到规则的遵守，说李洋落榜是规则惩罚的结果，可这种规则是以教育的标准制定的吗？这样的追问可以延着海南省那条“限报”的霸王规则向前追溯。

很多网友在《海南移民高考状元被香港城大录取》这条新闻下留言，向李洋“重获新生”表示祝贺。我想，之所以祝贺，是因为这个结果符合他们“正义的感觉”——而一个符合公众正义感觉的教育体制，一定是纯粹按教育标准而不附加其他考虑的体制。^①

① 《从落榜状元悲喜遭遇看教育泛行政化之弊》，《燕赵都市报》2005年9月16日。

教育管理制度与社会上的任何制度一样，其内在的合理性是建立在公开、公正、文明的价值观念基础上的，而如果缺乏这些特征，制度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制度的作用就会被无形减弱。而我国教育领域中某些方面的行政化的管理制度，使管理者与教师、学生之间的协作关系，变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实质性的“上下级”关系。管理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向教师发号施令，甚至要求教师们要对他们的权威表示敬畏，教师们却几乎没有质疑和反对的余地。可以说正是我们长期秉持的行政制度抑制和掩盖了学术制度，造成了行政权力至上的结果。而行政原则至上的结果，又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教师的责任心。

有专家指出，从根本上说，过度的行政化管制致使教育管理缺乏活力，问题重重，是由于还没有真正反映教育的本质性要求和特征，没有真正体现教育的专业性、自主性品质和精神主旨，现行教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还缺乏内在的合理性，以其过度的教育行政化管制教育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教育的理性方向，成为简单化、片面化、科层化的教育管理。

当然，当今中国，看什么问题都不能离开中国这个大环境，看中国教育的现状也是如此。有专家指出，学校不是世外桃源，学校内的人——从书记、校长到学生，从专业人员到工人——不能不食人间烟火，社会上存在的现象在学校里或多或少都存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学校都是公办的，都是纳入党政体系的“事业单位”。脱离中国的实际去讨论学校教育问题，不是隔靴搔痒，就是缘木求鱼。即使寻求理想的教育精神，至多也只是发思古之幽情，或寄希望于未来。如果真想为教育的现状把脉，还是面对现实，脚踏实地为好。有专家主张，应当将教育的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普遍性的，或主要是由政治体制、国家政策、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等非教育因素造成的；一是学校特殊性的，即由于学校自己的原因产生的问题。无论持什么态度，都必须真正反映教育的本质性要求和特征，真正体现教育的专业性、自主性品质和精神主旨，切实改变其过度的教育行政化管制教育活动，消除强制化、片面化、科层化的教育管理模式。

当然，切实改变过度的教育行政化管制状态，也并非易事。北京一所重点大学校长在2010年3月9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取消学校行政

级别同时要有新的制度设计”。该校校长表示，作为改革的一种手段，去行政化肯定是希望教育越办越好，但是，把取消学校行政级别作为去行政化的一个基本措施，“当前可能这不是最主要的，不一定是抓到主要点子上了。”他说：“我是完全赞成学校取消行政级别的。因为现在大学的行政级别让人感到很尴尬。比如人民大学的经济学院、法学院那么大的学院，有那么多顶尖的教授，竟然被认为这是个处级单位；大牌教授任教研室主任甚至被认为是科级领导等等，这难道不是一种令人尴尬的制度安排吗？”该校校长认为，学校并不是孤立于社会的，总是跟社会有着广泛交流联系的。“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目的肯定是要促进教育发展嘛，总不能让教育更难办，因此，取消行政级别的同时，就要有另外一种新的制度设计，以利于学校能更好地与外界交流，争取到更好的制度环境和办学条件。在浓厚的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中，把学校办得更好，为国家、为民族，也是为每个家庭提供更好的服务。”该校校长说，在去行政化这个问题上，他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包括学校在内的全社会的企事业单位都应该取消行政级别。现在社会上太多的东西和级别联系在一起，在这种还是主要以行政级别衡量社会地位的大环境下，单单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而又没有新的制度安排，最终受到贬损的是教育，受到不利影响的是孩子。由于教育的特殊性，这种损失对学生来讲是无可挽回的。所以对待教育问题特别讲科学、特别讲谨慎。

加快构建现代教育管理新模式

构建现代教育管理新模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在加快构建现代教育管理新模式的过程中，需要深刻认知和切实解决的问题很多。我们认为，针对我国教育管理的现状和发展来看，特别需要进行如下深入思考：

消除官本位意识和行政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

加快构建现代教育管理新模式，必须消除官本位意识和行政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对此，应当深入改革政府行政机关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建立

健全具有现代民主文明的新型的行政机关管理体制和机制，消除官本位意识和官僚主义作风。列宁曾经尖锐地指出：“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①因此，为了克服官本位制和官僚主义作风，我们必须深入分析研究产生官本位制和官僚主义作风的深层原因，看清产生官本位制和官僚主义作风的现实机会和条件，坚持不懈地制约、克服、消除产生官本位制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各种机会和条件，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切实可行的能够真正为民众使用操作监督的有关法规制度，改变行政机关对教育实行行政化的严格管制的方式，把强制化、简单化、科层化的教育管理模式转变为能够真正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的、适应现代教育发展要求的民主化、科学化、持续化的教育管理新模式。

真正按照现代教育发展理念健全教育管理系统

加快构建现代教育管理新模式，必须真正按照现代教育发展理念健全教育管理系统。现代教育管理系统是指根据一定的教育目标，通过决策、计划、组织、指导和控制，有效地利用教育的各种要素，以实现培育人的教育管理活动。现代教育管理是一种系统管理，管理者应该把管理对象作为一个动态的系统，以整体优化的观点协调各基本要素（包括人、财、物、信息和任务等项目）间的关系，使之向共同的管理目标逼近。因此，真正按照现代教育发展理念健全教育管理系统，既要改革原有的管理目标，又要改革原有的管理方法。现代教育管理系统的真谛在于发挥人的价值，发掘人的潜能，发展人的个性，尤其是在知识经济呼唤创新精神的时代，教育管理更应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现代教育管理系统把激发、形成教育工作者的内部动力机制作为管理目标，强调通过让教师和学生取得成功，最终实现教育取得成功的目标。改革管理方法即要改变传统的外压式的强制管理，通过为全体教育工作者创造成功机会，让教育工作者积极主动参与教育管理工作，改变被动接受管理的行为方式，使教育工作者成为教育管理系统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1页。

中的有利因素。

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

加快构建现代教育管理新模式，必须以人为本，积极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从教育主体作用论原理来看，教育过程的本质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两方面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从教育学意义来看，教育过程是教育者主体性的实施和受教育者主体的实现过程。教育者主体性在教育过程中是一种实性存在，具有自我规定性，先于教育过程而获得；而受教育者主体性是在教育过程中在教育者的直接影响下完成和确立的。受教育者是发展过程中的人，应尊重他们正在形成中和将要成熟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的发展直接处在教育者引导之下和意料之中，教育者是受教育者主体的前提条件。教育者的主体性的意义在于赋予受教育者主体性以可调控性的特征，受教育者主体性可体现为对调控的自主选择及体验。由此教育者主体性的发挥和体验直接影响到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发挥和体验。所以，无论是从教育者施教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受教育者受教的角度来看，都必须以人为本，积极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

教育思想的转变与改革教育方法双管齐下

加快构建现代教育管理新模式，必须把教育思想的转变与教育方法的改革结合在一起。从一般情况来看，仅仅抽象地要求人们进行教育思想观念的转变，人们往往听听有道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认同，但总觉得有“看不见、摸不着”的感觉。教育管理者（尤其是学校管理者）要花大力气把先进的教育思想转化为相应的教育教学方法，创设宽松民主、开放多元的教育教学环境，在共同讨论、整合互动的基础上，鼓励教师大胆实践、不断创新，使教育思想的转变不断深化，使教师和学生都有成功的体验。同时，使更多的教师在每个教育教学的实际环节中，都能自觉地运用正确的科学方法对学生进行教育，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取得成功的体验。在鼓励教师大胆进行教育教学方法改革的过程中，学校管理者还应注意分析不同的教育方法背后的教育思想，促进教师对教育思想的深入领会和把握，引导教师提升其教

育理论创新水平和教育实践创新能力,从而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增强教育教学效果。

让教学科研评估体系公正、合理,取信于民

加快构建现代教育管理新模式,必须建立健全公正、合理的教学科研评估体系。教育科学研究专家袁敏指出:“现行的评估体系,助长了教育浮躁的滋生和蔓延。现在,学术腐败严重,抄袭现象屡禁不止,这些都与评估体制的影响有关。”^①因此,必须改革以“量”为核心的评估体系。盲目追求论文数量容易引发学风的浮躁,致使大多数论文无重要价值,将阻碍中国教育、科技的发展。现存许多学校的教学科研评估体系是“应景型”的,使人心浮气躁,不得不去搞那些“西红柿炒鸡蛋”式的短、平、快的科学研究。同时,还要改变领导政绩的评价标准。教育界的浮躁自上而下存在着,有的领导往往好犯“政绩”浮躁的毛病,总希望在任期内多出、快出成果,却很少强调成果的内在质量。有的领导者,在教育建设中只重经费、待遇、仪器、实验室等有形条件,不注意人才素质、环境氛围、人际合作等无形条件。在教育管理中搞“一刀切”,顾此失彼,厚此薄彼。很多政策和规定,往往是便于管理者的管理,却不便于被管理者的教学科研实践,最终严重影响教学科研的质量。

让大学有大学的氛围

加快构建现代教育管理新模式,必须大力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培育科学精神。对此,要大力营造重贡献、重水平、重学风的环境,严防虚假宣传和不实包装,不应该过于看重有奖项的级别和获奖成果的排名顺序,对弄虚作假、夸大其词、虚报成果的人员应给予严厉处分。对那些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抵制各种不端行为,踏实敬业的教学、科研人员给予表彰。真正在全国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创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环境,造就和凝聚一批德才兼备、爱岗敬业的优秀教育工作者。要积极培养教育工作者的

① 《倡导敬业精神 抑制浮躁学风》,《黑龙江教育》2008年第1期。

科学精神。科学精神的核心就是崇尚真理，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求真，独立思考，不问利害、不问个人得失，只问是非。现在一些人把科学研究看成了仅仅是一种职业手段、一种谋生的手段，和社会上其他职业的活动一样，受物质利益驱动。这种物质利益型的驱动力，是不可能产生有重要价值的科研成果。必须营造一个追求真理、开拓创新、争取成功、容忍失败的宽松环境，才能使教学、科研人员解放思想，敢于探索，锲而不舍，才有可能取得自主创新的成就。

让专家、教授治学

加快构建现代教育管理新模式，必须建立健全专家、教授治学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倡导教育家办学，保障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拥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建立健全专家、教授治学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指出，教师对学校事务的参与和管理权，是现代大学的基本管理制度。迄今为止，中国的大学管理模式是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学校里的行政官员对学校事务有最高的发言权。这是延续了非学术组织、政府组织的行政化、科层化的管理模式，而这种管理与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管理的要求是不适应的。大学是学术机构，必须实行学术内行的自我管理。从2000年开始，国内一大批大学开始实行新一轮的教授委员会制度改革，从东北师范大学开始，中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很多大学在学院、系建立了教授委员会，而这些委员会到底是决策机构还是学术评价机构，各个学校在实践中赋予的功能各不相同，但是都说明是教授治学。现代大学的管理和100年前已经很不相同，大学已经成为非常复杂的组织，教授不可能直接处理很多复杂的非学术的事务，在美国也如此。美国的大学有一个副校长主管学校行政，校长是学术领袖，是学校的形象代言人，是公关的主要代表，这个制度在中国的新一轮大学建设过程中会获得生命力。

下面，是北京工业大学党委书记王守法在《合理构架大学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文章中所提出的“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协调政治权

力和行政权力”的重要观点,对于人们进一步思考构建科学合理的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具有深刻启发:

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协调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

从政治学视角考察我国高等学校的内部体制,高校党委是领导核心,党委领导是党的领导在高校的实现形式。党委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决策的领导。从管理学角度讲,领导致力于整个组织发展方向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决策和目标的制定等方面。领导与管理的功能不同,但又相互连接。领导通过服务、带领、影响,最大限度地团结干部和群众,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事业发展兴旺发达增添力量。管理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把人、财、物、信息等资源按合理合法、高效低耗的要求组成有效运作的系统,驱动组织不断前进。

科学区分领导与管理,使党组织处于超脱具体行政事务、驾驭全局的地位,既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党在高校的领导,发挥政治权力的作用,增强党委对学校的统一领导,又有利于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行政权力,发挥行政系统的职能,实现党委领导与校长负责的有机结合。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关键在于要协调好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党委的领导职责主要表现在把好方向、抓好大事、用好干部、出好思路上。党委要完善常委会决策制度、常委分工负责制度,建立健全常委会工作沟通协调机制,完善监督制度。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学校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要求,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充分体现党委集体领导。

大学内部行政权力是学校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通过各种方式管理行政事务的权力。行政权力的主体主要是行政机构及行政人员,其客体是行政事务,主要通过法律、政策、指示、指令等自上而下贯彻执行,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行政系统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上级对下级具有绝对的控制权。行政组织系统的科层制结构特点决定了只有坚持法治,照章办事,才可以最大限度减少长官意志对管理系统有效运行的干扰,保障管理的科学、合理,实现

管理运行有序、高效。

高校党委作为统一领导学校事务的集体,必须坚持依法保障校长行使职权,严格禁止不按程序办事和随意插手越权办事,为校长依法独立负责地解决各种问题和正确行使自己的职权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校长在党委重大决策的基础上,依法独立负责学校行政体系的运转。校长负责规范行政权力,调整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校长既要对学校党委的领导和决策负责,又要与内部学术体制相联系、渗透,将学校各项重大决策贯彻执行、予以落实。^①

构建有利于提升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创发能力平台

加快构建现代教育管理新模式,必须构建有利于提升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创发能力平台。能否切实保障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是能否增强学术创发能力的重要条件。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许章润认为,大学管理体制行政化首先抹杀了大学教授的主体性和大学本身的主体性,造成了中国大学及其教授们基于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创发能力的萎缩。教授们说话空间的大小与学校的行政级别成正比,课题确定又要投其所好,所以创发能力和热情苍白化。因此,加快构建现代教育管理新模式,必须构建有利于提升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创发能力平台。此外,对于改革大学管理体制行政化,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温儒敏认为,有两点是可以较快实施改革的:其一,取消校内的“行政套级”,在学校起码要逐步淡化“官本位”。其二,职能部门改变机关化,切实往服务教学方面转化。不应当处处想着“管理”,不断给下面“找事”。许章润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很重要的是发挥私营、外资企业的积极性,充分实现所有者的多元化,引爆其创发能力。中国大学的发展也应该借鉴,小型、地方性、工科学技术型院校也应该鼓励私人资本进入,造成学校在董事会引导之下的资本配置,这是增强中国高校活力的釜底抽薪的做法。

① 《合理构架大学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光明日报》2009年10月12日。

让政府管该管的事

加快构建现代教育管理新模式，必须切实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提高教育管理科学化和有效性。对此，有专家指出，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统筹规划、政策引导、监督管理和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建立健全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维护教育公平和教育秩序。改变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方式，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对此，必须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管理的有效性，规范决策程序，重大教育政策出台前要公开讨论，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成立教育咨询委员会，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咨询论证，提高重大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建立和完善国家教育基本标准。成立国家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机构，定期发布监测评估报告。加强教育监督检查，完善教育问责机制。同时，要大力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

幼儿教育超前成风

幼儿教育盲目超前的态势愈演愈烈，致使幼儿的灵性过早泯灭，好奇心丧失殆尽。因此，必须冲破幼儿教育盲目超前的误区，避免拔苗助长的危害，让幼儿保持天真烂漫的童心与童趣。

近些年来，年轻的父母们越来越注重幼儿教育，“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已成为广大家长的共同心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欣喜的现象。科学、适时的幼儿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和人才的培养都极为有利。尤其对于6岁之前的孩子，其学习兴趣的培养处于一生中发展最快的敏感期，所以父母也应该在这个时期抓紧对孩子学习兴趣的积极培养。

但是，如若认为幼儿教育越超前越好，甚至片面认为幼儿教育就是使孩子尽早多读书、多识字、多做算术、多学才艺，就是把孩子过早引入“成熟化”或“成人化”发展的状态，那么这种想法和做法必然造成拔苗助长的危害。孩子身体内各器官的发育、机体的成长和思维心理的健全是一个循序有致的过程，盲目的超前教育可能会造成孩子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使其不能得以正常的全面发展。

早期教育不等于“超前教育”

内蒙古师范大学早期教育研究专家解翠玲指出，早期教育这一概念在教育词典里是没有出处的。早期

教育的年龄时间段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一般对早期教育的广义理解为学前教育，即0岁至6岁的教育；狭义的理解为0岁至3岁的教育，即婴儿期的教育。早期教育研究专家姜英杰指出，按照美国幼儿协会的定义，早期教育是指对0岁到8岁孩子实施的教育，在某些情况下，特指0岁至3岁儿童的教育或者学龄前儿童的教育。^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家政专业委员会理事长赵忠心提出，早期教育是一种非正规教育，不是以传授知识为主的，不能跟学校教育（即正规教育）相比，幼儿教育（包括幼儿园教育）也是一种非正规教育，不能把教育过早地正规化。^②

“超前教育”又称“提前教育”，顾名思义是指超越儿童常规发展，把以后需要学习接受的事物提前教育。早期教育研究专家姜英杰指出，儿童心理学专家认为这种教育对个别人可能适用，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行不通的。英国著名教育思想家卢梭曾经在其名著《爱弥儿》中形象地指出，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这个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果实早熟，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就是说，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当人们为超前教育的“成果”沾沾自喜时，却导致孩子的认知能力的扭曲，孩子某一方面的发展以损害其全面发展为代价，孩子的童心和童趣过早地被泯灭。原苏联著名教育思想家乌申斯基就曾深刻指出，孩子们是凭形状、色彩、声音和一般感觉来观察思考事物的；假使有人想强迫他们凭其他方式来观察思考事物，那么，他便是无理地、有害地胁迫着孩子的天性。

早期教育研究专家赵碧霞在《超前教育要有“度”》一文中，深刻分析了超前教育所带来的危害性。如果人们认真读一读赵碧霞下面的分析论述，对于读者认识超前教育的负面影响会得到深刻启发：

3支冰棍+5支冰棍≠3只苹果+5只苹果

玲玲的妈妈好不容易教会3岁不到的玲玲：3支冰棍加5支冰棍等于8支

① 《非理性的超前教育：关于早期教育科学性的思考》，《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② 《早期教育不等于超前教育》，《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8期。

冰棍，玲玲总算可以在妈妈问她“3支冰棍加上5支冰棍等于多少”的时候大声地说：“8支！”然而，她学会的是真正的算术吗？当妈妈拿出一堆苹果，问玲玲，“玲玲，你看这里是3只苹果，这里是5只苹果，加在一起是几只啊？”玲玲皱着眉，依然说不出。妈妈很苦恼：既然已经知道3支冰棍加上5支等于8支，为什么一换成苹果仍然不知道呢？

其实玲玲的妈妈所做的实质上是一种超前教育，她的“失败”意味着什么？是玲玲太笨吗？不，其实，年纪那么小的玲玲还不能掌握我们成人觉得那么容易的数学概念，当妈妈让她学习有关冰棍的算术时，她只是靠记忆像听故事一样记住了一个事实，而不是真正的数学！

早期教育中的超前教育会对孩子的身心发展带来哪些不良影响？

危害一：将超前于孩子发展过程的知识技能强加于还没有完全做好能力上准备的孩子，它不仅仅会使父母倍感挫折，更严重的是会影响孩子以后的发展。

小鸟的妈妈如果在小鸟还没有长出羽毛的时候，就硬赶着小鸟飞出鸟巢，结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年幼的小鸟掉落在地上，而且可能永远丧失了飞翔的胆略。同样，科学家发现，儿童的许多能力是在成长中的某一段时间才会出现的，过早地将儿童还不具备该能力的知识强加于孩子，只能引起孩子更多的困惑和恐慌，特别是当他们面对想方设法要求他们完成任务的大人时，他们会为自己完成不了任务而感到害怕，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这种不自信带来的后果将影响孩子一生。

3岁之前的孩子，其大多数能力的发展处于人一生中发展最快的敏感期，父母给的刺激越适当，孩子相应能力的挖掘就越多，但是在这个大脑细胞还在继续生长的阶段，若父母急切地想将传统意义上的知识灌输到孩子脑子里，反而会使孩子将来吸收知识形成障碍。是否能学好某种知识来源于学习者本身在这方面的能力。比如，一个逻辑推理能力不强的人，不管你怎么说，他都无法在脑中进行一遍三角函数的推算，一个对色彩感觉不敏感的人，无论怎么样都无法创造出色彩和谐的画面。而这些能力来源于何处呢？不在于成

长后的教学，而在于人之初能力的培养。适合孩子成长的教育，让孩子在宽松、自由的环境里接触他们喜爱的玩具、花花草草，让他们为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学习知识打好基础，这是一种似乎还看不到成果，却实际上是比成果更为重要的基石，就像没有好的视力，我们无法看清楚远处的景色；没有好的听力，我们无法听清优美的乐曲一样。

危害二：不少年轻父母为了更早地看到成果，不惜忽略孩子能力的积累，而只求快些让孩子接受知识，事实上却限制了孩子能力的发展。孩子和成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当父母只注重孩子每天学了几首儿歌，会写了几个字，学了多少算术题的时候，他们便忽略了孩子和伙伴玩得是否融洽，在游戏过程中有没有摔倒再爬起，而孩子也逐渐只关心那些大人们为他们安排的任务，少了探索的兴趣，少了寻找问题和答案的动力。这些父母与孩子都逐渐远离和忽视的东西，与知识本身相比，对成长却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就像造房子一样，为了能尽快造起高楼大厦，却没有打严地下的基石，结果造成或是楼房的倒塌，或是无法建成高楼大厦。

危害三：有些超前教育，似乎对孩子目前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孩子幼年接受了不正规的教学方式，养成了不良的习惯，以至在以后真正的学习中无法接受正确的教学，影响其发展。比如，现在许多家长希望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能够掌握母语以外的语言，殊不知，由于教育本身在语言教育内容和方式上的问题，语言敏感期的孩子却将第二语言教育中许多不良的语音也一并吸收了进来，而且这种负面的影响比他们学到几个单词的正面影响大得多，等到上学后真正开始学习外语的时候，启蒙语音的不准确会使他们无法和其他孩子一样正确地按照音标朗读。

超前教育：优势能维持多久

超前教育将许多孩子本应在游戏中度过的时间用来进行比他们大的孩子才进行的学习，那么这种教育会带来与付出对等的后果吗？美国某大学做过一个实验：把175个孩子分成两组，一组由父母按照一般条件进行教养，另一组从3个月开始进行早期教育。之后，每15个月测验一次。他们发现，接受超前教育和训练的孩子智商确实平均高出15点。然而，这种早期教育的优

势并没有一直保持下去,有些儿童上小学四年级后,就逐渐丧失了这种优势,而接受父母循序渐进教育的孩子通常都赶了上来。

为什么超前教育会在小学就显示出不尽如人意的结果

这是因为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的学习兴趣、学习态度渐渐地开始支配他们的学习效果,而不是单一的智商,而且,超前教育组儿童在早年所体现出来的智商优势并非他们真实能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他们比其他孩子学习了更多知识的基础上。等到其他孩子的知识在正规学习时突飞猛进以后,超前教育儿童在知识上的优势就不明显了,相反,他们在幼年较少获得学习之外其他能力训练的不足则慢慢表现出来了。^①

早期教育并不是单纯地为了提高智商,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在游戏和学习等教育活动中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是一种重在学习过程而不是单纯追求技能训练和知识掌握的教育。我国早期教育研究专家赵忠心认为,早期教育的任务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二要学好母语,三是丰富感性知识,掌握生活常识。早期教育并不提倡超前学习大量知识,在儿童生命的早期,对其身心发展的整体关注、科学教育才会有助于儿童的终身发展。在学龄前阶段,最主要的是要让孩子丰富感性经验,掌握生活常识,这是直接经验。上学之后读书,书中讲的就是间接经验,就是理性经验。从科学的认识论观点来看,要想掌握大量的间接经验和理性经验,首先应该掌握大量的直接经验和感性经验,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间接经验。而在童年的游戏和活动中所积累的常识就是感性知识,感性知识越丰富,学习理性知识时才能有更好的理解力。早期教育研究专家姜英杰也指出,超前教育是将教育时间大大提前,让孩子过早地接受和承受不应有的压力,过多过高地硬性要求和希望孩子学这学那,完全不顾及孩子的天性,其结果必然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① 《超前教育要有“度”》，《星星生活周报》2006年1月23日。

幼儿超前教育的态势愈演愈烈

“一岁能背诵五言绝句，两岁识字2 000个、背诵30首以上古诗，三岁识字达到3 000个，四岁左右能流畅地读书、看报纸，五六岁时会使用汉语字典，喜欢古典文学或现代文学。”

这是某早期教育机构提出的“早期儿童教育标准”。与此同时，另一些幼儿教育机构也把培养孩子超前大量识字奉为圭臬。面对这些明显忽悠人的不负责任的宣传和高昂的价格，家长们竟趋之若鹜，争相解囊。

当前，超前识字教育、超前算术教育、超前外语教育、超前艺术教育、超前体育教育等俨然成了很多早期教育机构“发财致富”的法宝，家长们往往也以孩子早日进入各种超前教育班为荣。但是，在这些超前教育的狂热与躁动中，却很少有人去反思：超前教育是否符合教育规律，是不是真正符合孩子发展所需？这是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还是在透支孩子未来的发展？

家长望子成龙心切，以为孩子早学知识定能早日成才。中国民间有一句俗语：“早栽秧早收谷”。这话的含义是说，早日栽种秧苗，就能早日收获稻谷。其实，过早栽种真能早日有所收获吗？据说有一位名叫阳阳的“幼儿天才”，他才2岁半就已经会背100多首唐诗、50多则成语故事、12篇童话，能说出20个数字和26个英文字母……4岁的时候已经会做出小学的许多算术题！问及阳阳妈妈是如何培养孩子的，她列出了一个清单：阳阳每天必须读两篇故事书，回来讲给妈妈听；写出7个英文字母；画一幅画；做出五道算术题。邻居吃惊于孩子惊人的学习量，阳阳妈妈却语重心长地说：“要想把孩子培养成才，就一定得从小就严格要求，并且越早越好，这样才能让孩子多学知识，早日成才啊！”可见，阳阳妈妈望子成龙的心情是何等急切，她真的以为“尽早栽种秧苗，就能早日收获稻谷”。

在1997年7月，杭州大学儿童心理学专家对萧山市220多名3岁至7岁的幼儿进行为期一周的认知能力测查中发现，与日本大阪教育大学和筑波大学的专家们在同一时期对日本幼儿进行的同一内容的测查结果相比，在总共

18类指标中,中国儿童分辨数的概念、分类、时间、序列等能力较日本孩子强,而在运动、组合、容积、空间转换等方面则日本孩子强于中国孩子。这次测查的结果充分暴露出我国幼儿教育存在的一些误区,由于对幼儿过多地进行以数学、文字为主的超前教育,而忽视了幼儿的空间转换、形体感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使幼儿左脑的智力发展比右脑超前,影响了幼儿左右脑的均衡发展,具体表现为幼儿的逻辑推理能力较强,而想象力和动手能力较弱。这种状况如不及时纠正,将有可能导致幼儿今后左右脑智力的畸形发展。

根据现代人体发育医学理论和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幼儿的身心发育和学习有其规律性,哪个年龄该学什么,哪个年龄进入什么教育阶段,都该有科学合理的明确要求。对于不明世事的幼儿来说,过早地给他们套上繁重学习的枷锁,强迫他们超前学习或盲目学习,只会使孩子在不堪重负之中失去学习的兴趣,甚至对学习产生巨大的恐惧心理。

美国儿童心理学家格赛尔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即双生子爬梯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其中一个双生子从他出生后的第48周起每天做10分钟爬梯训练,连做6周,到第52周他能熟练地爬上5级楼梯;在此期间,他的同卵双胞胎兄弟并不做爬梯训练,而是从第54周才开始进行爬梯训练。但到他们满56周大的时候,只练了2周的双生子在10秒钟内能爬上特制的5级楼梯顶端,而练了8周的双生子则需要20秒才能完成同样的任务。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儿童的成长是受生理和心理成熟机制制约的,人为地任意提前对其训练,效果不见得会更好,还可能会给儿童在生理和心理上造成负担,甚至影响儿童的健康成长。

从以上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出,幼儿犹如大自然中的一粒种子,需要自然界赋予的各种条件,如温度、湿度、阳光等,但同样也需要成人的关心和呵护,需要科学的引导和培养,唯有双管齐下才能健康成长。早期教育有必要,但切忌超前教育!在进行早期教育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孩子的实际水平,在孩子尚未成熟之前要耐心等待,不要违背孩子发展的自然规律。人为地通过训练来加速孩子的发展,可能会在一定时间内占一些优势,但由于这种优势完全是靠人为力量获得,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即便是一些优势也只是一时的优势,很难保持下去。只有尊重孩子自己的生长规律,满足他成长的一系

列阶段里相应的需要，在他应当开花结果的年龄才能自然而然地大有收获。

过早过度开发人的智力，幼儿教育成了智力开发的受害者。幼儿教育在本质上应当是为人的终身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的素质教育，是旨在促进幼儿在体、智、德、美等方面得到健康和谐发展的教育。所以，促进幼儿的智力发展是幼儿教育的重要内容，但绝非全部内容。一些小学一年级的老师说，接受过超前教育的孩子，有的坐姿不正，拿笔姿势也不对；有的写字如画画，在一个格子里挤着写好几个字；有的学“神算”的孩子做起算术题来错误百出。有的中学老师提出，不能只注重智力因素的培养，更应该注意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从小进行全面的教育，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道德涵养、审美趣味、交往能力、创造能力和生存能力。不少大学教授也说，现在让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们“做学问”，而让大学的教授来教大学生和研究生们如何遵守社会公德规范，这些本该在学前、初等和中等教育中逐渐培养起来的素质，现在却交由高等教育来“补课”，完全是倒置了本末，令人难以理解。

许多家长认为，孩子有巨大的潜能，像一口深不可测的井一样，于是就向井里拼命填东西。填到最后，井里再也没有水了，孩子的心灵也就失去创造力，这才知道作罢，超前识字教育就是其中一例。在《超前识字：有毒的儿童“催熟剂”》一文中，作者记述了如下令人深思的典型案例：

两位“识字神童”的故事

瑶瑶（化名），一个文静的女孩。在全职妈妈的精心照料下，3岁入园时，她已认识3 000多个字，按妈妈的话说：“她读报纸没问题！”刚入园时，她看到报纸会念出声，老师问她：“上面说的是什么意思？”她看着老师，摇摇头。

在幼儿园一天的活动中，瑶瑶在图书区看书的时间比其他小朋友要长，一般都是自己看，边看边读书上的字。在其他活动中，与其他孩子积极主动的活动状态相比，她显得更安静。在其他孩子相互交流、争执、不断地尝试时，她在边上眼巴巴地看着，没有勇气参与。

近5岁时，瑶瑶参与幼儿园活动和与小朋友交往的情况，都有了明显的改善。由于之前所认识的字是强化训练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已经忘

了很多。

昊昊(化名)是一个帅气的男孩,与瑶瑶一样,他也是一个“识字神童”。昊昊在小班入园时,识字量就已达4 000多字。一进到班里,他就走到图书架前,一本本地看书。他看书时非常专注,一般能持续30~40分钟。昊昊的知识面比班里的其他小朋友要广,经常追着老师问“为什么”。老师们感叹道:这孩子真聪明!

但是,昊昊的口语表达能力却明显低于其他孩子,发音不清楚还略带口音,平时他也不愿意用语言与人交流。入园仅仅几周,老师们又开始对昊昊刮目相看。一天,大家一起看书,昊昊看完了自己手里的书,扭头看了看旁边小朋友的书,突然对着那位小朋友的脸就是一巴掌,被打的孩子愣住了,老师也愣住了!赶忙拉到旁边问:“为什么呀?”“我想看那本书。”“那你为什么不跟小朋友说呢?”昊昊的脸上有些茫然……

昊昊在看书或与老师交流书里内容时,真是一个积极求知的聪明孩子;在参加其他身体活动、动手操作活动的时候,是一个探索兴趣不强、坚持性较弱的孩子;在与同伴的交往中,是一个不善于用语言表达,而又明显具有肢体攻击性的孩子,这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孩子。

“填到最后,井里再也没有水了”

无疑,在识字方面,瑶瑶和昊昊比同龄的孩子早了很多,识字量也大了很多。但就在他们打开超前识字之窗时,另外几扇门却可能悄然关闭,在这个年龄段孩子最重要的非智力因素方面,他们的发展出现明显的迟缓和滞后。超前识字,非但没有让他们赢在起跑线上,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他们未来的发展。当然,我们并不排除个别特别早慧的儿童,在各方面都能发展不错,但这种情况实属万里挑一。

“孩子识字,可以通过机械重复的训练达到一定数量。如果天天训练识字,这些早教机构所说的识字数量,也许可能做得到。但问题在于,孩子只是鹦鹉学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机械训练时学习的枯燥、压力的痛苦,给孩子带来的身心伤害是无法估量的。”湖南省长沙师范附属幼儿园园长张建国如是说。

“学前教育的效果具有长期性、隐蔽性的特点，往往是若干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而且是和后续教育阶段的效果综合在一起显示的。”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晓霞表示，良好的学习习惯、良好的心态、自信、懂得与他人交往等非智力因素会影响到孩子以后的学习效果，但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等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发现孩子注意力不集中了、不会与同学交往，影响学习了，这才开始重视。而这些问题，大多出现在小学三年级以后。”

冯晓霞表示，由于孩子的记忆是比较短暂的，除非是不停地强化，否则很难保持长久。大量识字、机械地背诵会占去孩子大量的时间，使他没有时间游戏，没有时间去和其他小朋友交往。这对培养孩子的交往能力显然是十分不利的。“许多很聪明的人，最后并不是失败在智商和学业上，而是失败在不知道如何与别人相处上。现在的很多心理疾病、精神疾病都与人际关系有关。”冯晓霞感慨地说。

“如果强迫孩子超前去学不符合年龄特点和学习方式的东西，他就会体验到太多的无能感和挫折感，从小觉得学习是件很苦、很让人讨厌的事情，而家长盲目的攀比也会损害孩子的自尊和自信。”冯晓霞认为，一个从小就没有自尊、自信的孩子长大以后也很难有什么发展。一次，冯晓霞的学生去幼儿园进行幼儿发展状况的调查，其中个别儿童还不知道任务是什么，就往后退缩：“老师，别找我，我不会。”“你还没看呢，怎么就知道不会？”“反正我不会。”“最让我伤心的是，他连试的欲望都没有。”冯晓霞难过地说。

“许多人认为孩子有巨大的潜能，像一口深不可测的井。怎样开发？那就是向儿童灌输许多东西。”谈到超前识字，在《解放儿童》一书中，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研究员刘晓东认为，“这等于向井里拼命填东西。填到最后，井里再也没有水了，孩子的心灵也就失去创造力，这才知道作罢。这就是误区。”^①

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也曾痛心疾首地说，每当看到一些夫妇不尊重教育规律，逼迫孩子超前学这学那，让三四岁的孩子识字、弹唱、画画，朋友来

① 《超前识字：有毒的儿童“催熟剂”》，《中国教育报》2010年3月10日。

则表演一番，这是以孩子为玩物，不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不让孩子健康成长的表现。可见，家长们一心想让孩子多学知识、早日成才的愿望是好的，但不讲求科学的培养方法，忽视了素质教育的秘诀是先成人、再成才、再成功，这样势必给孩子的身体和心灵造成双重伤害。

听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一律要求幼儿绝对顺从与克制。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评价：××孩子很听话，是好孩子；××孩子调皮捣蛋，不是好孩子。暂不论这些孩子到底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只是“听话”这个在一些人传统思维中根深蒂固的评价标准即为：顺从。爸爸同意孩子和小朋友玩一个小时，结果孩子一个半小时才回来，于是爸爸说孩子不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妈妈让孩子在白纸上画画，孩子却在墙上涂鸦，于是妈妈呵斥孩子不听话。诸如此类，孩子要想达到大人们所说的“好孩子”的标准，就必须绝对顺从、克制、规规矩矩，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兴趣和愿望。

有些幼儿园为了维持所谓的纪律，要求幼儿对教师要驯顺听话，不许顶嘴、不许辩解；上课要专心听讲，不许开小差，不许有小动作，不许说话，坐姿要端正、精神要集中；不准追逐打闹，不许跳跃奔跑，不许高声喊叫。如若孩子有违反上述纪律的现象，即被教师评价为不听话的孩子，要求其他同学不要向其学习，争取做个听话的好孩子。于是，孩子从小就只能一味地听话、服从、墨守成规。日本著名教育家小原国芳指出，“在孩子本应是最美好、快活、奔放、自由、进取、幻想、浪漫的时代，充满了守旧、虚伪、不自由的气氛。使儿童在别人的号令下，在品行要端正的训导下，机械地度过了最宝贵的时光。这是一种天地间绝无仅有的损失。”^①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到了成年，“顺从”就成为他们的一种自然倾向。久而久之，“顺从”就会成为人的最重要的本能之一，成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当然，对孩子适当的要求是必要的，孩子也应该听大人的话。然而严格要求孩子从小就一定要养成只能一味顺从的习惯，这就有问题了，其实就是以扼杀个体丰富多彩的思想为代价去顺从社会认可的唯一模式，以墨守成规、思想禁锢、裹足不前的教条作为活动的准则。如果孩子们都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将来成人

① 《小原国芳教育论选著》，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2 页。

将会是怎样的人？社会又将是怎样的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创新进步还有希望吗？

幼儿从牙牙学语到认字、识数，对新知识、新事物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和强烈的好奇心，想象力极为丰富，新奇、惊奇心理情绪也异常活跃，他们的生活应当是宽松自由、快乐自在的。有的家长和幼儿园老师单纯地认为那些听话才懂事、教什么就学什么的孩子才是好孩子，而活泼好动、经常提问题、拆玩具、异想天开的孩子就是调皮捣蛋、不听话的坏孩子。这种观念是不可取的，如果不及时转变这种陈旧观念，总是用一种“成人化”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去教育儿童，势必扼杀儿童的创新意识。

盲目追求幼儿教育的高标准，崇拜“神童”心理极其严重。某早教机构制定的“儿童早期发展标准”罗列了如下标准：“一岁能背诵五言绝句，两岁识字2 000个、背诵30首以上古诗，三岁识字达到3 000个”对于这个幼儿教育标准，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晓霞指出，这样的标准，显然是没有根据的，绝大部分孩子根本达不到。冯晓霞说：“我们否认个别孩子对识字是有兴趣的，但即使有这样的个别孩子，也不能将其作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加以推广，因为人是千差万别的，有的人早慧，而有的人则是大器晚成的。”冯晓霞认为，“标准的制定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慎重的过程，一个合理的标准，应该是60%~80%的孩子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显然是非常不科学的。”

“2岁识字达2 000个，3岁识字达3 000个，这样的标准是缺乏科学的态度和依据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提起这个某早教机构制定的“儿童早期发展标准”，从事早期教育20多年的无锡市滨湖区早教中心主任祝晓燕，难掩心中的忧虑。

“在幼儿教育阶段，家长是最容易被误导、被‘忽悠’的，家长不是专业人士，往往只能看到表面的、眼前的效果，而幼儿教育的重要作用恰恰不一定是那些眼前可见的学业成果，而这些所谓教育成果有可能是短暂的，甚至有可能是弊大于利的。”冯晓霞指出，如果这种学业上的教育成果是用强迫的、剥夺孩子自信、压抑孩子兴趣和想象力的方式获得，实际上是贻害无穷的。

“超前识字这种观念，历史上早已有之，而且目前仍然大有市场。”早期

教育研究专家、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研究员刘晓东认为,人们自古以来对“神童”的崇拜,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三岁能诗,五岁能文,七岁能为孔子师,十二岁当了上卿,好像天下干大事的都是神童,都是孩子。”刘晓东认为,那些倡导超前识字的成人试图让人们了解到,许多“干大事的”也是超前识字的人,甚至是超前识字造就了神童,造就了“干大事的”。

“人们喜欢神童,实际上如同站在麦田里,只喜欢那几株疯长的苗子。殊不知,这几株苗子很难结出丰满的穗子。”刘晓东表示,实际上,爱迪生、爱因斯坦就不是神童,而且显得比平常的孩子还有些迟钝,但他们后来却干了大事。另一方面,“神童”也未必能干大事,宋朝的仲永就是一例。刘晓东深刻指出:“还是让儿童按照大自然规定的速度成长发育吧。拔苗不能助长,反而会毁了一株好苗子,到头来只能是一无所获。”

教育方法不符合幼儿认知特点,难以适当提供幼儿所需知识。现代幼儿心理学、幼儿教育学已经充分证明,由于幼儿处于特定的身体发育阶段、心理发育阶段或智商发育阶段、情商发育阶段、意志发育阶段,对于外界对象的认知具有其特殊的途径和方式,因此,如果幼儿教育的方法不符合幼儿认知的特点,就难以适当提供幼儿所需的知识,反而会影响孩子的健康发展。幼儿教育研究专家牛翠平对如下幼儿教育案例进行了深刻分析,对于读者把握幼儿教育的认知特点、掌握幼儿教育的正确方法,具有重要启发:

幼儿需要什么样的识字教学^①

场景:

教室内小朋友们在三三两两地游戏着,有几个小男孩在追逐打闹,这时带班老师走进了教室,皱了皱眉头,一边大声喊着:“安静安静”,一边手摇铃鼓组织幼儿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大约5分钟后,幼儿入座。下面是师幼对话)

师:小手摆在座位后,我看哪个小朋友坐得最好?(小朋友们个个把手放在背后,正襟危坐)今天,老师给小朋友们带来了5个字宝宝,它们是谁呀?(老师把5个字宝宝卡片贴在黑板上)它们是去字宝宝、丁字宝宝、又

^① 《幼儿需要什么样的识字教学》,《中国教育报》2010年3月10日。

字宝宝、位字宝宝和子字宝宝。小朋友们愿意和它们交朋友吗？

幼：愿意。（小朋友们齐声说）

师：我们一个一个地来认识它们，好吗？

幼：好。

师：小朋友们来看看去字宝宝长什么样呢？（老师在黑板上按照笔画分解写出“去”字）小眼睛要仔细看哦。横、竖、横、撇横、捺，这就是我们的“去”字宝宝。小朋友们跟老师一起来和“去”宝宝打个招呼吧，“去宝宝你好？”。

幼：去宝宝你好？

师：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喊一喊“去”宝宝吧。去、去、去，过去的去。

幼：去、去、去，过去的去。

（接下来，老师用同样的方法把另外4个字宝宝写在了黑板上然后教幼儿认读）

师：字宝宝和我说他们想和小朋友们玩游戏呢？你们愿意吗？（老师做出假装听到了字宝宝声音的动作）

幼：愿意。（小朋友们齐声说）

师：老师说我们玩一个“小小邮递员的游戏”，你们高兴吗？

幼：高兴。

师：高兴的赶紧坐好了。（老师提高了声调控制了一下有点乱的教室纪律）

师：（拿着汉字卡片）叮咚、叮咚（做敲门状）

幼：谁呀？

师：我是小小邮递员呀。

幼：哪里来的信呀？

师：北京来的信呀。

幼：送给谁呀？

师：送给坐好的小朋友呀？（小朋友们赶紧个个把手摆在背后）

师：送给王彤彤（某幼儿化名）呀。

（王彤彤小朋友站起来读出“去”字，然后从老师手里拿过卡片。）

(用同样的对话,老师分别把另外4个字卡片送到了能认出这些字的幼儿手里,不同的是“北京来的信呀”,这句中“北京”被分别换成了上海、动物园、公园、幼儿园等不同的地点。)

幼儿教育研究专家牛翠平指出,以上教学场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幼儿园识字教育现状。在此,我们无意于探讨这个教师在教学方法上的优劣,牛翠平认为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

首先,这样的识字教学隐含着一种怎样的文化观念。有学者从社会文化理论的视角研究了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学前教育观念,并归纳出4个方面:“训练、教师权威和纪律、强调诵记练习、强调努力”。上面的教学过程至少有3个方面体现出了这种特色,即强调训练、教师权威和纪律、强调诵记练习。

其次,这样的识字教学是否符合幼儿的认知特点。心理学的研究早已告诉我们,有意义的学习必须激起幼儿“真正的认知冲突”,幼儿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掌握知识。被动的、机械的、记忆性的学习只能使幼儿获得一些暂时的知识技能,而且这种获得还是以牺牲幼儿好奇心和探究精神为代价的。如此教学状态,不符合幼儿的认知特点,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再次,幼儿识字教学是否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有很多人认为,只要用有趣的方法教给幼儿汉字,就可以在幼儿阶段让幼儿多识字,有很多幼儿园也在不断探索各种各样的识字方法。对于幼儿来说,“可学”的是否是“应学”的,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对此,引用虞永平教授的一段话来说:“儿童可能学的东西有很多很多,儿童的学习潜能是无限的,但儿童该学的东西是有限的,所谓该学的,就是儿童生命和精神成长最需要的,对后继的发展有积极意义的。幼儿园阶段真正理解一个字大概需要小学阶段认同样一个字的3~4倍的时间,我们必须考虑这是否值得,别浪费孩子宝贵的童年时光。幼儿园教该教的东西,这是对儿童负责,对家长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因此,在科学把握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的基础上,正确区分幼儿应该学与暂时不应该学的东西,适时提供幼儿应该学的东西,是最为重要的。

忽视幼儿道德养成教育，错误地以为“智能补德”。一些人由于对于“人才”内涵的理解过于片面，在幼儿教育中，表现为过多的注重知识的灌输，而对于幼儿的思想道德教育不够重视。家长和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过于偏重智能训练，而忽视了道德教育，忽视了幼儿思想品德修养的形成，错误地认为智力发展的优势可以弥补道德的缺失。在当今社会里，由于受到物欲的影响，不少家长的价值观、人生观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金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包括孩子的教育问题。于是，一些不加选择的奖罚手段、不恰当的物质奖励使得孩子把一切事情都和金钱挂钩，而把道德品质丢之一旁。

比如，孩子完成作业给多少钱，帮父母干一件家务给多少钱，做一件好事给多少钱，等等。孩子在学习、劳动和做好事中体会的不是学习的快乐、劳动的光荣和做好事的高尚，而是可以得到钱或者其他想要的物质奖励，这种功利心完全谋杀了孩子道德感的培养。殊不知，幼儿阶段是一个人道德观念、行为习惯的奠基时期，这一步没迈好，人的全面发展就很难实现。教育本身不只是为传授生存知识，更重要的是教孩子如何做人、做好人。有些父母认为，孩子小时候就要先开始学好文化知识，长大以后再学做人，即先成才后成人，把学文化知识和学做人分割开来，这是一个误解。据教育学者的跟踪研究，发现成才的最大原因不是在于智力的差别，而是在于个性品德的不同。一个品德不良的人即使其知识再丰富，各方面能力再强，对社会的发展也不会起到促进作用，甚至还会危害社会；而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虽然知识有某些欠缺，但他会凭借踏实的态度、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决心去努力学习、克服困难，来提高自身素养，为社会奉献自己的力量，促进社会的向前发展。因此，德育对幼儿成才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道德是照亮全面发展的一切方面的光源。”幼儿不仅要掌握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还应具备高尚的道德品格、健康的人格和良好的行为习惯，这样才能为培养其成为杰出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认为，6岁以前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时期，凡人生之态度、习惯、倾向，皆可在幼稚时代立一适当基础。幼儿时期是个非常特殊时期，幼儿心灵纯净，属于自己的真正的思考能力还没完全形成，头脑单纯，就像一张洁白的纸张，受到任何教育，不管是好的或是坏的，都会在

其心中留下痕迹,这就是幼儿心理学中所说的“刻板印象”^①。因此,我们应当在这一时期加强对幼儿思想道德品质的塑造,应当有目的、有意识地化说教、灌输式的德育为潜移默化的渗透式德育,应当化留于口头的道德情操为自觉的态度和行为习惯,应当在幼儿的学习生活、交往生活、日常生活中充分挖掘幼儿内在的道德潜能,使德育置身于幼儿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之中。

积极建构幼儿教育的良好模式

构建幼儿教育的良好模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在构建幼儿教育的良好模式过程中,需要深刻认知和切实解决的问题很多。我们认为,针对目前幼儿教育现状和发展来看,尤其需要进行如下深入思考:

用道德的方式对待孩子,在爱的温暖中影响、教育幼儿

著名的儿童教育家科尔伯格博士指出:“培养一个有道德的孩子第一步是用道德的方式对待孩子。”也就是说,要把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要明白他们也有独立的人格,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平等地对待、尊重他们,像朋友一样给他们以理性的指导。一个幼儿园老师,发现有个小朋友这几天情绪低落、郁郁寡欢。她把孩子拉到一旁问个究竟,原来前几天组织打扫卫生时孩子跑了,老师在班里说孩子懒惰,还说以后再也不理他了!他哭了一回又一回,觉得班里的小朋友都不会愿意再和他这样懒惰的孩子玩了……老师只是不假思索的莽撞,却伤了孩子脆弱的心!如果老师能在其他小朋友面前先给他“面子”,过后再心平气和地与他谈心,了解他的心理状态,然后科学地加以引导,孩子就不会如此压抑、伤心了!我国著名的儿童教育家陈鹤琴说过:“儿童不是‘小人’,儿童的心理与成人的心理不同,儿童时期不仅作为成人之预备,亦有他本身的价值,我们应当尊重儿童的人格,爱护他们的天真烂漫。”^②是的,孩子自有一番与众不同的心理世界,成人的言语、动作,

① 《幼儿德育与家庭教育关系探究》,《探索》2009年第10期。

② 《陈鹤琴教育文集》(上),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184页。

他们都格外注意,如果对他们随心所欲地乱发脾气,很容易使他们走进情感的“误区”,这不仅会伤害他们的自尊心,严重的还会形成心理障碍,影响他们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对待每一个儿童,只有用爱开启他们心灵的窗口,才能真正走进他们的心理世界,才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尊重。简单粗暴、冷漠、体罚等方式,都是对孩子美好而脆弱的心灵的任意践踏,都是不道德的教育行为。

消解过早的知识灌输,注意培养幼儿的想象力

有教育专家曾对刚入小学的学生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班级的孩子分成两组,一组是入学前就已经认识许多字的孩子,另一组则是在上学前没有学过多少字的。两组孩子看同样的小人书。结果,没有学过多少字的孩子想象力要比认识许多字的孩子的想象力丰富。原因很简单,由于孩子过早地识字,已经明白了书中所讲的内容,使其本应在幼儿园阶段得到充分发展的想象力受到抑制。经过专家们的追踪研究,还发现,到小学三年级以后,学前识字不多的孩子要比学前识字很多的孩子学习成绩普遍较好。

专家解释说,一是由于识字多的孩子容易产生自满心理,觉得自己什么都会,导致上课不专心听讲,课后不认真复习;二是由于在学前接受的超前教育并不一定适当,导致孩子养成许多不良习惯,诸如笔画顺序颠倒、拼音发音不准确等。而这些习惯一旦养成就很难纠正,在今后的学习中成为障碍,造成孩子学习成绩下降。由于对幼儿过早过多地进行以数学、文字为主的超前教育,而忽视了幼儿的空间转换、形体感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使幼儿左脑的智力发展比右脑超前,影响了幼儿左右脑的均衡发展,具体表现为幼儿的逻辑推理能力较强,而想象力和动手能力较弱。这种状况如不及时纠正,将有可能导致幼儿今后左右脑智力的畸形发展。

尊重认知特点,积极培养学习兴趣

兴趣是孩子不断探究他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动力源泉,是开展幼儿教育活动的前提和保障。有关神经内科专家和幼儿教育家认为,幼儿不是不需要学习,但最主要的是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比如学几何图形,可以通过桌

椅、西瓜、五角星等各种具体事物来启发他们，让孩子对几何图形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从而能够有兴趣探究每个几何图形的不同，在寻求不同几何图形的过程中真正掌握有关图形知识。对学习兴趣的培养，需要宽松的学习环境。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幼儿的教育必须尊重幼儿的认知特点，把幼儿放在一个充满趣味的情境中、能激发好奇心的活动中、能满足幼儿的模仿力的事件中，幼儿的主动性才能充分发挥，对所见所闻才会有兴趣。家长应当有意识地引领幼儿到动物园参观，可以让孩子见识多种不同的动物；到植物园游玩，可以教孩子认识多种不同的植物；到商场买东西，可以教孩子识别不同的商品；到博物馆参观，可以让孩子知道更多的历史故事；到科技馆参观，可以让孩子接触多种多样的科学知识……通过大量具有生动、直观、形象、可感触、富有变化的生活情境来吸引孩子的注意，从中发现孩子的兴趣点，同时随着孩子的这一兴趣引导孩子进一步探索，长此以往，孩子的知识面将会被拓宽，孩子的学习兴趣也在每一次惊奇中得以激发。需要注意的是，幼儿神经最兴奋的时候，才是他学习的最佳时间。一般来讲，3岁以下的孩子学习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小时，如果孩子左顾右盼、注意力开始分散，那就不要勉强孩子继续学习，以免产生厌倦心理。

在寓教于乐中实施幼儿教育

家长到幼儿园接孩子时总是爱问：“今天在幼儿园学什么了？”如果回答是：“做游戏了。”有些家长就会表示不满：“幼儿园怎么能总是让孩子做游戏，而不教孩子学习呢？！”他们将游戏和学习对立起来，认为做游戏浪费了学习的宝贵时间，这是不了解幼儿园的孩子正处于“游戏期”的错误观念。

早期教育研究专家刘晓东指出：“孩子天性就爱玩，关键是培养孩子的天性。”“教育对于天性应当保持敬畏，教育应该首先尊重儿童的天性。”^①在幼儿时期，孩子在生理和心理发展上还不成熟，他们的特点是好奇、好动、好模仿，而游戏正是符合幼儿身心发展需要的快乐而自主的实践活动。在丰

① 《论教育与天性》，《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富多彩、轻松愉快的游戏中，孩子可以发现许多新事物、感受许多新体验、懂得许多新知识。也就是说，游戏的过程正是学习的过程，也是孩子自身发展的过程。

具体到实际生活中，父母应当多以游戏的方式来关注孩子学习上的点滴进步，最好能够和孩子一起游戏，在放风筝中发展孩子的运动力和想象力、在玩沙子时教孩子了解沙子的特点和用途、在喂鸽子时帮助孩子了解鸽子的习性……通过各种游戏活动，幼儿积极模仿人们的社会生活，吸取周围生活的基本知识，其自身各种感官得到积极开发，多种能力获得练习和发展，为其今后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幼儿园，则应当保证幼儿充足的游戏时间、开展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提供布局合理的稳定游戏区，让孩子们在教师指导下的游戏中快乐地成长和学习。但是，无论对于家长还是幼儿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游戏应该是有目的的，并非没玩没了的表面热闹而内容空洞的“玩乐”。在各种游戏中，既要保证幼儿游戏的自发性，又要保证间接的指导，使幼儿在不知不觉中学到知识，这才是游戏的真正目的之所在。

欣赏个性独特的幼儿，激发其创造精神

有这样两个故事对人们具有重要启发。故事之一：在幼儿园里，老师安排孩子们练习画画。当她踱到一个男孩身旁，看到他所创作的意愿画：一棵茂密的大树，一座尖尖的房子，两个玩球的小朋友，天上小鸟、白云，还有太阳。多么美丽的景色、多么快乐的生活啊！可是，怎么觉得哪里不对呢？原来，男孩画中的太阳是绿色的！老师很奇怪：“你画得真不错，可是我不是教过你，太阳是红色的，你怎么涂成绿色的了呢？”男孩认真地说：“今年夏天太热了，要是太阳也像大树一样是绿色的，就不会那么热了。”故事之二：女儿从幼儿园回到家中，神秘地对妈妈说：“我今天在苹果里发现了星星。”妈妈大惑不解，心想自己吃过那么多苹果，可从来没有发现什么星星啊！女儿要妈妈切开一个苹果来看。妈妈从冰箱里拿出一个苹果，熟练地将苹果一分为二，看了看说：“哪里有星星？你这个骗人的小鬼！”“还是让我切给你看吧！”女儿拿起另一只苹果，横刀一切，然后把

切开的苹果放到母亲面前炫耀：“看到星星了吧？”果然，从横切面看，苹果核处果然有一个清晰漂亮的五角图案！

如果以一个成人的眼光来看待上述故事，也许会觉得孩子的思维有悖常理，而事实上，这就是孩子的童真、童趣和异想天开！这就是孩子以其独特的视角看待世界而找到的异乎寻常的奇迹！在遇到类似情形时，老师和家长应当持鼓励和赞扬的态度，正确引导、随时启发、耐心讲解、有问必答，这样能够有效地强化孩子的创新意识、活跃孩子的创新思维，为逐步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奠定基础。陶行知先生就曾深刻指出：“培养儿童的创造力要同园丁一样，首先要认识他们，发现他们的特点而施之适宜的肥料、水分、太阳光，并须除害虫，这样他们才能欣欣向荣。”

培养孩子的自主精神，强化幼儿的主体意识

原苏联著名教育家霍姆林斯基认为，儿童就其天性来讲，是富有探求精神的探索者，是世界的发现者。作为家长和教师，应当培养孩子的自主精神，强化幼儿的主体意识，多给幼儿一些创造机会，鼓励他们从现实需要出发，多尝试“无中生有”的创新；从未来需要出发，多憧憬“异想天开”的创造。比如，鼓励幼儿自己制作简单的玩具，并玩出新花样；引导幼儿续编故事，聆听故事、想象故事所展示的图景；通过欣赏音乐让幼儿想象乐曲表达的意境，根据乐曲创编舞蹈动作，并鼓励幼儿自编歌曲；让孩子根据自己的愿望来布置自己的房间等。在幼儿园，可以组织幼儿集体进行自主创作活动。比如做“认识春天”的主题活动，把孩子们带到公园里去接触自然、感受自然、采集自然，然后再带回幼儿园，鼓励孩子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来描绘春天，并亲手裁剪小草、树叶，把春天搬进教室。在制作过程中，孩子们可以在墙壁上画也可以撕纸粘贴，还可以把在公园里收集的材料摆置上去，甚至鼓励孩子还可以自己做出许多新的“植物”！所有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甚至滑稽可笑的行为和作品，都能充分显示孩子自主精神和主体意识，都有利于发展孩子的创新思维，都应当受到赏识和激励。

当然，对于幼儿来讲，他们的整个心理活动尚处于无意识为主的阶段，目的意识和自主意识较差。因此，家长和老师要善于激发孩子的创造动机，

设置新奇的场景来提出疑问,鼓励幼儿大胆发表自己的独特观点,使他产生内在的、自主的参与创造活动的要求。德国著名教育家第斯多慧说:“教学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励。”在遇到问题时,先不要回答,而是启发孩子自己去想象和思考,鼓励幼儿尽量多地给出能想出的答案,并且对给出的答案不做评价,让幼儿能畅所欲言,甚至鼓励幼儿“异想天开”,直至自己发现并掌握相关的原理和规则。

另外,在幼儿园,还可以组织幼儿进行讨论、交流,在相互交流甚至争吵过程中,充分锻炼幼儿的思维能力、应变能力和表达能力。但是,我们在培养孩子的自主精神、强化幼儿的主体意识时,不能片面强调幼儿的“与众不同”和“标新立异”。有时,幼儿面对问题不去思考,甚至脱离活动对象、内容,其回答结果虽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但他们是否在思考与倾听、欣赏别人的观点,不得而知。所以,培养孩子的自主精神、强化幼儿的主体意识,应当建立在对事物真实的探究和想象的基础之上。

营造和谐平等的幼儿教育氛围,建立友爱融洽的幼教关系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学校,孩子自信心的形成与家庭氛围有着很大的关系。经过对比发现,民主型家庭最利于孩子充满自信。在这样的家庭里,父母把孩子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人,尊重孩子,与孩子保持平等的关系,知道并允许孩子享有自己的权利,而且对孩子的发展有正确的估计,并对孩子提出适宜的要求。家长常主动和孩子谈话,了解孩子感兴趣的事或经历过的事。他们还给孩子提供探索、玩耍的机会和条件,给孩子必要的帮助,及时肯定和鼓励孩子的成功,哪怕是微小的进步。对于孩子的不良行为,家长也能有理有据地批评指正。调查和实践表明,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的孩子,性格较为开朗、好奇心强、勇于探索,更富于自信心。

在幼儿园里,教师在幼儿心目中的地位是神圣的,老师的态度、言行对幼儿自信心的培养有着极大的影响。作为教师,首先要与孩子建立起平等友爱的融洽关系。原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一个好教师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他是这样的人:他热爱孩子,感到跟孩子交往是一种乐趣,关心孩子的快乐和悲伤,了解孩子的心灵,时刻都不忘自己也曾

经是一个孩子。”只有真正走进孩子的心里，能够让孩子真切感受到老师是真的喜欢自己，老师的鼓励和帮助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自信心才能在孩子心中真正树立起来。其次，要注意因材施教，根据他们不同的个性特点来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对于一些胆子较小、较为内向、不善于发现的孩子，切不可用刺激语言，要多一份关心、爱心和耐心，要鼓励他们，相信他们在自己的努力下一定会成功；对于一些胆子较大、较为外向、善于发现的孩子，不要随便抑制他们的一些“异想天开”的想法和做法，要善于抓住他们的闪光点进行激励和引导。在他们做错事时，老师不可随意加以指责，而应注意方式方法，以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使孩子畏缩不前或丧失兴趣，从而不利于幼儿自信心的培养。

给予孩子适当的赏识，用欣赏、信任的眼光看待孩子

从心理学角度上讲，渴望赏识与关注是每一个幼儿的心理需求。幼儿只有得到赏识才能拥有自信，拥有了自信才有利于激发幼儿潜在能量的发挥。在日常生活中，家长要学会用欣赏、信任、期待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孩子，给孩子以鼓励和力量，使孩子敢于相信自己的能力，并且取得更大的进步。

有这样一个赏识教育的成功案例：一次，妈妈和3岁女儿逛街，女儿指着一个饭店的招牌认认真真地念，妈妈带着欣喜而激动的表情说：“宝贝，你是从哪儿学会认这几个字的啊？”女儿得意地说：“我是通过电视广告认得的呀！”为了表示对她这种行为的赏识，妈妈用一种发现新大陆的眼光看着她、表扬她能在没有教的情况下学会了认字。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女儿更专注地看起电视和小画册，妈妈也有意识抓住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来检验她的学习效果，每当她多认识一个字，妈妈就对她大加赏识，于是女儿的学习兴趣更浓了，以致在很短的时间，女儿基本可以看书读报了！人性中最本质的需求就是渴望得到赏识、尊重、理解和爱，就每个孩子而言，赞赏是激发儿童内心张力的不可缺少的外部驱动力。及时肯定和鼓励孩子的每一个进步和优点，哪怕在成人眼中是微不足道的，也不要轻易放过，逐步形成燎原之势，让孩子在“我是能干孩子”的心态中觉醒。

其实，不是能干孩子需要赏识，而是赏识使他变得越来越能干！但在赏

识教育中也要注意分寸，孩子受到过度的鼓励和表扬，容易滋生骄傲之气，不易接受挫折和失败。这种氛围下教育出来的孩子，一般会在成绩面前虚荣、骄傲，在失败面前脆弱、自卑，在困难面前彷徨、畏缩，在集体生活中好嫉妒、心胸狭小。所以，赏识教育要合情合理，正面的表扬和婉转的批评教育相结合，孩子的自信心才能真正树立。

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

在幼儿眼中，家长的形象非常高大，无所不能，成人的一举一动是幼儿学习的直接榜样。因此，要进行良好的幼儿教育，就必须为他们树立良好的榜样。由于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先接触的就是父母，父母的文化素养、精神素质、言谈举止，会给孩子打下深刻的烙印，因而父母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孩子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作为家长，尤其在孩子面前，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品质。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让孩子参与其中，帮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并及时予以表扬和鼓励，孩子在这些实践锻炼中不但增强了动手能力，而且从内心会产生一种自信心和自豪感，认为自己是聪明能干的好孩子，是爸爸妈妈的好帮手。在遇到挫折，比如花费较长时间仍然不能使孩子明白某一事物时，家长首先要沉着冷静，切忌牢骚满腹或怒气冲冲，以自己的情绪感染孩子，让孩子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并在问题最终圆满解决时，与孩子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成功会给爸爸妈妈带来极大的快乐。

另外，幼儿最爱与动画片、儿童故事为伴，里面塑造的英雄人物也可以成为幼儿教育的好榜样。比如孩子喜欢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就告诉孩子：“你是孙悟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怕。”在心理学中，这种状况被称为自我投射，也即将自己的内在心理外在化。孩子通过建立自己行为表现的评价与英雄形象的联系，将自己的内在心理品质投射在外部的英雄人物身上。由于对英雄人物的崇拜和喜爱，加上幼儿天生的模仿能力，孩子在生活中，尤其是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就更易于表现得充满自信、乐观向上、勇往直前。总之，合理利用榜样的力量来感染孩子、鼓励孩子，会使整个教育活动更加生动直观，对孩子自信心的培养也才更为有效。

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

1988年1月下旬，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席间，记者问到其中的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您在哪些大学、哪个实验室学到了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呢？”这位白发苍苍的学者沉思片刻，答道：“在幼儿园里。”记者追问：“在幼儿园里学到了什么？”“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们；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吃饭前要洗手；午饭后要休息；做错了事要表示歉意；要仔细观察周围的大自然。从根本上说，我学到的东西就是这些。”可见，良好的行为习惯可以使一个人真正懂得关心他人和自制、养成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具备强烈的责任心和道德感、具有较强的观察能力……杰出人物的成就是与良好的行为习惯分不开的。

从幼儿时期就开始注重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是通往成功之路的有效途径。当然，培养幼儿良好的品德与行为习惯，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要从日常的每一个活动、每一个游戏、每一个环节中一点一滴地渗透和强化。比如，在起床洗漱的过程中，要求孩子自己穿简单的衣服，自己洗脸刷牙，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孩子不会时家长可以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示范，以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进餐时，有意识引导孩子了解饭菜的来之不易，饭后让孩子亲眼看到家长整理餐具、拖地等辛勤的劳动，并及时教孩子做力所能及的家务，以培养孩子爱惜粮食和尊重劳动的观念；散步时，让孩子在大自然中感受阳光、雨露、花草、小鸟的美妙，以培养孩子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美好情感；在游戏交往中，根据具体的游戏类型，教育孩子要团结合作、互相谦让，使孩子在帮助、关爱他人之中得到乐趣，以培养孩子的团队精神和助人为乐的良好品格。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说过：“道德教育的重要，就在于他无所不在。”生活中处处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教育资源，在这些细微之处时时关注幼儿、矫正幼儿、引导幼儿的行为规范，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会让他们受用终身！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教育家斯宾指出，在教育不过是局限于获得书本知识这一常见的有局限性的见解之下，家长们过早地把认字课本往小家伙们手里一塞，结果危害极大。智育进展是由具体到抽象。但是这点却遭到忽视，

很早便开始高度抽象的学习……我们来看看结果吧。由于早期的挫折和有害地死啃书本使得理解力变得迟钝。德国著名教育家福禄贝尔指出，我们给动植物以空间和时间，因为我们知道根据生存在它们身上的法则规律，它们能茁壮成长，对幼小的动植物要耐心，不能采用拔苗助长的方法。可是，幼小的人类却被当作一块蜡，一堆泥，可以由人去任意捏造。在处理自然界的事物时，我们走的路是对的，可是在处理人时，我们却迷了路。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指出，人生而具有智慧、道德和信仰的种子，但这些种子的发展如何，取决于人所受的教育。实施这种教育的时候不用鞭笞，无须严酷，也不用强迫，尽可以实施得尽量和缓、快乐，尽量自然。上述教育家们的重要思想，对于我们把握幼儿教育规律无疑具有深刻启迪。

小学教育负担过重

大剂量的课堂知识灌输和超负荷的课外作业,使得小学教育成了不停运转的知识灌输机器,小学生在不堪重负之中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因此,必须冲破小学教育进行繁重知识灌输的误区,小学生才能在愉快的学习中享受成长的快乐。

少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其身心的健康发展和素质的全面提高关系到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小学教育肩负着培养教育少年的重任，因而小学教育的过程、途径和方式、方法，将直接影响到少年教育的质量和成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小学教育经过60余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不能不说取得了巨大成就。

然而，就目前情况来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大剂量的课堂知识灌输和超负荷的课外作业，小学教育成了繁重知识灌输的机器，致使小学生在不堪重负之中喘息。繁重知识灌输的误区，严重影响了小学教育的质量和成效，不利于少年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冲破小学教育繁重知识灌输的误区，使小学生在愉快学习中成长，为其自由全面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近年来，尽管教育管理部门为小学生减负采取了相应措施，广大教育工作者做出了很大努力，减负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较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小学生负担过重问题至今仍然存在，在一些学校还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已经成为当

前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严重障碍。因此，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刻不容缓。

小学生在不堪重负之中喘息

在讨论减负的内涵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负担”的涵义。“负担”一词，在新华词典中的解释是：所承担的工作、责任、费用等。推而言之，对于学生来讲，是指学生为了自身素质的全面发展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适当的负担是促进学生自身素质全面发展的动力之一。如果学生能根据自己的能力预料自己能完成任务而产生自信心，并且能采取相应的行动，获得积极的成功体验，从而产生内驱动力，形成新的更高层次的需要，就可以促进自身素质的发展。^①因此，在学校教育环境内，学生必须履行一定的学习任务，承担作为学生应负的责任，以及承受一定的学业压力，即学生必须承担一定的学业负担。学业负担又包括课业负担、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三个方面。具体而言，课业负担主要是指完成学校所设置的课程的学习任务所产生的负担。心理负担是指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负面情绪所造成的心理压力。经济负担是指维持学生整个学习活动所需要的经费支持。这三方面的负担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其核心是课业负担和心理负担。^②我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我国的中小学教育是一种义务教育，也是一种法定的、带有强制性的教育，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形式减轻或加重学生的学业负担。这是因为，学业负担过轻或过重，都不利于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也不利于素质教育的推进，更不利于杰出人才的培养。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以及由此引发的心理负担加剧，让家长、教育部门以及整个社会都忧心忡忡。于是，“小学生减负”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全国上下掀起一股“减负”浪潮。然而就目前情况来看，“小学生减负”成效似乎并不明显。由于没有真正把握少年身心发展的特点，运用适应少年教育需求的教育规律，因而错误地认为在小学生

① 《浅谈减负与心理健康教育》，《校园心理》2009年第4期。

② 《综合辩证论“减负”》，《民主》2007年第7期。

教育中灌输的知识越多,就越能促进小学生成长。有学者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认为,目前,小学生的学业负担存在严重的“超标”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学习科目种类繁多,小学生负担沉重

小学生学习的科目种类,究竟应当如何设计安排,是关系到小学生能否提高学习质量和成效的一个重要问题,必须加以深入研究。在《教学研究》杂志的2006年11月号中旬刊里,一位学生家长对他四年级的孩子的学习科目进行了统计:

科目名称	课本、配套材料数及开本	作业本数	备注
语文	2 (32 开)	6	
数学	2 (32 开)	3	
英语	3 (16 开)	3	
体育	0	0	
音乐	1 (16 开)	0	
美术	1 (16 开)	0	
综合实践活动	1 (16 开)	0	
知识产权教育	1 (16 开)	0	
科学	1 (16 开)	0	
品德与社会	1 (16 开)	0	
信息技术	1 (16 开)	0	
(其它)	(作文书)1(32 开)(新华字典)1(64 开)	(笔记本) 2	
合计	16	14	30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对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共开设 11 门课程,每天需要带课本、配套材料、作业本和工具书共计 30 本,再加上铅笔盒、水杯和雨伞,总重量不少于 8 公斤!难怪现在的小学生都流行用一种价格不菲、专

门为学生设计的“拉杆式”书包，原来孩子稚嫩的肩膀早已背不动那种传统的“肩挎式”书包了！

课程难度过大，教与学都十分吃力

适宜的课程难度，才能适合小学生学习的需要。然而，由于一些人错误地认为，难度越大，就越能体现教学水平。现在，小学生的课程难度相当于初中生，而初中生的课程难度则相当于高中生，这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国家总督学顾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陶西平于2007年6月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日两国小学数学研讨活动，在课堂教学观摩中，发现我们的教学内容远远多于日本，要求也高于日本。北京一位知名小学的校长也认为，现行教学内容偏多、偏难，教与学都很吃力，教材的跳跃性产生的空白，使得无论是由教师教，还是由学生学来填补，负担都很重。前国家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王蒙先生亲身经历的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也很发人深思：他做过几次中学语文标准化试卷，成绩都不理想，最好的一次成绩也只有60分！堂堂文学大家、语言大师，也不得不感慨：“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学不改革不行了。”

布置的作业量过多，学生成了“作业机器”

在正常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布置作业和学生做作业，是必要的教学环节，因为老师适当布置一定量的作业，有利于学生掌握所学知识。然而，由于一些教师错误地认为，作业越多，越能帮助学生掌握所学知识，因而布置的作业量过多，致使学生成了“作业机器”。下面看看一名小学生写给老师的一封信吧：

敬爱的老师！我想对您说，请您少布置一点作业，让我们有一些自主学习、动手实践的空间好吗？我从书上看到邓小平爷爷说，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您也常常对我们说，小学生要有创新精神，才能适应未来的现代化建设。可我们每天的作业就像一座座小山似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在这日复一日简单重复的学习中，我们的创造性逐渐泯灭了。我永远

也不会忘记那一天。那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六点半放学回家后，我草草地吃了晚饭。晚上七点钟开始做作业，当闹钟“嗒嗒嗒”响过八下的时候，我刚刚写完一篇小作文，数学作业还没有动呢。当闹钟响了九下时，我的数学作业才做到一半，这时，妈妈催我去睡觉，她哪里知道，我还没有做完作业呢。这时，天上的一个小精灵——星星小人飞到我的作业纸上，挤挤眼对我说：“嘿哎，我带你去天上的星星王国玩吧，那里有美丽耀眼的土星、晶莹透亮的月球，神奇极了……”我一听心里痒痒的，可还是一边摇头，一边打断他的话匣子连声说：“不不不，我还没做完作业呢。”“叭”的一声，写字笔落在了地上，惊醒了我，原来我竟睡着了，做了一场梦。我睁开朦胧的睡眼，抬头看天上的星星，它们仍然那么自由自在地眨着眼睛。我呢，只是轻轻地叹口气，继续写呀写……老师，是您使我的人生开始有梦。然而，我盼望的梦想和期待，不只是机械重复写作业般的苍白，我渴求我的梦是快乐的、五彩斑斓的。老师，您能让我梦想成真吗？^①

由于不少小学生每天花费在作业上的时间过多，一些学生在深更半夜仍忙于作业。而在这些作业中，真正属于有利于提高理解能力的作业并不多，却是大量加深印象的作业，有很多是机械重复性作业，比如给学生布置大量在课题性质和类型上大致相同的重复练习；还有部分惩罚性作业，比如规定以前做错的作业要重抄多少遍等。难怪小学生在这封信中叹言：“我们每天的作业就像一座座小山似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辅导补习目不暇接，学生负担雪上加霜

参加适宜的课外辅导补习，有利于学生扩大知识视域，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然而，由于一些教师和家长错误地认为，参加课外辅导补习越多，越能提高孩子能力，因而许多小学生难得的一点课外业余时间，也被各种课外辅导补习所占据。每每在临放学的时候，小学校门口除了等待接孩子的家长，还有为数众多的辅导班、强化班、精讲班、培训班等令人眼花缭乱的辅

① 《作业的重负》，《小学生》2004年第1期。

导机构的宣传人员，他们巧舌如簧，手拿各种海报、手册，向这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宣扬上辅导班的好处和优势，而家长们唯恐自己的孩子掉队，对培养“天才”、“神童”的各种辅导机构信任有加。于是，众人趋之若鹜，有的孩子刚刚离开学校，即被送往这些种类繁多的辅导机构进行“小班”、“小灶”的辅导、补习、培训。回到家里，除了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辅导班布置的作业和家长布置的课外作业，使得孩子的整个世界都被名目繁多的作业填满。而到了周六、周日，家长已经为孩子精挑细选的家教，又开始了对孩子的学业辅导，上午是数学，下午是英语，晚上还要参加什么技能提高班、竞赛培训班等。孩子在目不暇接的辅导补习中，被搞得晕头转向。这种“连轴转”和“马不停蹄”的学习方式，致使学生负担雪上加霜！

学生小小年纪，即已背负过于沉重的学业负担，对其身心健康的危害是极为严重的。有专家指出，在过于沉重的学业负担下，对小学生身心健康将造成如下严重危害：

过于沉重的学业负担，对小学生的身体发育造成不良影响

有数据显示，在对中小學生所背书包重量的调查中，发现目前许多一年级小学生的书包重量在3公斤左右，到了小学六年级书包重量就增加到6.5公斤左右，沉重的书包使得小学生颈椎的正常生理曲度消失。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正处在发育阶段的青少年，颈椎病变随着年龄的增长，病理变化也越来越重。^①儿童医学专家认为，双肩背的书包重量在背包者体重的10%以下的，不会引起疼痛或使脊柱侧弯，否则就会引起身体的损伤。重量适中的双肩背书包不但不会影响健康，而且还有利于身体的成长，因为书包的重量能使少年儿童儿童的脊柱保持正确的姿势。但是，如果书包的重量只压在一个肩上则易使脊柱侧弯。根据鲍威尔定律，承受压力的骨骼比不承受压力的骨骼生长得慢，故长时间背包会阻碍身体的生长发育。按照这种标准，小学生们的书包重量基本符合要求，但是随着课业负担的增加，他们的书包越来越重，当肌肉劳累度超过正常负荷时，他们的骨骼发育就会出现改变，甚至会导致脊椎

① 《给书包“减负”》，《绿色中国》2007年第24期。

侧弯。更严重的是，青少年一旦颈椎病变，不仅会损伤颈部，还会引发颈椎之外的组织、器官损伤，出现如头痛、眩晕、记忆力减退等症状，严重影响孩子们的正常生长发育。

按照少年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小学生每天的睡眠时间应达到10小时，才能保证身体的良好发育。但在第一本中国少年儿童蓝皮书中透露：据调查发现，有47%的中小学生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睡眠标准。小学生每天的睡眠时间普遍不足9小时，小学六年级学生甚至不足8小时！一般情况下，他们在早上6：30左右起床，7：30左右到校开始一天的学习。上午11：30放学。13：30~16：50正常的4节课，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往往要留下来进行补课，回到家里的时间大都已经是18：00之后。晚上，小学低年级学生的作业有的已经超过每天2小时，中、高年级的学生常常做到晚上10点以后，有很多时候，孩子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揉揉眼继续赶作业。越来越多的小学生加入特“困”一族，一个个看上去神色憔悴，无精打采。而长时间超负荷的学习，导致学生视力下降更呈“低龄化”趋势。调查表明，学生近视发病率，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15%，上升到90年代末的55%~80%；我国学生近视发病率在全世界的排名，已从1998年的第4位上升到第2位。^①看着小小年纪的孩子就已带上厚重的眼镜，怎不叫人心痛？由于早晨上学太早，有的早饭顾不上吃，或者胡乱吃一口，再加上在校时间过长，学生营养不良、免疫力低下，本应健康快乐地成长、享受无忧无虑金色童年的孩子们，却过早地衰老了！这不能不说真是教育的悲哀！

过于沉重的学业负担，对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如今，我们所面临的社会已经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教育意识空前强烈，家长对孩子的期望越来越高，学校对学生的要求越来越严，社会给孩子的压力越来越大。刚刚步入校门的小学生们已经感受到阵阵寒意，学习、重复的学习、重压下的学习，在日复一日的单调无趣、枯燥压抑的学习生活里，孩子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据《中国儿童的生存与发展：数据与分

^①《减轻学生过重负担，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教育研究》2000年第5期。

析》报告显示：中国17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至少有3 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5.2%的少年儿童存在明显的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5年对9015名年龄在10~14周岁的学生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17.4%的学生“想过自杀”，8.2%的孩子甚至“做过自杀计划”。^①安徽省“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模式的研究”课题项目的调查数据显示：合肥市小学生有较严重心理健康问题的总检出率为3.65%，与国内其它运用相同调查工具的测试结果相比，这个比率低于重庆市的总检出率（10.9%）、杭州市的总检出率（9.5%），高于南宁市（2.82%）、阜新市（2.29%）和连云港市（0.25%）。其中，影响小学生心理健康的首要问题是学习焦虑，检出率高达43.3%。许多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成绩表现出过度的焦虑，成绩不好者愁眉苦脸，害怕家长、老师的责骂；成绩优秀者也是忧心忡忡，生怕下次考试不能考好。“过敏倾向”在小学生心理困扰中处于第二位。这样的孩子过于敏感，容易为一些小事烦恼，表现为爱哭、胆怯、担心、小心眼，这是由于可能长期处于不安、斥责的氛围中造成的结果。“自责倾向”也是小学生存在的较为严重的心理困扰。父母、教师对孩子的期望过高，而孩子又感到不能处处满足父母、老师的要求，从而产生不安，出现自责倾向。^②有专家指出，学生心理压力过重，如果长期得不到疏导，会造成心理障碍，性格扭曲，甚至严重的可能会出现变态、精神失常等疾病。如若真到了那般境地，该是多么可怕的惨状！

过于沉重的学业负担，导致孩子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严重匮乏

美国托兰斯在明尼苏达州对小学一年级学生至成年人进行了大规模、有组织的创造性思维测验，发现了少年儿童创造力发展的一种规律：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呈直线上升状态；小学四年级下降；五年级又回复上升；六年级至初中一年级再次下降，以后直至成人基本保持上升趋势。^③这充分说明，小

①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令人担忧》，《光明日报》2006年12月18日。

② 《合肥848名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分析》，《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③ 《脱颖而出——创新教育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

学生由于知识基础较为薄弱、思维能力较低,其创造力的发展需要正确的有效引导。教育专家指出,小学生从幼儿园走向学校开始系统地学习自然和社会知识、经验,对世界上一切未知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有较强的探究欲望。这种好奇心、求知欲正是创新意识的体现。在这一时期,如果采用强制性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手段,对儿童创新意识的培养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鼓励孩子适当自主学习、欣赏孩子提出的问题、允许孩子去异想天开,那么孩子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其创造力的发展也会进入到一个有实质性进展的新阶段。然而,人们对高层次学历的追求和对热门行业的企求直接转化成对基础教育的近乎苛刻的要求,孩子刚进入小学就面临着严峻的学业压力,读书、做题、写作业、写作文、背英语课文,学习生活逐渐由兴致勃勃变得枯燥无味。尤其是那些小学高年级学生,为了能够考入理想的中学,把自己过早地埋入书山题海中,对书本和附加的标准答案唯命是从,慢慢地,小学生原有的天真烂漫渐渐消失,学习兴趣减退,想象力受到抑制,模仿能力减弱,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不能得以健康发展。更为严重的是,过重的压力所造成的抑制,不仅会在学生学习阶段产生消极影响,而且在学生结束学校生活、走上工作岗位后的心理能量的发挥方面也会产生破坏性影响。所以,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一文中尖锐地批评“传统教育是吃人教育”,要求“我们要打倒传统教育,同时提倡创造教育。”

为小学生减负何以困难重重

所谓减负,就是减轻学生不必要的学习负担,使他们的学习时间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利用,科学合理地实现身心的健康发展及教育培养。^①在这里,减负不是说学生不需要负担,而是说要减掉那些不必要的、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那些负担,使学生能够保持一种正常的学习状态。与此同时,学生还必须承担起那些有利于他们各方面素质潜能得以健全发展的负担,如适当

^① 《减负≠快乐学习》,《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8年第8期。

的学习负担、生活负担、社会负担等。从实质意义上来讲,通过“减负”的手段使学生在单位时间内主动地获得成倍的知识,在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里彻底放飞心灵,在宽松和谐的教学氛围中充分展示才华,在注重个性发展的培养下激发创新意识和创新才能,以实现“增质”的效果是深化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

少年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阶段。素质教育体现了教育的真正本质。它要求每一个受教育者能够得到自由全面发展,进而提高全体国民素质,推进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但令人惋惜的是,二十多年的素质教育在风雨坎坷中举步维艰,其重要的阻碍就是应试教育所带来的沉重负担,教师们、学生们和家长们疲于应对各种压力和重负,无暇顾及学生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全面的发展。为了解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障碍,真正走出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泥潭,顺利实现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型,必须减负!

过重的学业剥夺了少年儿童的童心和乐趣,严重阻碍着少年儿童全面地、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发展,严重违背了少年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偏离了国家的教育方针。因此,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已成为推行素质教育刻不容缓的问题。当然,“减负”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同时也是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这就使“减负”变得十分复杂,所有关涉到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等方面因素的调整和完善都会成为切实推动“减负”的配套措施,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之所以成为一大顽疾,是教育内部与外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所产生的恶果。有专家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为什么小学生减负面临困难重重,有以下主要原因:

社会压力过早转嫁少儿身上,身心负担阻碍健康成长

目前,一些单位和部门的社会用人制度推动人们对高学历、高职称的过分追求,使得人们过早地把这种压力转嫁到少年儿童身上。如今,一些用人单位尤其是公有制企业和事业单位,形成了“文凭至上,学历第一”的倾向,招收人员时要先看其学历,然后再谈工作能力,对于没有学历的人员,即使

能力再强也被拒之门外。一些用人单位,片面追求高学历、高职称,招聘条件十分苛刻,即使是普通的工作或一般职工,也要求本科、硕士、博士学历,或者中级、高级职称,大专、中专学历者,一切免谈。在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家长在子女刚入小学时即已为孩子树立起考入重点大学的决心。然而,我国受教育总人口在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第二次人口高峰正在由小学向初中推进,另外,由于我国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比较少,招生比例相对较低,从而导致阶段性教育资源配置极度紧张。面对欠缺的优质教育和高等教育资源,社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渴望,基础教育也成为人们获求成功的第一个跳板。激烈的角逐愈演愈烈,而这场竞争的主将却是一个个满脸稚气、单纯可爱的小孩,他们刚想感受一下社会的美好,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巨大的压力已经无情地加载在他们身上。不难看出,学生负担过重,不仅仅表现在课业上,更多的还表现在生理上和心理上,这种无形的精神负担远比有形的课业负担所造成的后果严重得多。

“应试教育”模式依然盛行,导致减负难以真正实现

中考、高考等考试评价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应试教育久唱不衰。目前,考试依然是选拔优秀人才的主要方式,虽然在许多方面已暴露出它的弊端,但还尚未找到能替代这种选拔人才的途径。因此,形成了“应试教育”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以考试成绩为教育效果的主要评估标准,以升学和考试成败来评价学生的好坏、教师的水平和学校办学的质量。一些省市教育行政部门以此作为当地教育强弱的主要指标,鼓励各个学校多出名牌学生,提高升学率。而由于我国地区间经济差异较大,教育投入不均,地区间教育强弱悬殊较大。一些教育行政部门为了使本市(县)成为教育强市(县),就不得不对学校施加压力,教育实力相对较弱的地区希望能多出几个金凤凰,而教育实力较强的地区要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一场以考试成绩论输赢的拉锯战在应试教育的大旗下展开。学校和教师为了在这场战斗中取得胜利,虽然在思想上接受和赞同减负工作,但在实际中也不得不选择放弃,学生之间也在进行着残酷博弈。大家都以考试成绩为最终目标和最高追求,如果都选择减负,考试对每个人来讲都是公平的,但如果某个学校或某位

学生选择减负,而其他学校和其他学生选择增负,那么在现行考试评价制度下,这所学校或这位学生的竞争优势则明显降低。于是,为了学校和教师的声誉,为了获得高分以考入“知名中学”、“重点中校”,一些学校、教师和家长执行减负政策时都只做表面文章,并没有具体实施,或者敷衍塞责,拖延推诿,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在“减负”的掩盖下行“增负”之实,减负成了掩人耳目的“神话”。

学校自身压力重重,导致减负举步维艰

现如今,许多人对学校的办学质量评价标准主要是升学率,对于升学率较高的学校,家长几乎是挤破了头也要把孩子送进去,无论是高额的转学费还是托熟人找关系,只要能让孩子进入“好学校”,可谓不惜一切代价!而对于升学率较低的学校,每年招生人数总是较少,甚至有时不能完成招生任务。而且,一些教育管理部门年终考核学校是否优秀,学校接下来的可支配资源也与升学率挂钩。拥有较高升学率的学校,在进行评估时轻而易举地获得优秀等级,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而升学率较低的学校不但分不到更多的教育资源,而且还要被主管部门批评,校长甚至冒着被撤职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增强学校的影响力,扩大其社会声誉,实现其现实利益,不少学校不得不把全面贯彻实施减负政策作为口号,而把升学率作为追求的目标,不惜牺牲学生的休息时间,多给学生补课加压,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以换取较高的升学率来达到提高知名度的目的。此外,过重压力带给学校的另一重要问题是严重地制约和阻碍了学校自主办学的行为,挫伤了学校实施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积极性,使许多校长在这种升学率为教学质量唯一标准的重压下举步维艰,很难放开手脚,大胆探索。面对“减负”的要求,实施效果不佳,也是由于不合理的学校评估体系过多束缚学校管理制度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教师处于尴尬境地,导致减负左右为难

在减负问题上,教师的处境也很无奈。一方面,教师是最了解学生负担之重的,也是最能够听到学生要求减负的呼声的,他们并不愿意看到学生大

量的时间都被沉重的学业所占据,身心健康因过重的负担受到损害。但另一方面,教师又承担着家长寄予的重托和学校升学目标的实现。如果教师给予学生更多的课余时间,让学生的学业压力小些,一旦导致学生的学习成绩下滑、升学率下降,则教师将不得不面对家长的斥责和学校的批评。《教育文摘周报》曾报道过一个典型的案例: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一所小学的沈老师是一位优秀的班主任,她从2002年1月开始,按照规定减轻学生们的课业负担,并拿出较多的时间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但使她感到意外的是,班级的考评“综合成绩”下降到年级组的倒数第二名。她所带领的班级被称为“差班”。在寒假前的家长会上,沈老师哭着向家长鞠躬道歉,并表示今后将加大作业量。可见,教师在减负的道路上也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此外,有部分教师缺乏灵活的教学方法,课堂“大满灌”、课后“题海战”,无法切实提高教学效率,增加了学生的劳动量,剥夺了他们玩的权利。还有部分教师素质不高,上课照本宣科,下课一走了之,不是靠教育科研来指导教育教学工作,而只靠简单的增加学生负担来提高教学质量。因此,如果不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和素质修养,减负工作必将困难重重。

家长对孩子期望值过高,导致减负面临极大障碍

在中国这样一个家庭观念极强的国家里,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帮助,子女对父母依赖的同时,父母对子女也有着强烈的依附感。很多父母把自己没有完成或者不能完成的心愿寄希望于自己的子女,期望值过高,管理约束也就更严,常常以孩子的学业为中心,助推了孩子学业负担的加重。尤其在现代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里,很多家长不能树立正确的人才观,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有受过高等教育才能在将来找到好的工作,有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在督促孩子认真学习的同时,还要找名师做家教,送孩子去各种补习班、专业班、辅导班,为孩子买各种课外辅导材料,即便承担巨大的经济压力,也决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在学业上有任何的闪失。受传统的苦学价值观的影响,“学海无涯苦作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成为家长教育孩子努力学习时常用的座右铭。我们知道,培养孩子刻苦勤勉的学习精神是值得提倡的,但不讲求学习方法,一味强调死读书、读死书,就

会压制孩子自我发展的可能性,泯灭孩子的创造天性。另外,有些家长的教育方法存在问题,由于过分追求学习成绩,只要孩子成绩好,就把给予金钱物质奖励,或让孩子不做任何家务作为奖励。不少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会任何家务劳动,这对其自理能力和劳动意识的培养会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孩子在学习上容易产生焦虑紧张心理,害怕成绩不理想受到责骂,从而加重了孩子的心理负担。孩子在如此重负之下苦苦学习,其自由全面发展必然受到极大影响,家长对孩子“前途”的期望,最终也只能望洋兴叹。

在不恰当的攀比竞争中,学生自己成了减负的“拦路虎”

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少年儿童好胜心强、自尊心强,而受挫能力较弱。作为低龄的小学生,他们过早地懂得了“竞争”,知道了“好学生”的标准和意义,为了老师的一句表扬、为了一朵小红花的奖励、为了父母欣喜的笑容,他们争取让自己成为一个人人喜欢的好学生。邻居张阿姨的儿子和朋友小王的女儿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年级,大人孩子坐在一起聊天时,问及孩子的学习。两个小家伙学习成绩都不错,小男孩是年级第四名,小女孩是年级第二名。张阿姨对儿子说:“看,妹妹比你年龄还小一些,学习成绩比你还好呢,要加油哦!”孩子低着头一言不发,过一会竟自己一个人回屋看书去了!觉得欣慰,但也觉得很心酸。如果孩子能够正确认识学习的重要性,而不在乎名次的高低,那他们才是真正的懂得学习的意义了!只是,在他们的心里,学习成绩好、排名靠前才是最重要的。而高年级的小学生,更是把学习成绩放在第一位,考取重点中学是他们最大的梦想,他们不愿失败,老师、家长也不允许他们失败。经验告诉孩子,失败将会被批评、责怪,对不起父母,抬不起头。于是,有的孩子自己把自己束缚起来,不需要老师和家长的威逼利诱,他们就已经给自己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日本著名教育家小原国芳指出,少年儿童的生活包含着接受教育的过程,而“教育的第一原理是自由”。^①然而,在我们现实的教育环境中,一些

^① 《小原国芳教育论选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人奉行“题海战术”、“棍棒政策”、“榜样是金”，少年儿童由起初“自由在地表达自我”变成了“有所顾忌地表达自我”，再变成“只表达家长和老师等社会代言人所许可的内容”。久而久之，他律变成了自律，外在的权威成功地实现了内化，他们就只能服从权威，接受并表达那些符合预先存在于他们心中的图像的东西，而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不能如实地反馈自己所感受的信息，这极大地扼杀了少年儿童的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

教育专家指出，教育的本质是育人，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和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对受教育者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传授知识、技能，培养思想品德、发展智力体力，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的一种活动。教育的过程应该是人本的、积极的、开放的、生动的、创造的，教育应该使成长中的学童具备与他人合作的能力、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不断创新意识和能力以及能够与环境和谐相处的能力等，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是，现在的孩子们的课业要素在全面发展方面处于一种严重失衡的状态。他们在记忆方面的负担较重，因而忽略了对想象能力的培养；在课业数量上的负担较重，因而忽略了对合理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在智育上的负担较重，因而忽略了对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技能的培养；在主考课程上的负担较重，因而忽略了对不考课程上的教育。他们整天被禁锢在书本上和屋子里，没有机会去参加社会实践，没有空闲去观察外面的世界，没有勇气去反对现存的误区。在这种严重失衡的教育环境中，孩子们背负着沉重的来自于外界的压力，身心的发展违背着客观规律，独特的个性被人为地束缚，本该健康快乐地求学与成长，化为了机械性地被动完成课业，以便讨取老师和家长“满意”和“赞誉”的目光，自由全面的发展只能化作一个空想美丽的梦。

营造让小学生愉快学习的良好环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学生负担过重问题给予高度重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明确要求。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同志就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针对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强调“要各

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要求教育部研究制订学生“减负”的方案和措施。^①1953年，毛泽东同志在接见共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提出，“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并且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要求“他们的学习和工作负担都不能过重”。“学习工作要抓紧，睡眠休息娱乐也要抓紧”。^②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与七省市教育厅局长座谈时有针对性地提出：“教材要减轻，课程要减少”，并要求省、地、县三级第一书记要管好此事，要求第一书记作为“减负”的第一责任人。^③1964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主持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课程多，压力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同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编印的《群众反映》摘登的“北京一个中学校长提出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批示中，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④在《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一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晚年时对于设置繁杂的课程而造成学生过重的负担进行了更深入的论述：“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⑤“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慢慢去体会……”^⑥“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⑦

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思想，并且把“减负”工作作为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

①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4页。

②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

③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页。

④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⑤ 《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6页。

⑥ 《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8页。

⑦ 《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4页。

志尖锐地指出：“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特别强调，“对于没有考好的学生，要鼓励和帮助他们继续努力，不要因此造成不必要的精神负担。”在教育活动中，邓小平同志强调教育质量，注重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在鼓励帮助每个人勤奋努力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异，并且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进。”^①从邓小平的教育思想中可以看出，强调学生的个性发展得以解放，学习压力和心理压力得以有效缓解，按照教育规律来组织教育教学活动，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

党的第三代领导也同样重视“减负”工作。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已成为推进素质教育中刻不容缓的问题，要切实认真加以解决，各级政府都要建立健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监督检查机制。”^②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针对“现在一些学生负担很重，结果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由此而造成许多恶性事件，深刻指出：过重课业负担“不利于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要从根本上解决“减负”问题，就必须“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要“把家长希望子女成才的迫切愿望、教师教书育人的心情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全面提高青少年素质。”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并且把“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列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大题目下，将其上升至关系民生问题的高度。可见，胡锦涛总书记是何等高度重视学生课业减负问题！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指出，要把中小学生从过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实践、创造。在2006年12月，教育部、体育总局召开新中国

①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140页。

② 《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学校体育工作会议，会议提出：要保证学生每天参加一小时体育锻炼，让“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生活一辈子”的理念深入人心。

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如此重视学生的课业负担问题，并为此发表过重要的讲话和指示，教育行政部门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各教育部门按照要求采取一系列措施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时至今日，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学生的课业负担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在一些地方和学校也没有得到切实贯彻实施。往往在减负政策刚出台时，减负政策执行得较好，以应付上级教育部门的检查。过一段时间之后，减负风头减弱就恢复原貌，重负又扑面而来。或者断章取义、或者貌合神离，抱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态度与政府部门玩起了躲猫猫游戏。教育行政部门规定学校、教师禁止让学生统一购买课外练习，从此家长开始在老师的建议下自行购买；要求学校、教师不得在节假日和其他休息时间里组织补课，规定学生在校时间限度，早自修不得早于八点，然而一股“家教”之风接踵而至，孩子们“自行”早起去自修；要求学校不准组织过多的考试，取消期中考，一些学校又各有绝招，有的改成在往常期中考前或考后几周举行所谓“学业素质检测”……真可谓煞费苦心忙减负，岂料越减越添重负！正如2006年湖北高考的一篇满分作文《减负中的“朝三暮四”》中所讲述的那样：

有这样一群聪明猴子，它们为晚上吃的栗子是四颗而早上却只有三颗而气愤，于是主人一狠心，一跺脚，说：“以后给你们早上四颗，晚上三颗！”猴儿们心里都乐开了花。

自以为聪明的猴子们哪里知道，早上多出的那颗栗子，是从晚上那四颗中“挪”出来的，它们连半颗栗子都没多得到。

坐在考场中，我不由想到了减负中的我们，多少和这群猴子有点相像呢？

我们曾叫嚷着一天12个小时在校学习的生活太苦太累。于是，终于有一天，我们在校时间被压缩到了8个小时，大家都拍手叫好。然而，渐渐地，比傻猴儿聪明的我们发现：“负”并没有凭空消失，它只是被偷偷转移到家里。一

张张的卷子，一本本的习题……我们在家里度过了一节又一节“大练习”和“晚自习”。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很简单。就像那个故事中，栗子的总数没有变少一样，我们的考试制度、选拔人才的方法没有变，那么我们注定要付出和没有减负的上届、上上届……学生们一样的努力，才能跨过高考这座独木桥。

或许有人会问：“栗子的总数真的只能是七颗了吗？”唉，主人毕竟太穷了，他只有买七颗栗子的能力，不过，小猴子是他的宠物，无论如何他会想办法买更多的栗子。毕竟，减负是国家在教育方面一个崭新的举措，作为一个新事物，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特别国情的发展中国家，它还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困难。从某种角度看，我们的减负，似乎就成了国家的增负。

现在，我们中的许多人心上压着的都是“高考”这块大石头。如何减轻这种“升学”的心理负担？如何让更多的学生能更轻松地升大学？这毕竟是国家发展的问题，我自然不能多言。然而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忽视对下一代的培养，更何况我们走过五千年沧桑的中华民族！我相信，随着各方面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减负”一定会冲破各种阻力，达到一种真正的“减负”，绝不会任由“朝三暮四”的把戏上演下去。

那么，在这种过渡时期，聪明的小猴子们为了不饿肚子，就该学会自己打栗子吃，不要满足于“朝三暮四”的把戏；聪明的我们也要把握自己，调整好心态，驾驶自己生命的小舟，去寻找一条适合自己风帆风向的航道，驶向胜利的彼岸。大海是辽阔无边的，我们知道，这样的路不会只有一条，何必非要醉享“朝三暮四”的虚妄？

未来的某一天，当我们看到十几岁的孩子们在阳光下过着多姿多彩的生活时，我们的脸上也会露出会心的微笑，他们不再是沉醉于“朝三暮四”的傻孩子，因为主人给了他们更多的栗子，他们是真正幸福的“小猴子”。^①

有专家在对这篇作文之所以得满分的“解密”中认为，本文由“朝三暮四”的故事引申并联想到现行教育的弊端，作者理直气壮地透视现行教育存在的问题，可谓见解独到。用“朝三暮四”的故事来类比如今的减负现状，

① 《减负中的“朝三暮四”》，《少年文摘》2007年第3期。

显示出考生的洞察力和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源在于高考制度、经济发展和教育制度的滞后,这正是考生难能可贵的理性思考和见解。当然部分观点也值得商榷,可谓白璧微瑕。

种种情况充分表明,超负荷的学业负担,已经成为当前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严重障碍。减负并非一句空口号,需要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综合治理,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学校、家庭、社会的一切教育工作,都是围绕着培养学生这一中心任务展开的,学校工作的质量、家庭教育的成效和社会各界的努力最终都反映在受教育者身上。如果各方不能相互配合、相互影响,而是各自为政,那么我们最终所能看到的只会是一个个被重负挤压的“机器”!有专家指出,要想真正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还少年儿童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生活,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切实做好“减负”工作:

推进课程改革,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课程设置与学生的负担有直接关系。我国小学课程设置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计划规定的教学内容超负荷,不仅计划规定的课程门类过多、过偏,而且课程内容过深、过多,要求学生掌握过多的知识细节,其结果不但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而且导致学生不能遵循其年龄智力的发展规律,难以将精力集中到基本概念和思维技能上,不利于学生知识的巩固和智力的开发。因此,应当因势利导,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新课程的改革。尽管改革试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先进的课程理念落实不畅,相关配套政策未能及时跟上,个别学科标准和教材内容的适切性亟待进一步调研和论证,比如在减负声中诞生的新版语文教材,其背诵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教师和学生的负担并没有切实得到减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金芳在谈到新课程改革时指出,要真正减轻学生负担,就要改变教育观念,走出应试教育的误区。具体地说,应该减少基础教育的学科科目,降低学科的难度,删除那些对于中小学生发展没有多大实际应用价值的内容。科目减少了,内容减少了,难度降低了,按照“学什么考什么”原则而不是“考什么学什

么”的原则，才能把中小學生从繁重的学业负担中解放出来，让其发展身体、培养兴趣、发展个性。^①需要注意的是，“减负”并非盲目删减教学内容，也非随意减少学习时间，而是要让学生在充足的时间里系统掌握其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只有“减负不减质”，才能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

探索科学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只减轻学生的书包重量，仍属表面文章，远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在教学实践中，只有探索出一条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的课堂教学模式，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积极刺激学生思维的兴奋点，才能使学生在“爱学习、会学习”中减轻学业负担和心理负担。课堂教学由教材、学生、教师、教学目标、教学条件等各要素构成，其中教师和学生是人的因素，教材和教学条件是物的因素，人的因素是决定因素，物的因素是人运用的对象，是非决定因素。围绕着目标的达成，学生是直接的的决定性因素，教师是非直接的非决定性因素。因此，课堂教学应当以学生为中心，由教师运用教学条件加以指导，以达到学生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和课堂教学系统功能效率的提升。这就要求教师要认真研究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彻底改变将学生作为“知识容器”的旧的教学方法，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针对小学生的认知结构和知识结构相对薄弱的特点，在传授新知识时可以采用复习旧知识以引出新知识的方法，或者用生动形象的方式激发学生思维，或者提出问题让学生独立思考，再加以适时引导。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合理运用期望与激励的心理效应，满足学生的精神需求，激励起学生追求更高目标的愿望和对老师更真诚的尊重与信赖，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自由自在地学习。也就是说，在课堂上全体师生应当共同参与，教师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以充分调动和组织学生参与的兴趣和热情，学生也要自我调节和驱动，在教师的引导下把精力集中到教学活动中来。

①《“减负”为何会成为“负减”？——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金芳女士》，《教育（双周刊）》2006年第1期。

改进教学方法，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益

俗话说：“教无定法，贵要得法。”教学方法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固有模式，教师要根据不同的科目、不同的年级、不同的学习程度来选择适合学生学习的科学教学方法。具体针对课堂教学而言，提高40分钟教学效率，每一分钟都应用到实处才是“减负”的关键。首先，教师在课堂中必须精讲精练。精讲就是课堂中没有意义的问题不问，可有可无的话不说，争取把每节课上成“精品课”。教师首先要提高自身素质和业务能力，不仅要熟练驾驭教材，还要认真研究整个学段的教材结构和教科书的编排意图，有效整合教材以提高教学效率。其次，要充分了解每个班的每个学生，通过接触、谈心、合作等手段弄清班级同学的兴趣动机、接受能力、理解水平以及整个班级的学习氛围，做到“以学论教”、“因材施教”。其三，要上好每一节课，做到清晰准确、生动有趣，师生间有着良好的互动，学生能够积极思考，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在教师的启发下解决问题。精练就是教师在安排练习时，不出现重复的、机械性的题目，课内外的题目都经过精心的准备和设计。练习贵在得法，要重在教会学生练习的方法与技巧，而非简单机械地抄背课文。教师可以尽量在课堂上给学生留出5~10分钟时间写作业，学生在课堂上接受的新知识属于感性认识，在完成与教学重点相关的作业过程中，感性认识随着深入思考升华为理性认识，方便学生巩固、应用所学知识；而且教师可以巡视、察看学生的作业情况，随时帮助学生解决疑难问题，同时也检验了教师的教学效果。课堂作业之后，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在课外布置一些思考题，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激发学生再学习、再探索的兴趣和热情。

创设宽松和谐的学习生活环境，给孩子适当的自由发展空间

小学阶段的学生心理极不成熟，容易受周围环境因素的影响，为小学生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构建愉悦的校园环境、创设宽松平和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说过：“夫妻间的和睦是成功教育儿童的首要条件。”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孩子一般情绪稳定、情感

丰富细腻、性格开朗，懂得尊重和关心他人；而在不良的家庭氛围中的孩子，则过多地表现为任性、不懂礼貌、孤僻自卑等不良性格特征。因此，家长要积极营造温馨和谐、团结互助的氛围，对孩子尊重、信任、理解和宽容，对自己要以身作则，起到榜样的作用，采取恰当的方法对孩子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给孩子适当的自由发展空间，培养其独立自主、意志坚定、朝气蓬勃的良好人格。学生的大部分学习时间是在学校中度过的，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和和谐友爱的班集体是学生健康心理的有力保障。这就要求学校要开展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给予适当的竞争机会，培养学生积极进取精神和受挫能力；在班级开展互帮互学的活动，增强班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学生在学校里能感受到学习的快乐和校园的可爱。同时，社会文化环境对小学生的心理健康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社会应当通力合作，深化改革，营造有利于减负、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社会大环境。对学生免费开放社会文体场所，丰富学生课余生活，陶冶学生情操，组织健康有益的社会实践活动，拓宽学生活动空间，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宽松平和的社会环境。

培养孩子调控情绪的能力，增强自信心、自尊心和自制力

小学生在各种活动中，特别是在学习活动中，常常会产生各种情绪体验。由于小学生对自己情绪的识别能力很低，还不能完全控制和管理自己的情绪，如果教育不到位，则会给孩子心灵带来过重的负担，难以排解。因此，在学习和生活中，教师和家长应当注重培养孩子控制和调节情绪的能力，帮助学生保持愉悦的心情和积极的情绪体验，教会他们善于遗忘消极情绪，增强学生的自信心、自尊心和自制力。首先，要让学生认识真实的自己，看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学会悦纳自己、欣赏自己和肯定自己，但同时也要看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并且尽量去改正自己、完善自己、提高自己。其次，要鼓励孩子多参与各种活动。尤其一些内向的孩子，不善于表达和交流，教师要有意识地激发他们的表达欲和参与活动的积极性，让学生明白，多与他人交流可以增长知识、受到启迪、增进友谊，自己也可以得到轻松愉悦的心灵体验。再次，帮助学生确定符合他们实际情况的奋

斗目标。对学生的学习期望不要过高，不要用高压手段逼迫他们学习，对于学生的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要赞许和喝彩，面对他们的失败和挫折则要鼓励和宽慰，引导学生培养平和的心理情绪。最后，教会学生释放和遗忘消极情绪。孩子在遭遇不愉快的事情时，情绪最易愤怒、悲痛、彷徨或无助，这时教师或家长应当耐心地陪在孩子身边，尽量多和他进行沟通和交流，在谈心过程中为孩子解开心灵的枷锁。如果孩子情绪过于激动，不希望有人在身边，则应温和地抚慰，不妨劝他一个人放声大哭，把心中的不满和委屈发泄出来。在情绪有所缓解之后，教师和家长要适时引导孩子放飞心灵，学会调适自己，重新找回快乐和自信。

关注学生不同学习阶段的心理负担，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调适

由于面对的学习任务和自身的心理承受能力的不同，学生在整个小学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心理负担，家长和教师应根据学生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出现的不同问题进行有针对性地分析和疏导、调适，引领学生轻松愉快地度过六年小学阶段。学生刚入校时，面对陌生的环境既觉得新鲜有趣又有点忐忑不安，这就需要对他们进行入学适应能力的教育和培养，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帮助他们感受新的集体带来的温暖和友情，使他们乐学、好学，尽快融入到集体生活之中。小学中年级阶段已经适应了学校生活，在学习中逐渐有了自己的认识和思考，这时应当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我，克服自满或自卑的不良心理状态，正确对待自己的学习成绩，培养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增强集体意识，健全开朗、合群、好学、自立的良好人格。到了小学高年级阶段，随着学习难度的提高，学生的心理负担也相对增重不少。家长和教师首先要摆正自己的心态，不要对学习成绩要求过高，帮助他们在生活中品尝解决困难的快乐，增强他们在遇到挫折时顽强拼搏的勇气和毅力，培养面临毕业升学的进取态度。只有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根据不同学习阶段的心理发展特点和需求，在学习和生活中做到心理健康教育的科学性与针对性相结合，家长和教师的科学辅导与学生的主动参与相结合，预防、矫治和发展相结合，达到父母子女之间、师生之间和同学之间心灵的畅通无阻，小学生的心灵重负才能真正减轻，整个小学阶

段的学习生活才能充满阳光。

关注个体差异，尊重孩子个性和培养良好个性

根据心理学研究，智力与学习效果相关仅为0.5，而非智力因素与学生学习呈正相关。非智力因素包含的主要心理成分是动机、兴趣、意志、性格等。^①而每个孩子都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存在个体的差异，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尤其要关注他们的不同特点，激发其心理潜能，促进孩子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教师和家长，首先要明白孩子不是家长的私有财产，也不是学校沽名钓誉的工具，他们是一个个独立的人，需要用平等的态度去对待。懂得尊重孩子，理解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才能赢得孩子的信任。任何一个小学生，作为班级和伙伴中的一员，如果长期得不到认可，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信任，感受不到集体的温暖，他就不会有安全感、自尊感，而会感到孤独、压抑，就有可能走向封闭或者产生仇恨、漠然、攻击等消极心理。因此，用心去关爱每一位孩子的成长，用心去包容每一位孩子的个性，用心去满足每一位孩子的合理需要，孩子的身心发展才能健康成长。尤其对于有自卑感或者性格孤僻的孩子，他们有着自己的特殊心理，轻微的思想、情绪和行为的变化都会对他们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在和他们沟通与交流时更要注意方式方法，尽可能了解他们的想法，满足他们的合理愿望；发挥他们的特长，培养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创造轻松环境，淡化其不安、孤独、烦躁心理；帮助他们解开心灵桎梏，引导他们以轻松的心态和全新的姿态融入集体生活。只有在关注个体差异，尊重孩子个性和培养良好个性的基础上，允许学生个性发展，学生才会从内心深处感到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是一个优秀的人。

大力推进创新教育，增强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创新思维能力。长期以来，很多教师在课堂上习惯于滔滔不绝地满堂灌的教学方法，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

① 《给童心减负 构建和谐教育》，《科技教育》2007年第4期。

学生思维的活跃、智力的开发,尤其是创造力的开发与培养方面考虑,其危害极为严重。学生在接触到新知识时不用思考,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长此以往,小学生应有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无形泯灭,急于思考问题,万事依赖于教师和家长,其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也会消失殆尽。因此,在学习过程中,教师的角色应从“宣讲家”转换为“引路人”。讲述新知识之前,可以先让学生独立自学预习。学生在对学习内容有了大致了解以后,会产生许多疑问和困惑,这时教师不必急于回答学生的问题,而是先耐心倾听学生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看法,鼓励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在学生独立思考、合作学习都不能很好解决的时候再做适当的引导。学生带着问题自己去找寻答案,其学习兴趣大大提高,思维也会显得异常活跃。要鼓励学生质疑驳问,培养学生的怀疑态度和问题意识。古人云:“学贵有疑,学则须疑。”学习的过程正是一个积极思考的过程,是探究新知、质疑驳问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勤于动脑、喜于思考,敢于挑战权威,想象力和创新力才会蓬勃迸发,新的思想观点才会层出不穷。尤其对于刚刚进入校园的小学生来讲,小学阶段的学习生活正是探索真知的开始,教师要热情鼓励、积极配合。如果让学生只是一味死记硬背,唯书是从,教师也只是照本宣科,以课本答案作为标准答案束缚学生的思维,限制学生个性和主体性的发展,则容易使学生养成一种服从、保守、循规蹈矩的人格特征,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要鼓励学生多元求异,活跃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新力。想象力是根据以往接触到的对事物的感性认识,经过在脑海中进行归纳、总结、演绎、推理等,最终创造出一个全新形象的心理活动。^①它是创造思维的重要方法,也是创新力的先导。教师在教学中应有意识地鼓励学生多元求异,激发学生“一因多果”和“一果多因”的思维,指引学生沿不同的方向、路线去思考和探究,为某一情境找出不同的结论或者探寻问题成因的多种可能性,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鼓励学生另辟蹊径,让学生创新思维的火花迸发出耀眼的光彩。要联系生活实际,拓宽学生思路。传统的教学仅仅停留在为学生灌输知识的层次,学生所接受的新知识

^① 《创新教育学概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只是在头脑中形成的一种感觉，而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不能转化为学生自身的能力。“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从学生感兴趣的问题着手，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将所学知识与生活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应创造条件，放手让学生去操作，除了学习中常用的读写方法外，还可以引导学生根据具体学习内容进行操作实验，在探索过程中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在传授一个新知识后，根据不同的学习目标和任务，让学生运用所学，联系实际，不仅有利于改善学生的思维空间，实现认识能力的飞跃和突破，而且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Chapter5

第五章

中学教育 陷入文理分科的泥淖

中学教育在一切为高考服务的迷雾之中苦苦挣扎,文理分科成为影响中学教育发展的桎梏,致使中学生步入知识狭窄的偏道。因此,必须冲破中学教育文理分科为高考的误区,让中学生在知识海洋中畅游。

中学教育是人们接受学校学习教育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重要阶段，要实现从小学教育向大学教育的过渡，因而是知识学习、个性优化、身体发育、品德塑造的关键时期。中学教育的过程、途径和方式、方法，将直接影响到青少年教育的质量和成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中学教育经过60余年，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然而，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学教育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中学教育仍在为高考文理分科之中苦苦挣扎，文理分科成为影响中学教育发展的一大桎梏，致使中学生步入知识狭窄的偏道。因此，必须改革中学教育体制和机制，冲破中学教育文理分科为高考的误区，真正让中学生在知识海洋中畅游，切实推进素质教育，促进中学生得到自由全面发展。

文理分科是好是坏存在重大争议

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工作小组办公室把高中文理分科问题作

为“社会关注度高、影响教育改革发展全局”的20个重大问题之一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以来,对于高中是否应实行文理分科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专家、学者和家长们普遍希望学生能够“全面发展”,取消文理分科;而对于课业负担繁重的学生来说,取消文理界限,全面接收知识的同时无疑意味着身上的担子悄然加重。由于立场不同,对此问题的看法、理解难免不一,甚至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偏颇。

文理分科的好处

学生负担变轻松

迫于高考“指挥棒”的压力,高中生必须得认真学好高考所涉及的任何一门科目。现行的高中课时分布已经让学生几乎没有了合理休息的时间,但各学科都还认为课时太少,还在拼命抢时间、挤时间。如果文理不分科,本来应对数理化难度就很吃力的理科生,还要去学习文科,加重了学习的负担,而本来就怵数理化的文科学生,还要再学习难上加难的数理化,恐怕他们每天连睡觉的时间更要靠挤了!因此,高中学生普遍赞成文理分科,他们认为现在学6门功课就够累了,如果文理不分科,他们就要学9门功课,这与新课改倡导的减轻学生的负担相矛盾。高中教师最能深切体会高中阶段学生的压力,他们希望减轻学生负担,但面对激烈的竞争,不得不要求学生必须在三年内紧张负重地学习,以顺利通过高考,实现自己的梦想。学生家长心疼孩子疲于应付高考却无能为力,认为高中生现在单学文科或理科就已很累了,文理兼修只会把学生们累垮了搞厌学了!文理一旦不分,对于孩子们的课业负担来说,那将是“下雨背稻草——越背越重”。并且,学生学习负担过重,还容易导致过重心理压力的产生,这对学生的身心健康会带来极大危害。石家庄市教育学会秘书长王金刚认为,高中文理分科能够实现教育“减负”的目标。如果不分文理科,在短短的高中三年掌握全部的知识,就会导致学生顾此失彼,不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很可能造成一天到晚在课本和作业之间疲于奔波的被动局面,到头来何谈兴趣和全面发展?河北师大实验中学副校长王昕认为,高考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是决定命运的一次考验,学生的精力有限,学生在通过会考后,集中精力去学习相关的科目,有利于减轻学生的学

习负担。

所学科目术业有专攻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以及各个领域知识的深化,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通才,必然是要有所精,有所不精,个体也必然要“术业有专攻”。我国现当代史上,有许多人仅某个学科领域突出而其他学科平平甚至很差,但他也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钱钟书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时候,数学考试分数很低,却不失为文学、语言方面的大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赋和爱好,通过文理分科,一些人在文科方面大放异彩,一些人在理科方面有所成就,这样才更能适应社会的需求,更加有力地推动社会的发展,更有效地共同服务于国家和社会。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王贞松就认为,文理分开有一定的好处,不可以要求高中培养的是全才。高中不是义务教育,高中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理想和思考,会有自己一定的选择。石家庄市第一中学教导处主任米秉玺认为,古语讲“术业有专攻”,现代成功学讲“成功取决于你的优势”。因此,文理选择,因人而异,符合学生智能发展的实际。人类的智能主要是由语言、数学逻辑、空间、音乐、人际、自我认知等八项智能组成,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智能优势组合或某一优势智能。一般来讲,喜欢理科的学生,平常显得冷静,遇事较为理性,逻辑思维较发达;喜欢文科的学生,感情较丰富,人文素养较高,形象思维较发达。按照学生的特长和志向,通过文理分科提前挖掘学生的兴趣,有利于学生发挥自己的优势。绝大多数高中学生也认为,不分文理科,强迫自己去学习不喜欢的科目,这样都学不好。汉口某高中一位女生说,理科一直是她的弱项,自己适合学习文科。读高一时,她几乎没怎么学理化知识,高二她选报文科班,学习负担减轻了许多,不仅语文、英语成绩有提高,数学成绩也提升得很快。她认为,分科有利于学生及早选择今后的发展方向。

为与高等教育接轨铺路

从现行高等教育体制来看,大学实行的是专业教育,要求学生选择学科和专业,并且科类与专业设置也越来越细。在中小学学习阶段,文理学科齐全,分科教育只是从高中阶段开始,只占到整个基础教育学阶段的十五分之二。可以说,一个学生如果能在十三年里对各学科知识认真学习、融会贯通

的话,那他就可以说是一个全面掌握知识的人了。而到了高考阶段,面临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学生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侧重选择,有利于他们集中精力,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高中前承义务教育,后启高等教育,是一个相对特殊的教育阶段,既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又要为专门人才成长做准备,成了人才分流的分水岭。因此,实行文理分科,使学生在全面掌握基本知识以后,重点学习与未来专业相关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有利于他们在进入高校之后能够更快地适应大学的专业学习。大学主要是“专才”教育,更需要“偏才”、“怪才”。2009年元旦期间,北大、清华等高校都举办了自主招生考试。为了挑选出适合自己学校特点、“不同寻常”的学生,各高校的题出得很另类,以期找到“偏才”、“怪才”。然而,符合要求的学生寥寥无几。中山大学黄达人校长无不遗憾地说:“中大在自主招生中招‘偏才’、‘怪才’,可惜这类人才很难找。”学生家长认为,学生的精力只有那么多,不可能面面俱到。分科可以减轻学生负担,为以后大学的专业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文理分科,既可以减轻文理不分给学生带来的繁重课业负担,又可以让志趣不同的学生在规划自己的人生时有更多的选择空间;既可以避免国家教育资源的浪费,也可以更直接地体现个人的人生价值。

文理分科的弊端

学生知识结构缺陷严重

高中阶段属于基础教育阶段,文科、理科对于一个现代文明人来说都是知识性的东西,并非一门专门的学问。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在学习过程中,如果过早文理分科,让理科学生不再学习历史、地理,不再阅读经典文学作品,造成知识面狭窄;文科学生则远离物理、化学,不熟悉最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最终只能导致学生知识结构的偏差。加之,高考作为一种选拔性考试,要考虑命题的难易程度和区分度,又由于数学是大多数学生的“拦路虎”,结果造成文科学生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攻克数学,理科学生更是对文科知识看也不看,学生的知识分布极不均衡。上海市人大代表、松江区教师进修学院钱秋萍深刻指出,目前的高中学习不仅不能顾及文理兼容,就算是选文科的学生,在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下,除了选定的加一科目外,其他人文学科

基本放弃,理科也是如此,往往是学了物理,就不懂生化和人文,更有甚者,选科从高一起就开始渗入学习之中,学生普遍出现偏科现象,知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对此,复旦大学历史系沈渭滨教授说:“中学阶段需要对各学科的知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如果在这个时候就进行分科的话,会导致学习的片面性,不利于今后大学学习。”

学生综合素质欠缺

中学是培养一个人基本知识素养的重要阶段,其目的不在于专业技能的提高,而在于综合素质的培养。而文理分科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学生产生严重的偏科现象,在知识上实际是靠一条腿走路。由于人们只在乎学文、学理的片面知识教育,老师只抓学科的知识教学,且各自强调自己学科的重要性,无心在教学中提高学生素养。从功利的角度看,确实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升学率,但对学生今后的发展极为不利。武汉一中副校长徐立就一语道破:“纵观如今的大学校园,只有专业知识、没有想象力和创新能力的学生不在少数。他们从高中起就被限制了所接受的知识面,不仅限制了专业选择,更约束了创新思维的发展。”重庆麒麟国际象棋学校董事长杨盛瑜对文理分科也感触良深,他说:“作为20年前的文科生,在工作中我虽然不乏形象思维,但深感数学逻辑的欠缺,这影响了我对大局的把握!”一位从事理科工作的网友叹息,工作时间越长越感到一个理科生具有文科素养多么地重要!所以说,文理分科存在严重弊端,因为“我们要培养的是具有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的综合素质高的人才,而现在中学的文理分科,直接导致文科人才和理科人才两方面同时缺失。”

强化“应试教育”效应

从某种意义来讲,我国高中文理分科主要是为应对高考而设立的,高中文科和理科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是围绕高考而安排的,是为“应试教育”而设计的教育方式。教师在课堂上有目的有步骤地渗透与高考有关的知识内容,给学生讲深讲透,再对某些与考试有关的知识点或题型从不同角度去讲解,给学生以强化练习;学生天天埋头在作业堆里,机械地反复练习与高考相关的知识点,甚至以死记硬背的方法来达到记忆的目的。所有的理科学生都要开始学习那些他们可能一辈子根本派不上用场的东西,少数学生成为绝

大多数学生的陪同学习者,真正的最基础最现实的理科知识倒很少让学生去学习。对学生们一辈子有用的历史、地理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却在中学教育中没有地位。^①实施素质教育从根本上是要求学生打好综合的知识基础,并重视学生多种能力的发展。我国实施素质教育已有多年,但从现实效果来看却并不太理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与我国高中阶段文理分科有关。我们一方面强调素质教育,取消“应试教育”,而另一方面又在高中实行文理分科,这在实践上已形成了一种悖论,素质教育大打折扣,应试教育的实施及效果却被强化。

文理分科弊大于利

文理分科其实并不能减轻学生负担

很多人反对取消文理分科,其理由是高中生的学习压力太大,如果学习文理两方面的课程,会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事实上,负担都是相对的,文理分科未必负担就轻。学生的学习负担是学生主体与压力客体相互作用产生的心理反应。学生自身的学习兴趣、猎奇心理和学习能力决定了这个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每个学生的主体性因面对不同的学习目标、在不同的时间段和不同的智商及身体状况等因素而有所浮动。课业负担、教师的教学方法、家长的管理策略等外界因素则决定客体压力的大小。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总是强者压迫弱者。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面对相同的课业负担,学生的反应却有可能大相径庭。可以说,如果学生学习的主体能动性不能有效发挥,仅为应付考试而学习,那么即使只考一门课,其学习压力也会过大。更何况,学习内容本身对学生负担的影响,不在于学习内容的性质,而在于学习内容的难易程度。由于文理分科,学生在文科或理科方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过多,而高考命题又必须达到合理的区分度,这样试卷的难度自然较高。学生为了考取优异成绩,必然要学得更为深入和抽象,如此循环,只能导致学习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本来学生为实现自身发展理应承担一定的任务和责任,然而负担在无形中变得越来越重反而成为影响学生成长和发展的阻力。因此,减轻学生负担的着眼点并不在于文理分

① 《文理分科的四大弊端》,《科学时报》2008年12月3日。

科,而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降低学习难度。只有让学生通过广泛接触学科门类,在学习中发现兴趣所在,从而唤起学生的学习动力,学生的学习负担才能真正减轻。

文理分科不能真正使得术业有专攻

反对取消文理分科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学习的最佳时间也是有限的,实行文理文科,可以使学生更专注于自身的特长,使得术业有专攻。这个看似合理的观点其实有很大的陷阱。如前所述,人的智能是多元的,但是在这些多元智能中又有交叉,可以派生新的组合,因此绝对不能把学生的才能简单地划分为文科或者理科。并且,学生某一方面特长的发展不是仅仅依靠某个特长领域就能得到发展的,还得依靠其他领域才能使特长得到持久而充分的发展,那种只依靠某种单一领域而使在该领域的特长所得到的发展只是短暂的、缺乏可持续性的。建立在文理综合基础之上的特长教育,由于学生具有较全面的知识基础,这种特长才会持久并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①另外,现在自主招生强调“偏才”、“怪才”,是承认学生中“偏才”、“怪才”的合理性,但绝不等于认可知识的狭隘性。钱钟书当年以仅仅15分的数学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一时传为美谈。但是在那个年代,我国的基础教育尚不健全,钱钟书是家塾出身,他是因为没有系统地学过数学,而不是因为学不好数学,^②我们不能据此就普遍地容忍所谓的“偏才”、“怪才”不去学数学。我们所说的偏才,是指那些经过独立钻研,在某些方面的水平明显超过了课程要求的学生,并且他们在某一个方面出类拔萃,其素质优于那些只是各门功课都好但没有突出表现的学生。我们强调偏才的合理性,是说应该鼓励学生争取各门课程成绩全优,而要对其某一方面的特长加以培养和发展,但绝不是说提倡学生大多数课程都不及格,更不是对于偏才的包容就意味着高中毕业生可以缺乏常识。高中阶段的文理知识都属于基本知识,过早地分科只能导致学生学习的片面性,对其今后的“术业”并不会起到“专攻”的效用。

① 《高中阶段不宜实行文理分科》,《教育研究》2009年第4期。

② 《掌握自学这个武器》,《院士成才启示录》(下册),广东科技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文理分科并不利于与大学接轨

基础教育是为人的一生发展打基础的,是奠基的教育。高中作为基础教育的最高阶段,正是人生道路上最关键的时刻,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高中课程的设计必然考虑到中学生所需要的那些基础。而高等教育侧重于专业培养,学生在大学阶段结合中学综合基础知识进行相关专业的研究。并且,正如教育学家熊丙奇所说:“高校认识到,过窄的专业口径招生和专业人才培养,不但使人才的知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也不利于这些人才未来的就业。文理结合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趋势,一些传统的文科专业向理科高考生开放,以及一些传统的只招理科生的专业也向文科生开放,在培养过程中,开展通识教育,就体现了这种趋势。”现时大学教育改革不仅强调专业教育,而且更强调文理综合的通识教育,较早文理分科,如何为大学阶段的专业教育打基础?又如何与大学的这种文理综合的通识教育接轨呢?我国现今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许多地方正在重新审视基础教育的基础地位,酝酿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淡化高中教育对学科发展的作用。换言之,我们必须改变过去精英教育时代把高中作为大学预科的做法,以高中的分科达到学科的深化是不科学的。

文理分科的历史演变与取消分科的必要性

据专家考证从历史上看,文理分科问题是伴随着清末西方教育制度的引入和我国近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而发端的。如果以1909年清政府学部奏请实施中学“文实分科”为标志,我国中学(高中)文理分科的实践和争议至今已经走过了100余年。20世纪初,在改良派的推动下,作为西方三段制学校制度中的“中学”被引入中国,正式成为学制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政府于1902年、1904年先后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其中,“癸卯学制”在全国正式施行,中学堂学制五年,学生学习统一课程,不存在分科问题。5年之后,即1909年,学部向朝廷递交《奏请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折》,首度提出“文实分科”的建议,陈述分科的理由为:

(1) 中学生毕业有志于升学者,所升的学堂应有文科、实科的不同,“以分科大学言之,则经科、法政、文学科皆文科也,格致科、农科、工科、医科皆实科也”。

(2) 学生的个性与志向不同,“沉潜者于实科课程为宜,高明者于文科学问为近,此关于天授者也”。

(3) 实行“文实分科”有中国历史和国际比较的根据,“远稽湖学良规,近采德国成法”,以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将学生分为经义斋和治事斋进行分斋教学的历史和德国学制文实分科作为佐证。^①这可以说是开近代以来中学文理分科改革和争议之端。

专家指出,清末“文实分科”并未得到真正实施,而关于分科的实践和争议到了民国时期却仍在继续。中华民国成立后,教育部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按照民主共和原则,制定了民初学制。在1912年公布的《中学校令》中,确定普通中学“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中学是国民教育,不是英才教育,当然就不能采取那种旨在进行专向准备的“文实分科”,而应着重于普通知识和基本道德的陶冶,因此,在《中学校令》和《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中规定中学学制为四年,并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取消了文实分科。然而,仅仅过了3年,中学文实分科就再度实行。1915年,袁世凯颁布的《特定教育纲要》中明确指出:“中学校分为文科、实科,以期专精深造。”认为“现行中学校学制,各科并重……而于造就社会中坚之人物与高等教育之预备,均有不能独到之处。现宜取法德制,分为文科、实科两种,或分校,或一校兼备二科,视生徒之志愿以入学,不特适于天性,且学科有所偏重,造诣自有专长,将来毕业后出任事业,能力较优,自足为社会之中坚人物,即升入专门大学亦易深造,较现制实为便利”。这样,中学教育由注重培养“健全国民”转向升学预备。^②1915年4月,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一届年会中提出“湖南学制提案”,其中“文实分科”是该学制提案的重要特色之一。它要求采用德国式的双轨制,以富裕阶层为教育培养对象,以文、实科中学、大学及专门学校为主要办学模式。最终,袁世凯的文化复辟活动宣告

① 《文理分科与并科的演变和取舍》,《素质教育大参考》2009年第8期。

② 《文理分科与并科的演变和取舍》,《素质教育大参考》2009年第8期。

破产，湖南学制案也未能得以实施，但它却是我国近代以来最彻底的“文实分科”的学制提案。

“五四”运动之后，教育界重点推进学制的全面改革，其中就包括“文实分科”问题。1922年“新学制”（史称“壬戌学制”）应运而生，规定中学修业年限由四年改为六年，分初、高中两级，各三年，实行选科制和分科制。其中，在高中阶段，根据次年颁布的课程标准分普通科和职业科，普通科以升学为主要目的，又分为两组：第一组注重文学和社会科学，相当于以前的文科；第二组注重数学和自然科学，相当于以前的实科。1933年12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确立教育目标改革制度案”中，明确规定“高中不分文理科，现有之工农商等高中，均应改为职业学校”。此后，1940年国民政府修订课程规定，高中自第二学年分甲、乙两组，分别侧重理、文教育；1948年又规定取消分科。^①可以看出，在20世纪上半叶，关于中学（高中）是否实行“文实分科”的问题出现了多次反复，并且均以“学制”等国家法令的形式作出统一规定。

新中国成立后，一切从零开始的新中国面临着专业人才短缺的困境，全方位效仿前苏联的“分科教育”办法。首先，成立了西安、南京、重庆等最早的8所外语学校，然后以工业化为主要目标对高校进行专业大合并，将不同大学的同类专业“集成”为统一、单一的专业学院，或并入类似于清华大学等工科院校。这样，加强了工科院校的专业性，但也造成专业面窄，且理工、文理分家，文法、财经等学科被削减，“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在当时即已流行。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之后，高中阶段文理分科的现象愈演愈烈，形成了大家都看得见的事实。尽管1983年8月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中特别提出：“要注意克服轻视文科的倾向。重视和加强语文、历史、地理、音乐和美术等科教学，课时必须保证。不要搞高考考什么就只开设什么课程的所谓‘文理分科’。”然而，尽管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和社会各界多方呼吁，高中文理分科在实践

①《文理分科：历史视角下的实践和争议——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田慧生研究员》，《中国教育报》2009年5月19日。

中依然故我。^①

取消中学教育文理分科是否必要?一些教育专家认为,取消中学教育文理分科是有必要的。我国文理分科的存在有其历史原因。1977年恢复高考后,为了加快专业人才的培养,“多出人才、快出人才”,而采取了文理分科举措。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促进作用。可30多年过去了,我国的教育已发展到今天,大学生的数量和规模得以空前发展,文理分科已经失去了现实基础。更为严重的是,当前文理分科已异化为应试教育的产物,唯一目的是便于应付高考。社会改革与发展需要的不是单科性的人才而是具有普遍适应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复合型人才,高中阶段文理分科的做法不利于人才全面素质的提高及其未来的发展,更不利于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取消文理分科顺应时代要求,已是大势所趋。

取消文理分科是大众教育的要求

从教育性质上看,“文革”前我国大学教育属于精英教育,毛入学率大约为2%。^②“文革”后经过30年的非常规发展,大学教育突飞猛进,毛入学率成倍增长,2006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对“大学生应定位于普通劳动者”的“新的定位”,昭示着我国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发展到大众教育时期。大学教育既已这样定位,高中教育阶段就分文理科则显得不合时宜。而在大众教育的背景下,如果入学者文化层次差别明显,文理兼备者比例较低,又在单一评价制度的桎梏下根据考分录取考生,必然模糊学生的文化特长,对学生的知识学习、进取心理和创新精神都是一种打击,不利于大学阶段的专业学习乃至人才的培养。因此,中学教育更应该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无论是知识体系、能力结构,还是思维素养和视野都必须更注重全面培养,为学生在大学阶段进行更高层次的通识教育奠定深厚的基础和发展潜力。我们即已知道,大众教育是以提高全民素质和培养广泛建设者为目的的,那么在中学教育阶段的知识学习,不仅是要为将来从事的某一专业或职业,而且也

①《文理分科:历史视角下的实践和争议——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田慧生研究员》,《中国教育报》2009年5月19日。

②《解放思想是深化教育改革的金钥匙》,人教网2009年3月9日。

是为了更多地去了解整个社会和世界。在学习中,我们不能因为某些学生某些课程几次考试成绩不好,就认定他们应该与这部分知识绝缘;更不能因为某些学生对某些课程看似不感兴趣,就简单地允许他们放弃对这些课程的探讨。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学生过早确立专业方向的弊病,许多学生上了大学才发现自己的真正兴趣和潜能,但是由于中学阶段知识结构的片面性,只能抱憾终身。由此,旨在造就健全知识结构的大众教育,要求学生的文化素养在整个教育阶段应当全面培养,反对文理分科这种造成学生知识结构残缺的培养模式。

取消文理分科是全面发展教育的要求

有专家指出,早在1848年,教育学家梁思成在清华大学所作的《半个人的时代》中就指出,科技与人文分离导致了两种畸形人的出现:只懂技术而灵魂苍白的空心人和不懂技术奢谈人文的边缘人。搞文的不懂理,搞理的不懂文,只能培养出半个人来。可时至今日,文理分科不但没有变,而且分得更细,学工的不懂理,更不懂文,学机械的不懂电气,学制造的不懂汽车,当年所说的半个人,到现在已经是 $1/4$ 个人,甚至是 $1/8$ 个人了!有则报道也反映了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性: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发射原子弹的国家,但前苏联却超过美国在世界上最先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这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美国政府下令联邦调查局调查此事,原因找到了:美苏两国科学家的科学素养没有什么区别,差距就在于前苏联的基础教育优于美国,特别是艺术教育搞得好,使得苏联科学家的空间思维能力较强。^①可见,知识储备的全面不仅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必备条件,而且是国家综合国力强盛的必然要求。然而,我国在正处于知识储备期的高中阶段即已实行文理分科,学生很难在不考的学科方面下工夫,学校为了追求较高的升学率,对学生的学业趣味和全面发展不加重视,导致学文科的理科素养欠缺甚至数学不及格,学理科的人文知识匮乏,论文毫无文采,甚至文理不通……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就曾深刻指出:“科学和艺术是相通的。我虽然不赞同当下中

①《高中文理分科,利焉?弊焉?》,《河北教育》2009年第3期。

国要培养出多少大师，但人为地搞文理分科，对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可以说有百害无一利！”因此，在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所有人都得到发展”的观念已越来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所接受的今天，如果高中阶段继续存在文理分科教学，既有违素质教育的精神和方向，更不利于个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取消文理分科是科技发展的要求

有专家指出，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特点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学科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和难以区分。不仅出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自所属学科之间的融合，还出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纬线学科应运而生。要解决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科研课题，单靠某一学科、某一方法是无能为力的，必须依靠多学科、多视角、多层次、多方法才能实现。而且国民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推动了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学科间交叉渗透又加速了国民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在这个大趋势下，学生不仅要掌握全面而广博的知识，而且还要凭借完整合理的知识结构有能力综合新的知识。社会发展需要的正是知识和能力全面的综合型、复合型人才。如果从基础教育就开始分科教学，会使青少年缺少知识融合的基础和前提，难以成为适应学科综合的新型人才。近年来，由于一些人对教育为市场经济建设服务做了片面的理解，因而在课程的开设、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表现出明显的急功近利的倾向。教育在凸显为当前经济建设服务所需的知识技能教学的同时，却相对忽视了学生人文素质、身心素质的培养。现代教育是为了服务于人的发展，而不是控制与利用人。^①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现代社会亟需一大批能够依据现代信息技术在社会各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与相关专业相互交叉融合的综合性和应用型人才。而这些人才的培养，恰恰需要具备全面的知识背景和思维能力，基础教育阶段的文理综合知识的积累为其奠定坚实的基础，取消文理分科教学无疑会更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和创造。

① 《高中文理分科讨论中的误区》，《教育情报参考》2009年第11期。

取消文理分科是国际竞争的要求

人类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后,国际间的竞争归根结底为人才的竞争。世界各国都在加紧制定和调整本国科技和经济发展战略,加大人才资源特别是高素质人才的开发力度,谁能正确及时地抓住高素质人才培养这个关键,领先一步,抢占先机,谁就能在新的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江泽民同志早在20世纪末就提出了“在世界范围内知识经济初现端倪”的判断,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区别,知识经济(也称智能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其关键是知识生产率,即创新能力。经济财富的创造来源于人们对知识的加工、整合和处理。这需要依赖于完整的知识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知识创新。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一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中,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不仅是资源和技术上的差别,更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竞争的核心并不取决于人才的数量和知识的拥有量,而是取决于合理的知识结构、创新的思维能力和较高的人文素养。^①因此,我们必须从基础教育开始,犹如构建金字塔一样,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为高素质人才打下宽广而深厚的基础,才能使整个建筑达到很高的高度,在国际间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有专家指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各方面素质全面发展的人,需要具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科学、人文精神的人。为了培养和造就素质全面、具有创新精神、在国际竞争中勇立潮头的全新人才,我国的高中教育必须取消文理分科。

取消中学教育文理分科的可行性分析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高中阶段教育提出的“全面提高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和“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的改革思路,既充分体现了现代教育观和现代人才观,也积极回应了基础教育实践中提出的现实要求。面对引发各界热烈讨论的高中文理分科问题,我们认为,应根据“全面提高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精神,以促进人的自由

① 《建议取消高中文理分科教学》,《新京报》2010年3月15日。

全面发展为最终教育目的,从历史的高度和全球的视野来分析我国的基础教育现状与发展问题,才能对此有科学的认识并作出明晰的判断。

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改革不合理的教育评价体制

变革教育观念,树立正确的人才观

教育体系应当是一个四通八达的立交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相互衔接、协调发展。但是人们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为高学历人才、一味要求孩子接受高等教育,以基础教育为手段达到获取高等教育的目的。而对于职业教育,人们持以轻视和刻薄的态度,认为只有学习不好的学生、没有能力的学生才会不得已而选之。由此造成人们都向往和选择高等教育,久而久之,职业教育就愈加不发达,发展更为缓慢。有专家指出,事实上,具有高学历的人不一定都能成才,没有高学历的人只要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也完全能够在实践中逐步成为某一方面的优秀人才。就职业教育而言,在现实生活中“技工荒”的现象随处可见,国家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尤其是职业技能很高的人,这种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对于一般的本科生、研究生来讲是完全不能胜任的。如果就学生未来就业来说,技术型人才的需求比普通的本科生、研究生需求要大得多;就教育发展来讲,职业教育同样能为国家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合格的高素质人才。倘若学生在升学及就业的选择上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改变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状况,真正做到学有所专、学有所长、学有所成、学以致用,那么因高考过于激烈的竞争而实行的文理分科就显得毫无意义,学生也可以在文理融合的学习中拥有更多的发展空间,整个国家和社会也可以拥有更多的适用人才。

用多元标准评价制度代替单一的教育评估制度

如果还是采取单单以分数论高低的教育评估制度的话,那么取消文理分科只会大大加重学生负担。但不可否认的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考试毕竟是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有效途径,也是国家选拔人才加以深造的有效途径。所以,与其讨论取消考试制度的意义,不如探讨如何改进考试方式,更好地利用多元标准评价制度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以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金芳认为,对于考试来讲,可以多给学生一两次

机会,这样能够让学生有更多机会发挥自己、评价自己,还可以淡化考试在学校中的氛围和作用。比如,现在的高考可以像美国一些国家,一年多次,让每位学生在宽松的环境中健康学习与成长,实现全面的发展,这也正是减负的目的之所在。^①有的学者呼吁各高校可以采取自主招生政策。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在两会上就提出,高校未来可以根据报考考生初中到高中几年来的平均成绩和在校表现,来科学合理地评判学生的综合素质,综合考查学生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并结合专业要求招收合格人才。只有通过授予学校招生自主权,不用同一条标准来衡量学生,才能使具有不同特色的学校招收到自己满意的学生,不同类型的学生都有机会进入能够施展其才华的学校,才能让学生轻松学习,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与特长。

深入改革教育考核评价体系

有专家指出,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以学生的考试成绩、升学率作为教育考核的评价标准,这种评价方法固然管理成本低、容易操作且效率最高,但办教育不同于办工厂,我们要培养的是具有不同个性、不同特长、不同层次的学生,而非打造同一模子刻出的“产品”,所以对学校的评价也不可以只用一个标准,而要进行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划分。而针对具体的任何一所学校,要着重从贯彻落实教育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健全规章制度,规范办学行为,提高教师素质和管理水平等各个方面,结合本校的办学特色进行全面评估。考核教师也是如此。以往,教师的工作业绩都是依据学生的成绩来评价,导致教师为个人的生存利益不得不逼迫学生过重地学习。因此,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价标准成为减负工作的当务之急。考核教师应当对其思想政治表现、师德修养、专业学识水平、业务能力、教学质量、履行职责情况等综合评价。要多留给教师一些教科研和选择教材教法的自由,同时要积极提倡、鼓励那些科学施教、遵循教育规律得来的高质量教学的教师,并号召全体教师走到“减负增质”的轨道上来。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郭振有针对我国长期缺乏科学的评价体系,导致学校、教师不得不加重学生负担的现象,提出了颇有见地的建议:我们应

① 《“减负”为何会成为“负减”?——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金芳女士》,《教育(双周刊)》,2006年第1期。

当借鉴国际通行的基础教育评估体系,建立我国的基础教育发展水平评估体系,严格规范教学行为、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定期收集数据,开展科学的质量检测;定期对中小学生德智体美等全面素质进行抽样测试,反映学生的综合水平,依据数据进行分析、反馈和指导改进教学工作,正确地引导社会舆论。^①我们坚信,随着教育考核评价体制的不断完善,学校和教师有了更为广阔的教育教学空间,在正确的办学思想指导下真正提高教书育人的质量和水平。

大力改革高考制度

有专家指出,高考作为一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权威分配制度,是一把利弊兼具的双刃剑。它对于选拔合适人才、保障教育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表面上看,高考是招收新生的一种考试,但高考不仅仅是教育考试,还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责任,具有维护社会公平与德行的功能。实际上,现在高考存在的很多问题是社会各种矛盾在考场上的集中体现,因此,减少高考的负面影响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要从教育制度、考试制度等多方面进行改革,而不是简单的废除高考制度。在现有的社会状况下,若放弃选拔机制的统一性,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它所引起的连锁反应甚至可能会造成社会的混乱。但不可否认的是,现行高考制度的弊端也很明显。“一考定终身”的考试制度使得高中片面追求升学率,中学教学不能贯彻素质教育和全面人才的培养,忽视了对学生消化吸收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及人格、心理素质、适应社会能力等方面的塑造。正如教育专家、北京市西城教委副主任李燕玲所言:目前高中教育急功近利趋势比较严重,而且文理分科为这种现象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取消文理分科的必要性很明显。

基础教育的本质是素质教育,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体目标大致可确定为两点:基本素养的教育与自由的个性化教育。高考考试制度的设计要兼顾到基础教育的这两大目标。令人遗憾的是,现行高考制度偏离了素质教育的轨道,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通过高考制度改革进一步促进我国

① 《“减负”的难为与可为》,《中国教育学刊》2009年第4期。

教育发展的空间刻不容缓。

暨南大学袁忠群等专家对我国高考制度改革提出的建议很具借鉴意义,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两条重要建议:^①

第一条建议:改变高考的竞争方式,实行个性化竞争,录取标准多样化。

当代心理学与教育学普遍认可的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人的智能是多元的,一个人的各种智能是有差异的,相互间有优势与弱势之别。个体所具有的优势智能千差万别,个体潜能的发展差距明显。个体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无限的发展。人的学习兴趣最容易在自己的优势智能领域产生,而且从人的长远发展角度看,也是最容易在这些优势智能领域取得成就。所以,以促进个体潜能最大限度发展的自由的个性化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目标。从高校培养人才的角度看,高素质生源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学生对某一领域具有浓厚的兴趣并具有全面而扎实的基本功。合理的高考制度应是能让高校能够录取到这些个性化发展的学生,并更进一步由此而引导基础教育重视人的自由的个性化发展。

但我国现有的高考制度却由于设计的不合理,高考竞争成了一种全面的却不完全的竞争,而不是完全的个性化竞争,这种竞争不仅没有促进反而阻碍着人的自由的个性化发展。

1. 现有高考体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竞争。完全竞争要求体现出竞争者的真实差异。如果不能体现竞争者的真实差异,竞争就不完全,而且相应地也就不公平。

我国现有高考不能体现出竞争者真实的水平差距,不能区别出一学科领域有天赋的学习者和普通的学习者。比如说,语文卷中作文满分60分,中等的学生可得42分左右,那么,最好的学生也只能得60分,总分上只高出18分,这18分的差距不是两者的真实差距。改过高考作文的老师都知道,这18分的差距很可能是语文学习方面的天才与普通学习者的差距。在现有的高考中,具有天赋的学习者和勤奋的普通学习者都可能得到同样的高分。

① 《关于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两条建议》,《广东教育》2010年第1期。

这种考试差距的不明显,首先放大考生考试失误对考试结果的影响,使高考不能辨识真正的英才。一两分就会造成考生总排名的很大变化。这种偶然性掩盖了对考生真实水平的客观评价。

其次,这不利于引导考生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发展自己的优势领域,相反,它鼓励学生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去补差而不是去增强。一个真正在某一领域具有天赋并在基础教育阶段又得到了良好发展的考生所达到的水平是会远远超出现有高考试卷的测试范围的,他的这种本应有的巨大优势在现有的高考中是不能得到体现的。因此,为了高考,这种天赋的潜能将得不到有效开发。

还有,差距不明显使竞争更惨烈,分数上微小的差距都会导致竞争结果的巨大差异,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会为了高考中微小的分数而开展题海战术,导致大量低效重复的非思考性学习。这种非思考性的学习是扼杀青少年学习兴趣和创造力的元凶,也使青少年的自由个性化发展成为了一句空话。

2. 现有高考采用的是以多学科的总分为录取标准的全面性竞争方式。全面性竞争不是鼓励个体发展的差异性,而是抹杀差异性,鼓励个体发展的同步性、一致性。这使高校录取不到真正具有培养潜能的学生。

在这种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只能是两种学生:一种是各方面都具有优势智能的全面型天才,而现实中这样的全面型天才少之又少;一种是各方面的智能发展都比较平衡的,也就是可能没有什么天赋,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足之处且又勤奋好学的普通学习者,其中或有在某一智能领域具有天赋却没有去发展,而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发展弱势智能,从而形成优势智能与弱势智能没有明显差别学习者,这也同时意味着天赋被扼杀了。

在这种全面性竞争中,获胜者大多只能是平庸者。这可用一个体育竞赛中的事例进行更直观的说明。奥运会因为比赛单项区分细致,所以,王军霞和刘翔才都可成为冠军。如果奥运会也如我们的高考一样采用全面性竞争的方式,那么,可以设想,王军霞、刘翔都不可能成为世界冠军,同样也可以想象,当今的世界冠军绝大多数都不可能在这样的比赛中夺冠。真正的冠军很可能是那些在任何一个单项上都没有优势的平庸者。世界上有不少的文化学术大师就对数学一窍不通,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某一领

域的杰出人才。类似的例子，在我国的教育史上也不鲜见。比如，1930年高考成绩，钱钟书15分，吴晗0分，季羨林4分。这些人物都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在某一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的人。当时，他们没有因为数学的不足而失去进入大学的机会。今天，作为高考主科的数学、英语都成为了青少年自由的个性化发展和高校录取优秀生源的“拦路虎”。在这里，笔者不是说数学、英语不重要，不是说大家都像这些大师一样可以不学数学，或不学英语，但数学或英语至少不是对每一个人都重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只有学好了数学并同时学好了英语才能生存、发展。

丁肇中先生曾在参加中山大学80年校庆答记者问时说的一段话，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丁先生说：“我发现，上个世纪中后期大部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很少有人读书的时候是考第一名的，绝大部分都在50%以下，有的还是班上倒数第几名。而我自己比较侥幸，在中学的班里排第11。”我们的高考制度以及受高考制度影响的基础教育制度正在一步一步地将大量具有特殊天赋的孩子淘汰出局。

新高考制度要采用个性化的竞争方式，可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革：

一、对高考试卷的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扩大试卷的考查面和扩大难度差异，不同水平的考生能得到具有明显性的差异性评价。建议高考单科试卷的总分调整为1000分，难度设置为普通学习者成绩在200分至400分之间，天赋学习者的成绩在900分左右。比如作文，同样的试题，中等水平的作文评分在400分左右，而高水平的作文在900分以上。同样，在其他的所有学科考试中，试题设计让有天赋的考生该科成绩在900分左右，而普通学习者的成绩在400分左右。

二、基础教育各学科的课程目标分为基本素养教育课程目标、自由的个性化发展课程目标和天赋学习者学习指导性课程目标三个部分。前两大目标体现在学校教学所用的教材之内。后一目标由专家提出指导性意见，但不编入教材，也不属于学校日常教学内容，主要由学生自找资料自学和研究。

第二条建议：将选拔性的个性化竞争考试与基本素养测试的考查性考试相结合，丰富高考考试功能。

前面说到,基础教育有两大目标,一是自由的个性化教育目标,一是基本素养教育目标。通过个性化竞争选拔人才,可促进青少年的个性化发展,但如果高考只有这种选拔性的考试,那么,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就会出现問題。为了鼓励青少年的全面发展,高考还需开展基本素养的考试。

基本素养的考试不能成为竞争性考试。我国当前的高考制度将基本素养的考试当作了竞争性考试造成了基础教育的一系列问题。归纳起来至少有以下两点:

1. 普及性的基本素养教育目标是一个比较低且区分度不大的大多数受教育者都能达到的教育目标,而高考的竞争性则要求增加对考生的区分度,以利于选拔。为了增加区分度,就必须提高考试难度。这导致基础教育的教学内容永无止境地往繁、难、偏的方向上发展。基础教育的教学严重偏离了基本素养教育目标。有人高兴地说,中国的基础教育很成功,尤其是数学。美国高中数学的难度才只达到我国的初中二年级水平。不只是数学,我国的中小学英语教育表面上也是硕果累累,据媒体报道,我国某些中学的英语试题让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学生也一筹莫展,甚至是让英语研究专家也头痛不已。殊不知,正是这两者的差距体现了两种教育的理念差异。作为普及性的基础教育的数学应是适合大多数学习者的,而中国的数学却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学习掌握。我们的英语考试越来越难,但我们能用简单英语交流的孩子却并不多。为了选拔,大家越重视教育,孩子越苦学,我们的考试就会越难。考试越难,教育教学效果就会越差,学生的基本素养就会越低,这种恶性循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脱离大多数学生发展水平的不切实际的教育,严重违背了教育规律,使基础教育的基本素养教育目标无法有效实现。教育学和心理学告诉我们,只有教育的内容与孩子的学习能力相一致时,这样的教育才有效。

2. 青少年严重的人格缺陷,以及带有社会普遍性的厌学情绪。全面的素养教育是一种弱化竞争的教育,基础教育中也难免存在适度的竞争,但这些竞争在强度上不能与高考的竞争相提并论。基础教育本质上应是使每个受教育者都从个体的进步中体会成功,是一种使人感受成功的快乐的教育。但因受高考制度的影响,我国的基础教育过早地引入了激烈的竞争制

度。学校和教育机构为了追求升学率，会急功近利，拔苗助长，会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少数的学习优秀者身上，而大多数学生就被教育者的关爱遗忘了。成长中的青少年过早地领受了社会的冷漠、势利和残酷，失败感、自卑感、受歧视的不公平感日益增长，他们既不自爱也不爱人。这样的基础教育会使受教育者在内心深处谈学习而色变，厌学情绪强烈，受教育的成长过程成为一个一生都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受教育者健全的人格，但将素养教育异化为竞争性的应试教育严重扭曲着受教育者的人格。

高考不能没有竞争，但要改变高考就只能是竞争性考试的思维。人的很多素养是不能通过竞争性考试的方式来进行评价的。考查是非常重要的辨识人才的方法。在大学办学独立自主性强和法治环境优良的国家，大学招生已越来越多地采用考查的方式而不是考试的方式。但在我国，让高校像欧美国家的学校一样拥有巨大的独立自主招生权可能还不合适。我们现在所说的考查还依然只能以考试为主要手段，辅以非考试方式。以考试为主要手段，我们就有必要区别选拔性的竞争性考试与非竞争性的考查性考试。

在新的高考制度中，赋予竞争性考试与考查性考试以不同的地位。具体的方法如下：

考生通过考查性考试以获得参与竞争的资格，竞争的结果最后由竞争性考试决定。国家规定基本素养考试的科目，统一划定各层次高校所需要达到的录取资格控制分数线。

基本素养考试科目有两科：母语水平考试、逻辑能力水平考试。

母语能力和逻辑能力是现代公民社会中最基本的两项能力，单独设科考试以加强基础教育对青少年这两方面能力的培养。

母语能力水平考试的试卷设计：试卷分成A、B两卷，各占500分。A卷考查考生掌握母语的熟练程度；B卷考查考生的阅读量与阅读面。B卷是专为推动阅读而设计。大量阅读是母语学习的基础。阅读也是个体成长最为重要的方法和途径。一个人的人文素养主要从经典作品的阅读而来。阅读的推动也是提高全民族整体素养的最佳途径。国家指定青少年必读书目与推荐书目，其中的200分来自必读书目，200分来自推荐书目，另有100分来自

个体的自由阅读。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为所有中小学免费配备必读图书和推荐图书。

逻辑能力水平考试全卷亦为1 000分。逻辑能力水平考试不是考查考生的逻辑学知识,而是考查考生综合运用人文常识和自然科学常识对大量的具体事例进行逻辑分析、推理和判断的能力。逻辑能力水平考试内容可以覆盖基础教育的所有学科(包括音体美和劳动技术等)的基本常识。基础教育阶段所有学科的教育的重点在于常识教育和思维的训练。逻辑蕴含于所有的学科之中,培养学习者的逻辑能力也是所有学科的教学重点。逻辑能力水平考试的设置,将使基础教育中的学科教育由目前的重视知识的难度转向重视知识的广度,由重视知识的记忆转向重视思维能力的培养,尤其是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是我国传统文化弱于西方文化的地方,尤其是其中的形式逻辑。

个性化竞争考试的实施,高校录取标准的多样化以及基本素养考查性考试的开展既能真正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极大地降低各学科的学习难度,又能使青少年的基本素养教育得到保障,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得以提高,同时也使青少年学子能依各自的天赋和兴趣去学习和发展。

高考制度改革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完备的设计方案、配套措施和具体步骤的有效推进。在近乎白热化的讨论中,我们需要坚定改革的方向,通过理性、建设性、渐进性的方式,用改革的实践推进改革,使高考改革走出困境。关于高考制度改革,除袁忠群等专家提出的以上两条建议外,朱寅年、王旗、杨东平等专家还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1. 高考制度改革应当具有明确的目标观。高考制度改革的目标应当是人的发展、素质教育的推进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考试作为测评人的身心素质、个别差异的社会活动,首先应满足个人发展的需要,这就要确立考生的主体地位,以考生为中心,考试设计应使考生的知识、能力、身心素质得到全面锻炼和提高。然而,单纯以笔纸测验的考试形式是不可能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只有开发口试、笔试、实际操作、表现性测验、综合测评等多样的测试手段,才能满足人发展维度的多样性,促进考生能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使考生富有个性地发展。其次,高考应当成为推进素质教育的有力保障。目

前,绝大多数学校的教学安排都是在围着高考转,高考考什么,学校就开什么课程;高考重点考什么,学校就重点教什么。学校只重视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忽视了学生动手实验能力的培养和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倡素质教育之名,行应试教育之实。显然,这种教育是有缺陷的教育,是以考试取代教育,以应试方法取代教育过程。高考改革应以教育价值标准和社会价值标准为参照,全方位收集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的发展状况,高考内容不只是来自教材,更注重来自现实生活,所测量的不仅是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还要测试学生收集、判断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更要测试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2. 均衡各地优质教育资源和招生名额。我国现有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集中在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而欠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资源则相对短缺。基于历史形成的地方高等教育资源巨大差异、录取名额分配缺乏地域公平考虑的原因,各地的录取名额不是按照考生人数制定的,致使各地的录取率差异极大,山东、河南、湖北等人口大省的分数线比一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高出100多分,造成“倾斜的高考分数线”、“高考移民”等不合理现象。美籍华裔科学家、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孔宪铎先生在谈到中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时,就曾对上海和北京等人口不到全国1%的城市集中了全国10%以上的大学、而很多人口已近千万的贫困地区却没有一所大学的不合理布局深为喟叹。^①因此,中央应当直接支持欠发达地区弥补高教资源之不足,通过中央与地方联合投资办学模式(省部共建)、中央财政对欠发达地区地方财政设立高等教育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等方式,充实欠发达地区的高教资源,提升高教供给水平;加快人口大省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地方高教资源差异未能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通过宏观调控,使新增的招生机会主要向那些人口大省倾斜,将缩小各地的录取率差距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

3. 赋予学生选择高校的权力。现行的高考制度设计,严格限制学生的报

^①《高考竞争的本质与现象》,《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12期。

考自主权,同一批次的不同高校不能同步录取,多数高校对于学生的第二志愿不予考虑,从而使填报志愿成为一门学问,一些成绩优秀的考生因填报志愿不当而失去机会。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以学生为本的制度设计,要求赋予学生更多的报考自主权和对高校的选择权。只有当学生有权选择高校时,才会真正出现高校为吸引优秀生源而改善服务的竞争。建议在招生过程中,同一批次高校对学生不分志愿先后同步招生。这意味着一个学生可能接到几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为避免造成高校的名额浪费,需要延长录取周期,将现行一次性的录取改为多次。对此,需要进行过细的制度设计和试点。这一世界通行的招生模式,没有理由在中国不能实行。

4. 实行高考社会化。为了改变以高考升学率作为高中评价的做法,必须强化高中会考制度,同时实行高考社会化。在通过会考、获得高中毕业证书之后,学生即与高中脱离。考生到户口所在的派出所或者居委会报考,高校的录取通知书也直接发送给考生,将高考结果与高中学校相隔离。这一措施的价值在于,虽然高中仍能够知道毕业生的情况,但地方政府却难以按照高考升学率对学校进行精确的排名,从而弱化高考对高中的强硬“指挥”,解脱多数高中学校。北京市曾试行过此办法,取得了积极效果。^①

下面,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提出的关于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建议,对于人们进一步思考高考制度改革具有深刻启发:

关于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建议^②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一、高考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高考制度是教育教学和人才筛选的基本制度之一。从恢复高考制度三十余年的教育实践看,高考制度对于促进教育发展、保障教育公平、重构

① 《文理分科,关键在高考指挥棒的改革》,《现代经济信息》2009年第12期。

② 《关于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建议》,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6月14日。

教育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现行高考制度的弊端也很明显。例如,偏重知识记忆和解题技巧的考试内容,造成死记硬背与机械训练充斥高中教学。集中录取制度取消了高等学校的招生自主权和受教育者的选择权,限制了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降低了高等教育的竞争力。一些高考加分、地方分数线、指定特招等政策违背了考试公正的原则,损害了教育公平。不少地方政府将高考升学率视为政绩,形成单一的分数评价和升学率导向,致使基础教育“为考试而教、为考试而学”的“应试教育”弊端严重,造成对学生身体健康、道德品质、个性发展和创造力的伤害,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面临知识经济和国际竞争的严峻挑战,世界各国的教育竞争已经发展为教育改革的竞争。同样具有儒家教育文化传统的东亚国家和我国台湾省纷纷改革大学招生考试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借鉴。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的发展阶段,外部环境逐渐宽松,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选择性逐渐加强。不失时机地推进高考制度改革,对于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多样化的适用人才和创新型人才,开创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高考制度改革影响面大,专业性强,面对复杂的利益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困难不难想象,但改革势在必行。我们需要坚定改革的方向,通过理性、建设性、渐进性的方式,用改革的实践推进改革,使高考改革走出困境,将现在“最不坏的高考制度”,最终改变为“最好的高考制度”。

二、高考制度改革的基本价值

本高考改革方案以“受教育者的权利”为出发点,构建新的考试与招生制度。其基本价值包括:

- 1.以学生为本。扩大考生选择考试与高校的权利,尊重和保护考生的个性。改变一张试卷考所有学生、所有学校按照高考分数的单一标准录取考生的情况,促进考试和选拔方式的多样化、多轨化、弹性化,促进学校和学生的双向选择,实现一名考生可以同时获得多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书,以学生的自由选择权来推进高校竞争。

- 2.保障并促进教育公平。保持和发扬高考制度的公平价值,通过考试立

科目与层次组合的示意图如下:

高考科目组合示意图

	研究型大学	地方性院校	高职院校
普通文科	语文 1 英语 1 + 社会 1 数学 2	语文 1 英语 2 + 社会 1 数学 3	语文 2 英语 3
普通理科	语文 2 英语 1 + 科学 1 数学 1	语文 2 英语 2 + 科学 1 数学 1	
工程技术	语文 2 英语 1 + 科学 2 数学 1	语文 2 英语 2 + 科学 1 数学 2	语文 2 英语 3 + 科学 2 数学 3
生物和医学	语文 2 英语 1 + 生物、化学 数学 1	语文 2 英语 2 + 科学 1 数学 2	
艺术和体育	语文 2 英语 3 + 社会 2	语文 2 英语 3 + 社会 2	语文 3 英语 3

(注:课程标号为难度系数,1为最高。)

这一改革增大了考试的选择性,避免了一张试卷考所有考生的粗陋,有利于考生扬其所长,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考试科目。也有利于提高高校和学科招收人才的“精准性”。还可以改善对高中教育的引导,可以根据不同学生的需要制订学习的策略,而不是在同一个跑道、一个标准下竞争。

2. 举行“全国学业能力水平测试”

增加全国统一的“学业能力水平测试”。“学业能力水平测试”的内容以考察学生基本的分析、判断、逻辑思维等能力为主,类似于美国的 SAT 考试,是对学生学业水平的标准评价,作为考生申请高校自主招生的门槛条件。

学业水平测试可每年举行3次，有效期为2年。

（二）录取制度改革

探索多元化的录取方式，包括“全国学业能力水平测试+高校自主招生”模式、“统一学科知识考试+集中录取”模式、自主考试等不同模式。

1.“全国学业能力水平测试+高校自主招生”模式。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985高校和211院校，主要对象是参加自主招生的考生。高校提出“全国学业水平测试”的成绩作为申请门槛要求，对达到要求的申请者进行面试，结合申请者的学业水平测试成绩，中学学业成绩，综合表现，自主录取学生。考生可以申请多所学校，同时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被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统一学科知识考试。

2.“统一学科知识考试+集中录取”模式。这种模式即为现行高考录取模式，不同之处是对考试进行多轨化和分层改革。考生可以自主选择参加何种层次的考试，学校也可提出考试科目与层次要求。这种模式适用于部分211高校和地方本科院校。

3.自主考试模式。这种模式完全由高校自行确定、选择考试方式，自主录取学生。适用于高职高专院校。

四、高考改革的配套措施

高考制度改革是整体教育改革的中心环节之一，需要进行缜密的整体设计，在试点的基础上分步推进，并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

1.制定《考试法》，将考试招生纳入法制轨道。加快《考试法》制定，以法律形式明确受教育者的考试权益，明确政府、考试组织机构、大学、中学在考试、招生中的权利与责任，严厉打击考试作弊行为，追究政府、考试组织机构、大学、中学在考试招生中弄虚作假、侵犯受教育者权益的法律责任。

2.推进高校管理改革，建立高校自主招生公信力需要通过高等学校内部管理制度改革，建立高校自主招生的公信力，降低自主招生导致高考腐败的风险。

首先是信息公开。目前高校的自主招生，信息公开极其有限，公众难以进行监督，从而对自主招生充满质疑。全部、全程公开自主招生的信息，可

以有效打消社会的疑虑。为此,需要建立高校自主招生信息公开机制,以及中学教育质量监控体系。同时,需要在大学实行学术本位管理,发挥教授治学的作用,减少行政因素对招生等教育事务的干涉,减少招生过程中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建立问责机制。无论大学还是中学,发现弄虚作假的,要公开揭露,并承担相应责任,取消有关的资格和招生权利。

3. 构建不同类型教育的“立交桥”。与自主招生、多次录取对应,高校应推行完全学分制教学管理,探索沟通不同类型教育的“立交桥”,完善招生、培养、就业服务体系。完全学分制教学管理,可打破上学时间局限、学科与专业局限、学校局限,扩大学生选时、选课、选科、选师的自由。不同类型教育的“立交桥”,可打破高校之间的壁垒,通过课程认证、学分互换等制度,形成学生可以在研究型大学与其它大学、普通高校与职业高校之间流动的通道,以及灵活地接受高等教育的多种形式,从而实现学生的“学习自由”,并减缓一次性高考的压力,促进高校教育竞争。

4. 实行高考报名社会化。考生直接到户口所在的派出所或居委会报考,高校的录取通知书直接发送给考生。此举可以将高考结果与高中学校隔离,使得地方政府难以按升学率对学校进行精确排名。

5. 改革考试加分政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清理目前的各种高考加分政策。原则是尽可能地减少加分项目,必须保留的应降低分值,以保障全体考生公平地参与高考竞争。今后,地方行政部门不得自行增加加分项目,如需增加需经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6. 均衡研究型大学生源分布,保障农村学生的入学机会。改变国立的研究型大学招生本地化的弊端,扩大人口大省和西部地区的招生名额,逐渐均衡各地考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保障农村学生公平接受研究型大学的教育机会。参照发达国家的有关做法,可规定国立重点高校录取农村生源的比例(例如不低于30%),在自主招生中对农村家庭学生实行同等分数情况下优先录取或对农村家庭学生加分,弥补农村学生因基础教育质量差异所造成的与城市学生的差距。

7. 降低英语分数权重。前多数省份高考科目中,语文、数学、英语3门主课的分数,满分均为150分。有必要降低英语的分数权重,例如改为满

分100分甚至80分,从而恢复母语教育的核心价值,并减少英语成绩对农村学生的影响。待条件成熟时,可考虑在6月初的统一高考中取消英语考试,实行一年多次的英语等级考试,成绩保留两年。不同高校可指定所需的英语分数。

8. 培育中介组织,提高考试服务质量。由国家和地方教育考试中心提供考试服务,是现阶段保障考试权威性的需要。从长远看,考试机构应更加专业化,并通过专业组织之间的竞争,提高考试技术、测量和评价水平。可通过培育社会中介组织,逐步实现考试机构和考试的社会化。

五、高考改革的具体步骤

高考改革可以采取“放开两头、稳住中间、逐步渗透”的方式,以985高校、高等职业学校、民办学校 and 艺术类高校为突破口,逐步实现所有高校的自主招生。

高考改革的推进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2010~2015年)

(1) 推行多轨化、分层次的学科知识考试改革。对现行高考实行多轨化改革,打破所有考生考一张试卷的格局,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学科和层次,高校在录取中可自主提出学科和层次要求。

(2) 制订“学业能力水平测试”方案并开展试点。由国家教育考试部门制订全国学业能力水平测试的方案,并选择部分地区和学校进行试点。

(3) 扩大985高校自主招生。目前实行的高校5%自主招生,考生的选择权十分有限。自主招生录取制度改革,应该朝着考生可拿到多张录取通知书的方向,通过增加考生选择学校的权利,加强学校之间在教学质量、管理和服务水平方面的竞争。

985、211高校的自主招生改革可采取两种方式推进。一是实行高校联考,比如985高校联考、211高校联考,在联考基础上对考生进行面试考查。自主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统一高考。二是采取“统一学科考试+自主招生+集中录取”的模式。在全国学业能力水平测试尚未推行之前,以统一高考成绩作为申请门槛,高校再分别进行自主招生。高考成绩公布后,高校提出申请成绩要求,6月底至7月底,进行自主招生录取。取消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等校的“零志愿”，考生可以平行申请4所学校，并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由高校进行确认后，将余下的招生名额投入集中录取。集中录取阶段采取原来的填报志愿方式。这种方式，用高考成绩保证基本公平，多张录取通知书扩大考生的选择权，学校两次录取，提高了资源配置率。

(4)地方本科院校采用传统方式招生。地方本科院校的录取，仍采用集中录取方式，即学校提出考生考试科目和层次要求，学校根据考生考试成绩与志愿，依次投档、录取。

(5)高职高专多种形式的自主招生。各地高职和专科院校，可根据不同情况自行确定考试和录取方式。

例如可选择：①在高三会考成绩基础上的自主测试和申请入学；②有关高校联合举行学科知识水平考试，然后自主招生；③参加全国统一的学科知识水平考试，然后自主招生；④办学质量优良的高职学校，可实行自主考试、自主录取。

2. 第二阶段（2015～2020年）

全国学业能力水平考试、学科知识考试并存，985高校、211高校可以采取“全国学业能力水平测试+高校自主招生”的方式，以全国学业能力水平考试为申请门槛成绩，自主录取学生，逐步扩大自主招生的比例。完成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集中高考。

高校可自主确定以何种方式，包括多次“学业能力水平测试+自主招生”或者“自主招生+集中录取”等，进行多次录取。高校实行学生可以拿到多张录取通知书的自主招生，必然面临教育资源无法一次充分配置的问题，而采取“自主招生+集中录取”的方式，可以通过多次录取，使教育资源有效配置。由此建立多次考试、多次录取的招生考试格局。地方本科院校的招生，以学科考试、集中录取为主，尝试向自主招生方向发展。

3. 第三阶段（2020年以后）

建立起多次考试、多次录取、自主招生、多元评价的招生考试新格局。

中国教育网7月18日讯：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今日公布该院最新研究成果《我国高考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据悉，这份出自民间研究团体之手的方案是目前公开亮相的第一份具有完整框架的高考改革方案。

该方案的提出者、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表示，正如其日前在“纪念中国恢复高考30年高峰论坛”上所讲，希望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的主题不能永远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适当的对恢复高考的感激、对高考制度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讴歌之后更多的应该是“从单纯的怀旧转向改革，转向未来，向前再走一步——哪怕半步！”

此方案的研究者们指其《方案》关于高考改革的基本价值：保障教育公平，全面评价学生；促进考试和选拔的多样化、多轨化、弹性化；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权，重视和扩大学生的选择权；促进高考多元化发展。

据杨东平介绍，该方案提出的目标模式是，以全国统一的学业能力水平考试为主，辅之以高中成绩、高中课外综合表现的多元入学评价；高校确定录取标准，进行加试和面试后自主录取。其基本模式是：基础资格考试+高校自主录取。

“整个《方案》的设计，突出体现了对学生权利的高度重视。”杨东平如是说。杨东平指出，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学生付费上学、自主选择业，已经成为教育购买服务中的消费主体。因而，以学生为本的制度设计，应该赋予学生更多的自主权。在招生方面，要求赋予学生更多的报考自主权和对高校的选择权。因为只有当学生有权选择高校时，才会真正出现高校为吸引优秀生源而改善服务的竞争。

杨东平表示，改革是大势所趋。提出这一方案，主要是提供一个可供公开讨论的文本，让不同利益的群体充分表达意见，从而达到消弭矛盾，形成共识，推进改革的目的。

据2010年3月13日《长江商报》报道，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12日举行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集体采访中，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表示，高考制度应当存在，但要逐步改革，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制度。孙霄兵说，“我们认为应当有一个高考的制度，包括全国统一高考。考试制度也是得到人民群众认可，保障教育公平的基本制度。”

高考成绩不是唯一依据。孙霄兵指出，高考制度必须改革，逐步形成分

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制度。要逐步实施高等学校的分类入学考试,改变全国本科、专科一起考试的制度。根据设想,在全国只进行本科考试,专科的考试在省里进行。同时,要探索高水平大学联考,进一步完善招生录取办法。今后高考成绩将作为一个重要的依据,但不是唯一依据。要把高中阶段的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

要实行多元录取机制。孙霄兵说,在高考的具体录取制度上,要实行多元录取的机制。对于统一入学考试的学生,还是要实行择优录取;对于有特长的,符合学校培养条件的,经过面试、测试自主录取;在高中阶段表现优异的,可以推荐录取;符合国家特殊需要的,要进行定向录取;有特异的才能,要实行破格录取。通过实行五个录取制度,来解决多样化考试的问题。此外,今后还要进一步推行社会化考试。在严格的法律法规保障和社会监督下逐步进行,并必须在试点和慎重地研究后,才能全面推开。

教育专家叶祝颐指出,“高考多元化改革需配套措施跟进。”^①叶祝颐认为,本科全国统考,专科、高职考试权下放到省里,让学生根据实际情况作出选择。应该说,这种多元化高考改革思路值得肯定。但是,如果考生参加本科统考,没有被本科院校录取,怎么办?是让他们再参加省里组织的专科考试,还是从本科统考中划定专科录取分数线呢?如果是前者,无疑会增加这部分学生的考试负担;如果是后者,专科分数线如何划定也是一个问题。

如果专科分数线过高,可能让部分考生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如果专科分数线过低,也会让人产生上不了本科上专科的印象,最后大家都去报考本科统考,本、专科考试分开可能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实行本、专科考试分离改革时,对这些细节问题应做出周到的制度安排。

高考制度恢复以来,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尽管有人呼吁“取消高考”,但是在高等教育尚未发展为大众化教育的现实语境下,如果没有更好的制度来完全取代它,仅因为它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问题就言彻底抛弃,并不现实。当然,我们应该承认,现行高考制度存在着一些缺陷,“以分数论

①《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新安晚报》2009年11月11日。

英雄”也不是教育的本意。对“一考定终身”的现行高考制度进行改革，确实很有必要。

叶祝颐认为，教育部提出完善招生录取办法，把高中阶段的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作为高考录取的重要参考，实行多元录取的机制，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改变传统高考模式，诠释了高考改革的方向。但是，在高考改革实施过程中，也要注重配套制度建设，完善高考评价机制，最大限度维护教育公平与考生利益。

比如，由于城乡发展、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农村孩子接受新生事物的机会较少，如果学业水平测试与综合素质评价计入高考总分，农村孩子在这方面的得分机会可能会相对较少，这个问题不容忽视。更重要的是，招生腐败，“分数不够钱来凑”的教训太多。把学业水平考试作为高考录取的重要参考依据，公信度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因此，相关部门对学业水平测试、综合评价造假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完善相关制度设计，制定明确合理、易于操作的评价标准，让相关评价在量化、公开的尺度下进行。避免因评价标准模糊、程序不透明，滋生腐败的隐患。这既是对高考评价者的考验，也是对高考改革制度设计公平合理性的考验。

高考制度到底怎么改，值得探讨与反思。叶祝颐认为，如果高考招生改革朝着维护教育公平、利于人才培养的方向发展；如果高考招生改革抛弃急功近利思维，循序渐进、不急于求成；如果高考改革相关程序放到阳光下暴晒，高考招生改革的诚信与公正会得到公众认可。

教育专家姜泓冰指出，“本、专科分开考试具破冰意义。”^①姜泓冰认为，本科入学考试由全国统一组织，大专、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下放到省里进行的消息之传播过程表明，整个社会的应试教育焦虑症丝毫未因这样重大变革的公布得到缓解。不知是因为百姓对已到“深水区”的教育改革很难了，还是由于家长和学生这些年来耳朵里早已灌满了有关教育改革、素质教育、减负之类的词语、口号，在一再重复的希望到失望循环中修炼到了“说什么

① 《本专科分开考试具破冰意义》，《京华时报》2010年3月14日。

都甬信”的境界？

对于本、专科考试分开的方案，许多人担心，不仅不会减轻、反而会增加一些学生的学业负担——在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提醒下，有多少家长会甘心允许自家孩子只参加专科考试而放弃一点对高学历的期望？结果很可能是，许多孩子被迫从本科到专科皆备考，受到“双重压迫”。这正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教育界各种减负改革所面临的尴尬处境。到中小学校去，最常听到老师和校长们抱怨：我们这边儿减负，家长那边儿就报班增负，其实家长也时时矛盾。高考制度不改，人人痛恨应试教育对孩子创造力和身心健康的折磨，高考改革，有了自主招生、特长加分之类，人们担心滋生腐败，造成对农村孩子、平民子弟教育权利的不公。

教育部有关人士因此而审慎地说，本、专科考试分开进行，目前只是设想，未到路线确定、已有成熟具体施行方案的时候。

姜泓冰认为，这“设想”足使人兴奋。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教育部对专科考试下放，看作是对近30年来持续不变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第一次冲破。虽然此前也有一些高校试点自主招生，但它只涉及部分地区少数考生，且实行7年，参加自主选拔考试的学生仍需挤过全国统考这一关，不论是对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还是学生减负，都无实际意义。

家长们对高学历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与多年来整个社会评价系统和人才培养体制设计缺陷有关。而将本、专科升学考试分开，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可以引导基础教育建设体系的逐渐分层、分流，帮助社会摆脱人才选拔和评价只重“高学历”的现状，真正实现多样化、多标准。

教育改革需要遵循教育自身规律，很难立竿见影。也许，本专科升学考试分开后，增负现象难免。姜泓冰认为，但若真能将教改纲要的种种“设想”落到实处，以综合力量推动，打破一考定终身、所有人同爬一座金字塔的可怕现状，建设一个让人民基本满意的教育体制，依然可能。不论此去多么难行，这样的图景都值得努力。

厦门一中校长助理、特级教师钟灿富认为，目前高考的升学率，专科以上的，福建省已达到70%；其他省份，有的还更高。国际上，这个数字从毛

入学率来看,已达到了普及水平。在这种背景下,专科的考试权下放到省里,可以稍微减轻学生的考试压力。但由于目前本科的录取率还比较低,为讲究公平,本科还是应实行全国统一考试。

专科的考试下放到省里,是否应组织单独考试?“专科可以组织单独考试,也可以不组织单独考试,估计届时组织单独考试的省份应该不多。”钟灿富建议,专科可以不用组织单独考试;专科的录取,可以与会考结合,与平时的一些权威性统考结合,如省市的统考、会考,此外还可以结合校长推荐等一些比较灵活的选拔方式。因为,减少一次考试,对学生、学校以及社会都会减少很多压力,也降低考试成本。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认为,全国一张卷子,从本科考到专科,从清华北大考到普通的高职高专,作为命题者,不太容易命题,考试也不容易拉开区分度。高考作为选拔性考试,应有一定的区分度,因为每个学生的特点并不一样,有的适合做学术精英,有的适合做应用型人才。

这种本、专科分开高考的模式,15年前就有人提过。这一观点,一直有人提出。此外,也有人提出,985、211工程的学校一张卷子联考,但相对而言,本、专科分开考,层次更分明。但一旦分开的话,多数家长和学生都会反对,更多的学生和家长还是希望一张卷子统一考,能够考好就上好学校,考不好再说。

本、专科分开考,2002年广西曾试验过,但最后以失败收场。当时做过试验,本、专科分两次考,大概只有10%的学生不考本科,直接去考专科,绝大多数的考生最后都考两次,造成家长和学生意见很大。如果本、专科分开考在全国铺开,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但相对而言,北京、上海等一些直辖市推行比较容易,目前北京、上海相当一批高职院校已没参加全国统考。刘海峰教授认为,“本、专科分开考,一定要先试点,然后在试点的基础上,再决定是否在全国铺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①

①《本专科分开高考?厦门家长多反对专家建议试点》,《海峡导报》2010年3月14日。

深入改革高校录取制度

高校对参与高考的中学生以什么样的方式录取,关系到考生的前途命运。随着高考制度的改革,录取制度的改革也势在必行。暨南大学袁忠群等专家对我国高校录取制度的改革提出的建议很具借鉴意义,其总体思路是:高校录取标准多样化,总体上共设以下五类,各类的录取名额按一定比例进行分配(比如各为20%,办学水平高的学校也可第一类的比例略高,而办学水平低的学校则可第五类的比例略高)。考前,学校依专业公布录取的学科类别、录取名额和具体要求。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运作方式:^①

1. 单科天赋奇高,实行特招。现在有些大学破格录取奥数优胜者和国家优秀运动员就是采用了这一方法。国家按高校的办学水平和类别公布统一的单科特招控制分数线。学校依专业公布录取的学科和名额。国家授予各高校特招学生的权利。特招生分两类:一类是保留各高校现有的自主招生政策和录取比例;一类是根据高考成绩确定的特招生。各高校可依各自所在的层次和学科教学需要对有特殊水平的学生,实施特招。特招生需经过录取学校的面试,录取结果均须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特招生不受任何其它分数线的约束。

2. 以核心学科成绩为主录取一定比例的生源。核心学科依学科大类而定。学科依其特点分成三大类:文科类、理工科类和国际交流类。文科类的核心学科是写作,理科类的核心学科是数学,国际交流类的核心学科是英语。说明一下,现有的基础学科语文应依其特点分成母语能力水平考试和写作考试两个层次。母语能力水平考试待后会有论述。

3. 以某一个性发展学科成绩为主录取一定比例的生源。这一部分的录取名额可全部留给统一高考的考生;对于有条件的学校,也可单独或联合举行一些个性化的考试,将部分名额用作录取这些特殊的学生,比如,名校的中文专业可举行古代音韵学和古代训诂学等单独考试,录取在古代“小学”的学习和研究方面有特殊兴趣和专长的学生,也可举行中国古代经

^① 《关于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两条建议》,《广东教育》2010年第1期。

典的单独考试，以发现国学基础特别好的学生。现在很多高校有特长生招生制度，新的高考制度可将这种特长生招生的范围适当放宽。国家鼓励有条件的高校不断扩大这一类的单独考试，但同时国家要对这一类考试严格审核和监督，避免弄虚作假。

4. 文科类分别以数学和英语成绩为主，理工科类分别以写作和英语成绩为主，国际交流类分别以写作和数学成绩为主各录取一定比例的新生，对写作、数学、英语水平较高的考生实施倾斜。这一标准的设定在于鼓励考生重视写作、数学、英语的学习。

5. 按多学科总分录取一定比例的生源。多学科总分可设定为按考生的核心学科成绩和另外三科成绩之和。这一标准的设定使各方面都均衡发展的考生有了更多的升学机会。

第三、四、五类的录取，各校可依各自的具体情况设定一个核心学科所应达到的基本分数线。

以上五大类又可在实际招生中进一步细化。每一类都可再按专业学科将录取名额进行细分。比如某校某文科专业准备录取第三类考生10名，学校可录取数学、历史、地理、哲学（或政治思想）、英语较优者各2名。

考生需要选考作为个性化竞争考试的科目在一科至九科之间。具体选考科目数与科目类别完全由考生依学习兴趣而定。考生选考科目数的理性做法应是首先尽可能将至少一门个性化学科学好，然后在此基础上量力而行多学几科。

录取标准的多样化，增加了高校招生自主权，使高校各专业依各自的需要录取到更为合适的学生。高校学生个性特征更明显，有利于不同类型的学生的相互促进。同时这也可激励青少年学生基础教育阶段的自由发展，更注重天赋潜能的开发，避免越来越明显的趋同化倾向。

多样化的录取标准使青少年可以完全依自己的天赋和兴趣去学习，以实现自由的个性化发展。录取标准的多样化也使优秀考生具有了多次录取机会。多样化的录取既鼓励了青少年写作、数学、英语的学习，又不因其中某些学科的不足而影响在某些方面有天赋的考生的升学。这种多样化的录取方式，表面看起来很复杂，似乎没有可行性，但实际上，在计算机被广泛运用于高

考招生的今天，这种录取方式非常简单，一点也不复杂。

我们认为，高校录取学生采取标准多样化录取方式，并不意味着高考录取完全没有严格的录取标准，也并不意味着放松对学生基础知识掌握程度的严格考量，同时也并不意味着增加录取工作的难度，而是通过构建一种科学合理、动态适变、切实可行的高考录取模式，在尊重学生个性、调动学生天赋、激发学生兴趣、挖掘学生潜能的基础上，既保障基础知识扎实、高考综合分数较高的考生得以录取，也为具有一定基础知识而又具有优异特长的考生提供录取的机会。可以说，这也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有效途径。

大学教育 步入单向度误区

大学教育囿于专业知识教育的定势，单向度、程式化教育状态依然严重，致使大学生难以形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此，必须冲破大学教育囿于专业知识教育的误区，使大学生能够真正成为社会栋梁。

大学教育牵动着社会的神经。大学教育的水平和成效，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发展状态优劣的重要标尺，也是展示社会文明进步状态的重要体现，是能否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杰出人才的重要领域。因此，大学教育历来备受人们高度关注。

新中国大学教育经过 60 余年的建设改革发展历程，不能不说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大学教育也仍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大学教育囿于专业知识教育的定势，单向度、程式化教育状态依然严重，致使大学生难以形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此，必须冲破大学教育囿于专业知识教育的误区，构建适应现代大学教育的新模式，以使大学生能够真正成为社会栋梁之材。

大学教育囿于专业知识教育的定势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虽然对大学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较大成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大学教育的发展。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大学教育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就目前的大学教育状况来

看，囿于专业知识教育的定势尚未彻底改变，不能不说是大学教育所存在的一大误区。

大学教育学科专业结构设置不合理，一些学校的学科专业过于细化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大学教育学科专业结构设置，主要是按照当时苏联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设置的，即所谓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苏联模式”。前苏联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主要体现为3大种类：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工业大学（或学院）及各类专科性学院。前苏联综合大学一般只设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相关专业，亦即一般具有文理综合性。前苏联的综合大学数量不多，但在整个高等教育中的地位较高。前苏联的多科性工业大学（或学院）数量也不多。在3种高校类型中，单科性学院数量最多。前苏联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几经变化，到1956年形成两个层次：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本科生教育的学制较为复杂，一般单科性学院学制为4年，医学院一般为5年；综合性大学和多科性工业大学学制以5年为多，有的专业甚至达到6年。在同一层次中仍有培养规格高低、培养面宽窄的区别。由于高等教育长期实行国家强制性和行政命令性的管理体制，前苏联高校的教学计划、大纲及教材的制定或编写一般是集体劳动的产物，因而有一定的全面性、系统性和统一性。但正因为是国家强制性、行政命令性，使得作为执行者的教师和学生个人灵性、意趣、风格等受到限制，个性被模糊，创造性被抹平。这种过程如同大工业生产，在生产批量产品时有效，因而它在前苏联高教猛增规模时曾起作用。然而教师和学生各不相同，特别是创新性人才的创新性各不相同（相同不成为创新），因而这种模式制约了高层次的创新人才的出现。在苏联高等教育中，无论是综合性大学，还是多科性工业大学（或学院）及各类专科性学院，其学科专业结构设置都是在专业细化的定势中形成的，导致了大学教育学科专业结构设置不合理，学科专业过于细化。这种不良状况，长期影响了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设置，一些学校在很大程度上也出现了学科专业过于细化、学科专业结构封闭僵化的状态。

大学教育现实功利主义严重，一些人对教育价值取向狭窄单薄

有人认为，回顾 60 余年的教育发展进程，改革开放前的整个大学教育被明确地确定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纯粹的政治权力的附属物与传播意识形态的阵地。改革开放后，大学又被赋予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因而在政治功利主义之上，教育又具有了极强的经济实利主义价值。无疑，现实功利性价值与非现实超功利性价值是现代大学教育始终存在着的相辅相成之两翼。但在实际中，其现实的功利价值常常被片面地理解为大学的唯一功能，令大学教育始终游移于政治功利主义和经济实利主义之间。对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虽然并没有全面正确地把握大学教育的状态，具有偏激的情绪。但是，上述认识也指出了大学教育现实功利主义严重、教育价值取向狭窄单薄的问题。这里，我们看看著名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在其名著《大学的理念》^①中认定的大学教育应蕴涵的价值取向：大学教育应当是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提高公众的智力修养，纯洁国民的情趣，为大众的热情提供正直的原则，为大众的志向提供确定的目标，扩展时代的思想内容并使这种思想处于清醒的状态，推进政治权力的运用以及使个人生活之间的交往文雅化。我们认为，约翰·亨利·纽曼的深刻认识对于把握大学教育价值取向具有重要启迪。

缺乏引导对知识积累的精神升华，一些大学生的素质难尽如人意

大学生是大学教育的“成品”，其表现优劣，直接反映着大学教育的效果。近年来发生的诸如刘海洋伤熊、马加爵杀人、“欧丽曼”传销及一些类似事件一再表明，一些大学生在大学中也许获取了某种专门的甚至是广博的知识，但却没有从知识的积累中升华出一种良好的独立思考判断是非的能力，沉淀一个深沉丰富的精神世界，塑造一种和谐健全的人格，形成一种对法律起码的敬畏意识及自律意识，确立一种为与不为之间严格的行为准则或者起码的道德底线，养成良好的公民素养。就是说一些大学生还没

① 《大学的理念》，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有深入人心地接受诚实守信、友爱宽容、自尊自重、法律信仰、守法护法等人类文明中基本的价值理念,公民应有的基本行为准则,并使之真正成为学生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恰恰正是这些,可以构成一个人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衡量识别正误是非美丑善恶的价值尺度,构成避免误入歧途的强大的精神防线。理性自律、正直守法、诚实向善等优秀品格的缺失,使一些大学生在面临某种不良社会现象或潮流的诱惑冲击时,常常不仅不能明辨是非,理性行为,反而是为泥沙俱下的潮流裹挟其中,随波逐流。一些大学生素质的难尽如人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目前我国大学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与危机的外化。

人才培养模式发生变异

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刘尧指出:“1999年以前,我国大学生总量少,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具有浓厚的精英意识,这种意识很好地促进了大学生的学习和发展。1999年以来的大学扩招,高等教育大众化后,特别是巨大的就业压力驱使大学以就业为导向,家长和学生也越来越把高等教育看作职业培训。大学生的精英认同感越来越淡薄,精英教育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稀缺资源。从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中山大学的博雅学院,到一些大学把高尔夫球列为学生的课程,以及家长争先恐后地把孩子送进各种礼仪培训班,这些举措无一不在昭示着人们向往的精英教育。社会对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多样化需求,确实提出了高等教育如何处理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双重使命的关系问题,如何开展精英教育已经成为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①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是否还需要进行精英教育?刘尧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精英教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即便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之后,精英教育也是不能停歇的。但是,对于如何开展精英教育,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与误区。比如,有许多大学将“学打高尔夫”作为精英教育内容。对此,舆论一片哗然。熊丙奇教授指出,怎么也看不出,“精英”与高尔夫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于海教授说,认为会打高尔夫球、会优雅地喝咖啡、会绅

^① 《走出精英教育误区》,《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25日。

士一般地吃西餐就是社会精英，显然是一种荒谬的“伪精英意识”。这样的精英教育逻辑太过肤浅，如果只从表面风度与生活方式上去理解“精英”，精英教育也就成了对物质时尚与潮流的追捧，大学有成为美容机构或礼仪学校的危险。如此的精英教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精英教育，而是一种低劣化的教育，必须引起人们高度警惕！

单向度、程式化教育状态严重影响大学教育

单向度教育就是在既定的思维模式中以单一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实施其教育活动；程式化教育就是在固定的教育框架中以封闭的教育过程、教育方式，实施其教育活动。就目前的大学教育来看，单向度、程式化教育状态依然较为严重，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影响了大学教育的良性发展。

大学教育内容单薄，教育教学视野狭窄

有学者认为，由于对大学教育功能片面狭隘的理解与定位，我们的大学教育长期被一种现实功利主义的思维支配，教育内容狭窄单薄，缺少深厚的科学精神和人文内涵，有着极其强烈的专业单向度倾向，与本应丰厚丰盈的以陶冶人格、开阔视野、传承文化、知识创新等为宗旨的广博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教育相异甚远（文科教育中存在如此状况，理科教育更为严重）。一些学校在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取舍上，总是试图把学生思路圈进预定的狭窄小道，有意无意地陷入了一种唯我独尊、封闭禁锢的状态，试图把个性迥异的青年放在一个模子里，塑造成毫无差异的可供随意取用的砖头。一些学校高高在上、远离尘嚣、空泛不实的思想教育实际上连基本的公民教育目标都很难达到，难以培育出学生立足社会应有的公民意识，不能使之正确认识社会的复杂性，自觉地守法护法，保护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当然也难说通过关注社会及学生个人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关注他们心灵的发育与成长，呵护青年的至情至性，引导青年塑造健全人格，砥砺青年的独立践行精神。更谈不上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具有尊重、关注个体生命的人道意识，促成学生去认识和体验人类一体、去关注人类的

共同命运、尊重人类的共同规范的精神，引导学生尝试与不同民族和文化相互沟通、理解和彼此尊重。

大学教育专业定位不准，课程设置落后脱离现实

民盟中央常委、北京新东方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在2010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时谈到大学教育问题指出，大学四年应该认真学习，把自己的底蕴变厚。俞敏洪说，我说的学习当然不是脱离社会现实的学习。面对中国大学的课程设置我也是比较迷茫的。中国大学一方面讲就业问题，一方面很多的课程设置脱离社会现实，并且是落后的，知识更新速度是不够的。其实一般大学课程的设置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是研究性人才的方向。这个研究性人才的方向不一定是为了某一个具体工作岗位，赚大钱的岗位，而是出来以后，研究某个领域的高精尖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知识的。国家现在应该给予（这方面人才）大力的资助。二是实践性的人才，也就是这个专业设置的时候，就是为了未来一个很好的岗位做准备的。现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大学生毕业以后找工作，到处递简历，但是挑人的单位挑出的人才却很少的情况，就是大学教育与现实脱节的明显的证明。俞敏洪说，我这儿每年收到的大学生的应聘简历大概至少是十万份，我们中间能挑出的马上能用的人才最多是一两千人，其余至少要经过半年左右的培训才能上岗，也就意味着大学教育是脱节的，一方面鼓励创业，一方面教育又脱节，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大学招生考试存在弊端，难以测评考生素质能力

高等教育研究专家顾春梅在《大学到底要什么》一文中指出，2010年全国名校的自主招生考试已落幕，其试题延续了与高考不同的“另类”风格，一如既往地引来了各界热议。争论的焦点无非是些老调重弹：有考生和家长反映，被那些偏、难、新、奇的试题“雷”到了；有中学教师抱怨，这样的考试令中学教育无所适从。高校的回应则是，选拔本来就不是以中学教学为中心，而是以大学各自的要求为标准。那么，“大学各自的标准”究竟在哪里、是什么呢？翻遍各大名校的招生简章，似乎找不到所谓的标准。有的只

是对招收对象的要求,比如“优秀”、“综合素质高”等抽象字眼,或者是对报考条件的罗列。理论上讲,标准应该体现在对考试的规定之中,然而各高校对考试的说明实在少得可怜,除了考试的科目以外,你一无所知。这也许正是高校想要的效果。因为,学生知道得越少,越没法准备,就越能考查平时的积累,从而使一切题海战术和应试教育彻底失灵。可如果真是这样,高考的考纲早该先扔掉,应试教育也应该彻底改革。

考试是一种测量工具,好比尺子。尺子如果没有刻度,就无法丈量长度。同样道理,自主考试也应有纲可循,否则命题者难免就兴之所至,甚至随心所欲了。比如,某高校特色模块考试的作文题是:要求对台湾诗人林亨泰《二倍距离》这首颇具后现代色彩的诗歌——“你的诞生已经/诞生的你的死/已经不死的你/的诞生已经诞/生的你的死已/经不死的你……”进行鉴赏。有学生称看了30遍都没有读懂。如果是为了显示出题者的“匠心独运”,那么它做到了。有人认为出题者“创造性地把奥数题搬进了语文考试”。唯一让人弄不明白的是,它到底想考查学生哪方面的能力?如果想考查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和独到的见解,就不应该设置如此高难度的审题障碍,因为这样一来很难分清学生的失误究竟是因为看不懂,还是因为没有表达和思考的能力。据校方称,这道题并不是没有高分,我们很希望校方能将得高分的答案公之于众。但在高等教育研究专家顾春梅看来,“不知目标为何物的试题是无效度的,依据无效度的试题转换出来的分数也是没有参考意义的。”^①

公平性是考试的底线。那么,自主考试的“超纲”之举,是否如高校所言使考生无法投机取巧而只能靠平时积累,所以就格外公平了呢?我们不妨推敲一下。首先,考试的时间和长度有限,所以不可能包揽一切知识和能力的考查,而只能做抽样。如何进行抽样?如果不是在约定的范围内抽取,而是根据命题者的偏好来决定,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为什么我必须答对这几道题而不是有可能的其他试题?如果考生在平时花了很多工夫刻苦学习,但长期的积累恰恰没有在寥寥几道试题中被考到,因而得不到高分,这是公平

^① 《无学术大师时代的文艺学危机》,《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24日。

吗？这源于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的看法：考试大纲无非就是知识点的罗列。事实远非如此。世界各地几乎所有规范的考试都有大纲，它们不会把内容规定细致到具体的知识点，但是会给出大致的范围，或者根据自身的定位对所考查的能力做出界定和解释，或者分批次公布样题。自主考试比高考更有空间做到这些，这才是它的真正优势所在。然而，高校是否已经做好准备，考虑清楚自己究竟想要选拔什么样的学生？高校要做的不是一遍遍强调大学的要求与中学的不同，而是应该找出这些不同，定义这些不同。自主考试与其一面在试题形式和考试模块上大做文章，一面在考试理念上大开倒车，回到最原始、最粗放的状态，不如花些力气把符合自己定位的考试标准制定出来，解决目前有效性和公平性的基本问题。

“多而空”、“窄而离”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导致了学生知识不扎实、学风空疏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著名文艺理论家曹顺庆教授从分析文艺学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入手，在《无学术大师时代的文艺学危机》一文中深刻指出：“随着钱钟书、季羨林等学术大师的离去，我国几乎没有再产生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造成这种无大师时代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从文艺学研究生教学视角分析，‘多而空’、‘窄而离’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导致了学生知识不扎实、学风空疏。”^①所谓“多而空”，就是研究生课程设置得太多、学习效果不明显。所谓“窄而离”，“窄”是指高校学科越分越细，专业越来越窄。这种教育方式培养了很多精于专业的“匠”，却少了高水准的“大师”。

曹顺庆教授指出，由于整个课程设置都直接围绕学科来设置，这样一种方式对学生本专业的知识是加强了，但对学生的学术视野训练却是不利的。专业教育应当在加强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要有一种大学科意识，掌握博与专的关系，做到以专带博，以博促专。所谓“离”，是指我们读的一些东西离原著太远。仔细琢磨一下学术大师的成功之路，他们大多具备厚实的基础，这

^① 《大学到底要什么》，《解放日报》2010年1月28日。

个基础就是他们精通古文元典、精通外语文献,这就能使他们做到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就文艺学专业研究生来看,目前在读的文艺学研究生们多少会学一点《诗经》、《楚辞》、《论语》、《孟子》,但这种学习方式有些走样,学生的读本很多是古文今注今译版本,而并非直接用文言文阅读文化与文学典籍原文,这使得学习与原著隔了一层;读西方的文艺理论,多半是翻译过来的二手货,在基本看不懂外文原文或者干脆不读外文文献的情况下,就夸夸其谈地大肆向国人贩卖国外的理论。曹顺庆教授认为,不是说不可以参照译文来研究,而是强调应该尽量阅读外语原本,因为不读原文,一定会出问题。遗憾的是,不少学生依然使用厚厚的二手货贩来的“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中国式的西方文论专著。可想而知,在这种“多而空”、“窄而离”的教育方式下,只会造成学生知识不扎实、学风空疏,不可能产生学贯中西的大师。这种状况,不仅在研究生专业学习教育中严重存在,就是在本科学生专业学习教育中也同样严重存在。

大学教育的淘汰机制不健全,难以真正形成优胜劣汰的局面。据《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10日以“撬动中国顶级教育制度锈轮”为题报道:“2009年夏,南开大学又有33名博士生,因学习超期未达到毕业要求而没有戴上博士帽。这使得自2006年在全国率先打破博士生‘零淘汰率’以来,南开大学淘汰的博士生累计共达168名。此举彻底扭转了‘考上博士生就等于拿到博士学位’的观念并引发学界内外激烈讨论。喧嚣过后,由博士淘汰制所引发的对中国最高级别教育制度的种种叩问,则更值得我们冷静反思。”^①首先值得冷静反思的问题是:学业年限应否成为淘汰标准?南开大学打破博士生“零淘汰率”,本应是博士人才培养的常态。但据悉,该校淘汰的主要是那些学业超长延期的“研久生”,南开大学规定,博士生的学习年限不得超过6年,到期仍不达毕业要求则遭淘汰。前几年南京大学也曾出台政策规定对到当年底读满8年仍未毕业的博士生一律清除、退学。“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上海交通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存在着教学资源有限的问题。年限本不应是博士生考核的重点。”山东

① 《撬动中国顶级教育制度锈轮》,《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10日。

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张会杰认为,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在于知识的广博和精深的研究,而这一目标的达成需要相对宽松的时间来保障,学习年限不应该成为博士生淘汰与否的标准。

另一个值得冷静反思的问题是:现行导师终身制问题重重。博士生导师对博士生培养的重要性,相对于淘汰机制本身毋庸置疑,因而完善现行的博士生培养制度更是亟待重视。只是单方面地对博士生进行淘汰,却对一些不具备培养资质的机构和导师实行终身制,淘汰机制就会失去应有的积极意义。集美大学张永汀认为,只有建立有效的博士生和导师双淘汰制度,方能充分发挥淘汰机制的作用。

构建适应现代大学教育发展的新模式

构建适应现代大学教育发展的新模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在构建适应现代大学教育发展新模式过程中,需要深刻认知和切实解决的问题很多。我们认为,针对目前大学教育现状和发展来看,尤其需要进行如下深入思考:

强化现代公民精神,构建适应公民社会需要的大学教育模式

公民社会,是指对应于吏治国家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是一种相对独立于吏治国家的由各类自主、自治、合法、非政治的民间组织和团体构成的社会力量。它与制度现代化的另外两个组成部分——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而相辅相成。相对自由的公民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一个“公共领域”,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就他们关心的各种公共问题发表意见,针砭时弊。公民社会遵循正义的逻辑、良心的逻辑、知识的逻辑,而不是强者逻辑、权力逻辑、金钱逻辑。公民社会是政治文明国家的体现,公民社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治,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防范公共权力对人权的侵犯,是培养和深化如守法护法、宽容、温和、愿意合作、尊重不同观点、追求自己的权利、尊重他人权利等民主法治文化价值的重要场所。2009年1月15日,由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编的首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发布。该

蓝皮书凝聚了包括俞可平、高丙中、袁瑞军在内的20余位著名学者的三年学术努力,虽然20多位学者所论重点各不同,但是他们都承认一点:中国已经迈进公民社会。而在2008年底,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也似乎将关注点落在公民社会身上:《社会蓝皮书》主编、2009年《社会蓝皮书》主报告李培林表示,今年比较明显的新现象就是公民社会发展很快,公民意识显著增强。学者们似乎都提倡(至少不反对)将2008年作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当然,即使是学界,也有不同意见:就在北大相关研究部门和学者正在筹备发布他们的蓝皮书的同时,清华大学NGO研究所也刚刚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的研究成果,来自清华的观点则明确表示:“中国离公民社会还有很大的距离。”

大学是公民社会建设的重镇,在发挥公民社会的积极功能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殊重要作用。强化现代公民精神,构建适应公民社会需要的大学教育模式,就是应当在大学教育中努力通过坚持合理的教育自主、学术自由、知识的崇高地位、教育的世界性以及人格本位的教育原则而履行其公民社会的重要职责,并且在此过程中,生成自己独立的、清白的、身正声朗的、凛然无畏的、直面权力与诱惑的高贵品格;孕育自己自主自治、开放宽容、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秉持理想、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新知等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特质;进而又努力通过将大学精神真正赋予其受教育的学生,通过积极的科学与人文并重的教育实践,培养出具有良好精神素养的优秀现代公民而引领社会。因此,大学作为公民社会建设的重镇,其自身就应当具有适应现代公民社会发展要求的教育价值理念、组织结构、制度安排、运行机制和师资队伍,切实消除行政化管制的弊端,把强制化、简单化、科层化的教育管理模式转变为能够真正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的、适应现代公民社会发展要求的民主化、科学化、持续化的现代大学教育新模式,进而在推动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发挥其特殊重要作用。

树立正确的精英意识,构建良好的大学精英教育模式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是否需要进行精英教育?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刘尧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精英教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

至关重要,即便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之后,精英教育也是不能停歇的。什么是精英?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周志成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事物之最、身居高位者;二是能力绝佳、拥有资源者;三是理想远大、追求完美者;四是德才兼备、品行俱佳者。用三个字概括,一是强调精英的“质”,事物之最,德才兼备;二是强调精英的“量”,高居塔尖,数量极少;三是强调精英的“实”,实有地位,现有贡献。当前存在的问题是:过于注重精英的显赫地位,过于注重精英的现实存在,忽视潜在的精英素养或精英意识。就精英教育而言,从词意理解,就是培养精英的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中具有双重含义:一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教育阶段。二是以培养社会精英为目的的人才培养模式。有人说,精英教育是培养具有高超专门知识与强烈责任感人才的教育;也有人说,精英教育是建立在高等教育总量基础之上的、由精英教育机构承担、具有质的规定性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综合各家观点,精英教育是以培养精英为目的,贯穿于教育全过程(学前、小学、中学、大学)、全方位(家庭、学校、社会)的人才培养模式。因为,作为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具有“量”的规定性,标志着少数人在享受教育的权利,但培养的并非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精英;作为培养模式的精英教育具有“质”的规定性,着重培养社会需要的精英。从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意义来说,量的发展是阶段性的任务,而质的发展则是历史的、长久的任务。美国社会学家特纳将精英培养模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美国式的“竞争流动模式”,即将选择过程尽可能地推迟,所有人都可参加公开竞争,最后产生少数精英;另一种是英国式的“庇护流动模式”,即在文法学校实施早期淘汰机制,胜出者接受专门的精英教育;法国只有那些高中毕业会考的佼佼者,经过大学预备班的洗礼之后,才能登上大学这一通往精英的坦途。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吴祚来认为,无论具体过程是怎样的,从上述精英教育模式中不难看出,精英的产生离不开激烈的竞争和艰苦的历练。如果我国的精英教育只局限于展示精英优越的生活,这无疑是危险的。因为,这种精英教育传递给学生错误的讯息,使学生被精英奢华的生活所迷惑,而忽略精英产生背后的激烈竞争和艰苦历练。

如何开展精英教育呢?精英是德才兼备的顶尖人才,精英教育是培养精

英的教育模式。有论者从“时态”的角度提出精英与精英教育的区别：精英是现实社会的精英，是现在时；而精英教育是一种培养精英的教育活动，这种精英是理想，是将来时，而非现实。既然是将来时，那么精英教育培养的是“隐性精英”，他们可能发展成为“显性精英”，也可能成为永远的“隐性精英”。这就是说精英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精英，其途径是选拔具有精英潜质的人才，通过对其“精英素养”的培养使其成为“隐性精英”。“隐性精英”能否成为“显性精英”，还有其他许多社会因素制约。但是，精英教育的着力点是培养“精英素养”，这一点是肯定的。

关于培养“精英素养”，简而言之就是从德才兼备入手，进行全面的艰苦历练。具体讲，一要培养其强烈的精英意识，目标远大，意志坚强，能够朝着理想孜孜以求；二要培养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关注民生，关心他人，能够带领团队共同奋斗；三要培养其扎实的业务功底，善于学习，勇于创新，能够引领所处领域发展进步。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刘尧深刻指出：“从根本上讲，培养精英，教育者首先要从整体上把握精英对社会的价值与意义，而不是培养学生表面风度与生活方式。”^①渴望成为精英的人也要明白，精英首先需要“精神”，在担当社会责任方面要有“英雄”的风范，在创新与社会思想进步上有所作为。

以拓展知识视域为纽带，构建科学合理的大学课程结构体系

课程结构是学校教育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指出，从产生模式上看，课程结构会受到教育制度结构、教育观念结构和培养目标的影响和制约；从具体内容上看，课程结构的这一认识是从课程结构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位置、其本身运作的动态系统来看的，表明了课程结构制定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相关因素，以及在课程结构制定以后，相应的影响因素等。对课程结构的认识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概括来说，宏观的课程结构着重于对各级各类学校中具体课程设置的研究；中观的课程结构着重于研讨所设置的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而微观的课程结构则重在

① 《走出精英教育误区》，《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25日。

探讨学科内部各知识的体系化组织及不同领域知识之间的关系。因此,课程结构是指在学校课程的设计与开发过程中将所有课程类型或具体科目组织在一起所形成的课程体系的结构形态。这种形态的形成以既定的课程目标和各类课程固有的价值为依据,以此所确立的课程明确了各种课程类型以及具体科目在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差异和比例关系。换句话说,课程结构是课程内部各要素、各成分、各部分之间合乎规律的组织形式。它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根据课程目标设计什么课程,以及如何设置这些课程等,处于课程体系的核心位置。从不同角度出發,可以对课程结构进行不同的划分。如以教育目标为标准形式的课程结构,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技能教育等几个方面;以学生的心理发展标准的课程结构,包括认知类的课程和情意类的课程两个方面;而从课程决策的层面来看,课程结构中包含着理想的课程、正式的课程、领悟的课程、实行的课程以及经验的课程等;从知识的不同性质来看,课程结构中则有学科课程、活动课程、综合课程和潜在课程的划分等。

以拓展知识视域为纽带,建构科学合理的大学课程结构体系,就是要通过系统深入的整体分析,正确把握大学教育课程结构中课程质的结构、课程类的结构与课程量的结构的合理关系。具体来说,在课程质的结构中,应以自我发展课程为主线,统摄人格教育课程、实践教育课程、知识教育课程以及情感教育课程,这五种课程各自发挥自己的功能,并且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立体式的网状结构;在课程类的结构中,把握课程体系在课程组织形式上的特征,提出不同的课程类型,一般包括分科课程、综合课程、活动课程和隐性课程等,也包括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等;而在课程量的结构中,则是从对各类课程的具体落实情况出发,考察它们各自在不同类型高校以及该类型高校中所占的比例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适宜的课时数、开课阶段和开课方式。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于任何一个层面的课程、任何一种类型的课程而言,它都有着形式结构和实质结构,其外在表现形式是可观的、易观的,但更重要的是认识到其内在的组织方式,即其实质性结构。因为课程的形式结构只是课程的外部存在形式,是课程的“躯壳”;而其实质结构才决定着课程具体的

内容、性质以及价值，是课程的“灵魂”。就目前大学教育课程结构体系来看，不能不说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系统性、规范性。然而，就是由于以往过度强调课程结构的系统性和规范性，致使课程结构出现了两个严重缺陷：一是开课数量过于庞大，二是课程内容空泛。为了多开课，也为了满足学生专业学习需要，很多学校会提供一份含量很大、可供学生自由选择的课表。然而，仔细一看，课程很多内容是大而空的，即开设的课程不少内容是重复的大而空的概论性课程。对此，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曹顺庆教授指出：“课开得再多，如果落不到实处，就等于没开，而且会浪费一些原本有自己学术理想追求的学生的时间。”因此，该取消的课程一定要取消，该合并的课程一定要合并，适当增设一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课，适当增设一些适应拓展知识视域的通识课，适当增设一些适应开发个性潜力的选修课，真正构建一种具有科学性、多样性、自主化、个性化的整合互动、适时调控的大学教育课程结构体系。

深入改革考试评价制度，建构科学合理的大学教育淘汰机制

自从2006年在全国率先打破博士生“零淘汰率”以来，南开大学淘汰的博士生累计共达168名，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和讨论。学业年限能否成为淘汰学生的标准？导师又如何实行淘汰？这些都是建构科学合理的教育淘汰机制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学者认为，可以借鉴西方高校的“过程淘汰”机制。相对国内限制学习年限的做法，西方高校对博士生主要采用“过程淘汰”。美国高校博士层次的人才培养，要实现博士生（Doctoral student）到博士候选人（Doctoral candidate）再到博士（Doctor）的角度转变，博士生必须在指定时间内通过相当严格的中期考核，才能成为博士候选人，这个过程的淘汰率大约为30%。要拿到博士学位成为博士，其博士论文还必须符合极为规范的学术标准并通过同行专家的盲审。

南开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佟家栋表示，南开大学也在计划完善博士生的淘汰机制，将其从出口淘汰向过程淘汰转变。佟家栋指出：“实行过程淘汰，标准的客观性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主观的东西太多，容易造成拉关系走后门的问题。”实际上早在2003年，清华大学就已经对博士生培养采取了

“过程淘汰”的做法,该校经管学院的博士生必须先完成两年的学习课程,其间学校要对其进行两次资格考试,考试全部合格才能开始做博士论文,否则就将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但是,时任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的陈皓明教授也表示,因为要涉及淘汰后的博士生出路等问题,“怎样建立这样的淘汰机制还需研究”。

此外,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导师淘汰机制,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正如集美大学张永汀所指出,只有建立有效的博士生和导师双淘汰制度,方能充分发挥淘汰机制的作用。有学者提出,应当改革既定的“欧式的单一导师负责制”,与“美式的集体决策、共同管理导师制”结合起来。也有学者提出,应当改革论资历评聘博导的传统做法,允许有科研业绩和科研能力突出的副教授担任博导。郑州大学校长申长雨教授指出:“博导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个承担博士生培养的重要岗位。允许有科研业绩和科研能力突出的副教授做博导,就是要打破原有的观念,凸现博导的岗位属性。”

此外,还应当深入改革考试评价和退学转学制度。有人认为,我国近年在博士生招生规模“大跃进”的同时,考评标准仍十分单一甚至死板,主要以发表论文的硬性规定来衡量,而对于各学科自身培养特质等却失之考虑。据了解,目前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生必须在指定的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2~3篇论文。反观欧美博士生教育,却并非如此。中国政法大学郭世佑教授指出,在欧美许多国家的博士生教育中,“学校并不对他们在在校期间发表论文作硬性要求,在程序符合的情况下,授予学位的主要依据甚至唯一依据就是学位论文本身,学校并不需要靠他们现在就发表论文去争取排行榜上的好名次,更不存在降低质量标准的绿色通道与形形色色的人情交易、权学交易或钱学交易。唯其如此,博士生培养质量就无需别人操心了,博士学位就能作为畅行天下的品牌。”^①

鉴于此,有学者建议降低甚至取消发表论文的要求,让博士生能够集中时间精力开展创新性的研究。同时,对应于博士生淘汰制,更需要有“重新进入的合理制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

^① 《博士生教育之患》,《南方周末》2005年5月5日。

出：“必须探索学生退出机制，即所谓自由转学制度”，“而构建这种自由转学制度，又必须打破升学考试制度”，否则，依据招生计划、升学考试分数实行的学生录取方式，将制约学生的转学。熊丙奇还指出，在美国高校，新生留校率是评价一所大学的重要指标之一，淘汰不仅是学校的优化机制，也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竞争机制，所以，“只有不断探索基于高校自主招生的申请入学制度，才能构建起高校的自由转学制度与‘宽进严出’的淘汰制度。如若升学计划体制不变，高校所探索的单方面淘汰制，将难以走远。”^①因此，深化改革升学考试制度势在必行！

① 《撬动中国顶级教育制度锈轮》，《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10日。

继续教育有名无实

继续教育成了专为技能补课的工具，继续教育的功能大为弱化，致使继续教育陷入职业场所技能培训的泥潭。因此，必须冲破继续教育专为技能补课的误区，全方位构建有利于终身学习的新体系。

俗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

继续教育就是帮助人们活到老学到老的一种重要学习教育途径。继续教育是从20世纪80年代蓬勃兴起的新型教育。继续教育观是对传统教育观的极大丰富和发展，是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理念，是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专家指出，继续教育（further education）是指已经脱离正规教育，或对参加工作和负有成人责任的人所接受的各种各样的教育，也可以说是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知识更新、补充、拓展和能力提高的一种高层次的追加教育。具体说来，继续教育包含了以下四种含义：第一，继续教育是一种非学历的成人教育；第二，受继续教育者在年龄上、学历上或专业技术上已达到了一定的阶段、层次和水平；第三，继续教育的内容是新知识、新技术、新理论、新方法、新信息、新技能；第四，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更新补充知识，扩大视野、改善知识结构、提高创新能力，以适应科技发展、社会进步和本职工作的需要。

继续教育理念就是现代世界教育所倡导的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或终身教育（lifelong

education) 理念,是当今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继续教育研究专家高文书指出:“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类的预期寿命也在不断延长,从而对学习的需求和渴望不断增长,这是终身学习理念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与此同时,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高新科技的不断涌现,使劳动者不断面临增长知识、提升技能的压力,唯有不断学习,才能顺利、稳定就业,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此外,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各国为提升本国竞争力,纷纷将加强对本国人民的教育和培训作为重要的竞争手段。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终身学习和终身教育的理念逐渐形成和发展,并成为当今世界教育思想的主流。”^①

然而,目前许多人却并不了解继续教育的丰厚内涵,或者曲解了继续教育的真正含义,因而导致继续教育陷入了极大的误区,走向歧途。这其中的突出表现,就是把继续教育作为专门为技能补课或文凭补课、学历补课的工具,继续教育的功能大为弱化,致使继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职业场所技能培训、滥发文凭和各类证书、抢夺生源大战的泥潭。

继续教育成了专为技能补课的工具

由于并不了解继续教育的丰厚内涵,或者曲解了继续教育的真正含义,因而把继续教育当作专为技能补课的工具或手段。下面,是某县对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常见知识问答,我们从中就可以看出该县对继续教育的理解和要求在“继续教育对象”、“继续教育任务”、“继续教育内容”等方面所存在的一定缺陷: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常见知识问答

关于继续教育对象

1. 哪些专业技术人员需要参加继续教育?

^① 《终身学习视角下的中国继续教育现实需求分析》,《继续教育研究》2009年第5期。

全县所有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专业技术岗位工作的人员(不含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人员)都要参加继续教育。

2. 已评聘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是否还需要参加继续教育?

继续教育是专业技术人员的义务,只要是在职人员都需要完成规定的学时任务。

关于继续教育任务

3. 专业技术人员每年的继续教育任务有哪些?

每年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含公共科目和专业科目)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累计不少于72学时;初级专业技术人员累计不少于40学时。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实行学分制的部门,按照经人事行政部门认可的学分制度执行。

4. 学时任务是否一定要按年计算?

原则上是按年计算,公共科目必须完成年度学时任务,专业科目可根据学时折算办法在一个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周期内的学习时间可以分散使用,也可以集中使用。

关于继续教育内容

5.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内容包括哪些?

公共科目和专业科目。公共科目是指要求全体专业技术人员应该掌握的通用知识和技能;专业科目是指本岗位的基本业务知识,本专业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本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职业规范等。

关于继续教育形式

6. 公共科目的学习形式有哪些?

公共科目的主要学习形式是网络远程教育,辅之现场讲座等形式。

7. 专业科目的主要学习形式有哪些?

由本行业、本系统、本单位组织的各种培训、研修、学术活动、考察、进修、远程教育或非达标性学历学位教育;经本单位认可的有考核的自学成果等。

关于继续教育证书

8. 继续教育证书有哪些用途? 如何办理?

《证书》是用于连续记载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情况,并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以及职业资格再注册的重要依据。《证书》由单位统一到县人事局职称科领取,由专业技术人员所在单位人事教育部门或人事代理机构填写、编号、贴照片,统一到人事局职称科加盖钢印后发给专业技术人员本人保管。

《证书》一般以本人身份证号作为证书编号。

9. 继续教育证书如何登记?

专业技术人员每次接受继续教育后,应及时提供有关参加学习培训的有效证明材料到施教机构或主管部门(单位)在本人持有的《继续教育证书》上登记继续教育学习的内容、形式、起止时间、学时以及考核(考试)结果等,并加盖印章。

10. 专业科目继续教育学时折算规定有哪些?

①参照继续教育课程或科目指南所列范围内培训、进修或研修,以及参加经单位组织批准的各科学习,均按课程或内容规定学习时数按实填写。

②参加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脱产、半脱产培训或进修,按每日5学时折算。

③单位举办的学术、技术讲座,参加人员按实际听课时间凭组织单位开列的证明折算学时。

④参加国家或省组织的高级研修班,凭结业证书,每次计算5学时。

⑤出国考察、讲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出国留学进修、持考察报告或总结,时间在一个月内的计10学时;一个月以上的计15学时;一年以上的记30学时。

⑥参加各种在职对口学历教育,在规定的学制年限内,视为完成专业科目继续教育任务;参加全国统一自学考试的,凭单科考试合格证,每门计8学时。

11. 什么是继续教育证书的签证?

《证书》的签证是单位主管部门对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情况及登记工作的认可。签证工作一般在每年年底或次年年初进行,也可与验证登记工作一同进行。符合继续教育要求的,由主管部门加盖签证专用章。

12. 公共科目继续教育如何登记、签证?

公共科目继续教育统一实行网络教育,在每年验证时由培训机构统一登记,直接由人事局职称科签证。

13.什么是继续教育验证?

每年的1~3月份,专业技术人员或所在单位带证书和接受继续教育的有关资料,到县人事局职称审验,符合条件的,“验证登记”栏加盖“射阳县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验证章”。

关于继续教育考核

14.完成继续教育任务有何作用?

各单位在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年度考核和职务聘任时,应当把完成各年度继续教育学习任务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和职务聘任的必备条件之一。

15.继续教育任务没完成怎么办?有何影响?

专业技术人员无正当理由未完成继续教育学习任务的,应及时进行补课。专业技术人员无正当理由未完成年度继续教育公共科目的培训学习任务,未达到本年度继续教育学习的规定学时数,年度考核不能确定为优秀等次。

关于继续教育分工

16.人事部门和主管部门在继续教育工作中的职责分工是怎样的?

人事部门是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综合管理部门。负责指导、检查各行业主管部门继续教育登记和考核工作,指导公共科目的学习和学时认定等;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对企业继续教育工作的指导,积极提供政策、培训项目和信息等服务,帮助企业建立健全继续教育制度,培养急需人才,促进继续教育协调发展。主管部门负责本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的学习和学时认定、登记、考核等,配合人事部门组织公共科目的学习。

17.公共科目继续教育一定要参加人事部门组织的网络教育吗?

根据规定,公共科目培训由县人事部门统一组织实施,其他部门和单位组织的一律不认可。

18.企事业单位在继续教育工作中的职责是什么?

各企业、事业单位负责具体实施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活动的组织、登记及考核工作。

关于继续教育费用

19.继续教育费用怎么解决?

继续教育经费由政府、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统一安排的继续教育,所需费用主要由本单位承担。专业技术人员与本单位另有约定的除外。

关于远程继续教育

20.远程网络教育有什么好处?

与传统的面授式学习方法相比,远程网络教育具有自主便捷、高效超值的优势,可突破时间、地点的限制,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有互联网就能学习,可自主选择学习网站提供的各种课程,并可重复学习,还可以提出培训需求申请,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定单式、个性化培训。有效解决了现场学习费用过高、工学矛盾突出等现实问题,节省了大量学习费用和花在路上的时间和精力。

21.如何报名参加公共科目的远程网络教育?

各事业单位将专业技术人员有关个人信息,填写统一格式的电子表格,到县人事局职称科办理缴费报名手续,培训网站接受委托统一办理专业技术人员学员注册手续。再由网站统一公布学员注册用户名和登录密码。企业单位或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可直接在网上注册、缴费和申请学习。

22.公共科目远程网络教育学习流程?

①登录盐城培训网(www.111px.com),点击网站首页上的“远程教育”栏目或登录盐城远程教育(www.111px.cn)进入系统登录界面。

②以用户名、密码登录进入网站首页。

③点击“我的课程”-“必修课程”或“选修课程”。

④选择学习课程,点击“开始上课”-“培训课件”-“开始学习”进入学习状态。

⑤学习结束后,点“退出培训”。

23.网络培训对计算机和网络环境有什么要求?

学员计算机要求:P31GM CPU/128M 内存/20G 硬盘, Windows98/Mc/2000/XP, 安装IE浏览器,另外要求有音响,电脑安装有Media player和Real player 两种播放器(一般上网电脑都能达到)。网络环境:播放视频需要2M

以上带宽,文字课件需要56K以上带宽。

24.为什么系统登录出现错误?

可能是你的用户名错误,单位集中缴费注册的一般使用你的中文姓名作为用户名,如果是同名的在姓名后加序号1、2、3,我们会在网站首页公告里告知你,密码初始为666888。

25.个人资料和密码如何修改,密码忘记了怎么办?

个人资料是集中导入的,有不对不全或信息变化的,你可以到我的账户—个人资料里修改,初始密码是统一的并且比较简单,应到“我的账户-修改密码”处修改,密码忘记了可与网站客服人员联系恢复初始密码。

26.为什么课程打不开或太慢?

课程打不开的原因可能是电脑没有必要的播放器,可以到网页右上角的“使用帮助”里下载。打开太慢的原因可能是你的电脑网络带宽不够或电脑硬件配置太低,你可以耐心的让课件缓冲一段时间再放或换个时间再上网学习。

27.为什么提示学习积分不够不能参加学习考试?

对集中统一报名的用户课程学习考试我们不设积分需求,但其他用户、其他课程需要缴纳费用后才可以学习,每次学习考试后会扣除积分,积分扣完后就不能再参加学习考试了。

28.专技人员个人没有上网学习条件怎么参加公共科目继续教育?

有两种方法:一是单位提供集中学习场所;二是参加面授学习,具体方法根据用户申请情况另定。

29.如何参加公共科目学习考试?

课程学习结束后,即完成规定的学时任务后(到首页课程表上查看相关课程已学课时数达到总课时数),可以通过短信方式向管理或客服人员申请参加网上考试(每周六、日),集中书面考试的根据网站通知参加。

30.怎样知道我的学习考试情况?

每次考试结束后就可以知道你本次考试成绩,还可以点击网站上的“我的档案-在线学习档案”、“我的考试成绩”,查看你的课程学习进度和每次考试成绩。

由于并不了解继续教育的丰厚内涵,或者曲解了继续教育的真正含义,

因而把继续教育当作专为技能补课的工具或手段,不仅在一些县级部门有所表现,而且在有些省级部门也有所表现。我们在某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发布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中,就可以看到这种状况。该省在2003年3月27日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中,就如此规定:“本条例所称专业技术人员,是指在企业、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上工作的人员。本条例所称继续教育,是指为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进行的教育和培训。”该继续教育条例对继续教育的任务所作规定是:“继续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一)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经常性的知识更新、补充、拓展,提高专业技能、管理水平,增强创新能力;(二)对在岗未达到岗位专业技能要求或者需要转换岗位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可见,该条例依然是把继续教育主要当作专为技能补课的工具或手段。

下面,是某市财政局对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所下发的文件通知,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该市财政局对继续教育的理解和要求,在“继续教育培训组织方式”、“继续教育训练重点内容”等方面所存在的一定缺陷:

各县(市)、区财政局,市级有关部门(单位):

为确保我市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有序开展,增强继续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提高继续教育培训质量,促进会计人员更新知识、提高技能,推动新企业会计准则、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等会计法规的贯彻执行,现对2010年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继续教育培训组织方式

继续探索实行分层分类开展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市局重点抓好全市高级会计人员业务培训。市局重点培训的高级会计人员范围包括高级会计师、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的总会计师(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以及大型企业财会部门负责人等。高级会计人员的具体培训计划另行制订下达。各县(市)、区财政局应根据当地实际,抓好当地重点骨干企业主要财务人员的业务培训。普通会计人员的面授继续教育培训可选择中华会计网校的网上培训或由社会培训机构(单位)组织集中面授培训。

对一般企业会计人员、金融保险企业会计人员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人员实行分类培训。财政会计管理部门和有关培训机构应根据不同行业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特点,有针对性地开设继续教育培训课程,以便各行业会计人员有针对性地选择学习,增强培训实效。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由市局会计管理处商定有关财政业务处室确定培训课程,由市会计学会具体组织实施专题培训。

二、继续教育培训重点内容

1.继续抓好新企业会计准则的普及培训。在巩固基本准则以及常用的8个具体会计准则——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资产减值、职工薪酬、收入、政府补助、外币折算学习培训的基础上,2010年可重点选择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投资性房地产、所得税等具体准则的培训。

2.抓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配套指引的学习培训。

3.国家出台的新的会计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税收政策的学习培训。

4.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人员培训要紧紧围绕当前财政改革新任务和财政财务管理新要求,紧密结合各地财政管理中心工作,重点组织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等财政改革政策的学习培训。

三、网上继续教育培训有关规定

2010年我市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实行网上培训和面授培训并行。各地可根据会计管理力量、教学资源、师资、会计人员的要求等实际情况,确定继续教育培训具体形式,对教学资源、师资以及会计管理力量不足的地区可以网上培训为主要培训形式。

对网上继续教育培训的管理,原则上由市局统一确定培训运行模式管理规程和培训课程,市会计学会统一负责全市网上培训课程的需求调研、课程开发的研讨论证、课件审核、课件上线,并商定全市网上培训统一收费标准。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有关机构负责做好网上学习卡的发售、网上培训业务咨询、网上培训的日常管理、网络培训平台的日常维护、培训情况的后台监控管理以及培训信息数据的交换、传送等管理服务工作。与中华会计网校培训数据的传送,一般要求在每月月中、月底定期进行传送。

四、面授培训的有关规定

开通网上继续教育培训平台后,将对现有社会培训机构的面授培训带来一定的影响。各培训机构应认清形势,认真做好会计人员培训需求调研,选聘理论和实务水平高的老师,开设适合企业和会计人员实际需要的特色课程,增强培训课程的吸引力;要加强培训教学管理、严格培训签到考勤制度和课堂纪律,提高学员到课率,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

要严格培训考核制度和考试纪律,考试试卷要保证一定深度和题量,并要求学员独立完成考试答卷,确保继续教育培训取得实效。为便于协调管理,方便单位办学,提高工作效率,树立良好形象,对市级主管部门自行组织系统内部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会计人员跨区域分布广的企业集团自行组织单位内部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以及市级行业会计学会组织会员单位会计人员培训,由市局统一负责培训管理和审批。

五、继续教育培训与从业资格管理

1.为强化会计人员自觉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意识,各地应按规定,将会计人员每年度继续教育情况在《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上记载登记。

2.对要求调转的会计人员,调出市外的,要求完成以前年度继续教育培训课时,当年度继续教育可不作要求;宁波市范围内调动的,继续教育可不作要求。

3.在办理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登记时,对现在单位与会计从业资格档案库中登记的单位不一致的,各地会计管理部门应查明原因,督促会计人员及时办理调转手续。实务操作中,应根据会计人员的调转登记表,先办理继续教育登记手续,再予以转出。对经督促仍不来办理会计从业资格调转手续的,可暂缓办理继续教育登记,并向其现工作单位报告。

4.会计人员申报高级会计师资格,其继续教育培训时间、内容、课时一律以会计从业资格档案库登记的信息为准,并以统一格式出具继续教育培训证明。

5.会计人员未完成当年度继续教育,要求补课的,原则上一律参加网上培训。

6.对未换发2006年新版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其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是否有效,由属地会计管理部门负责鉴定,其继续教育补课,原则上一律参

加网上培训。

六、继续教育培训管理要求

1.各级财政会计管理部门要采取多种宣传发动手段,广泛深入地向会计人员宣传《会计法》、《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管理规定》等法规,提高会计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自觉性,发动组织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特别要注意做好网上继续教育培训宣传、推广、辅导咨询工作,把参加网络培训作为普及会计人员运用现代信息化技术手段能力的有效载体,为下一步我市会计管理信息化建设推进打好基础。

2.各级财政会计管理部门要把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与加强财政管理、税收征管、会计改革等财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把服务财税中心工作作为继续教育工作的立足点,不断增强继续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

3.各级财政会计管理部门要加大对继续教育培训的监管力度,督促培训单位端正办学态度,加强教学管理,提高培训质量。对教学资源、师资缺乏、没有力量和能力开设特色培训课程,或者培训管理松弛、学员到课率低,甚至培训时间缩水,弄虚作假的培训机构,视其情节轻重,可采取限期整改、停学整顿、责令退出培训市场等处罚手段。

4.各地财政会计管理部门要把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情况作为会计执法检查、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检查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经常性督查,提醒督促会计人员自觉参加和完成年度继续教育培训任务。对连续两年无故未完成继续教育培训的会计人员,可采取在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上记载违规事项或向社会进行公告等处理手段,努力营造良好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环境。

从以上有关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情况来看,大都把继续教育作为技能补课的工具或手段,继续教育的功能大为弱化,致使继续教育陷入职业技能培训的泥潭。那么,就企业继续教育情况来看,又是如何的呢?

企业继续教育误区

企业继续教育研究专家白冰如、邵萌、刘颖在《企业继续教育存在的问

题及解决途径的分析、探讨》文中指出：“企业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培养与开发离不开继续教育，理论和实践均表明继续教育在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工作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在相当多的企业中，继续教育的发展并不顺利。有多种因素制约着企业继续教育发展，必须认真加以研究解决。”^①白冰如、邵萌、刘颖认为，企业继续教育发展存在如下障碍：

企业继续教育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

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尚处在转型阶段，完善的竞争机制尚未形成，企业普遍的短期行为过分追求眼前经济效益，着眼提高企业人员管理与技术素质的继续教育多数不能在短期内给企业和专业技术人员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因此难以充分调动企业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积极性。尽管中央到省市都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继续教育的法规条例，然而一些企业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继续教育与人员使用相结合的制度，人才的提拔、使用不是根据公开、公平等竞争的原则，实际上仍然是“一张文凭保终身”、“靠年头评职称”、“以职称定待遇”等传统观念、做法在起支配作用。继续教育往往流于形式，“学而无用武之地”，这也极大地挫伤了企业决策者和员工参加继续教育的积极性。

企业继续教育管理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继续教育层次偏低

由于受落后观念的影响，一些企业的发展目标没有与人力资源开发融为一体，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科学的人力资源系统工程，经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被动应付。同时，由于继续教育管理者素质不高，对继续教育理论、方向、方法、内容知之不多，简单地认为继续教育就是办办培训班而已，教育培训不能结合企业生产经营的热点、生产技术的难点重点，教学方式上不考虑高智力成人接受教育的特点，不问需求，不看对象，不讲实效，培训方式刻板僵化、教学手段落后、培训水平低下，效果大打折扣，其结果就是进一步挫伤企业和个人参加继续教育的积极性，即使参加也是为了完成任务，

^① 《企业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的分析、探讨》，《继续教育》2001年第4期。

奉命搞教育受教育而已。以西飞公司开展外语知识培训为例,由于培训基本以日常生活等内容为主,培训对广大学员所从事的工作帮助不大,所以学员数量逐年下降,多年一直举办的半年以上业余英语培训班到2000年由于参加人员极少而被迫停办。

企业担心受训人才外流

接受培训,知识和能力提高后的员工离职是一个十分普遍且令人头痛的问题。人才流动是当前国家人才人事政策鼓励和保护的一项措施。但对企业来说如果不能留住受训员工,花在培训上的投资得不到回报,企业培训成了被人利用的跳板,充当为人作嫁衣的角色。而空缺的岗位不得不通过招聘新的员工来填补,招聘新的员工又必须经历培训和熟悉工作的过程,大大增加了企业人力资源成本,严重影响企业管理者对员工培训的积极性。

企业继续教育的工学矛盾

一些企业由于管理水平落后,各部门协调性差,管理技术人员整天忙于应付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根本没有把提高人力资源素质作为企业实现经营目标的重要支撑,相反以工作忙为借口拒绝或被动消极参加继续教育活动。加之,培训部门安排教学工作与生产脱节,如有些培训学习恰恰安排在生产大忙时节,尽管组织者精心组织,但参加的人寥寥无几。有些培训内容脱离企业实际,脱离当今技术发展实际。最终造成职工不愿学习,企业不支持员工学习等。

企业继续教育效果缺少评估

继续教育效果不容易评估、缺少评估,使得不少企业管理者看不到教育培训的重要效果、效益,对继续教育培训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其结果只能是消极对待继续教育工作了。

企业继续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追求经济效益成为企业的最高目

标,企业为了节约开支,教育经费逐年削减,就连全国职教做得比较好的西飞集团公司自1998年到2001年教育经费也削减了将近50%,其他单位可想而知了。越来越少的教育经费,有时还会像“唐僧肉”一样,东借一点、西摊一点被分割使用。企业高水平的继续教育离不开高等学校的师资参与支持,由于高校教师在校薪酬不断提高,企业的授课酬金标准较低,若不及教师在校的课酬,就难以聘到教师尤其是高水平的教授、专家长途跋涉到企业来授课。而企业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又难以提高课酬标准,结果直接导致继续教育质量、水平与效益的下降。

教师继续教育的误区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教师继续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对教师进行良好的继续教育,是提高教师综合素质、增强教师教学科研能力、促进教师不断发挥教学科研潜能的重要途径。然而,就教师继续教育的现状来看,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教师继续教育研究专家童宏保认为,教师继续教育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教师继续教育的专家本位

这种模式,从专家出发,站在专家的位置上考虑问题,不考虑一般教师的继续教育需求是典型的专家本位模式。这种思路很容易发生对教师身处的条件和环境的回避和漠视。而实际上我们做任何事都是有某种条件和环境的,人实际上是在某种条件和环境中才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怎么做或不怎么做的。

教师继续教育的话语霸权

主要从事教师继续教育的一些教育学院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专家告诉接受教育的老师继续教育内容。这是一种“话语霸权”。因为“话语霸权”使继续教育脱离实际,这不符合目前教学改革的需要。教学改革具有明显的探索性,谁也不能说你就掌握了真理,就可以直接命令别人怎么做,并且使

继续教育只讲大道理，脱离教学的具体环境。

教师继续教育的后评价指导

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告诉教师许多“道理”，然后教师按照理解到的继续教育所讲的道理来“做事”。在“你传授的道理”与“我理解的道理”之间是有距离的。教育学院的课程设置存在着重理论轻实际、不能有效地促进职后教师全面发展、重视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总体模式单一等弊端。这些特点也是这种接受与指导式教师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

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不足，师资匮乏

教师继续教育经费投资总量严重不足，形式单一。国家对教师教育投资形式单一，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为辅的教育投资体制虽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但实际上渠道畅通、机制健全的多元化投资体制在我国还未形成。因此国家对教师教育的投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更是受到限制。对于教师职后教育的各级教育学院来说，它们的教育经费来源除了国家财政拨款以外，主要是依靠学费收入。职后教育的经费筹措渠道单一，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是职后教育体系健全发展的一大障碍。

教师继续教育与职前教育分离

独立形成的各级教育学院和进修学校是以成人教育学院和教研室为主体的教师职后培训体系。单一的教师教育培养模式使教师的职前的师范大学教育与职后教育学院培训相分离。在培养计划上各自为政，在行政管理上政出多门，在培养方式上各行其是，难以使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成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更难以使教师教育形成一种与终身教育相联系的教师培养体系。既不利于调动教师继续学习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挖掘教师终身发展的潜能，同时还会增加高层次正规教师教育的培养负担。单一的教师职后培训不能形成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进入教育学院的师资基本是上一级师范大学或学院的毕业生，缺乏教育教学经验和学术研究能力，难以胜任教师继续教育大任。

教师继续教育在微观上的教学实施模式缺乏互动整合性

教师继续教育大多是按照形式分类,如反思模式、“教培研”一体化模式、校本模式、校地合作模式、合作发展模式、参与式模式、师徒模式;只有少数是按照内容分类的,如分层模式、主题核心模式等。这些教学模式,有些有一定的理论依据,有些只是经验的升华,在指导价值上缺乏比较研究,没有把握不同教学实施模式之间的异同和特色,缺乏互动整合性的有效运用。

公务员继续教育误区

此外,我们再来看看公务员继续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公务员继续教育研究专家张国安认为,公务员继续教育是指国家各级政府机关根据公务员工作职责的要求和公务员个体素质的实际情况,按照分级分类原则,对公务员进行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性的训练和教育,内容包括政治理论素养、管理组织能力、专业技术知识等,形式包括各类非学历教育培训、学历进修等,渠道包括国家(地方)行政学院、中央(地方)党校、公务员培训中心、高等院校以及社会各类培训机构等。

1993年,国务院颁布了我国公务员管理的第一个基本行政法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我国由此开始全面推行公务员制度。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专设国家公务员培训一章(第十章),对公务员培训作出相应规定。从此,我国公务员继续教育工作步入正轨。在此基础上,国家人事部于1996年发布了《国家公务员培训暂行规定》,就公务员继续教育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和规定,成为我国公务员继续教育工作开展和指导性文件。200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使我国公务员继续教育由政府条例规定上升到了国家法律层面。中央和地方相关法律、规范的相继出台,为我国公务员继续教育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常态化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与此同时,我国公务员继续教育的机构体系也在不断健全和完善。在中央政府层面,1994年我国正式成立国家行政学院,负责政府系统部分省部级、司局级和处级公务员的培训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国外委托的培训工

作等。除北京以外,2003年又在上海浦东、井冈山、延安三个城市设立了国家级的高级干部培训学院。中央政府各部委也大多设立了相关的培训机构,开展各自业务范围内的培训工作。在地方政府层面,地方各级政府也建立了行政学院、公务员培训中心,目前全国县级政府以上的专门培训官员的行政学院或党校已达到3 000多所。主要负责开展地方中层及基层公务员的继续教育培训及交流、管理工作。在政府系统以外,部分高等院校和企事业单位也根据需要设立了培训机构,或多或少地承担了公务员继续教育任务。这些不同层次、纵横交错的培训机构,为我国公务员继续教育的开展提供了较为完备的组织保障。

经过中央及各级政府的不懈努力,我国公务员继续教育取得了良好效果。据统计,1993年~2000年的8年间,我国公务员培训总人数已达到900多万人次;按照人事部出台的《2001年~2005年全国公务员教育培训规划》的要求,2001年~2005年5年间公务员初任培训率基本达到100%,对口培训骨干公务员7 100余人次,《公务员法》轮训600多万公务员,《行政许可法》轮训430多万公务员,培训人事干部10万余人次。2007年,人事部出台的《“十一五”行政机关公务员培训纲要》,对我国“十一五”时期公务员继续教育提出明确目标,要求“五年内对全体公务员普遍轮训一遍,使公务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明显提高,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本领显著增强”。

尽管我国公务员继续教育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但是“由于我国公务员正规的继续教育起步晚,公务员队伍基数大、增长快,以及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对公务员继续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致使我国公务员继续教育的开展面临很多的问题和不足。”^①公务员继续教育研究专家张国安认为,公务员继续教育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一些政府机构对公务员继续教育的认识不够

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提倡建设学习型社会,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但是现阶段一些人对学习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的“一次学习、终身受用”的层面上。

① 《我国公务员继续教育途径新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对通过继续教育不断提高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性还没有充分的认识。造成了现实中对公务员继续教育“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局面。具体表现在：首先对公务员继续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尤其是部分地方政府没有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公务员继续教育所需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和年度预算，有的即使列入预算了，一到经费紧张的时候就会被挪用。其次是缺乏对公务员继续教育的系统规划。没有真正领会公务员继续教育的深层含义，没有将其贯穿到公务员职业发展生涯中。在公务员继续教育的真正实施中缺乏计划性。譬如有的公务员多次接受培训，但是内容趋同，对其职业发展和能力提高作用不大。再次是继续教育难以落到实处。由于对公务员继续教育的规划大多停留在宏观指导层面，缺乏相应的具体措施和制度保障，使得地方政府的公务员继续教育开展很大程度上还处于被动应付的层面，走过场、重形式，难以取得实效。

公务员继续教育渠道单一，教育资源缺乏整合和共享

我国现行公务员继续教育的机构体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内部的如各级行政学院或党校等，二是政府之外的如高等院校以及社会各类培训机构等。从表面上看可供国家公务员继续教育使用的教育资源十分丰富。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也明确提出，“机关根据需要也可以委托其他培训机构承担公务员培训任务”。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国家公务员继续教育渠道的选择还是局限于政府机关内部的公务员培训体系，主要集中在各级行政学院和党校。政府外的培训机构尤其是高等院校的作用没有充分挖掘和发挥。教育渠道的单一化使得散布于高等院校和社会教育机构的优秀师资无法有效利用，受训学员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无法充分满足，同时，形成了公务员继续教育渠道客观上的政府垄断，造成公务员继续教育机构体系中缺乏竞争性，不利于公务员继续教育质量的提高。同时，目前存在的公务员继续教育机构之间还没有形成一个相互补充和支持的有机网络，机构相互之间条块分割，缺乏交流与合作，缺乏开放性，没有充分发挥协同效应。由于缺乏统筹管理和整合，各个培训机构各行其是，造成公务员继续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譬如，有的地方政府不仅同时设有行政学院和党校，当地人事部门还专

门设立公务员培训中心，结果导致有的培训中心因为工作量不饱和，最终沦为人事部门的招待所。

公务员继续教育方式没有适时创新，内容与需求脱节

目前，我国公务员继续教育开展仍然普遍采用传统的“课堂灌输式”，缺乏对受教育者的关注，从而无法有效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育培训效果大打折扣。公务员继续教育的受教育者都是成年人，具备一定的知识和经验，并且也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对这个群体的教育培训应该更加注重对受教育者的关注，多采用互动式的教学方式，既要注重以政策性知识传授为主的课堂教育形式，又要借鉴其它领域继续教育咨询与培训的灵活、现代、互动形式，充分调动他们的参与热情，变纯粹传统的授业解惑方式为经验交流共享的方式，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保证学习效果。另外，我国公务员继续教育的内容基本上以政治理论修养为主，其他专业技能以及心理和综合素养类的职业化教育培训比重偏低，这与公务员本身对继续教育的需求不相适应。虽然公务员教育培训具有较为明显的政治导向性，但是这绝不能是公务员继续教育的全部，相当比重的专业知识、技能以及其他方面的综合素养的职业化教育培训也是十分重要的。此外，由于在教育培训前普遍缺乏教育需求分析，致使教育内容与实践脱节，公务员继续教育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

公务员继续教育缺乏科学有效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

对公务员继续教育质量进行评估是保证培训质量的重要环节和手段，科学合理、系统完备的质量评估体系能够有效地检验培训效果和质量，对培训机构及参训公务员有很大的督促作用。但是我国目前公务员教育培训却还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质量评估体系，尽管在1996年我国颁布的《国家公务员培训暂行规定》、2001年制定的《“十五”公务员培训纲要》和2006年制定的《“十一五”公务员培训纲要》中对公务员继续教育培训质量的评估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把公务员的培训经历、学习表现和培训考试考核结果作为公务员考核、任职、定级、晋升职务的重要依据。”但在公务员继

继续教育的实践中,对培训质量的评估没有具体操作规范、实施细则,大多流于形式,没有落到实处。各级各类公务员培训质量的评估还仅仅停留在培训后对参训人员进行测试,培训人员给授课老师打分的形式上,存在评估主体不完善、培训标准不量化、评估效果不客观等问题。评估体系的不健全,也直接导致培训结果和公务员考核、任职、定级、职务晋升很难关联起来。此外,对培训机构的评估也没有形成相关制度,是否具有承担培训任务所必备的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也把关不严。

为什么继续教育会沦为补技工具

继续教育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社会、创新型经济的保障。继续教育研究专家徐芳琼指出,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进程的推进,知识更新越来越快,继续教育与终身教育已成为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国家对人才培养越来越重视,各级党委政府、行业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人对继续教育更加迫切,继续教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同个人甚至整个国家的振兴、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国的继续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经历了新中国建立之初到1954年的初步形成阶段,这个时期的继续教育主要采取了专业培训班、岗位速成班,保送上大学等,毕业生大多数都参加了地方的经济建设。1954年到1964年的初步发展阶段,科技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后来在受训人员中出现不少火箭、卫星专家,社会经济在这一时期得到较快发展。1964年到1974年的基本停止阶段,由于受到“十年动乱”的影响,这个时期的继续教育基本停止,给我国的经济工作带来了重大损失。1974年到1984年的恢复发展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十年动乱”,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高考的恢复,继续教育也逐步得到恢复,成人教育应运而生,“五大”毕业生成了“香饽饽”,这一时期的继续教育为我国经济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1984年到1994年的发展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走向复兴,各类成人教育、进修学院、管理干部学院、公派出国学习推动了继续教育向规范化、规模化、高层次方面发展。1994年

到2006年的大发展阶段,这一时期,除了成人教育、进修、管理培训机构更加规范外,各类职业技术学院应运而生,岗位培训机构也更加健全,继续教育的发展,为我国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科技知识经济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暴露了许多问题。继续教育研究专家促萍认为,继续教育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如下方面:^①

认识不足,目标不明确,办学理念存在误区

一是许多人在思想上普遍轻视继续教育,没有认识到继续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二是很多教育机构和部门即使开展了继续教育工作,但也不能保证质量。社会上很多机构和部门热衷于旨在提高学历层次的继续教育,对技能性的培训活动冷漠处置,对继续教育有利于提高个人素质的作用认识不足。很多人接受继续教育就是为了获得文凭,有的单位为了各自利益在继续教育的实施过程中也主动迎合这些人的需求,导致追求学历教育、文凭本位之风盛行,完全违背了实施继续教育的宗旨。

管理体制不科学,缺乏创新性,吸引力不足

继续教育是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本应该统一协调管理包括继续教育在内的所有教育事业,而目前这项工作由包括人事部门在内的多个部门牵头管理。这些部门由于对教育并不专业,尤其对学科构建和课程设置不熟悉,因此,有关继续教育的教育教学大纲没有统一的规定,形成了“自由散漫式”教学模式,这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严重地影响着继续教育事业的健康和科学发展,直接导致了重学历教育、轻培训教育现象的出现。近年来,由于高校扩招以及取消对报考年龄的限制,很多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学院单一的学历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日渐萎缩,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课程设置落后,师资力量短缺,教育质量较低

教育领域的课程建设是个关键问题,而目前我国继续教育课程不系统、

①《当前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不规范,且设置的课程与学生的实际需求对接得不好,这就会对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效果产生不良影响。继续教育是学历后教育,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这些特点必然要求继续教育的师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掌握新科学知识和技能的,具有前瞻性思想观念的教师。目前,这类师资短缺,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很难配备足够的、适应教学要求的、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有时为了应急而聘请的教师往往满足不了学员的需要,学员的高期望值与师资水平的相对滞后产生很大的矛盾。课程设置的落后、师资力量力量的短缺直接导致了教学质量的低下。

投入不足,理论研究不系统,发展滞后

人财物的投入,是继续教育质量的“硬件”保障,继续教育同义务教育、普通教育一样,需要有一定的投入,而且投入与产出应当是成正比的。尽管有社会力量投资兴办或对国家投入进行补充,但毕竟继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看应是非赢利性社会公益事业,需要各级财政的大量投入,才能保障和促进继续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目前,这种以社会力量对继续教育的投入为主、国家财力投入较少,严重地制约了继续教育事业的发展。另外,我国对继续教育理论的研究不系统,在开展的各类继续教育中,还没有依据继续教育对象的全员性、整体性、差异性的特点,对接受继续教育的群体层次进行足够的分析,也导致了教育主管部门对继续教育发展的决策缺乏理论依据,难以提出客观、科学、适合我国现状的继续教育发展战略,难以做好继续教育的全面规划工作,这也成为继续教育发展滞后的一个主因。

全方位构建有利于终身学习的继续教育新体系

全方位构建有利于终身学习的继续教育新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在全方位构建有利于终身学习的继续教育新体系的过程中,需要深刻认知和切实解决的问题很多。我们认为,针对我国继续教育的现状和发展来看,特别需要进行如下深入思考:

从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战略高度着眼，全面推进继续教育

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宏伟发展目标，教育方面也要满足很多新要求。首先，要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学习型社会，就是我们所说的学习之邦。其次，要让全体人民的人力资本有明显的提升。再次，就是我们要实现社会公平，而社会最大的公平主要是教育公平。因此，必须从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战略高度着眼，全面推进继续教育，为努力实现教育公平创造有利条件。要大力营造“人人是学习之人”的社会风尚，引导努力学习从每个社会成员做起，树立浓厚的学习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无论是政府公务员还是企业生产管理人员，无论是文教工作者还是商业工作者，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乡村农民，无论是少年儿童还是青壮年和老年人，都有一种发自内在需求的学习愿望，并切实付之于具体行动之中。人们以自觉努力学习的行动为时尚，以充分展示学习的价值为自豪。

适应现代教育发展需要，促进继续教育学习方式多样化

现代教育并不完全排斥传统的“受动式”学习方式，但对其进行了巨大变革，即突破了传统“受动式”学习主要依靠被动的灌输方式的局限，而是将灌输与启发、诱导相结合，在加强基础知识教学的同时，大力开发学习者的智能，从而有效地驾驭并灵活地运用知识。形象地说，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要向学习者提供“黄金”，而且要授予学习者“点金术”。“自主式”学习方式是现代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即通过自主选择学习形式、内容、时间和场所来进行学习。自主式学习是现代社会人的自主意识提高的显现，也是人个性优化和积极性发挥的表现。当然，自主学习并不意味完全游离一定的学习规律，也并非完全排斥有效的学习经验模式，而是切合实际需要，对学习规律和经验模式的充分运用与积极创新。此外，“交互式”学习也是现代教育中的一种重要学习方式，即在有效通过与他人的知识和信息交流、整合中进行学习。“交互式”学习是现代社会开放特征的重要体现，也是现代互联网技术在教学中的具体运用。交互式学习可实现与他人“对话”、人机“对话”，突破其一定的时空限制，直接展现学习场景、生动营

造学习气氛,有利于提高学习兴趣和绩效。

充分发掘人的学习潜能,促进继续教育学习内容综合化

继续教育讲求的学习内容综合化,首先体现为学习内容的“贯通性”,即突破学习专业的局限,在跨学科、多领域的联系中进行学习。由于现代科技知识不仅高度分化,更表现出高度综合的特征,因而局限于某一专业的学习,难以适应这一变化趋势。目前,美国流行的“百科全书式”教育模式、西欧国家流行的“H型”教育模式、日本流行的集科技、文学、经贸、外语于一身的“四合一”教育模式,我国提倡的“文理科交叉”、“跨系科”学习,可以说都是适应学习内容综合化趋势的体现。学习内容综合化还体现为学习内容的“多层性”,即突破学习定势于仅满足理论知识,或仅满足操作技能的局限,而是通过一定的理论学习和具体实践,既学习和掌握必要的理论知识,又学习和掌握必需的操作技能。此外,学习内容的“集约性”,也是学习内容综合化的重要体现。集约并不是简单的集成,更不是机械的叠加,而是在有所分析和整理基础上的整合。具体而言,就是在突破学习内容单一化格局、拓展学习领域的同时,要注意避免漫无边际的“蜻蜓点水”的学习,避免盲目填充“记忆仓库”式的学习,切实增强学习的目的性和有效性。

积极整合社会学习资源,促进继续教育学习过程终身化

现代教育提倡的学习过程终身化,又称“学习持续化”、“教育终身化”,是指完成了某一学习或教育阶段的人,在参加工作之后重新接受一定形式的、有组织的学习和教育。由于现代知识更新速度大大加快,知识老化周期大大缩短,在人的一生中,即使完成了大学学习阶段,也只能获得所需知识的一部分。因此,必须持续性地学习知识,才能不断适应工作和生活的需要。终身教育并不等于学校教育,但又不排斥学校教育,而是把学校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一个过程;同样,终身教育也不等于成人教育,但包括成人教育,它的含义更为广泛。实施终身学习教育的途径有多种,一种是回到学校学习所需的新知识,如企业管理者回校学习进修MBA课程,政府公务员回校学习进修MPA课程;一种是企业或研究机构自己培训,如美国80%以上的企业和

科研机构都建立了自己的培训中心、研修中心,计划培训员工及科研人员的课程有几百门,员工或科研人员每年必须接受1~2次培训教育;一种是社会业余性教育,例如日本采用训练所、养成所、教导所等形式培训技工,而采用研修所或教育中心等形式提高管理人员及高级干部的业务水平。德国的西门子商业通信系统部利用 learnig space 技术开办“西门子虚拟大学”,员工不离开岗位现场便可获得在线培训,不仅培训效率、效益高,而且成功地削减了39%的培训费用。发达国家在继续教育方面的成功实践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有效增强资金投入,大力改善继续教育学习场所和设施

为了大力积极发展继续教育,不仅各级政府应不断加大教育的投入,积极推进社会学习设施的现代化建设,而且企业、社区以及一些具有经济实力而又热心公益事业的个人,也都积极投资教育事业,也极大推动着社会学习设施的现代化建设。社会学习设施的现代化,一方面体现在科技文化教育的普及性设施的现代化建设上,如各类学校、图书馆、博物馆、青少年科普活动中心、老年文化活动中心、职业培训基地以及社区科教文化场所等,它们以较为完善的设施和较为广泛的服务层面,为社会成员学习科技知识、丰富文化生活提供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体现在各类专业性的研究所、实验室以及科研仪器设备中心、信息传输的现代化建设上,如实验中心、仪器测试中心、计算中心、数据库、互联网络系统、科技情报中心等,它们以其先进的实验测试、产品分析、信息处理等手段为基础,既从事专业性的研究活动,也为社会其它机构、高校、企业和个人提供服务。当然,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大型综合性的高水平教育科研设施,如具有世界教育领先地位的一流大学、世界科研领先水平的一流实验室,更是社会学习设施现代化的一大显示。

真正转变观念,对继续教育作出较为科学合理的定位

必须转变继续教育就是为技能补课的观念,才能对继续教育作出较为科学合理的定位。我们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发布《中国注册会计师继续教育制度》的第4号通知中,可以看出,由于转变了观念,对继续教育作出了较为科学合理的定位。在《中国注册会计师继续教育制度》中,提出了如

下认识和要求：“目前，对注册会计师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专业知识补课，而是全面的、立体的、多层次的在职教育；继续教育的形式也不应当再局限于集中培训，而应当吸收和引进各种有利于保持和提高注册会计师职业胜任能力的形式。”“不再规定具体的培训内容。注册会计师继续教育的内容已经从过去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培训，发展扩大到与注册会计师执业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管理等多学科知识的培训。培训内容是随着形势发展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而《继续教育制度》是有一定的稳定期，不变期的，因此《继续教育制度》中不再规定具体的培训内容。”“明确了继续教育形式。《继续教育制度》将继续教育的形式分为‘有组织形式’和‘其他形式’两类。由各级协会组织的各种形式的培训和事务所经批准组织的内部培训等，为有组织形式的培训；‘其他形式’则包括了出版著作、发表论文、参加行业执业质量检查等。”我们在《中国注册会计师继续教育制度》中看到，把继续教育的特点概括为“全面的、立体的、多层次的”教育，并认为“继续教育的内容已经从过去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培训，发展扩大到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管理等多学科知识的培训”，因此，转变了继续教育就是为技能补课的观念，对继续教育作出了较为科学合理的定位。

以健全继续教育体制为重点，建立继续教育协调机构

以健全继续教育体制为重点，建立继续教育协调机构，是推进继续教育的重要保障。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了“实现跨部门的继续教育协调机构”的要求，对此，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韩进说，规划纲要用词就是“跨部门”，这是考虑到继续教育是我们国家建设终身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不是从学前一直到高等教育这个体系里面的，这个体系是从学前到高等教育再加上继续教育构成了完整的终身教育体系。客观上，继续教育就是解决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用不同的方式都可以学习的问题。前面有一个定义，是国际上教科文组织的定义，读起来比较绕口。但在这个领域里大家可以共同沟通的，要说得简单一点实际上就是解决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可以在自己不同的人生阶段，该上大学的时候没上，但工作后觉得需要又可以来上学的教育。这样就不仅仅涉及学校教育，可能还

通过其他的培训,包括工作上的、岗位上面的,这就涉及这些领域里相关的部门,既有教育部门,又有非教育部门,可能还涉及人力资源管理的部门,涉及某些企业,可能还涉及某些企业的管理部门。所以应该说它是一个跨部门的,至于说什么部门我们觉得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和要求来具体考虑。基本的是建立一个体系框架,建立一个协调机构。

针对地区和人员状况差异,构建不同层次的继续教育体系

由于继续教育涉及的要素比较多,在这些要素上,不同地区和不同教育机构的条件有较大差异,这必然使得继续教育要因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我国一些地区和教育机构在继续教育中创新地形成了一些宝贵经验,其中“三型十环”模式就是值得推广的经验^①。“三型十环”模式是依据不同地区和不同教育机构的条件和基础,将不同的继续教育对象划分为“欠发展型”、“发展型”、“优先发展型”三种类型,每种类型确定为四个培训基本环节,并使三种类型有机相连的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继续教育有效模式。一是“学习—岗练—考评—分层”模式。这种模式适合于欠发展型的继续教育对象。欠发展型的继续教育对象,主要是指没有接受过高等院校集中学习的继续教育对象。这些对象的继续教育以补课为主,按照实际需要,选取大中专的部分公共课和专业课,通过讲授或看录像、分散自学、考查,以达到继续教育的基本要求。二是“分层—研训—师导—定向”模式。这种模式适合于初步接受过高等院校集中学习的继续教育对象。此类对象的继续教育按照课程培训、问题研讨、课题研究、技能训练等不同形式进行,不同层次对象进行分类培训,逐步平衡,自我完善。三是“定向—专修—独创—发展”模式。这种模式适合于全面完成大学本科集中学习任务的优先发展型的继续教育对象。此类对象的继续教育可以在继续教育专家指导下,由个人定出自己应达到的继续教育目标,继续教育机构专家进行分别指导,分类调控,大力提高继续教育对象的独创能力,促进继续教育对象在有所创新中发展。

^①《校本培训“三型十环”模式的构建》,《中小学教师培训》2001年第10期。

Afterwords

结束语

教育的真谛： 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饱经沧桑的中国教育，在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中发展。如今，人们站在新的时代高度，面对世界现代教育的巨大冲击，怀着焦虑与希冀之情，对中国教育进行新的审视。著名科学思想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必须直面这一重大问题。

“钱学森之问”切中了中国教育时弊，中国教育在教育观念、教育管理、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继续教育等方面还存在种种误区。身陷种种误区的中国教育，能够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吗？求解“钱学森之问”，必须冲破教育的种种误区。教育，需要真正步入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轨道，杰出人才的辈出才有可能，振兴教育才有希望！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溯源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即如何使人摆脱各种不利于自由全面发展的束缚，彻底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古今中外许多仁人志士为此辛勤探索，留下了闪光的足迹，为我们探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

古今中外的自由思想观

人类历史的进步是人类追求自由并一步步实现这种追求的过程。而面对自由问题，不同的文化传统浸染出不同的自由精神。有专家指出，中华民族传统的

自由精神主要表现在儒家的“入世自由”、道家的“忘世自由”和佛家的“出世自由”。西方思想家则把自由视为政治领域的核心范畴或最高理想,把自由视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马克思主义则认为,自由问题与人自身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经济进步和制度安排有着最为直接和最为密切的关系,它是在人的历史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只有在以改造客观世界为基础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得以实现。

中国古代的自由思想观

儒家的自由思想观。有专家指出,儒家典籍中虽然没有出现“自由”的字眼,但不能否认它含有自由精神,它所追求的自由是一种内在精神和道德的自由,反映了积极的人世精神。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最早发现了人的自觉,并把人带入了社会,他认为人是社会中的人,天生具有仁义礼智等道德本性,要求人们通过存心养性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创造性地把外在的强制化为内在的道德自律,以使自己身心得以道德的自由。孔子一生加强自我修养的经历正是儒家注重内心自由的真实写照:“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①在儒家看来,人对宇宙人生的觉悟和理解过程正是不断追求自由的过程,从仅能安身立命(即“立”)到知其然(即“不惑”)、知其所以然(即“知天命”)再到知之之至(即“耳顺”),最终真正彻底自由自在又不违礼犯规(即“从心所欲不逾矩”)。同时,儒家认为,人类自由的理想境界,并不仅仅停留在自己内心的道德精神之中,而且在现实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促使这个理想境界的实现,即“力行近乎仁”,也就是说,力行虽非仁,但能求仁,且能忘私,故“近乎仁”。因此,孔子一生奔走列国宣传自己的仁学主张,“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②孟子则胸怀天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③这反映出儒家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及生产生活,所具有的一种积极豁达、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积极的人世精神。

① 《论语·为政》,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② 《论语·述而》,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③ 《孟子·滕文公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5页。

道家的自由思想观。专家指出,在先秦的诸子百家中,道家特别强调自由。在道家看来,社会是使人失去自由的根源,人要想获得自由就要远离社会。也即道家追求的自由是一种“避世的自由”,或者“忘世的自由”。“避世”就是回避现实;“忘世”就是忘却现实。他们希望按人的自然本性生活,从仁义礼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返璞归真,回归自然,以求得心灵的解放,实现精神的自由。^①所以老子主张无为之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②只要因循自然,顺应万物本性,少去干涉和役使人民,便可收到治平天下的功效,而人民也可以自然自在地生活。庄子则认为人们要想获得自由,不仅要摆脱社会的束缚,还要摆脱自然界的束缚,达到无所待而游于无穷的逍遥游的境界。也即不以外界事物为依赖,超越有限的时空,做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③显然,庄子的逍遥游实际上是指人的心灵的逍遥、精神的遨游,这种自由的精神境界不为欲所动、不为物所累、不受任何条件限制。这就需要“心斋”、“坐忘”的修炼方法来达到此种境界。所谓“心斋”,就是指心灵的一种空无一物的专一而虚静的状态。^④“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⑤由于感觉和心灵都是有所依赖的(“耳止于听”、“心止于符”),而气是无所依赖(“虚而待物”)而与道相通的(“唯道集虚”),人们不仅要使感觉进入到心灵,而且要使心灵进入到气的那种与道相通的状态,以达到心斋。所谓“坐忘”,就是指端坐静心、物我两忘的修行境界。^⑥“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⑦忘却自己的身体,抛弃知识智慧,达到与道的同一,就是坐忘。可见,通过心斋和坐忘,可以使人们摆脱外物干扰,忘却自我,进入一个虚无空寂的世界,以达到真正的自由平和。

① 《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176页。

② 《老子·庄子》57章,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③ 《老子·庄子》,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页。

④ 《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213页。

⑤ 《老子·庄子》,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页。

⑥ 《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213页。

⑦ 《老子·庄子》,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页。

佛家的自由思想观。有专家指出，佛教哲学以人为本位，探讨人生的终极真实问题。杜继文先生研究指出，中国佛学按它的本质规定，可直截了当地定义为“自由”。^①这种以解脱为中心而展开悲智双运的生命升进历程，具有强烈的出世性格。它对人生世间甚至人性本身持彻底的否定态度，以佛性代替人性，以佛国净土代替人间世界，以自由平等的个人独尊代替相互牵制的现实社会，体现了彻底的出世精神。佛家认为，人间是无常的苦海，充满了矛盾、纷争、流血和冲突等浑浊的东西，所以佛家将其人间世界称作“红尘”，而将佛教的理想之境称作“净土”，要想获得自由，必须从红尘解脱至净土。而能否达到净土之地，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觉悟。这里的觉悟，并不需要靠上香拜佛、坐禅读经等形式求得，只要有一念之悟，在世俗生活中照样可以达到超越生死的成佛境界。因为佛家认为人心即佛，摆脱束缚要从心中摆脱，不必到外界去寻找解脱途径。每个人心中有众生，各需自性觉悟，并不是由如来佛普渡众生，而是众生自性普渡。因此“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这里的“自性”，就是自我生命的真性，是人类的心灵主体，这一主体具有高度的自我觉悟能力，具有透过重重遮蔽而显示自己的无限能动作用。^②所以，成佛并不必须刻意修行，机械模仿高僧大德、严守戒律，只要保持真我本性，自觉到本来具有的佛性，即可彻见自心之佛性，其本心也就达到了真正的自由状态。由此可见，自由其实是自性的呈现、开发和利用，是“本心本性的实存地醒悟”以后的生命活动，这也是禅宗自由观的实质。

总之，儒、道、佛三家均重视人的自由问题，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并且在它们分别达到最高境界时相契相通。而三者自由追求的相互融合，便是中华民族的自由精神传统。这个传统既追求群体的自由，又追求个体的自由；既追求现实的自由，又追求理想的自由；既追求人身的自由，又追求精神的自由。^③

西方的自由思想观

有专家指出，从自由思想的发展来看，古希腊是西方自由思想的奠基时

① 《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217页。

② 《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224页。

③ 《中国传统的自由精神》，《理论学刊》2001年7月第4期。

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在一个国家内部，各个人正确地尽到各自本分就是正义。”也就是说，各个人根据各自的本分，正确地从事自己的职业，各个人之间就会有自由的发展，从而在全体之上协调一致。在“正义”的观念中，柏拉图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自由思想，他把人分为奴隶和公民，奴隶不被当成人，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只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而公民是自由的，不受他人的强制和奴役，是独立的个体，其中只有哲学王才能维护国家的正义与公民的自由。这样，每个人遵照各自的本分工作、生活，在全体之中形成完全的协调，从而实现国家的正义，达到全体公民的自由。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一种社会政治动物，只有生活在社会即城邦之中，才能获得自由。这是因为，城邦不仅是最高形式的政治社会组织，能满足人的各种需要，使之过一种自足的生活，而且它是由理性组织起来的社会，以正义为原则，以法律为准绳，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能识善恶、辨曲直，生活得有秩序而合乎道德。也就是说，人类只有生活在城邦之中，才能真正离开动物而成为自由人。

到了近代，自由被赋予更多含义。洛克作为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者，从自然自由和政治社会自由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自由思想。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自由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行为，不需要听命于他人。“人的自然自由，就是不受人间任何上级权力的约束，不处在人们的意志或立法权之下，只以自然法作为他的准绳。”^①所以，自然自由的唯一限制就是自然法，“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②对于政治社会自由，洛克认为“处在社会中的人的自由，就是除经人们同意在国家内所建立的立法权以外，不受其他任何立法权的支配；除了立法机关根据对它的委托所制定的法律以外，不受任何意志的统辖或任何法律的约束。”^③在这里，“同意”表明了政府权威的来源是从属于人们的自由的，而这种自由又是以立法为工具和手段的，“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但是自由，正如人们告诉我们的，并非人人爱怎样就怎样的那种自

① 《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6页。

② 《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页。

③ 《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6页。

由,而是在他所受约束的法律许可范围内,随其所欲地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行为、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那种自由。”这就意味着自由是理性的伸张,而法律就是对非理性的束缚和限制。自由是人生而具有的自然状态,但自由不是放任,必须以法律为限,否则就是不自由的。^①

康德把人分为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感性方面包括人的肉体和情感,理性方面则包括理论理性(即认识)和实践理性(即意志)。在感性方面,人服从自然规律的控制和支配,他是不自由的;而在理性方面,人所服从的道德规律是人类的理性给自己立的法则,服从它就等于服从自己的意志,所以他是自由的。而由于人的理性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人的本质是自由的。但是,人的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自由必须是“只要他不伤害别人也根据可能的普遍的法则而能与每个人的自由相共处的那种追逐类似的自由”。^②在社会中,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自由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幸福,然而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不可避免。但由于人是理性的,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可以有意识地去避免这种冲突,在冲突出现时,可以选择不伤害他人权利,并能自由共处的方式。总之,处在社会中的人的行为都是在具有自觉意识的意志下进行的,康德所谓的自由主要是指意志自由。

黑格尔认为“自由的真义在于没有绝对的外物与我对立,而依赖一种‘内容’,这内容就是我自己”。^③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依靠自己存在的,那么我就是自由的。在这里,“自己”的实质就是精神,而“精神一般说来就是思维”,“在思维里,我是自由的,因为我不是在他物中,而纯全保持在我自身中,并且那对我是客观存在着的对象也是为我而存在的,与我有不可分离的统一。”^④同时“我自己”的存在离不开自然界,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因为“自然界是人类在他的自身内能够取得自由的第一个立脚点。”^⑤而一定的物质基础,比如财产,是自由的一个要求。因为“如果把需要当作首要的东

① 《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6页。

②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82页。

③ 《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5页。

④ 《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3页。

⑤ 《历史哲学》,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页。

西,那么从需要的方面看,拥有财产就好像是满足需要的一种手段。但真正的观点在于,从自由的角度看,财产就是自由最初的定在,它本身是本质的目的。”^①因此,黑格尔认为自由的实现离不开物质手段和人的思维,必须是两者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思想观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继承前人自由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将自由与实践相联系,第一次真正把自由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给自由以科学的解释。马克思认为:“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②这一概括表明,自由是主体在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追求和表现出的一种状态,一种境界。具体来说,就是人若想成为自由的人,就必须能够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能够合理调节自身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能够认识和把握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关系,能够充分认识和发展自身的智力和体力,最大限度发挥自身创造性。最终,“人终于成为自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③

一是人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中获得自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指出,首先,人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恩格斯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④也即,自由表现为一种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结合。一方面,人必须要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自由能否实现就在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程度。另一方面,人必须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能像动物那样被动地受制于自然界,要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做到认识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

① 《法哲学原理》,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6~92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3页。

利用自然规律。其次，人的生产实践活动的深入意味着人类获得更为广泛的自由。“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①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界对人类具有不可制服的力量，人类毫无自由可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能力越来越高，能够更大程度地支配自然、驾驭自然，从而获得更多的自由。也就是说，生产力的每一进步都意味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自由又前进了一步。

二是人在社会实践中获得自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指出，个体的人的存在，不过是人进入社会生活的一个自然前提，人的生存和发展要求人必须同其他个体结成特定的社会关系。要想建立一种体现每个个体的自由本质的社会关系，其前提必须是要形成一种能够使每个个体都能以平等的方式对自然展开自由的劳动关系。而由于人的劳动的社会性和人的存在形式的整体性，人的自由本质的真正实现，只能发生在一种使人与人之间真正成为一个整体的生产关系的社会形态中。并且，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自由主体性表现为他的实践性，而这种实践性又反映出人在对物的改造过程中实现的人对自身的改造与发展，因而从本质上说，人的自由，就是人在其对自然的自由展现过程中所体现的人对其自身的自由。从道德角度来看，就是使人逐渐摆脱自身的动物性痕迹，不断消除人与人之间的排他性关系，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真正成为一种以劳动为基础和纽带的社会性存在。这样，人才能过上一种真正的属人的生活，才能有真正意义的自由。

三是人在自身发展中获得自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指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把人的自由分为三大阶段：第一是“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在这一阶段，“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交往”，^②个体的存在发展只能依附于群体，人的多方面能力的全面发展受到限制，直接妨碍了个性自由的实现。第二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在这一阶段，个人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各个人看起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页。

似乎独立地（这种独立一般只不过是幻想，确切些此可叫作——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但这种人的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对群体而言的发展是以具体个人发展的片面性和畸形化为代价的，人的发展或个性自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现。第三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一阶段，人第一次成为自身发展的真正主人，成为自己的自由主宰者。共产主义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质和异化，把那些作为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的物质条件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人的自由的现实条件，人的发展从而能够真正达到“自由个性”。

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观

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理性自由和个性解放是人类最终期望达到的理想境界。为了达到这样的境界，要经历一个迄今尚未结束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他的全面的发展的，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之间是具有内在联系的。

马克思主义以前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概述

有专家指出，我国古代思想家主要从理想人格的培养和塑造方面探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西周时期就有了“六艺”的要求，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包含政治、道德、爱国主义、行为习惯等内容；乐包含音乐、舞蹈、诗歌等内容；射是射箭技术的训练；御是驾驭战车的技术培养；书是识字教育；数包含数学等自然科学技术及宗教技术的传授。春秋时代，孔子提倡的完美人格则包含智、仁、勇、义、礼、乐六个方面的素养，也是从人的思想道德、才能智慧、文化艺术、人格修养等各方面对人的全面发展做出具体的规定和要求。古代思想家以期培养文武兼备的全面发展人才的理念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萌芽。

西方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探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体育、智育和德育的思想，认为人在理性的指导下，身心应

得到全面发展，从而达到美、智、仁、勇。除此之外，他还倡导“四德”，即智慧、勇敢、节制、正义，他认为只有“四德”协调发展的人才是全面的人。^①在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着复兴古文化的旗帜，同封建专制、教会神学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人文主义者高扬人的价值与尊严，要求个性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促进人类的完善，使人得到充分发展，实现人的自由本质。他认为，“社会和国家的目的在于使人类的潜能以及一切个人的能力在一切方面和一切方向都可以得到发展和表现”。^②空想主义的代表人物圣西门也曾提出过“全面发展的人”的理论，他明确指出：“我终生的全部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一切社会成员创造最广泛的可能来发展他们的才能。”^③欧文则在英国和美州进行共产主义实验，以求“使劳动阶级各个人的脑力和体力广泛地结合起来”，^④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把自然和社会长期所赋予人的一切潜能充分而全面地展示出来，即人的本质和人性的全面生成、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指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异化角度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发展的片面性，并基于人的“类”本质，对人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尽管当时尚未形成“人的全面发展”的完整概念，但却孕育出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萌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揭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旧的分工等原因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此时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已初步形成。随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指每个人都能得到的平等发展、完整发展、和谐发展和自由发展。^⑤

一是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指出，所谓人的

①《西方哲学中“发展”涵义的演变与反思》，《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②《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初探》，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③《圣西门选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50页。

④《欧文选集》（上），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38页。

能力是指人的体力、智力、自然力、创造力、社会能力、现实能力及各种潜能。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①在诸能力的发展中，马克思着重关注的是体力和智力相统一的发展，因为它们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基础。由于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改造客观世界进而改造主观世界，也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对象性劳动中，才能锻炼和发挥自己的全部才能和力量。正是劳动“使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就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就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②所以，人的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如前所述，构成人的劳动能力的主要基础条件是体力和智力，体力是人本身具有的自然力，智力包括人的创造力和社会能力等精神方面的生产力，它们之间的统一发展是人的能力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有利于培养和造就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

二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指出，自然界是人认识和改造的对象，也是人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人通过劳动同自然进行物质交换，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以往的历史阶段，人的劳动能力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主要承担者呈现着狭隘性，由此造成了人的劳动不能同人的自由创造相一致，即人与自然不能全面统一。而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状态下，人所从事的劳动由谋生变成自由创造，人在改造外部自然中创造着自身的价值，实现着人的自由意志，人与自然之间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的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

① 《论人的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的关系及其历史进程》，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7页。

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①随着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人将把对自然界的消极片面的拥有，变为积极全面的占有，并在其中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三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指出，人不是抽象的、孤立的人，而是处于社会关系中具体的、现实的人，社会关系对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具有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就是对其现有的及现有基础上的、未来的社会关系的全面突破。个人的社会关系从最初以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原始时期，到以人身占有及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自然经济时期，都是以普遍的物质交换关系为基础来进行社会关系的展开的。没有个人与社会之间普遍联系的存在，个人的社会性质就不可能得以充分体现，个人的才能也不可能得以充分发挥。但是人的全面发展，不仅要求人类之间建立的关系是普遍的，而且还应该是全面的。只有进一步发展出全面的社会关系，即在物质交换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政治法律关系、伦理道德关系、思想文化关系等，才能形成普遍而稳固的统一共同体，个人的社会性才能得以充分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

四是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指出，人是现实的人，具有自身属性，每个人在世界上都是独特的、唯一的存在者。因此，只有每个人都不断发展完善自身属性，自觉发挥和运用个人才能，人类才能在不断超越现实的过程中创造自己的历史，达到真正的全面发展。可见，人的全面发展强调人的个性化程度。而人的个性，表现为人的不断发展中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是个体的人的独立人格和品质。但是，在人的发展过程中，从最初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人的个性被完全淹没，到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都是人的个性不能得以充分发展的阶段，那么，只有从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解放出来、人的社会关系得到充分而自由的发展，人才能实现其个性的全面发展。也即到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时，“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条件，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①人才将会真正成为具有独特个性的人，整个社会才将是由各具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人形成的联合体。

人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在研究人的未来发展状态时，始终是把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的。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首先，两者的侧重点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指出，在“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中，“全面”表明人的社会关系、个人能力和个性发展等方面的全面性，作为一个完整和完善的人，应该是体力和智力的统一、生存和发展的统一、劳动和享受的统一，应当是其身心、能力和个性的全面而丰富的发展，侧重于人的外在的表述。而“自由”强调的是以个人兴趣爱好为基础的个人发展的独特性，个人的发展不受他人的强制，而由自身所驾驭，是为了培养自身的独立人格和品质而发展，是为了自身自由个性的充分展现而发展，侧重于人的内在的差异性。

其次，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指出，从人类的实践来看，一个人的能力如果没有一定的全面性，体力智力没有充分统一的发展，那么他就失去了自由选择活动的条件，因而也就失去了自由发展的基础。同样，旧的社会分工造成的各种强制性的外在目的和条件使个人丧失了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因而人也不可能获得全面发展。所以，人的全面发展包含着人的自由发展的因素，而人的自由发展本身也蕴涵有人的全面发展的成分。只有两者之间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共产主义者所理想的“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的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状态才能真正实现。

再次，人的全面发展受人的自由发展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指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说：“个人的全面发展，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219页。

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这表明,人的全面发展要想成为现实,就必须达到一定的条件,而这一条件即是个人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才能,而不受他人和外力强加的控制。同时,这也说明,人的自由度越大,人的发展就越快,人的发展程度也就越高。人类历史从“自然共同体”到“经济共同体”最后发展到“自由人联合体”,也只有到那时,个人的独特性、自由性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人的全面性才能随着自由度的极度提高而得以完全发展。

最后,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实现路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是手段、金钱是目的的社会制度使人片面化和畸形化,人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而人的自由由于受物的支配也不可能彻底实现。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迫使人们奴隶般服从社会分工的现象已经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增长,一切社会财富的资源都充分涌现出来”。^①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个人的才能和智慧得以充分展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广阔的平台,使个人能够自由地发展自己想要发展的素质和能力,形成自己的良好自由个性,从而真正实现人的良好自由发展。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才成长规律

现代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大概要用“宇宙速度”来计算。经典物理学被相对论所修正,量子论跃入量子力学,高能加速器对原子核的轰击,粉碎了人们传统的物质结构观,基本粒子被发现吸引人们向更微观的内部结构进军;与此同时,射电望远镜把科学的视野伸向无限广袤的宇宙,类星体、河外星体、红外星云等宏观的发现纷至沓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正做连篇累牍的宣言,然而很快就被人们称作“旧三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4页。

论”，而“新三论”的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则接踵而至。在这个信息按天文数字剧增、新兴学科不断涌现的时代，如何改善人力资源的结构，积极培养大批优秀人才，以至跟上时代飞速前进的步伐，换句话说，深入探讨人才成长规律，进一步做好人才开发与培养工作，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此迎接时代的挑战，正越来越紧迫地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我们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系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大系统，是既有心理因素、生理因素，又有历史因素、环境因素等主客观纵横交错的立体结构，因此，必须通过多角度、多方法、多途径、多层次的艰苦探索，才有可能彻底打开人才成长规律的“黑箱”。在此，我们从培育和提升人文艺术修养的独特视角，来深入探讨人才成长规律与人文艺术修养的内在联系，深刻阐明培育和提升人文艺术修养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具有的特殊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

理论和实践都充分证明，丰厚的人文艺术修养来源于人们的人文艺术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而人们所进行的有意识的人文艺术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则是良好的人文艺术教育。良好的人文艺术教育，是人的综合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通过积极的、持续的、有效的人文艺术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使人们通过接受大量的人文艺术信息，培养人们对于人文艺术的感受、认识和爱好，树立正确的人文艺术观点，丰富健康的人文艺术情趣，使其对于社会生活的真善美、大自然的真善美、文学艺术作品的真善美的感受、理解和鉴赏的能力以及在工作和生活实践中去发掘真善美、表现真善美、创造真善美的技能、技巧和才能得以不断发展。进行人文艺术教育的显著标志，是以鲜明的形象（包括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和社会生活、自然界中富有人文艺术审美特征的事物）和它所表现的一定的情感，使人于潜移默化之中获得人文艺术真善美的享受和感染，熏陶人的情感、品德，开阔人的知识视野，丰富和启发人的想象和智慧，从而为积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众所周知，开发思维智能（智力）在人的成才过程中也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所谓思维智能（智力），简言之，是指人在掌握和运用知识、技能时所达到的心理状态和实践能力，也就是人顺利地完

的思维水平和实践本领。理论和实践都充分表明，通过积极的、持续的、有效的人文艺术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可以培育和提升人们丰厚的人文艺术修养，对于培养和提高以至发挥人优异的思维智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的认知能力具有密切关系，因为一个认知能力低下的人，不可能是一个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在人的认知能力的系统构成中，观察能力、形象思维能力、抽象思维能力、灵感思维能力、记忆能力、实际操作能力、思维心境等就是重要的构成要素。就总体而言，尽管人的认知能力是植根于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以及现代的与实践的丰厚土壤之中，而发展成为复杂的有机的立体结构。然而这一立体结构就一般的表现形式来看，即人在认知事物的心理过程中，与其认知能力关系最为密切的应当是人文艺术修养。下面，我们有必要对此逐一作出阐释：

其一，从“人文艺术修养与观察能力的密切关系”之中把握人文艺术对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人的观察能力就是能够迅速辨析、准确发现不同事物差异性的能力，被称为“智力结构的眼睛”。一个观察能力低下的人，要想具备高智能的思维结构，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培养和发展乃至发挥人的优良的思维智能，必须首先积极培养和极大提高其观察能力。诚然，培养和提高人的观察能力的方法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而通过对人进行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具有广泛内容的人文艺术陶冶，则是培养和提高人的观察能力的重要途径。无数经验证明，人们通过鉴赏自然美景、社会美物、艺术作品来培养和提高其观察能力，就是切实可行的重要方法之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少年儿童教育来说，尤其应当讲究这种方法的科学运用。原苏联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就曾深刻地指出：“孩子们是凭形状、色彩、声音和一般感觉来观察思考事物的；假使有人想强迫他们凭其他方式来观察思考事物，那么，他便是无理地、有害地胁迫着孩子的天性。”所以，充分利用优美的自然景色、优美的社会事物和优美的艺术作品对少年儿童进行人文艺术美的陶冶，在培养他们的人文艺术修养之中提高他们观察事物的能力，将极其有利于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

其二，从“人文艺术修养与形象思维能力的密切关系”之中把握人文艺术对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现代脑科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也

已表明,形象思维作为人脑的一种思维活动,不仅存在,而且是一种很重要的思维方式,它对于建构高智能的思维结构具有特殊的意义。形象思维能力低下的人,不可能具有优秀的思维智能,不可能表现出巨大的创造才能,因而不可能做出伟大的科学贡献。所以,必须积极培养和提高人的形象思维能力。诚然,培养和提高人的形象思维能力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而通过对人进行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具有广泛内容的人文艺术陶冶,则是培养和提高人的形象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无数经验证明,人们通过鉴赏自然美景、社会美物、艺术作品来培养和提高其形象思维能力,就是切实可行的重要方法之一。无论是就知觉想象的产生而言,还是就创造性想象的展开来看,其心理活动机制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这就是蕴藏在头脑里的丰富的形象(意象),有的学者称这些形象(意象)为“内在图式”。由于人在人文艺术感悟活动中,尤其是在审美艺术创作和鉴赏活动中所进行的主要思维活动不是抽象思维(运用概念、判断和逻辑推理),而是形象思维,因此,对人进行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具有广泛内容的人文艺术审美陶冶,极其有利于在头脑里蕴藏丰富的形象(意象),即增加“内在图式”量的储备。在此基础上,想象心理活动机制的顺利、及时地产生才成为可能。大量的观察实验和分析研究表明,在对人进行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人文艺术审美陶冶中,就能培养、唤起和展开人们的想象力的活跃性,即达到联想、体验的积极状态,如对语言艺术品的深切感受不停留在字面意义上,对造型艺术和音乐艺术的视觉、听觉感受不停留在直接感知的水平上,而能主动升起联想表象的兴奋和情绪体验的共鸣,这对于培养和提高形象思维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其三,从“人文艺术修养与抽象思维能力的密切关系”之中把握人文艺术对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从一般情形来看,抽象思维是从规定性方面把握客观事物,而形象思维则从形象性方面把握客观事物。只有形象思维的形象性,无抽象思维的规定性,就不能了解客体的性质;只有抽象思维的规定性,而无形象思维的形象性,认识也不活跃、不丰满。形象思维的模型越是趋向于逼真,抽象思维的概念越是趋向于准确;抽象思维的概念越是规定得准确,形象思维的模型也就越趋向于真实。可见,抽象思维在人的整个思维过程中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诚然,培养和提高人的抽

象思维能力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而通过对人进行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具有广泛内容的人文艺术陶冶,则是培养和提高人的抽象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无数经验证明,人们通过鉴赏自然美景、社会美物、艺术作品来培养和提高其抽象思维能力,就是切实可行的重要方法之一。因为要抽象、归纳出事物的本质特征,必须在占有丰富和全面的现象材料的基础上才可能得以完成。而经常参加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具有广泛内容的人文艺术鉴赏活动,就极其有助于人们采集多种多样的现象材料,为抽象思维的进行提供前提条件。不仅如此,通过人文艺术的陶冶所培养的形象思维能力,也有助于促进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诚如著名学者考林乌德所说:“艺术是人类最原始和最基本的活动,其他所有的精神活动都得从它的土壤上生长起来。宗教、科学、哲学都不是最原始的形式。艺术比它们更为原始,它构成了它们的基础,使它们的发生成为可能”。可见,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具有广泛内容的良好持续的人文艺术陶冶活动,对于培养和提高抽象思维能力是多么重要。

其四,从“人文艺术修养与灵感思维能力的密切关系”之中把握人文艺术对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如果我们稍略翻阅一下人类科技发明史,便可发现,许多做出伟大的科学贡献和技术创新的人才,都具有灵感思维的才能。人们常说他们是天才,就很大程度上来看,就是指他们所具有的灵感思维能力。一个从未产生过灵感思维的人,即使他做出了一定的创造成绩,但就其创造成绩的“质”来衡量,不会具有惊人的价值,因而也难以产生划时代的重大影响。所以,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灵感思维在科学探索和理论研究中的作用,把它誉为促进重大创造的“催生素”。诚然,培养和提高人的灵感思维能力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而通过对人进行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具有广泛内容的人文艺术陶冶,则是培养和提高人的灵感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无数经验证明,人们通过鉴赏自然美景、社会美物、艺术作品来培养和提高其灵感思维能力,就是切实可行的重要方法之一。因为灵感的产生有其相应的“契机”和适宜的心理情状,而人所积淀于心中的丰厚的人文艺术修养,或者人所正在进行的人文艺术审美活动,则能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为人们灵感的产生提供引爆的“契机”和准备良好的心理情状。无论是理论还是事实都表明,人所积淀于

心中的丰厚的人文艺术修养，或者人所正在进行的人文艺术审美活动，会使整个意识活跃起来，各种心理因素发生自由的相互作用，作为一种既轻松自由、又深沉博大的“极其丰富和生动的愉悦体验”的审美心态，正是灵感思维得以闪现和展开的最有利的心理情状之一。因此，人所积淀于心中的丰厚的人文艺术修养，或者人所正在进行的人文艺术陶冶活动，是积极培养和提高灵感思维能力的特殊重要的途径。

其五，从“人文艺术修养与记忆能力的密切关系”之中把握人文艺术对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记忆能力是人的回忆、还原所需要的事实、数据、图景等的心理情状和能力水平。在心理学中，把没有理解的记忆叫做“机械记忆”，理解的叫做“意义记忆”。通过大量的心理试验证明，“意义记忆”比“机械记忆”的记忆效率要高。因为不理解、没消化，不知其中道理的知识就难记忆。相反，对那些已经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的知识，不仅会记得快，记得牢，而且容易记得精确、全面。众所周知，优异的记忆能力，对于建构优异的思维智能是至关重要的。诚然，培养和提高人的记忆能力的方法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而通过对人进行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具有广泛内容的人文艺术陶冶，则是培养和提高人的记忆能力的重要途径。无数经验证明，人们通过鉴赏优美的自然景色、优美的社会事物、优美的艺术作品来培养和提高其记忆能力，就是切实可行的重要方法之一。因为对人进行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具有广泛内容的人文艺术陶冶，则能够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支持人们对事物的理解，有利于发展人们的记忆能力。通过大量的观察和试验发现，让人在具有人文艺术意蕴的直观形象面前进行理性的认识，可以让感性材料支持对理性知识的理解，加固对理性知识的记忆，不断充实和丰富理性知识所包括的内容。因此，通过对人进行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具有广泛内容的良好持续的人文艺术陶冶，则是积极培养和大力提高人的记忆能力的有效方法。

其六，从“人文艺术修养与实际操作技能的密切关系”之中把握人文艺术对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技能可分为“动作技能（操作技能）”与“心智技能”两种。心智技能主要是认识活动，包括感知（观察）、记忆、想象和思维等的技能。动作技能主要是心智技能的外部表现，即表

现在对事物的直接行动中的动作,例如,操作机器、写字、说话、打球、弹琴等技能,都属于这一类。这两种技能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实际上,人的整个思维智能结构就主要是由心智技能和操作技能所组成。心智低下的人,不可能建立优秀的思维智能结构,同样,操作(动作)笨拙的人,乃会对于优秀的思维智能的建立和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诚然,培养和提高人的操作技能的方法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而通过对人进行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具有广泛内容的人文艺术陶冶,则是培养和提高人的操作技能的重要途径。无数经验证明,人们通过鉴赏自然美景、社会美物、艺术作品来培养和提高其操作技能,就是切实可行的重要方法之一。例如,语言表达的能力就直接影响着思维的整个过程。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研究了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以后下结论说,一个人的智力发展和他形成概念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语言的。通过良好的人文艺术陶冶,尤其是语言艺术品的创作和鉴赏,可以大大提高人的口头和书面语言的表达能力。再如,美术作品的创作和鉴赏,可以培养和提高人们对形体、比例、空间、透视、色彩等的知识及初步的表现技能;参与积极健康的舞蹈活动,有利于培养和提高人的身体各部分的协调性与动作的协调技能。总之,通过对人进行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具有广泛内容的良好持续的人文艺术陶冶,则是培养和提高人的操作技能或动作技能的有效方法。

其七,从“人文艺术修养与优化思维心境的密切关系”之中把握人文艺术对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所谓思维心境,主要是指由情感、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所构成的进行思维活动的心理情状(也可称之为“心态模式”)。思维心境的优化与劣化,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思维活动的兴奋与抑制,从而对于建立和发展优异智能的思维结构产生不同的影响。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吉尔福特认为,优异的思维智能必须具备三个特点:一是思维流畅性,指心智活动畅通、灵敏迅速,能够在短时间内表达较多的想法;二是思维灵活性,指思考随机应变、触类旁通,不局限于某一方面,不受习惯趋势的约束,因而能产生超常的构思,提出不凡的新概念;三是思维独创性,指用前所未有的新角度、新观点去认识事物、反映事物,对事物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独特见解。显然,要使思维智能具备这三个特点,优化的思维心境的影

响是有很大关系的。反之,诸如压抑感、忧虑感、恐惧感、孤独感、自卑感等劣化的思维心境,都不利于建构和发展较优的思维智能。诚然,建构人优化的思维心境的方法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而通过对人进行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具有广泛内容的良好持续的人文艺术陶冶,则是建构人优化的思维心境的重要途径。无数经验证明,人们通过鉴赏优美的自然景色、优美的社会事物、优美的艺术作品来建构人优化的思维心境,就是切实可行的重要方法之一。诸如人们感受从声音、色彩、形态的美感到内在的崇高的精神美,从山水花鸟等自然美到社会生活中各种典型人物思想、信仰、意志、道德、生活情趣的美,从现实中各种美好的事物到各种优秀作品的艺术美,等等,可以培养人们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和心态模式,促进人们的思维活动常常处于优化状态,从而为促进优秀的思维智能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因此,通过对人们进行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具有广泛内容的良好持续的人文艺术陶冶,的确是建构人优化的思维心境的一条重要途径。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文明综合素质的极大提高,而人文艺术修养则是体现人的文明综合素质的重要方面。一个匮乏人文艺术修养或人文艺术修养低劣的人,不可能成为具有优良文明综合素质的人,也难以成长为真正的人才。在探讨人才成长的诸多著述中,伟人或名人的成长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和重点,然而,人们过去在对伟人或名人成长过程的探讨中,往往过多侧重于分析研究思维智能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忽视了对人文艺术修养在他们成长过程中的特殊重要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人才成长探讨中的一大缺憾。

只要我们稍略翻阅一下人类文明史,便可发现,许多具有较高思维智能并为人类文明做出极大贡献的著名人物,都与人文艺术有着密切关系,都具有丰厚的人文艺术修养。例如:

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就是一位具有丰厚人文艺术修养的伟人。我国著名美学思想家叶朗指出,孔子十分喜爱艺术珍品,从小就耳濡目染,后来对诗歌和音乐尤其具有很高的造诣。他还乐于畅游名山大川,欣赏大自然美景。他认为,审美和艺术在人们为达到“仁”的精神境界而进行的主观修养中能起到一种特殊的作用。因此,他十分强调美育的重要性。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重视、大力提倡美育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老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者，同样也是一位具有丰厚人文艺术修养的伟人。我国著名美学思想家叶朗指出，老子不仅具有丰厚的美感经验和艺术修养，而且在美学理论和艺术理论上也有许多深刻的见解。他所提出的“道”、“气”、“象”、“有”、“无”、“虚”、“实”、“味”、“妙”、“虚静”、“玄鉴”、“自然”等，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理论和艺术理论形成自己的体系和特点，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

李冰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水利学家。据史载，他的知识十分渊博，不仅通晓天文地理，而且具有丰厚的人文艺术修养。他所主持修建的众多水利工程（以“都江堰”尤为著名），不仅能够给人们带来灌溉、排水和航运之利，而且能够通过工程的水道干支交错、沟渠纵横的合理结构与优美的建筑造型给人以极大的美感，所以，他的设计和建造技巧的优美风格，为历代人所高度重视和备加欣赏。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不仅具有广博精深的历史知识，而且具有丰厚的审美艺术修养，从小就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他一生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在游历中，他不仅广泛接触了社会各阶层，考察了大量的历史遗迹，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为日后撰写《史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在名胜古迹、名山大川的游历中，他也获得了丰富的审美艺术享受，陶冶了情操。丰厚的审美艺术修养，为他撰写《史记》提供了有利条件。《史记》不但内容丰富翔实，叙述实事求是，而且语言清新优美，人物描写栩栩如生，是史学与文学艺术相结合的典范，其中许多篇章都具有很高的审美艺术价值。

张衡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具有丰厚人文艺术修养的伟人。他不仅在天文、数学、气象学等多种学科上有高深造诣和杰出贡献，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具有重要贡献。他根据自己在西安、洛阳的见闻，花了十年时间，精心创作的文学作品《两京赋》颇富盛名。从我国古代文学史来看，五言诗、七言诗和汉赋的创始与转变，都离不开张衡的贡献。所以，他同时也是一位在我国文学史中地位很高的文学艺术家。

诸葛亮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长于巧思，深谙兵法，治军有道，治国有方，他的名字成了智慧的化身。殊不知，诸葛亮也具有相当

丰富的人文艺术修养。他在结草为庐，“躬耕陇亩”的十年中，除了常与好友崔州平、徐元直、石广平、孟公威、司马微等人纵论国家大事之外，还阅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也很喜欢听优美的音乐，有时也与好友结伴一同去欣赏大自然美景。他的政治见解和品行雅趣受到朋辈的高度赞扬，被人们誉为“卧龙”。

郦道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地理学家，也是一位具有丰厚人文艺术修养的伟人。他在少年时代，就曾随父亲访求名胜古迹，并研读了丰富的古典书籍和文学作品，如《山海经》、《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以及描绘名山大川的诗篇辞赋和记载水道的《水经》。他的名著《水经注》，以水道为纲，凡是河流经过地区的风土人情、历史古迹、地形矿藏、农田水利以及城镇的兴废沿革和有关的历史人物事件、神话传说等，都作了详细的考订和描述。书中很多绘声绘色、逼真动人的描写，简直就是文笔绚烂的游记小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读来颇能给人以丰富的美感享受。

祖冲之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同样也是一位具有丰厚人文艺术修养的伟人。据史载，他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对于自然科学、哲学、文学以至音乐、绘画，都有浓厚的兴趣。渊博的知识和广泛的兴趣爱好，为他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做出伟大的贡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沈括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文武兼备的政治思想家，十一世纪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具有丰厚人文艺术修养的多才多艺的学者。沈括一生虽大部分时间从事政治活动，但他刻苦治学，“博闻强记，一时罕有其匹”，“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在青少年时代，沈括就酷爱阅读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并且还进行了大量的创作活动。在沈括的《梦溪笔谈》这部被誉为“中国科学历史上的座标”的巨著中，就有许多描绘天文、地理、生物、气象和工程的优秀篇章，能够给人以丰富的美感享受，堪称优美的科学散文。沈括在对先秦诸子、《诗经》、《楚辞》、唐宋文学等研究方面，也都有很深的造诣；在音乐方面，《梦溪笔谈》有“乐律”三卷，还有散见于其它各卷中论述音乐的篇章，都是研究我国古代音乐的珍贵文献。他对古代乐理、乐器和少数民族音乐都做了精湛的研究，不愧为我国古代罕有的大音乐家。在书画美术方面，沈括精通画理，《梦溪笔谈》里有数十条是专

门记叙书画的，他所撰写的《图画歌》，全文不过五百六十字，却是一篇历代名家画法的总论和绘画学史诗，为深入研究我国书画艺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李时珍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医药学家，也是一位具有丰厚人文艺术修养的伟人。他的父亲李言闻既是个医生，又是个秀才。李时珍从小就在父亲的良好教育下，“学八股”，做“制艺”，在十四岁那年就中了秀才。李时珍读书的面很广，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到宋代名医唐慎微编著的《证类本草》等历代医药书籍，他都一一精读了。至于经史、声韵、诗文小说也无所不及，对于书画艺术，他也具有一定的造诣。在采集药物标本时，置身于名山大川之中，他的性情无疑也获得了美的陶冶。丰厚的人文艺术修养不能不说为李时珍做出伟大的科学贡献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宋应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他从小不仅对那些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科学技术问题感兴趣，而且还酷爱阅读优美的诗篇辞赋，尤其喜欢书画艺术。在他的被国内外学者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这部科学技术巨著中，除了对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加工，纺织、染色、制盐、制糖、陶瓷、车船、锻造、油料、造纸、冶炼、采矿、武器、菌种培养以及采琢珠玉等方面的生产过程和技术成就有精彩的文字描述之外，那一百二十三幅插图更是形象生动，具体真实地描绘了三四百年前的生产现场情景，其形象优美的生动性令人赞叹不已。

王夫之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位具有丰厚人文艺术修养的人才，尤其具有很深造诣的诗学修养。王夫之总结自己的生活经历时说：“十六而学韵语，阅古今人所作诗不下十万。”他编有《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三部诗歌选集；他还著有《诗译》、《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南窗漫记》三部论诗的理论著作，合称《姜斋诗话》。在《姜斋诗话》著述中，王夫之以自己丰富、深切的审美艺术感受为依据，建立了一个以诗歌的“审美意象”为中心的美学体系，被人们称为“一个博大精深的唯物主义美学体系，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种总结的形态”。

梁启超、蔡元培、孙中山、鲁迅、李大钊等都是闻名于世的思想家，他们同时还是杰出的革命家，也都是具有丰厚人文艺术修养的著名人物。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然而他们所具

有的人文艺术方面的丰厚修养也是博大精深的，为世人所敬仰。

我国现当代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也都具有丰厚的人文艺术修养，他们有的喜欢中外古典文学、音乐，有的酷爱欣赏中外著名的美术作品。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和苏步青，都喜爱填词、读诗，苏步青还喜欢欣赏音乐、戏曲和舞蹈。著名化学家杨石先爱好养花、读诗词、游览名山大川。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生物化学家徐京华、水利专家张光斗、桥梁专家茅以升等都是具有丰厚人文艺术修养的科学家。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2001年他获得了国家首届最高科技奖。袁隆平也非常喜欢体育运动和音乐艺术，有着丰厚的人文艺术修养。在《“富翁”袁隆平的幸福生活》^①中有如此生动具体的描述：距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不远处，有一个充满田园气息的安静小院。两层高的红砖楼，到处挂着喜庆的红灯笼和中国结，有假山、有池塘，也有园林，这里就是袁隆平的家。袁隆平和他的儿孙们住在一起。尽管每天的行程安排得很紧，可是袁隆平雷打不动的事情，是每天上午7点半起床做广播体操。“我有70多岁的年龄，50多岁的身体，30多岁的心态，20多岁的肌肉弹性。”他说。游泳是袁隆平最喜欢的体育项目，每年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举行游泳比赛，袁隆平都能战胜小伙子们当仁不让地成为游泳冠军。袁老喜欢运动，他说，游泳、排球、跳舞，都是不花钱的平民项目。“游泳我是一流水平，打排球我只能算是二三流的水平。”音乐是运动之外袁隆平的另一项爱好，幽静的袁家小院里常常会传来悠扬的琴声，妻子邓哲喜欢弹电子琴，袁隆平喜欢拉小提琴，两人配合默契。袁老还擅长男低音，他深情并茂地给我们演唱了一段美国民谣“old black joe（《老黑乔》）”。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位可爱的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杂交水稻之父”。

.....

如果我们不是把眼光仅仅局限于中国的古今文明史，而是拓展开去，放眼世界，我们仍会发现许多鲜为人知然而非常有趣的现象：许多伟大人物都

① 《“富翁”袁隆平的幸福生活》，《环球人物》2008年第15期。

具有丰厚的人文艺术修养。例如：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大人物，对世界优秀的文艺名作都极感兴趣。马克思、恩格斯对莎士比亚的戏剧、诗歌都推崇备至。据史料记载，马克思如果没有仔细鉴赏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等人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很难写出《资本论》这样的巨著。列宁曾在一个夏天，就仔细阅读了俄国著名文学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名著《怎么办》；列宁对世界优秀的古典音乐的精湛修养，也是令人赞叹的。

世界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海森堡、玻尔和普朗克等都酷爱音乐，并且皆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爱因斯坦本人就曾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小提琴手，他对弹奏钢琴也有异常浓厚的兴趣，并具有一定的演奏技巧；他还热烈崇拜海涅、席勒、歌德等世界著名诗人，对贝多芬、莫扎特、巴赫等世界音乐家也十分推崇。

著名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就曾受过良好的人文艺术教育，十几岁时，他曾同时获得了爱丁堡中学的数学和诗歌比赛的第一名。据说丰厚的人文艺术修养使他养成了把每个问题在头脑中构成形象的习惯，以此来激发自己的创造性思维。

居里夫人也是一位具有丰厚人文艺术修养的著名科学家。她颇爱民间舞蹈，有时甚至亲自加入跳舞的行列，其优美的舞姿深受人们的高度赞扬。她还爱好骑自行车旅行，欣赏大自然美景，陶冶性情。另外，她对世界优秀古典文学作品也很感兴趣。

黑姆霍兹亦是一位具有丰厚人文艺术修养的科学家。他常常挤出时间到碧波荡漾的湖畔，绿草如茵的园地，郁郁葱葱的林间，尽情欣赏大自然的秀丽风光。他说，缓步攀登树木葱茏的小山时，灵感往往出现。世界著名数学家彭加勒就喜欢欣赏音乐，也乐于挤出时间去欣赏大自然美景。他说，他的科学论断“不定三元二次型的算术变换和非欧几何的变换方法完全一样”，就是在山林间散步时发现的。

世界著名天文学家哥白尼10岁以后就阅读了大量关于文学、绘画、雕塑、数学和音乐等方面的书籍，自幼就对文学、艺术和科学都产生了极大兴趣。他曾到意大利求学，又受到意大利人文艺术风气的熏陶，专门用一

段时间学绘画。他不只学会了画大地的风景，也学会了画天空的星座。据说，他正是在无数次地揣摩如何用画笔来表现出“宇宙星空的和谐优美”的过程中，渐渐萌发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地球也像其他行星一样，环绕着太阳在不停地转动。

大发明家爱迪生也是一位具有丰厚人文艺术修养的伟人。爱迪生酷爱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尤其对世界伟大作家维克多·雨果的作品爱不释手，总是挤出时间来阅读欣赏维克多·雨果的优秀文学作品，以至朋友们幽默地称他是“维克多·雨果·爱迪生”。

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年轻时就非常喜爱优美的音乐，也常在伦敦美术馆欣赏意大利的著名绘画和雕塑，还喜欢阅读幻想小说、各类诗歌、游记、传记和历史剧，几乎读了莎士比亚的全部著名戏剧和诗歌。达尔文说，后来由于他全力贯注于研究进化论，对音乐、诗歌等失去了兴趣，一旦发现后，他十分吃惊，觉得这些兴趣的消失就等于快乐的消失，而且可能有害于智力。于是，他给自己作了规定，每周至少读两次诗，听一些音乐。可见，达尔文是何等高度重视丰富自己的人文艺术修养。

著名科学家牛顿是在他父亲死后不久出生的一个瘦弱的、先天不足的、苍白的畸型小孩。给他接生的接生妇甚至没有料到他会活下来。她说：“唉，这么一个小不点儿，我简直可以把他塞进一只杯子里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缺乏先天优良素质的人，后来却成了举世闻名的科学家。牛顿12岁时才进学堂念书。课余时，他很喜欢做游戏，曾搜集大大小小的斧子、锯子和锤子，制造奇奇怪怪的小玩意儿。在他比较安静的时候，他读诗和写诗，或在卧房的墙壁上用木炭画人物和各种物体的素描。牛顿在少年时代写了一首标题为“三顶冠冕”的意味深长的诗：

世俗的冠冕啊，我鄙视它如同脚下的尘土，
它是沉重的，而最佳也只是一场空虚；
可是现在我愉快地欢迎一顶荆棘冠冕，
尽管刺得人痛，但味道主要的是甜；
我看见光荣之冠在我的面前呈现，

它充满着幸福，永恒无边。

牛顿在诗中巧妙运用隐喻的手法，表达了他为着自己理想的实现而心甘情愿地承受难以忍受的痛苦的情怀。他把接受荆棘之冠，作为更伟大的光荣之冠的前奏。牛顿上大学以后，在繁忙的学习之余，他最喜欢邀约同学们一块去旅游，尽情欣赏名胜古迹和大自然美景，并且还亲自动手在大学宿舍窗外的空地上培植了一个优美的花园。

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法拉第，在年轻的时候所酷爱阅读的书刊中，就包括许多文学艺术方面的书刊。他还特别喜欢听哲学家和艺术家们的讲演。一有时间，他也乐于旅游。他曾说过，夜间海上灿烂的波光，庄严雄伟的群山，笼罩在雾鬓云鬟里的枫丹白露的森林，都给他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后来法拉第成了有名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即使是在十分繁忙的科研工作中，他也常常非常有兴趣去看戏剧、赛马、跳舞，有时甚至还扮成一个穿睡衣戴睡帽的参加者去出席假面舞会。法拉第在步入老年以后，每天工作结束，他便常常和妻子手挽着手，欣赏晚霞夕照的自然美景。他在日记中写道：

多么绚丽的日落啊！

多么古老而又美丽啊！

它带来了使我心旷神怡的万千思绪。

据法拉第的朋友说，在艰难的科学研究和探索过程中，法拉第对诗歌、音乐、舞蹈和旅游都一直保持着极大的兴趣爱好，因而他“总是显得眼睛有神，一副乐观的样子，人们总听见他的笑声”。这与他极为重视对自己进行人文艺术的陶冶是分不开的。

科学家海克尔的著作《宇宙之迷》、《人的进化》、《海中的生命》等都是德国十九世纪科学界中声誉很高的科学名著。海克尔也有着丰厚的人文艺术修养，尤其具有精深的美术知识和娴熟的绘画技巧。他对于描绘人的肌肉和画出一幅农村风光，都是高手。年轻的时候，他曾考虑一辈子当一

个美术家，后来由于其他种种原因使他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可他从未抛弃自己绘画这一兴趣，他一生精心画了一千多幅风景画，就是明证。这为海克尔在植物学、生物学、医学等方面做出杰出的贡献，不能不说起到了非常有利的作用。

科学家班廷以发现胰岛素在糖尿病治疗中的价值等而闻名于世。他也酷爱绘画艺术，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在潜心科学研究的时间以外，班廷常常拿起画板和画笔，溜到乡间去描绘眼前的美丽风物，创作了大量的美术作品。他的同事、科学家贝司特称赞说：“班廷是加拿大最引人注目的业余画家之一。”班廷尤其擅长于画大自然的夏景和冬景，其作品具有强烈的审美艺术感染力。1922年，班廷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与此同时，他优美的绘画作品也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赏。

世界著名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少儿时特别喜欢到美丽的大自然怀抱里游玩，并细心观察各种昆虫的生活习性。他也爱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和欣赏音乐。后来，巴甫洛夫在心脏生理、消化生理和高级神经活动生理等方面从事繁重的科学研究工作，即使这样，他仍然挤出时间来阅读小说、欣赏诗歌，还喜欢划船、游泳、集邮、画图 and 种花。广泛多样的兴趣爱好和丰厚的审美艺术修养，培养和提高了巴甫洛夫的观察力、想象力，为他做出许多大胆的设想和创造而提供了十分良好的条件。

歌德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他在矿物学、地质学、比较解剖学、植物学、颜色学等方面曾进行了深入的科学研究，并且均有一定建树；与此同时，歌德又是一位举世闻名的戏剧家、诗人和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他的戏剧、诗歌创作成果和哲学思想、文艺理论思想都在世界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歌德的成长过程和取得显著成果的创造活动中，丰厚的人文艺术修养对于他的良好影响和积极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

如果我们再耐心地翻阅一下人类古今文明史，如同祖冲之、沈括、巴甫洛夫、爱因斯坦等这样的具有丰厚人文艺术修养的世界伟人和名人，还可以往下列出许多。由此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人才的成长进步和取得重要成果，与人文艺术有着紧密的系统联系，良好的人文艺术修养是人们不可或缺的营养。因此，从丰富和提升人们的人文艺术修养的角度，来

深入系统地探讨如何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确实是一条值得重视的科研途径。简而言之，就是研究如何通过培育和提高人文艺术修养来陶冶人的性情、丰富人的想象、拓展人的视野、启迪人的智慧，从而为培养人才、开发人才、利用人才开辟一条良好的途径。

开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新途径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在开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新途径的过程中，需要深刻认知和切实解决的问题很多。我们认为，针对我国教育的现状和发展来看，特别需要进行如下深入思考：

消解“注、疏、解”思维方式，建构批判性思维方式

著名旅美教育学者黄全愈说他最近收到由宾州大学牵头，对全美国 36 个大学进行教学调研的表格（共有 24 个大问题及上百个调查细目）。这项调研围绕六个议题进行。开篇第一题就是“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无独有偶，根据《天赋教育在美国》的介绍，美国“神童”教育（天赋教育）的“童子功”入门第一招是“培养批判性的阅读能力”，第二招是培养“批判性的聆听能力”。在小学阶段还是作为一种行为习惯来培养，到了大学阶段就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了。

作为美国天赋教育的入门功夫，所谓“批判性阅读”，就是不仅从阅读中吸收性地学东西，更重要的是从阅读中批判性地学东西。死记硬背、人云亦云，那是末流功夫。批判性阅读才是硬功夫，才是高段位的阅读行为。

发人深省的是，中国教育的“童子功”入门第一招是“听话”。至于“批判性思维”，那是成人以后再考虑，或者根本就用不着考虑的问题。从小就人云亦云，长大了能有批判性思维吗？别人从小培养批判性阅读能力，我们传统“注、疏、解”式的读经，却是亦步亦趋地从“听话”开始培养人云亦云的习惯。经典就是经典，对经典只能是“注”，“注”完还可以“疏”，“疏”了再“解”……总之，是在前贤的字里行间徘徊。

据黄全愈回忆说，前两年去哈佛大学，友人指给我看：哈佛大学的标志

是三本书：两本朝上开着，一本朝下盖着。什么谜底？朋友引而不发。我寻思了几天，豁然开朗：哈佛想告诉她的师生：书本传播了知识，传播了真理，但是书本也传播了谬误。因此，哈佛的师生都要不唯书，不唯上！哈佛精神追求的就是教授和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国内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是外在强加的被动式积累学习过程。批判性阅读则是自我教育的过程。从批判中吸收，是主动的吸收、过滤后的吸收，吸收的是精髓，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质疑、批判，从而对知识进行重构，成为知识的主人、学习的主体。批判性阅读必须以独立思考为基础。没有独立思考，没有创新意识，就没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因此，批判性阅读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第一块基石。

然而，“批判性思维”不是事事作对、处处唱反调，或者干脆为反对而反对，进行盲目批判。那是“造反有理”的“红卫兵思维”。“批判性思维”的关键是：既不要盲目地全盘接受，又要以开放的胸襟去伪存真，然后“悟”出自己的思想。许多时候，学生的“起疑”、“存疑”，就是“批判性思维”的开端。简单地把“批判性思维”看作“对着干”，完全是一种误解。

中国的大学考老师说什么（“注、疏、解”），美国的大学考学生想什么（批判性思维）。在国内大学读书，学生忙于埋头做笔记，也有人戏称为“听写课”。在美国大学读书，学生忙于思考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国内读书是“学多悟少”，在美国读书是“学少悟多”的原因。

黄全愈认为，钱老质疑中国教育“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太热衷于培养“注、疏、解”式的考生，严重忽视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而“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所需要的探索精神和创造能力是以“批判性思维”作为“内功根基”的。因为“探索”与“创造”是用批判性思维去重新思考别人做过的事情，甚至推翻别人做过的事情，完成前人的未竟事业或开拓前人未涉领域。

著名学者钟沛璋指出，我们读一读爱因斯坦在“美国高等教育三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稿——《论教育》，和他怎样从一个发育缓慢的孩子成为科学奇才的切身感受，会得到深刻的教益。爱因斯坦说：人不同于蜜蜂或蚂蚁，“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思想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社会服

务看做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对于学校来说,最坏的事是,主要靠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这些办法来进行工作。这种做法摧残学生的健康的感情、诚实和自信,它制造出来的是顺从的。”“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就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①

培育健全人格,促进身心自由和谐发展

人格理论研究专家余潇枫指出:“人格性是人的主体性的现实展开,人格的获得和人格化运动的实质,应该是主体性的获得和主体形态的历史展开。”^②根据高清海教授提出的人的主体性生成的三形态学说,余潇枫把人格置于具体历史进程的分析框架,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与人的生成发展过程统一的角度,对人格化运动规律进行了新的探索。他认为,人格是人的价值生命的承担者,“人格承担价值生命的方式就是人自觉意识到获得自然生命并非就成其为人,而只有获得人的价值生命才成其为人。因此,相对于自然意义上说,人格就是人以人的意识为前提的价值追求的自觉,人所意识到的人之为人的历史规定,是人在社会实践中发生发展出的具有普遍社会联系的人性。”具有人格的人是与孤立的“生理人”、“心理人”、“精神人”不同的,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规定性的人。尽管现实的人格只能是个体的,但同时它又包含着社会性,随着人的历史生成与发展,个体人格将不断地丰富着人格的社会内涵。受此规定,人格化运动就只能在社会“格”中进行。我们如果对具体的“格”中之人作一历时性考察,就不难发现,人格化的过程就是人格的历史形态的不断转换的过程,而人格的形态转换又是随着主体的形态生成变化、随着人的关系的生长发育而发展变化的。“与作为人的主体的‘集群主体’、‘个人主体’和‘类主体’三种历史形态相对应,人格化运动具有四种历史形态:‘族群人格’、‘依附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③

① 《《爱因斯坦文录》:“千年思想家”的思想》,《中华读书报》2004年6月14日。

② 《哲学人格》,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③ 《哲学人格》,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培育健全人格,促进身心自由和谐发展,就是要消除族群人格、依附人格的消极影响。“族群人格”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时期的“自然化人格”,“依附人格”是封建社会时期的“群体化人格”。应该说,这种划分是有见地的,它较准确反映了人类从自然人向社会人发展的曲折历史。然而,我们又认为,从社会形态更替、人的类性发育来看,没有必要对集群主体阶段中的人格形态作出以上“一分为二”的划分。因为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各个关系上,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个人对群体、社会共同体的附属或依附,实质上都源于并体现着人对自然的依赖,在这种依附、依赖的关系中,个体一直谈不上有自己真正独立的人格自我存在。因此,族群人格与依附人格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必须消除族群人格与依附人格的消极影响,人的身心才可能得到自由和谐发展。

培育健全人格,促进身心自由和谐发展,还要扬弃个体本位下的独立人格。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商品经济时代,人的存在方式的重心开始从群体本位转向个体本位。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价值规律客观上要求经营者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生产,灵活应变,只有平等的经营者,才能有公平的竞争和发展的机会。平等性要求消灭一切等级特权,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提倡人格的独立。另外,商品经济的激烈竞争,会激发每个人的潜能和智慧,全面提升个人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到了这时,个人就有可能形成独特的主体,自主的“我”就有可能成立,人们就会产生“我只属于我自己,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属于上帝”的个体人格观念。当然,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避免不了人被置于金钱、则富等物的支配下的“异化”。这时,人从以往各种人身依附关系中挣脱出来,由共同体成员变为具有个性意识的独立个人,这些独立个人对物的利己主义追逐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残酷和对抗。并且,在贪婪的物欲支配下,人们还对自然实施了疯狂的征服和掠夺,造成人与自然的冲突。在这一阶段,人的发展特点表现为表面上的个性独立被事实上的“人对物的依赖”所代替,人成了金钱的奴隶,而形成了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所谓的现代文化价值观,所以,个体本位的生存状态并非就是人的发展的完善状态。因此,必须扬弃个体本位下的独立人格,才能促进身心自由和谐发展。

培育健全人格，促进身心自由和谐发展，就是要实现类体本位下的自由人格。个体本位下的独立人格实际上是人格形成和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具有对抗性质的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由此，人格的发展进入到第三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不同于过去那些“虚假的共同体”，共产主义是“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在联合体内不仅消除了人与人的对抗，也消除了人与自然的对抗，而人格形态特征将集中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最终形成。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人联合体”其实是一种不同于群集体的类集体，或者说“类体”。“群集体是一种超个体性的存在，而类集体则是多元复合的统一体。在前种集体中，个人只是附属于集体的一个成员，他们的价值和意义不在自身而在集体。”^②类集体则扬弃了单纯的群体性和单纯的个体性的对立，由此形成了群体性与个体性达到辩证统一的类主体人格，即真正的“自由人格”。在这种存在状态，“人”已不再是超越个体之上、存在个人之外那种“大我”，也不再是相互分裂单子式的“小我”，而是分别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体之中而又把他们统一为一体的类我的存在。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小我”和“大我”的统一体，人与人之间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个性上是充分自由的。只有在这种良好状态之中，人的身心自由和谐发展才有可能。

理工文兼收并蓄，培育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曾跟随钱学森 26 年之久的秘书兼学术助手、年届七旬的涂元季先生，2009 年 11 月 2 日接受了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的专访。涂元季先生说，“钱老晚年认真思考过杰出人才培养的问题，他的观点也由理工结合发展为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涂元季先生又说，“他经常说，学理工的，要懂一点文学艺术，特别是要学会文学艺术的思维方式。科学家要有点艺术修养，能够学会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73 页。

②《哲学的奥秘》，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2 页。

文学家艺术家那种形象思维，能够大跨度地联想。”涂元季先生还说，“他在谈到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时曾说过，科学的创新往往不是靠科学里面的这点逻辑推理得出来的，科学创新的萌芽在于形象的思维，在于大跨度地联想会突然给你一个启发，产生了灵感，你才有创新。灵感出来了以后，再按照科学的逻辑思维，去推导去计算，或者设计严密的实验去加以证实。所以科学家既要有逻辑思维也要有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是科学领域的规律，很严密。但形象思维是创新的起点。”钱学森一生兴趣广泛，知识面很宽，他不仅是科学大师，而且在音乐、绘画、摄影等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在早年求学时他虽然学的是自然科学，但同时也学过钢琴和管弦乐，曾是上海交大铜管乐团的重要成员。涂元季先生说，“理、工、文三者的兼收并蓄，这应该就是钱老心目中培养杰出人才的必由之路吧。”

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促进人才成长的优化过程，又是体现人才成长的积极成果。我们在探索人才成长的分析研究中，深深地被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所吸引，这就是：许多震古烁今的具有较高思维智能的人才，皆具有丰厚的人文艺术修养。我们发现，丰厚的人文艺术修养与人的优秀的思维智能的关系极为密切；对人进行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具有广泛内容的人文艺术陶冶，能够成为促进其思维智能发展的有力杠杆，能够为思维智能的发展开辟多种有利的途径，并且积极而持续地影响人的整个人生过程。从人的身心有机结构系统性原理看，人的各种能力是相互制约而又相互促进的，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有机和谐的统一机体。人文艺术修养与其思维智能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紧密关系，就是这一系统原理的重要体现。

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大系统中，人文艺术系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或子系统。而人文艺术系统也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复合型系统，主要是由“人文艺术知识”和“人文艺术精神”两大子系统所构成。由于人文艺术系统是由“人文艺术知识”和“人文艺术精神”两大子系统所构成，因此，人文艺术系统是既具有指向性、层次性又具有动态性、渗透性的综合体，所以，探讨人文艺术系统的基本属性，必须从多角度、多层面来加以深入分析研究，才能深刻认识人文艺术系统的丰厚内涵，正确把握人文艺术修养的特殊价值。

从基本属性上看，人文的内容分为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其本质是人文精神。人文知识是“知道”，主要以文、史、哲等为核心内容；人文精神是“体道”，其核心是认识社会、认识自我，以人为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内心的和谐。与人文内容密切相关的是人文教育，即受教育者提高人文修养，学会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处理各种关系、如何确认价值取向、如何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的过程，其目的是丰富文化底蕴、提高人文素质、培养人文情感，其核心是培养人文精神。而艺术的内容也分为艺术知识和艺术精神，其本质是艺术精神。艺术知识亦是“知道”，主要以文学（诗歌、小说、散文、杂文、游记等）和美术（绘画、雕塑、装饰等）以及戏剧、影视等为核心内容；艺术精神亦是“体道”，其核心是对人、社会、自然的审美把握，以美为本，实现艺术与人的和谐、艺术与社会的和谐、艺术与自然的和谐。与艺术内容密切相关的是艺术教育（也称之为美育），即受教育者提高审美艺术修养，学会如何发现美、如何表现美、如何创造美的能力，其目的是确立审美标准、提高审美能力、培养优美情感，其核心是培养人文精神和丰富文化底蕴。

从人文与艺术的主要内容和本质要求可以看出，人文艺术修养的基本属性是做人的一种精神素养，体现了人的品位与追求；而人文艺术修养的表现特征则是人的精神素养的积极显现，体现了人的气质与文化。努力培养和大力提高人文艺术修养，就是在积极学习、深刻理解、正确掌握、有效运用人文艺术知识的过程中，陶冶情趣，开阔视野，丰富文化底蕴，提高人文素质，培养人文情感，领悟人生价值，从而正确认识社会、认识自我，追求真、善、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内心的和谐。

树立科学精神，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对人的主体性的积极肯定，又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因为在人的主体性缺失或发挥受阻的状况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人的主体性主要是指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人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演进过程中所表现的主体地位，就是通过人的能动性、自由性和创造性来实现的。人的主体性活动（自主

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活动)与一般动物的活动属性有着根本区别。从本质上看,一般动物的活动属性都不具有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意义,因为它们没有思维、意识、精神,决定了一般动物更多的是生理活动或条件反射活动,是一种被动的或消极的活动。人的主体性活动即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活动是积极的超越活动,不是消极的受制活动。虽然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也表现在思想活动中,但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更多存在于人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只有在实践活动中取得了成绩和进步,人才真正走上了获得主体性的道路。同时,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思想活动也不能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也要联系客观活动来理解。就社会中的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来说,人的思想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必然表现为言论和某种程度的行动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上,否则思想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就是不完全的。因此,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积极的,是人在主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得到确立和发展的。

科学精神与人的主体性(即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有着密切关系。科学精神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一种自觉崇尚科学的精神状态。从科学精神的表征来看,主要内容包括理性精神、实证精神、分析精神、开放精神、民主精神、批判精神、奉献精神等诸方面。从科学精神的核心来看,要义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无论是从人的自主性、能动性来看,还是从人的自由性、创造性来看,都与科学精神内涵与表征有着密切关系,都应当是科学精神内涵与表征的重要体现。如果离开科学精神的积极引导与合理规范,人的主体性所显现的自主性、能动性、自由性和创造性就有可能成为“私欲的自主性”、“盲目的能动性”、“随意的自由性”和“灾难的创造性”。如以人的自主性来看,如果离开“奉献精神”这一科学精神的积极引导和合理规范,自主性就可能成为私欲的自主性。再以人的自由性来看,如果离开了“理性精神”这一科学精神的积极引导和合理规范,自由性就可能成为随意的自由性。科学精神中的理性精神,就是要正确把握自由与必然的内在联系,从而将人的自由性建立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上。因为人的自由受着条件的限制,而且有条件的限制是

必然的，既不能摆脱和绕开，也不能加以排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条件背后隐藏着客观的必然性。正是这种客观的必然性构成了对人的自由的根本限制。因此，必须深入考察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所谓必然，指的是客观世界的规律性，是客观世界运动变化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世界上每一种物质运动形式都有其规律性即必然性，它是一种不得不如此的趋势。同时，客观世界的必然性也会反映在主观世界之中，因此人的主观世界的活动，也有其规律性或必然性。总之，不论是自然、社会还是人自身（包括人的思维），都有其必然性。正是这些必然性构成了人所受的限制。而真正人主体性的自由，就是在科学认识必然性的基础上对客观世界的合理改造，从而突破这些限制，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

在人主体性中的创造性与科学精神中的开拓创新精神是密切相关的。创造性实质上就是创新性。人类社会的演进和自然界的演进一样，是一个有客观规律的运动过程。“但是，社会发展同自然界的发展相比较有着明显的特殊性。在自然界中，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力量彼此发生相互作用。在这个进程中，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目的发生的。然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进行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在社会生活中，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自觉的意图、预期的目的的；正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①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在人的实践活动之外，没有社会历史及其规律。人类通过劳动实践而创造了自身、创造了社会，从而才有了有别于自然界的、新的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因此，从根本上说，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人的实践和认识的创新过程，社会发展规律就是人的创新活动规律。这一创新活动规律集中体现为人的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表明人们的创造活动过程既不是封闭式的循环，也不是直线式的前进，而是螺旋式的曲折上升的无限创新运动。这个无限创新运动，从推动社会发展的运动状态上看，表现为实践和认识的创新之每一环节，都进到了比较高一级的程度。人们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已经取得的任何一项创新成果，都是社会创造活动长河中的某一“水滴”和“河段”，

^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

都是以往创造活动的终点，又是进一步创造的新起点。人们向着理想社会的创造活动是无止境的，永远都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的创新永无止境，既深刻把握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在本质，又深刻体现了社会发展规律的根本要求；既是对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之受制性的充分肯定，又是对运用社会发展规律之主体性的极大褒扬。

促进科技创新，彰显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具有丰厚内容，其核心就是关心、保障和实现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理性。促进科技创新，彰显人文关怀，就是要在深刻把握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的内在联系基础上，推动科技进步，倡导人文关怀。

其一，科技创新应与人的尊严相统一。人类与一般动物的显著区别之一，就是人有意识、有思想、有尊严。就每一个人而言，他不仅是个体的存在，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地位之中，都有他的尊严。不尊重人的尊严、损害人的尊严，就是对人格的侮辱，对人的自尊心、自信心的摧残。维护与尊重人的尊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人文关怀的一个重要内容。科技创新与人的尊严相统一，也就是说，科技创新与维护 and 尊重人的尊严有着密切的关系。科技应当成为积极维护和尊重人的尊严的重要保障，不能成为丧失人的尊严、损害人的尊严的武器或工具；而切实维护和尊重人的尊严，则是推动科技创新的根本要求，因为发展科学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为了更好地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更加充分地展示人的聪明才智，努力实现人的价值，彰显人的社会地位。因此，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是相互促进的，共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当然，保障人的尊严，还不仅是科技创新所应关注的问题。人权研究专家张千帆指出，古人云“衣食足则知荣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得到了巨大发展，但是作为有道德、有价值、有尊严的存在，人并非纯粹的经济动物；在满足温饱、进入小康之后，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更为全面地发展人性的尊严。“尊严”这个词听上去也许有点虚无缥缈，但是其实每天都伴随着我们的生活。实际上，尊严也是中国人数千年来追求的

理想。儒家正统说到底，就是一种关于尊严的哲学。君子的“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正是儒家人格的标准写照。在儒家看来，从天子到庶人都可以通过修身认识到“人人有贵于己者”，进而让自己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符合人的尊严本性。然而，尊严不仅仅是一种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而是和国家制度息息相关；在缺乏制度保障的环境下，个人生存不可能获得完整意义的尊严。而一旦人的尊严得不到基本尊重，就远不只是一个颜面受损的个人问题，整个国家都将陷入相互伤害、侮辱、践踏的人为灾难。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浩劫，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制度缺陷造成的对人的尊严的严重侵犯。因此，要恢复完整的人性尊严，首先必须完善宪法规定的某些对于公民权利和国家政治生活至关重要的制度。爱因斯坦就深刻指出：“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要是没有能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有创造能力的个人，社会的向上发展就不可想象，正像要是没有供给养料的土壤，人的个性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一样。”爱因斯坦认为，科学的发展，创造性精神的发展，需要内心的自由。他说：“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①

其二，科技创新应与人的自由相统一。充分自由也是人文关怀的一个重要内容。离开自由概念来谈论人文关怀，就如同离开人的个性特征来谈论人的共性特征一样，都是片面的。其实，自由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是被广泛使用的，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践活动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自由问题。当然，对自由的理解又确实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时甚至截然相反。如一些人把自由理解为绝对自由，把自由与自由化、自由主义等同，别人要是不认同他们的自由化、自由主义，就是反对自由，就是不自由。自由化与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同义语，标榜个人至上的绝对自由，但这种个人自由是抽象的自由，是撇开社会存在的客观现实而讲的。显然，这种自由观与人文关怀所包含的充分自由是格格不入的。

人文关怀所倡导的充分自由，不是抽象的自由，更非绝对的自由，而是

① 《〈爱因斯坦文录〉：“千年思想家”的思想》，《中华读书报》2004年6月14日。

体现人的科学把握自然、社会运动发展规律的自觉性,并将这种自觉性与客观的、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相联系,从而不断充实和提高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在积极发挥人的能动自由和创造自由之中充分展示其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成果,为实现科技创新开辟新的道路,提供新的手段,创造新的条件。

既然人文关怀所倡导的充分自由,不是抽象的自由、绝对的自由,而是在一定的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水平上所展现和享受的自由,因而也必然会受到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条件的制约。一讲社会制约,不少人往往想到的是单纯的社会约束或限制,即社会制约就是一概压抑人的自由个性,或是一概控制人的自由活动。其实,这种认识也是非常片面的。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制约,并不是指对人的自由活动的单纯约束或限制,更不是指对人的自由个性的极度压抑,或对人的自由活动的过度控制,而是在充分尊重人的自由个性、努力优化人的自由环境、积极发挥人的自由创造潜能的前提下,正确引导人的自由活动目标、积极协调人的自由活动项目、有效规范人的自由活动方式,从而在不断适应和满足个人与社会发展需求相一致的前提下,达到实现促进科技创新的目的。

当然,社会制约也离不开一定的约束、限制或控制手段,但其约束决不是盲目的约束,其限制决不是简单的限制,其控制也决不是粗暴的控制,而是对人在自由活动中所出现的不当行为的正确校正、积极规范、合理调控。因此,真正的社会制约,是建立在社会民主化与法制化相统一基础上的,决不是阻挠人的自由发展活动的随意干预,而是推进人的自由发展活动的重要保障,是为了有利于人们充分享受自由权利、积极展开自由创造活动、努力实现科技创新发展目标所应当采取的必要措施。

因此,保障与发展人的自由,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人文关怀的又一个重要内容。科技创新与人的自由相统一,也就是说,科技创新与保障和发展人的自由有着密切的关系。科技创新应当成为有效保障和发展人的自由的重要力量,因为人的自由活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依靠科学方法才能真正创造出有价值的成果,真正发挥出积极的能量;而切实保障和发展人的自由,则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条件,因为人是有主体性和能动性的,

人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有了充分的自由，个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这有利于冲破禁锢科技创新的各种障碍，科技发展也才具有巨大的活力和广阔的空间。

其三，科技创新应与人的自我理性相统一。什么是理性？理性是指对事物的冷静思考、科学把握的心理活动属性，是一种较为稳定的心理活动过程的体现。什么是自我理性？自我理性是指人对自身属性的冷静思考，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科学认知。因此，缺乏自我理性的人，一定是对事物缺乏冷静思考的人，是对自我价值缺乏正确认识的人。这种人要么是浅薄而浮躁，要么是没有主见而盲从。人文关怀就是积极引导人们确立自我理性，积极帮助人们发挥自我理性。

确立和发挥人的自我理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重要观点，也是人文关怀的又一个重要内容。科技创新与人的自我理性相统一，也就是说，科技创新与确立和发挥人的自我理性有着密切关系。科技创新应当坚决反对人的自我理性的丧失，避免人的“自我迷失”（即不知道“自我是谁”的问题，这在“网络化世界”中已初见端倪）、避免“自我混乱”（即自我的“不清醒”、“不理智”）、避免“自我异化”（即完全受制于机器、工具、网络等的绝对控制）；而积极确立和发挥人的自我理性，也是积极推动科技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因为只有真正具有自我理性的人，才能对事物有冷静的思考，不浮躁、不盲从，进而对事物进行科学的认知，并将科技发明创造成果积极地加以应用和传播，这有助于使科技朝着规范化、合理化、有序化、持续化的方向进步发展。

按教育规律办事，构建合理的教育运行机制

教育研究专家指出，从一般意义上看，教育规律就是教育现象同其他社会现象或教育现象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或彼此间的内在联系。例如，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从根本上说，要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与它的教育发展程度成正比的，这就是规律。又如，教育为人类社会所共有，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或不同的社会里有不同的性质，这主要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即受经济政治制度决

定的，这也是规律。再如儿童的年龄特征是进行教育和教学的依据，而教育又能促进儿童的身心发展，这也是教育规律，如此等等。这些规律是教育本身固有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承认教育活动的客观实在性，也就承认教育规律客观存在的实在性。

教育规律的实现有其运行特点、过程方式和重要意义。教育研究专家程少堂指出，教育规律的实现机制，即是把不能直接指导教育实践的“抽象”教育规律，在一定客观条件下，通过一系列中介环节，转化为具体指导和改造人们教育实践的过程。其特点：

1. 具有时代性。即同一条教育规律，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实现形式。
2. 具有社会性。即不同社会制度对教育规律的实现有制约、导向作用，社会主体的不同需要决定了教育规律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实现形式。
3. 具有民族性。即不同民族的教育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价值标准，各民族总是选择与本民族价值观有同构并能发生“共鸣”的方面，不适应自身的价值观则不予理会甚至予以削弱。
4. 具有依存性。教育活动受客观条件制约，决定了教育规律实现必然受客观条件制约。如“教导过程的效果规律”依赖于它赖以进行的社会物质条件和社会精神（道德的、心理的和审美的）条件。
5. 具有主体性。教育规律的实现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过程，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包括一系列中介环节，即教育规律理论化、目的化、技术化和行动化四个环节。没有高度的主体创造性，这一过程便不可能完整地实现。
6. 具有系统性。教育作为一个系统，是由“教育事业”（宏观教育）和教育活动（微观教育）两个子系统组成。在教育整体发展中，两者不是孤立地单独起作用，而是作为彼此制约、相互作用的规律网络和体系所形成的合力而发挥作用，这种合力就使教育规律的实现具有系统性特点。
7. 具有有限度性。黑格尔最早把规律和度联系起来考察，提出“规律的量的规定”概念。在表述量时指出：“它有一个幅度，在这个幅度内，它对于变化仍然是漠不关心的，它的质也不改变。但是，在这种量变中，出现了一个点，在这个点上，质也将改变”。同样，规律所显示的就是一种幅度。由此可

知，规律与度的关系：一是度即规律，二是规律有度。

教育规律是产生、形成、实现于教育活动的。深刻把握教育规律实现的运行特点、过程方式，对于当代教育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教育研究专家程少堂指出，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有助于人们科学地、准确地理解什么是“按教育规律办事”。具体讲，有以下几方面：

1. 由于教育规律实现有时代、社会、民族性特点，那就必须找到教育客观规律与所处的时代、社会、民族特点的结合点，这样才能促进教育规律“有价值”的实现。

2. 教育规律的实现是一个主客相统一的复杂过程，需要主体付出巨大努力，不仅创造条件促使教育规律实现，而且需要创造新的现象来实现教育规律，甚至可从中发现新的教育规律，这是主体性的最高表现。

3.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发展历程，其所以左右摇摆，几经折腾，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教育规律系统性缺乏正确认识。需指出的是，提倡人的“全面发展”，是按教育规律体系办事的具体表现。而孤立地看待每个教育规律作用，认为教育规律是可单独实现的，实际上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教育规律问题上的表现。

4. 据教育规律实现的限度性可知，教育规律及其实现，既有质度性，又有量度性。首先，必须明确“度”的上限和下限，在界限内办事。其次，要明确不同类别的教育规律的“度”有不同的范围。按教育规律办事就应该综合考虑影响教育的各个方面，即要有大教育观。

按教育规律办事，构建合理的教育运行机制，首先必须深入研究教育规律，把握育人的真谛。教育研究专家苏军指出：“现在是到了静下心、坐下来、深进去研究教育规律的时候了。这是因为，在近年的教育实践中，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纷纷拿出“十八般武艺”、使出“绝招妙法”之后，再回头看看走过的脚印，猛然发现仅凭一腔热血、一股热情是远远不够的。”^①

教育既是神圣的，又是微妙的。同是教育，效果却可以有天壤之别。平

① 《潜心研究教育规律是时候了》，《文汇报》2002年8月30日。

心而论,目前对教育规律的认识、研究及其实践的成效不算多。于是,在冷落教育规律的同时,一些人为盲目行事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甚至“欠债”累累。不研究教育规律,对教育就缺少“制空权”,容易为“风”所动,为“情”所驱。你看,一提实施素质教育,就以为是增加唱唱跳跳,或者弄点科技制作,造点气氛;一说要改革评价体系,就以为用A、B、C、D等第制代替百分制,就能实现真正评价;一讲研究性学习,就把做课题视为唯一途径。但得到的结果往往是不知所措,一片茫然。

因此,教育研究专家苏军认为不研究教育规律,培养人才就缺少底气,容易按习惯和个人意志行事。迄今为止,我们对学生生理成长、心理发展、认知接受等特征的认识;对处在各个年龄段的学生有什么共性、个性特点;不同家庭背景中的学生有什么不同的潜质等问题,究竟说得清多少?程式化的教育能否适应所有学生?敢不敢在事实上承认学生是有差异的?教育是不是万能的?正是在这些关键问题上,一旦驾驭不了规律,屡屡碰壁和效果不佳也就很自然了。

不研究教育规律,把教育仅仅当成了单向的知识传输的工具,把握不了育人的真谛,使鲜活的教育变成了枯燥的说教。见物不见人,见具象不见神韵,见结果不见过程,就是对目前某些教育现象的一种概括。显然,离开了育人的主旨和循序渐进的规律,一切教育只会显得苍白无力。

教育规律是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是教育工作必须遵循的客观法则。从大的方面讲,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教育培养的目标要同社会事业发展相适应,教育既要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又要具有前瞻性。从小的方面讲,人各有其面,教育的“张网”要有所倚重。教育规律,是教育现象所固有的、客观存在的;只要教育现象存在,教育规律就要发生作用。教育在任何状况下都要受到自身规律的制约,一般规律存在于一切教育现象之中,并始终贯穿于教育发展的整个过程。特殊规律,则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教育对象的特殊性。

诚然,教育规律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社会进步而发展的。尊重教育规律,就要既尊重又不拘泥于客观的固有的历史,更注重变化和新的发展。教育规律是可以认知的。人们通过探究而使自己的认识接近规律,从而使工

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教育现象捉弄我们，是因为我们对教育规律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敬而远之”或“大而化之”的态度。无措，是因为我们没有规律的“脚本”；无望，是因为我们缺少深究的“底蕴”；无奈，是因为我们失去工作重心的“秤砣”。急功近利的浮躁，蜻蜓点水的满足，使教育工作远离了教育规律。

教育研究专家苏军认为，今天重提要重视对教育规律的研究，是因为现在的社会风气和心态并不一定利于潜心研究氛围的形成，而教育则要耐得住寂寞，抗得住潮流，顶得住诱惑，识得了经纬。而且还要造成上至领导下至一般教育工作者及家长，人人都来关注教育规律的研究与实践的局面。这样，可以少走弯路，逐步走进教育的“自由王国”。看来，这堂“必修课”该抓紧普及了！

按教育规律办事，构建合理的教育运行机制，必须建立合理的学科专业结构，提倡学术民主。曾跟随钱学森26年之久的秘书兼学术助手、年届七旬的涂元季先生，2009年11月2日接受了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的专访。涂元季先生在谈到钱学森对学科专业结构的认识时说：“他的基本观点是，我们的学科专业不能分得太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学习苏联实施教育改革以后，按照苏联的模式，大学学科专业都分得很细。”涂元季先生说，“在钱老内心里面，他对苏联那一套不欣赏，他比较欣赏美国的那一套，就是理工结合。这源自他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的亲身体会。”涂元季先生还说：“钱老回国后，对这个问题就一直有看法、有意见，他认为学科分得这么细，培养不出拔尖人才。尽管囿于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他不能提出这些意见，但在工作中他还是尽其可能积极而巧妙地推动一些改革。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立时，他作为倡导者之一，就是按照理工结合的模式设置专业与课程的。为给学生打下深厚的理论功底，他曾经邀请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和化学家蒋丽金为他执教的近代力学系的学生分别讲授物理和化学。”“钱老反复强调，杰出人才的产生离不开宽松的学术氛围，办大学要有一种很宽松的学术氛围啊！”涂元季说，“钱老当初在加州理工学院时，学术氛围非常民主，他挑战过一些学术权威。他晚年多次说过，要敢于培养年轻人挑战权威才行啊，‘学术权威把着位置，他往那儿一坐，旁

边的人都不敢说话了’，这哪行啊。”可见，按教育规律办事，构建合理的教育运行机制，必须建立合理的学科专业结构，提倡学术民主。

按教育规律办事，构建合理的教育运行机制，必须明确教育价值和教育目的。恩格斯曾深刻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的活动，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意图，没有预期目的的。”这也就是说，任何社会活动都是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不存在没有意识、没有目的的人的社会活动，社会活动与自在自然的区别在于其意识目的性。教育活动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一样，是一种意识目的性的活动，是观念建构起来的教育价值、教育目的的对象化的活动。尽管教育活动受客观必然性制约，但教育活动的客观性不仅不排斥主观应然性因素——教育价值、目的的作用，而且必须以主观应然性因素的作用作为自身存在的前提和构成自身的必要环节；所以，教育规律不仅包含着客观性侧面——因果必然性联系，而且包含着主观性侧面——应然性联系；教育活动的结果就不仅包含着客观原因的作用，而且包含着主观性的教育价值、目的的作用。应然性联系与客观性联系一样是教育活动的基本联系。由此看来，以教育活动的理解方式来理解教育规律，把教育规律理解为教育活动的规律，就应把应然性的教育价值、目的理解为教育规律的内在构成，就应把教育的目的性联系或应然性联系理解为教育活动的规律。教育研究专家吴全华指出：“我们在看待教育规律时，强调教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对教育规律的客观性追求是应该的，但在强调和追求教育规律的客观性时，却不能把本来是内在于教育规律的应然性因素——教育的价值、目的用纯客观性要求给消解了。人们对于教育规律的理解，不在于是否承认教育规律有没有教育价值、目的设定，而在于如何建构合理的教育价值、目的并以此来指导教育活动。”^①

按教育规律办事，构建合理的教育运行机制，必须消除行政化管理方式。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高校去行政化真正含义是按教育规律办

① 《教育规律的理解方式与教育规律的特点》，《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2期。

教育”。据新华网北京2010年3月9日电（记者邹伟）：“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需要有另外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能够让学校能更好地与外界交流对接，以利于争取到更好的制度环境和办学条件。”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围绕高校去行政化这一热点话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纪宝成说，“我觉得，去行政化这个概念本身，需要进行讨论和界定。”纪宝成认为，去行政化的真正含义，应该是按照教育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和学术发展规律办教育，而不要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和思维来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在纪宝成看来，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讨论，一个是政府和学校之间的关系，一个是学校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纪宝成指出：“公立学校是由政府来管理的，但不应该是政府的附属物。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尊重教育规律、学术规律，落实大学的法人地位和办学自主权，不能单纯用行政眼光、行政思维，用处理行政事务的手段对待学术和学校事务。不应该再使用‘部属’、‘省属’高校这样的说法，应该改为国立的、省立的高校。这个观念需要得到改变。”纪宝成认为，用行政思维管理高校学术事务的表现很多，从招生录取到经费使用，从科研项目安排到教学改革，不少都要有上级部门审批；大学领导因学术活动出访也要按行政官员一样审批等等。纪宝成认为，这次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对此有比较大的改进，把更多的自主权给学校，这是非常正确的，是在按教育自身的规律办事。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 列宁.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6]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教育[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9] 袁贵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

[10] 龚育之.论科学精神[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1年版。

[11] 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N].新安晚报,2009-11-11。

[12] 黄济,王策三.现代教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3] 季建林.“官本位制”严重危及党的宗旨[N].社会科学报,2009-12-24。

[14] 吴灿新.官本位意识是和谐社会的宿敌[J].嘉应学院学报,2006(1)。

- [15] 和静均. 日本为何出现“公考冷”[N]. 报刊文摘, 2009-12-9.
- [16] 郭少峰. 大学官本位影响发展 急功近利将导致学术浮躁[N]. 新京报, 2007-9-9.
- [17] 大卫. 陈丹青: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9-11-27.
- [18] 吕宗恕. 安徽大学名教授称学校行政化严重申请提前退休[N]. 新京报, 2007-5-16.
- [19] 曹林. 从落榜状元悲喜遭遇看教育泛行政化之弊[N]. 燕赵都市报, 2005-9-16.
- [20] 袁敏. 倡导敬业精神 抑制浮躁学风[J]. 黑龙江教育, 2008(1).
- [21] 王守法. 合理构架大学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N]. 光明日报, 2009-10-12.
- [22] 姜英杰. 非理性的超前教育: 关于早期教育科学性的思考[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6).
- [23] 刘业文. 早期教育不等于超前教育[J]. 成都教育学院学报, 2006(8).
- [24] 赵碧霞. 超前教育要有“度”[N]. 星星生活周报, 2006-1-23.
- [25] 苏令. 超前识字: 有毒的儿童“催熟剂”[N]. 中国教育报, 2010-3-10.
- [26] 小原国芳. 小原国芳教育论选著[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
- [27] 牛翠平. 幼儿需要什么样的识字教学[N]. 中国教育报, 2010-3-10.
- [28] 郑伊凡. 幼儿德育与家庭教育关系探究[J]. 探索, 2009(10).
- [29]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陈鹤琴教育文集[C].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3年版.
- [30] 刘晓东. 论教育与天性[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4).
- [31] 章敏. 浅谈减负与心理健康教育[J]. 校园心理, 2009(4).
- [32] 鲁林岳. 综合辩证论“减负”[J]. 民主, 2007(7).

- [33] 曹晓玲. 减负≠快乐学习 [J]. 科技信息 (学术研究), 2008 (8).
- [34] 曹文哲. 作业的重负 [J]. 小学生, 2004 (1).
- [35] 安雅. 给书包“减负” [J]. 绿色中国, 2007 (24).
- [36] 辜胜阻. 减轻学生过重负担, 大力推进素质教育 [J]. 教育研究, 2000 (5).
- [37] 董城.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令人担忧 [N]. 光明日报, 2006-12-18.
- [38] 卫萍, 葛明贵, 陈雪梅. 合肥 848 名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 [J]. 合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6).
- [39] 肖云龙. 脱颖而出——创新教育论 [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40] 武国华. “减负”为何会成为“负减”?——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金芳女士 [J]. 教育 (双周刊), 2006 (1).
- [41] 刘得本. 给童心减负 构建和谐教育 [J]. 科技教育, 2007 (4).
- [42] 王复亮. 创新教育学概论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年版。
- [43] 王伦信. 文理分科与并科的演变和取舍 [J]. 素质教育大参考, 2009 (8).
- [44] 马思援. 文理分科: 历史视角下的实践和争议——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田慧生研究员 [N]. 中国教育报, 2009-5-19.
- [45] 朱永新. 文理分科的四大弊端 [N]. 科学时报, 2008-12-3.
- [46] 康翠萍. 高中阶段不宜实行文理分科 [J]. 教育研究, 2009 (4).
- [47] 钱钟韩. 院士成才启示录 (下册) [M]. 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03 年版。
- [48] 顾明远. 解放思想是深化教育改革的金钥匙 [J/OL]. 人教网, 2009-3-9.
- [49] 董志伟. 高中文理分科, 利焉? 弊焉? [J]. 河北教育, 2009 (3).
- [50] 庞守兴. 高中文理分科讨论中的误区 [J]. 教育情报参考, 2009 (11).
- [51] 虞水洪. 建议取消高中文理分科教学 [N]. 新京报, 2010-3-15.
- [52] 郭振有. “减负”的难为与可为 [J]. 中国教育学刊, 2009 (4).
- [53] 袁忠群, 刘智平, 黄杜樱. 关于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两条建议 [J].

广东教育, 2010 (1)。

[54] 刘海峰. 高考竞争的本质与现象 [J]. 高等教育研究, 2006 (12)。

[55] 刘蒙, 王越, 吕营. 文理分科, 关键在高考指挥棒的改革 [J]. 现代经济信息, 2009 (12)。

[56]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关于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建议 [J/OL]. www.sina.com.cn2009-6-14。

[57] 叶祝颐. 高考多元化改革需配套措施跟进 [N]. 西安日报, 2010-3-14。

[58] 姜泓冰. 本专科分开考试具破冰意义 [N]. 京华时报, 2010-3-14。

[59] 沈晓丽, 张向阳. 本专科分开高考? 厦门家长多反对专家建议试点 [N]. 海峡导报, 2010-3-14。

[60] 刘尧. 走出精英教育误区 [N]. 社会科学报, 2010-2-25。

[61] 顾春梅. 大学到底要什么 [N]. 解放日报, 2010-1-28。

[62] 曹顺庆. 无学术大师时代的文艺学危机 [N]. 社会科学报, 2009-12-24。

[63] 李雨洋. 撬动中国顶级教育制度锈轮 [N]. 社会科学报, 2009-12-10。

[64] 郭世佑. 博士生教育之患 [N]. 南方周末, 2005-5-5。

[65] 高文书. 终身学习视角下的中国继续教育现实需求分析 [J]. 继续教育研究, 2009 (5)。

[66] 白冰如, 邵萌, 刘颖. 企业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的分析、探讨 [J]. 继续教育, 2001 (4)。

[67] 张国安. 我国公务员继续教育途径新探 [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08 (2)。

[68] 促萍. 当前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J].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8 (6)。

[69] 十堰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校本培训实验课题组. 校本培训“三型十环”模式的构建 [J]. 中小学教师培训, 2001 (10)。

[70] 论语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4 年版。

[71] 孟子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 [72] 老子·庄子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6 年版。
- [73] 陈小鸿. 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 [74] 黄玉顺. 中国传统的自由精神 [J]. 理论学刊, 2001 (4)。
- [75] 洛克. 政府论 (下篇) [M]. 叶启芳, 瞿菊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
- [76] 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 [77]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上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
- [78] 黑格尔. 历史哲学 [M]. 张作成, 车仁维编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8 年版。
- [79] 李红专, 杨胜荣. 西方哲学中“发展”涵义的演变与反思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2)。
- [80] 郭晓君.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初探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7 (2)。
- [81] 董果良等译. 圣西门选集 (第三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 [82] 柯象峰等译. 欧文选集 (上)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
- [83] 尚伟伟. 论人的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的关系及其历史进程 [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09 (3)。
- [84] 欢子, 路琰. “富翁”袁隆平的幸福生活 [J]. 环球人物, 2008 (15)。
- [85] 钟沛璋. 《爱因斯坦文录》: “千年思想家”的思想 [N]. 中华读书报, 2004-6-14。
- [86] 余潇枫. 哲学人格 [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 [87] 高清海. 哲学的奥秘 [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 [88] 寇东亮. 人的发展与人文精神 [J]. 探索, 1999 (4)。
- [89] 俞吾金.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必须协调发展 [J]. 探索与争鸣, 1996 (1)。
- [90] 苏军. 潜心研究教育规律是时候了 [N]. 文汇报, 2002-8-30。
- [91] 吴全华. 教育规律的理解方式与教育规律的特点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4 (2)。
- [92] 曾明德. 战略思维与中国发展战略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3

年版。

[93] 江苏省委宣传部调研组. 把着力点放在人的全面发展上 [J]. 求是, 2005 (13)。

[94] 高玉祥. 健全人格及其塑造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95] 卫异, 左振璞. 青少年人格塑造: 马加爵案件的心理学思考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96] 袁金辉. 邓小平人格 [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97] 李维. 心理健康百科全书 第 5 卷 人格发展卷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98] 聂衍刚. 智力与人格协调发展的教育 [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99] 斯迈尔斯. 砺炼完美人格 [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100] 陈盛荣. 高校人才发展战略 [M]. 北京: 中国人事出版社, 2005 年版。

[101] 诺斯拉特佩塞施基安. 积极心理治疗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

[102] 张应抗, 万斌.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论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103] 张玉芬. 大学生人格教育 [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6 年版。

[104] 卡尔. 积极心理学 [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8 年版。

[105] 高敏. 高中该不该“文理分科” [N]. 重庆时报, 2009-2-8。

[106]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征求意见稿) [S]. 人民网, 2010-2-28。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中国教育怎么了 求解“钱学森之问”

作者= 庞跃辉，史银著

页数= 257

S S 号= 12732653

出版日期= 2010.11

前言

目录

序

引言 反思“钱学森之问”

第一章 教育观念有偏颇

第二章 教育管理过度行政化

第三章 幼儿教育超前成风

第四章 小学教育负担过重

第五章 中学教育陷入文理分科的泥淖

第六章 大学教育步入单向度误区

第七章 继续教育有名无实

结束语 教育的真谛：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